

國家圖書館



001574349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專書第一號

# 九〇年代的台灣社會

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系列二（下）

張荳雲·呂玉瑕·王甫昌 主編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月

第 24 卷

第 1 期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專書第一號

# 九〇年代的台灣社會

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系列二（下）

張荳雲·呂玉瑕·王甫昌 主編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敬贈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TH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五月·台北南港



09>3>  
53:2  
2

## 下冊目錄

助力與阻力之間：家庭互動關係與 已婚婦女就業 .....	呂玉瑕	1
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對台灣已婚婦女 就業與收入之影響 .....	陸先恆·胡美珍	41
性別、婚姻與家庭對心理焦鬱的影響： 變遷中的台灣社會個案研究(英文) .....	孔祥明	87
中國家庭價值觀的持續與改變： 台灣的例子(英文) .....	蔡勇美·伊慶春	123
台灣民衆之孝道觀念的變遷情形 .....	葉光輝	171
嚴酷教養方式之代間傳承 .....	吳齊殷·高美英	215
結構限制、運動參與、與異議性意識： 台灣民衆政黨支持的社會結構基礎初探 .....	王甫昌	249
當代台灣社會的信任與不信任 .....	張苙雲	295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劃 .....		333
作者簡介 .....		338

國家圖書館



001574349

100827869

# Contents

## (Part II)

Facilitation or Inhibition: Family Interaction and Married Women's Employment .....	Yu-Hsia Lu	1
Complementarity of Work and Fertility and its Effects on Mid-Life Income and Employment among Mothers in Taiwan .....	Hsieh-Hen Lu and Mei-Chen Hu	41
The Effect of Gender, Marriage, and Family o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 Case Study of Taiwan's Changing Society .....	Hsiang-Ming Justine Kung	87
Persistence and Changes in Chinese Family Values: The Taiwanese Case .....	Yung-Mei Tsai and Chin-Chun Yi	123
Changes in the Taiwan People's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	Kuang-Hui Yeh	171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Harsh Parenting .....	Chyi-In Wu and Meei-Ying Kao	215
Structural Constraint,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nd Dissent Ideology: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Social Structural Bases of Party Support in Taiwan .....	Fu-Chang Wang	249
Trust and Distrust in the Taiwanese Society .....	Ly-Yun Chang	295
The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		333
Contributors .....		338

# 助力與阻力之間： 家庭互動關係與已婚婦女就業\*

呂玉瑕\*\*

## 摘要

本研究根據 1991 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查驗家人互動因素與妻子就業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家人互動關係對妻子就業行為是一個助力也是一個阻力，因家庭情境而異。本文指出了過去研究以靜態家庭結構型態預測已婚婦女就業的缺失，由於家庭組織影響個人行為的複雜性，必須深入動態的家庭角色互動過程才可能解釋家庭對女性就業行為的影響。

本研究使用多項邏輯迴歸分析，研究結果指出妻方親屬互動關係顯著的有利於妻子的就業，而夫方親屬的來往對妻子就業無顯著影響，可能因妻方親屬協助家務以及育兒，降低了妻子就業的成本。本研究亦指出在家庭互動關係中妻子的照顧角色對妻子就業有負面影響。當家中有照護需求時，家人的角色會經歷調適的過程，然而可能因家庭經濟狀況而異。家庭收入較高的妻子由於家庭時間的價值比市場時間高，較可能離職或改變就業型態以便調適照顧工作，在收入低的家庭，妻子就業型態沒有顯著的不同。可能收入低的家庭因需要妻子的收入

---

\* 本研究承蒙中研院民族所提供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謹此致謝。特別感謝李美玲教授以及三位匿名審查人給予寶貴意見，研究助理梁燕蕙小姐協助資料處理。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

而採取不同的照顧調適。另一方面，雖然教育程度較低者市場時間價值較低，由於教育程度較低的妻子較可能從事可同時兼顧經濟角色與照顧角色的非正式就業，因此並未比教育程度較高者更可能離職或改變就業型態來調適照顧角色。



# **Facilitation or Inhibition: Family Interaction and Married Women's Employment**

Yu-Hsia Lu

##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interaction and wives' employment based on the 1991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family interaction may facilitate wives' employment in some circumstances but may inhibit it in others. They thus reveal that the complexity of the family organization's influence on individual behavior requires in-depth analysis of role interaction dynamics among family members.

Based on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interaction with wives' relatives, not with husbands',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wives' employment.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support from wives' relatives substitutes for wives' familial roles and thus lowers the cost of wives' employment. The findings also indicate that wives' caregiving role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wives' employment, but effects may vary with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In the case of family caregiving, wives from higher income families are more likely to quit jobs or change employment patterns to adapt to the role of caregiving, with a higher value on family time rather than market time. On the other hand, although lower-educated wives may give a lower value to their market time, they are no more likely to quit their jobs or change their employment patterns for adaptation;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lower-educated wives are more likely to work on an informal base which is compatible with the caregiving role.

# 助力與阻力之間： 家庭互動關係與已婚婦女就業

## 緒論

在已婚婦女勞動參與行爲的研究裡，家庭組織的影響是倍受注意的，因對大多數已婚婦女而言，其生活的領域及所扮演的角色，仍以家庭爲主，其就業的選擇亦通常在家庭組織情境中做決定。過去研究發現家庭經濟、子女數、家庭發展階段皆對妻子就業有顯著影響（張清溪, 1980; 謝雨生, 1982; 張素梅, 1988; 劉鶯釧, 1988; 呂玉瑕, 1992）。然而同住家人間的互動關係對妻子的就業選擇的影響則較少被提到。

過去有些研究用家庭結構或居住安排型態作爲互動的指標，來檢驗家庭互動因素與妻子就業的相關（謝雨生, 1982; 張清溪, 1982; 呂玉瑕, 1992; 齊力, 1991），研究的結果並未得到一致的結論，而多數研究顯示家庭結構的影響不顯著。可能因爲靜態的家庭人口結構或組成未能涵蓋錯綜複雜的家人互動關係，另一方面家庭互動對於妻子就業的影響因著不同的家庭組織情境而異，需進一步深入分析家人互動的內容才可能釐清兩者間相關。本研究的目的即是分析家人互動的情境因素，探討家庭互動對於妻子就業行爲是一種助力，還是阻力？或是因家庭組織情境而異？

隨著台灣的經濟發展，就業婦女的比率逐年上升，女性的勞動參與對於數十年來以勞力密集產業爲主力的台灣經濟發展有極大貢獻。由勞動力統計資料來看，近十年來婦女勞動力的增加主要是已婚婦女

的大量湧進。由於勞工短缺，吸引更多已婚婦女就業已成為紓解勞力短缺的途徑之一。因此已婚婦女就業的問題也廣受社會大眾及人力運用決策當局的注意。

本研究的目的是察驗家人互動關係對已婚婦女就業選擇的影響。雖然女性勞動參與率提昇了，但是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角色規範仍相當的持續，在女性以家庭角色為主的情況下，女性的就業選擇是家庭組織情境下的考慮。從家庭組織是一個整合的系統的觀點，家庭組織內成員的行為、態度及價值在日常生活的互動中相互影響，個人的資源、利益、需求也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影響彼此的行為及決定。家庭成員按其相屬關係扮演不同角色彼此調適，使家庭功能正常運作。在家庭的發展過程中無論受外在環境的影響或組織內部引發的改變皆可能影響其他部份的變遷，任何一個家人角色的變遷都可能引起其他角色的變遷。在家庭的發展過程中，以及在外部或內部因素引起的家庭變遷中，家人行為及價值藉著角色互動的過程可能會相當程度的影響女性就業的選擇及行為。

理論上，家人互動關係對已婚婦女就業可能有正面的影響，也可能有負面的影響。誠如 Wallman (1984:25) 所說，家人可以同時是經濟負擔及情感資源，在不同情境下可以是支持的來源，也可以是心理壓力的癥結所在。一方面，家人可能取代妻子的家務角色，降低了妻子就業的成本因此有正面的影響，尤其當妻子的收入對家庭經濟而言是不可少的時候。另一方面，妻子的照顧者的角色可能增加就業的成本，因此需照顧的家人對於妻子就業有負面的影響，尤其是當家中有長期臥病的家屬需居家照護時。

以家人互動對妻子就業為一種助力而言，通常同住或經常來往的家人最可能在妻子需要時幫忙家務，因此是妻子就業時最有效率的家務角色取代來源。以幼兒托顧為例，一般來說，大多數有學齡前幼兒的已婚婦女就業時，協助照顧幼兒者以親屬為主。根據 1980 年人力資

源統計，台灣的幼兒照顧方式，父母照顧者遞減（表示有學齡前幼兒的母親勞動參與率增加），他人照顧方式包括親屬照顧、家庭托養及機構照顧，其中以親屬照顧比率最高且逐年遞增，由1980的12%增至1990的20%。而由過去研究知，協助照顧的親屬以夫妻雙方的父母為主（內政部，1989；胡幼慧，1995），因此家人的協助對婦女就業有重要的影響。

另一方面，從傳統的性別角色定位及從婦女的照顧者角色來看，在不同情境下，同樣的家人間的互動關係可能對妻子的就業有負面的影響。一般而言，當家人有較傳統的家庭價值觀念時，會伴隨較傳統的性別分工方式，強調妻子的家庭角色而較少支持其出外就業。一項對已婚職業婦女的研究指出家人對於妻子就業的態度會影響她本人的就業行為。配偶、父母或公婆愈贊成妻子出外就業時，妻子越傾向於外出工作（伊慶春，高淑貴，1986）。除了家庭分工可能對妻子就業的限制，妻子的照顧者角色亦可能是就業阻力的來源。當家中有因年老或疾病需依賴他人照顧時，在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之下，妻子及媳婦往往是理所當然的照顧者。在面臨照顧角色壓力時，妻子不大可能工作，即使不得不工作（如經濟因素的考慮），亦可能需要調整工作角色使能兼顧照顧角色。也就是說，在照顧家人的角色壓力下，已婚婦女就業的成本便相對提高。

總之，在傳統性別角色仍持續的現代台灣社會，妻子的就業選擇往往是家庭組織情境下的考慮，而家人互動關係是家庭組織的動態展現，家人互動關係隨著家庭組織情境而變化，對於妻子就業也會有不同的影響。

## 研究架構

本研究探討家庭組織中家人互動與女性就業的關係，主要是從社

會交換論的觀點。社會交換論主張個人是行動的主體，其行動乃一理性選擇 (Blau, 1964)，衡量該行動的成本及利益選擇最小成本及最大利益，以便取得最大效用的結果。這樣的觀點應用在勞動參與的研究上時，個人是一個決策者，在個人、家庭及勞動市場條件之限制下以最大效用的原則衡量勞動參與之成本利益選擇最大利益或最小成本的結果 (Blau and Ferber, 1986)。女性的工作選擇，卻不只是經濟上實質利益的考量，而是價值上的考量，在講求和諧的家庭制度中，個人的權益必須置於家庭整體權益之下，追求家庭的整體利益的價值觀導引女性工作的動機及選擇，成為工作選擇的理性考量 (呂玉瑕, 1996)。根據這樣的觀點，已婚婦女的工作選擇是由他們對於工作成本及利益的認知而決定，也就是由時間的市場價值及家庭的價值而決定。若在勞動市場工作的酬勞的價值比留在家庭的價值高，他會選擇工作來取得最大效用。相反的，若認為家庭時間比工作的價值高則不會去工作。若一個因素會增加工作時間的價值，也就是會增加女性工作的可能性，若一個因素會增加家庭時間的價值，就會減少工作的可能性。這樣的觀點是把女性個人當作行動的主體，在家庭及社會的資源及限制下做出決定，建構她的生活。這樣的觀點也指出女性的社會化背景可能影響她選擇時的價值判斷，也指出她的選擇是反應勞動市場的工作機會以及家庭組織提供的資源或限制，因此將提供較完整的研究架構來分析家庭組織中女性工作選擇與家人互動的關係。

由社會交換論出發分析家庭互動對女性就業的影響，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負面的，依照家庭不同的情境而異。同住或住在鄰近的家人可以取代妻子的家務角色協助家務或照顧小孩，使她降低就業的成本，增加妻子出外工作的可能性，因此有正面的影響。然而家人互動關係對女性就業的影響也可能是負面的，當有家人因年老或疾病而需長期照護時，妻子的家庭時間價值可能比勞動市場時間價值高，她可能選擇不工作或調整工作時間以便提供照顧。

關於家人互動對於妻子就業有正向影響的論點在過去的研究已得到部份的支持，然而需進一步探討。過去研究發現，與妻方父母之同住關係對妻子就業有顯著的影響，與娘家同住者遠較不同住者就業的可能性高，然而與夫方父母同住與否對妻子就業的影響不顯著（呂玉瑕，1991）。該研究以靜態同住關係而不是動態的互動關係為指標，然而卻不難從這樣的研究結果看出背後隱含的家人互動關係影響的機制；由於與妻方親屬同住並不符合我國傳統規範，可能年輕夫婦是因為妻子就業需要協助家務及育兒，才與娘家同住，因此娘家親屬對於已婚婦女就業可能有積極的支持作用。

李美玲的一項台灣老人的居住安排的質性研究亦指出，兒媳都要工作時，多數老年父母扮演照顧孫子及協助家務的角色，父母的協助對年輕夫婦而言，相當重要（李美玲，1994）。胡幼慧的關於婆媳家事交換的質性研究則進一步指出，在年輕人外移和進入勞動市場時，老年婦女承擔家務及托孫以低階層家庭較多，中產階級的家庭，在經濟條件允許，且父母不必依靠兒子經濟供養之下，家務或幼兒照顧多以市場服務而不是父母協助來取代自己的勞力（胡幼慧，1995）。

關於親屬網絡支持對於婦女就業的正面影響，本研究將分析夫方及妻方親屬同住的型態及互動關係對妻子就業行為的影響。過去台灣的家庭研究指出，雖然擴展家庭的比例逐漸降低，仍有近七成的老年父母與已婚子女同住（陳寬正和賴澤涵，1980；陳肇男，1996）。而人類學的研究亦指出，雖然擴展家庭式微，同胞兄弟的核心家庭之間，及與本家族之間仍然保持密切接觸，經濟上互通有無，這樣的家族型態在台灣相當普遍，是適應工業化及現代化過程的產物（莊英章，1972；謝繼昌，1981；Wang, 1985）。國外早期的家庭研究指出，在維持親屬的互動關係上，妻子比丈夫扮演更重要的角色（Sweetser, 1963）。就情感上的來往而言，女性與父母親的來往比男性更密切，女性從父母親所得到的支持也較多，主要是協助家務及子女照顧（Eggebeen and

Hogan, 1990)。就妻子的就業選擇而言，可能由於妻子與家族之密切互動，同住或鄰近的親屬協助妻子的家務角色，減少妻子就業的成本。

然而另一方面，照顧家人及家族間的守望相助或安排家族活動(如婚喪宴客、祖先祭祀)可能增加了妻子就業的成本，以至於限制了妻子就業或就業方式的選擇。關於家庭互動對於妻子就業的負面作用，可能是由家庭互動中女性的家庭角色而來。當老年父母因年老或疾病需照顧時，在家庭性別分工的傳統下，照顧者通常是媳婦或妻子。過去一些居住安排以及老人照顧的研究揭示了女性照顧的可能性及普遍性：大多數的老人認為健康及經濟狀況許可的情況，與子女分開住比較理想，但健康不佳時希望與子女同住(李美玲, 1994)，國內老人臥床慢性病照顧的研究則發現，老年男性的照顧主要是依賴妻子，而老年女性的照顧則依賴下一代的媳婦(胡幼慧, 1995)。根據調查，老年男性臥病者中，45%的照顧者是其配偶，而媳婦佔22%。若老年女性臥病則51%由其媳婦照顧(內政部, 1989)。因此，在缺乏長期照護的公共資源的狀況下造成家庭依賴高，而在父系家庭體制下女性承擔最重的負荷(胡幼慧, 1995)。

對於家庭互動對妻子就業的負面作用，本研究將把焦點放在有家人因年老或疾病而需長期照護的家庭，分析妻子作為照顧者的角色對於其就業行為有何影響，這影響是否因家庭社經狀況以及妻子個人的人力資源因素而有差異？家中有需長期照護的老人或病患是一個生活事件(life event)，家人因應這事件的方式及過程會影響婦女就業的選擇及調適。對家庭而言，家中有人需長期照顧時，家庭便要發揮保護功能，運用可能的資源照顧病患。照顧家人所需的醫療資源及人力將使得家庭資源及成員的分工需重新調整，調適的方式及過程因家庭的人口結構及經濟狀況而異。

依循傳統性別角色規範通常女性(如前述多數是病患的媳婦或妻子)承擔照顧者的角色。以照顧者角色而言，家有長期病患時婦女會

面臨角色衝突，家務及工作角色都要重新調整。家庭內的調適方式也是家庭互動的結果。可能因家庭內成員人力資源或個人投入照顧工作的意願不同而有差異。國外的研究顯示，在面臨家庭照顧的需求時，若照顧者已有工作，會調整就業型態來適應照顧的責任，但調整的方法及程度因人而異 (Franklin et al., 1994; Anastas et al., 1990; Scharlach and Boyd, 1989)。

以女性的照顧角色而言，可能的調適方式有：(1)家庭時間價值較高時，全時間從事家庭照顧，不從事經濟性工作，(2)調整工作方式，例如減少工時或從事彈性時間的工作，以便兼顧工作與照顧的角色，(3)此外，基於家庭分工效率的考量，如妻子或媳婦工作較穩定或收入較高時其勞動市場時間價值比家庭時間價值高，可能會選擇出外工作，而照顧工作由其他家人負責、大家輪流做或雇人。

根據以上探討，本研究分析家人互動對妻子就業的正面及負面的影響時研究假設是：

- (1)家庭互動過程中，夫(妻)方親屬在勞力及資源上的協助可能取代妻子的家務角色因此減少其就業的成本，對妻子就業有正面的影響。
- (2)妻子在家人互動上的照顧者的角色提高其家庭時間的價值，對其就業有負面的影響。
- (3)家庭互動對妻子就業的正面或負面影響程度因家庭經濟狀況及妻子的個人資源條件(教育程度或工作能力)而不同。

## 已婚婦女的就業型態

本研究根據台灣產業及勞力市場的結構以及婦女工作的特質將就業型態分為正式就業、非正式就業以及不就業，而不只是就業與否。在台灣的經濟組織的特性之背景下，已婚婦女在非正式部門從事自雇工作或為自己家庭事業工作的不在少數。已婚女性就業機會的擴張與



台灣產業零細化及家庭企業蓬勃有密切關聯。在家庭企業中，家庭成員的參與是極普遍的，而家庭勞力中以已婚女性最多，根據人口統計資料，以小型企業的無酬家屬來看，已婚女性參與率一向偏高（附錄一），1980至1990之間已婚女性無酬家屬參與率在三成左右。可見為家庭事業工作是已婚婦女重要的就業選擇，過去對已婚婦女就業的研究大都將就業行為二分為就業及不就業，忽略了為家庭工作或其他非正式就業者的工作屬性，是不合適的。

若女性在選擇就業時看待家庭工作與其他受雇工作是有區別的不同選擇，而研究者分析就業行為時只考慮就業與否之區分便模糊化了女性就業行為的內在概念，進而導致分析模型上之界定誤差（specification bias）。顯然的，受雇工作與家庭工作有區別，女性在選擇受雇工作時，需要考慮到一些成本的問題，如子女照顧、交通時間及費用的問題。為家庭工作時間較有彈性及可能兼顧家庭，因此工作成本較低，但須考慮家庭事業本身的需要。

## ✓ 影響已婚婦女就業的因素

在分析家庭互動因素對於妻子就業的影響時，同時要控制其他可能影響妻子就業的因素，根據過去文獻，較重要的影響因素包括：妻子的年齡、教育程度、性別角色態度、城鄉別居住地、遷移經驗、勞力市場工作機會、家庭收入、子女數、家庭生活階段，分述如下。除了以下探討的因素以外，其他家庭成員的資源、行為及態度也可能影響妻子的就業與否，因為資料的限制，未考慮在分析模型中。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越高，愈具有工作所需能力與態度，也愈可能得到地位及所得較高的工作，增加女性市場工作時間價值，因此對女性就業有正面影響。過去研究的發現也證實了教育程度對已婚女性就業的顯著的正向影響（張清溪，1980；張素梅，1988；劉鶯釧，1988；呂玉瑕，

1992)。

**年齡：**年齡與個人的工作體能有關，也表示個人社會化的時代背景，因此可能影響已婚女性就業的選擇。

**勞動市場工作機會：**勞動市場工作機會對已婚女性從事受雇工作有正面影響（張素梅，1988；劉鶯釧，1988；呂玉瑕，1992），因在當地勞動市場的工作機會愈多，找尋工作成本愈低。

**性別角色態度：**妻子的性別角色態度表示她對工作角色及家庭角色的看法，可能影響她的工作決策以及家庭的分工，過去許多研究發現性別角色態度影響女性的勞動參與（Thornton et al., 1983; Lu, 1992, 1993）也可以預測家務分工（Barnett and Baruch, 1987, 唐先梅, 1996），家庭照顧本身是家庭勞務的一種型態，因此家庭照顧的分工也會受到性別角色態度的影響。若女性較傾向傳統的性別角色態度，則家庭時間的價值較高，對就業有負面影響。

**居住地：**城鄉地區在產業結構上有別，提供的工作機會也不同，可能影響妻子就業選擇。過去研究發現鄉村婦女比都市的婦女更可能就業（張清溪，1980；呂玉瑕，1992）。可能在鄉村所提供給已婚女性的工作機會，如農場工作或家庭代工，較可能兼顧家務角色。因此住在鄉村的已婚女性較城市的更可能從事經濟性的工作。

**遷移經驗：**過去關於非正式部門的研究指出鄉村遷移到都市者因缺少工作技能及人脈關係，無法進入正式部門的工作，往往被非正式部門吸收（Portes and Sassen-Koob, 1987; Souza and Tokman, 1976）。因此遷移者比世居當地或居住相當時間者尋找工作的成本較高，對就

業有負面影響。然而以就業者而言，遷移者比原居者較可能從事非正式部門工作如自雇或為家庭工作。

家庭收入：過去研究發現家庭收入對妻子就業的影響並不一致。多數研究發現家庭收入有負的影響（張清溪, 1980; 劉鶯釧, 1988; 呂玉瑕, 1992），收入低時，家庭經濟壓力增加了妻子勞動市場時間的價值，對就業有正面影響，家庭收入高時，妻子家庭時間的價值增加，減少妻子就業的可能性。也有研究發現正的相關（張素梅, 1978）。可能因家庭收入表示妻子潛在所得的高低，收入愈高的家庭的妻子也可能比較有工作條件及取得工作的人脈關係，降低妻子尋找工作的成本，因此對妻子就業有正面影響。

子女數：過去的研究指出子女數與妻子就業有負相關（張清溪, 1980; 謝雨生, 1982; 張素梅, 1988）。子女愈多，妻子家務角色愈重，家庭時間的價值愈高，就業的成本也就愈高。

家庭發展階段：過去有關已婚婦女勞動力的研究指出婦女就業行為因著不同的家庭發展階段而有差別（謝雨生, 1982; 呂玉瑕, 1992, 1994）；有學齡前子女時，妻子由於家務責任的需求，家庭時間的價值增高，較可能退出勞力市場，而那些留在勞力市場的較可能從事非正式或臨時性的工作（呂玉瑕, 1992），因為非正式就業比正式部門就業較可能兼顧家務角色。

## 資料及方法

本研究使用 1991 社會變遷問卷調查第二期第二次。該調查為全台

灣地區抽樣，總樣本共 2488 人。本研究由總樣本中選出已婚女性 1025 人為本研究樣本。樣本的各種特性分配見附錄二。該調查的抽樣過程及問卷內容，參見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二期第一、二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

在本研究中婦女就業型態分為三類：「為家庭工作」、「受雇他人」及「不工作」。「為家庭工作」包括在自己家庭事業工作、被親戚雇用以及自雇的工作；「受雇他人」指受家人以外的雇主雇用的薪資工作。

本研究應用多項邏輯迴歸模型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分析家人互動關係對婦女就業的影響。多項邏輯迴歸模型可應用在應變項為兩類別以上時各類別間機率之比較。在分析模型中，應變項就業型態包含三種不同的就業選擇，受雇他人、為家庭工作及不就業。在常情下，已婚婦女同時選擇受雇他人及為家庭工作的機率很小，可視為三個互斥的類別，故使用多項邏輯迴歸分析模型來分析影響婦女就業型態之因素是合適的。

在分析模型中，主要的自變項是家庭同住型態、妻方親屬互動、夫方親屬互動、及居家照護需求。其他為控制變項，包括可能影響妻子就業與否的因素及影響妻子選擇為家庭工作或受雇他人的因素。

妻方及夫方互動的測度是以受訪者是否與夫方或妻方父母住在一起以及不住在一起時相互來往的頻率為指標。雖然沒有親屬往來的具體內容資料，由於親屬間來往密切的，比較可能提供家務協助減輕已婚女性就業成本，也比較可能提供與就業有關資訊、機會及資源，因此可作為考慮家庭支持網絡對女性就業影響的指標。資料來自問卷問題：「您家中現在住在一起的有哪些人？」「過去三個月中您與不住在一起的親人或朋友彼此聯絡的情形如何？(1)自己的父母(2)配偶的父母。」由於在邏輯迴歸模型中的自變數家庭同住型態及互動關係皆包含夫方或妻方同住的類別，為了避免模型推估中產生 structural zero，便將最高來往頻率與同住歸為一類。故此，夫方及妻方互動兩變項包含三

分類：彼此來往不到每月一次或幾乎從不、一個月一次至兩三次、一星期一次以上或同住。

另一個家庭互動的變數是家中有無需要居家照護的家人。如上所述，有居家照護病人時會產生與一般情況下不同的角色互動關係，而且女性的照顧角色更被強調，而增加女性家庭時間的價值，可能減少女性勞動參與時間，因此可做為家人互動成為就業阻力的指標。家中有無需照護的家人是一個虛擬變項；有則給值 1，無則給值 0。資料來自下列題目：「您家裡有沒有人是長期生病，需要別人照顧或不能工作的？」

在分析模型中，除了考慮家人互動關係之因素外，還有其他相關的因素，包括可能影響就業與否的因素以及可能影響不同就業型態的因素；有妻子的年齡、教育程度、性別角色態度、族群、居住地、遷移經驗、子女數、家庭發展階段、以及勞力市場的女性就業機會。這些因素的測度如下：

在分析模型中妻子的年齡以實際歲數表示，教育程度為類別變項按所接受教育層級分為國中以下及高中以上。族群則為兩類的虛擬變項：本省、大陸各省。居住地亦為類別變項，分為鄉村、城鎮及都會區。遷移經驗則按受訪者住在現址的時間長度分兩類：五年以上、五年以下。

性別角色態度的測度由四個項目組成（已刪除其中區辨力低的項目），因素分析的結果歸為兩因素：對母親就業的態度，對夫妻分工的態度。前者包括母親就業對家庭生活影響的兩項目，後者包括對夫妻角色看法的兩項。

家庭收入的測度是類別尺度。以本研究目的而言，影響妻子就業的是減去妻子就業收入的家庭收入，由於本研究所用資料中妻子收入及全家收入的測度是類別尺度，無法求算個別相減後結果。一般而言，

妻子收入佔全家總收入的比例不高，<sup>1</sup> 因此本研究以全家總收入取代。在問卷中全家收入的測量從零收入、一萬元以下至二十萬元以上分為八等級。本研究以每月收入五萬元為準分為高、低兩組。而由於缺漏值太多（15%），將缺漏值另列一類，成為三類別的兩個虛擬變項。

子女數以人數表示。家庭型態根據同住家庭成員的組成分為三類：核心家庭指家庭內包含一對夫婦及未成年子女。擴展家庭指除了核心家庭夫妻外包含丈夫的父母、祖父母或丈夫的已婚兄弟。妻方親屬同住家庭指核心家庭外包括妻方父母或其他已婚妻方親屬。

家庭發展階段是由最幼子女年齡來界定。第一階段由結婚到第一個孩子出生，為無子女時期；第二階段從最大子女出生到最幼子女三歲前，在這階段母親的家務角色需求最大；第三階段從最幼子女三歲至六歲，在這階段母親家務角色稍輕，因幼兒可由托兒所照顧。第四階段是最幼子女六歲以後，因子女都上學了，母親的家庭勞務減輕。但由於家庭消費增加，家庭經濟壓力加重了。

勞力市場的女性就業機會的測度是以地方勞力市場的女性勞力需求程度為指標。首先根據經建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在 1988 的台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中所規劃的生活圈的範圍來界定勞力市場。綜合開發計畫根據各地區產業活動範圍、文化及歷史傳統共同性，以及行政區域，將全省劃分為十七個地方勞力市場。女性勞力需求指標的計算是參照 Bowen and Finegan (1969:772-776) 的 Female Industry Mix，其

1 劉鶯釧 (1985) 根據 1976-1983 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資料分析妻子就業所得對家庭所得分配的可能影響。將家庭總所得分為丈夫所得、妻子所得及其他來源所得，她的分析結果指出妻子所得配份 (income share) 大部分在 10% 以內。妻子就業所得對家庭所得不均度的貢獻比重是三者中最小的一項，丈夫所得的比重甚至超過 50%，妻子所得的比重則約在 7% 至 10% 之間。根據本研究樣本資料，妻子收入在一萬元以下的佔總樣本 60%，三萬元以下的佔 85%，而全家收入一萬元以下佔 4%，三萬元以下的佔 34%，因此妻子收入所佔的比例可能不高。

計算方式是根據全省個別產業的女性就業所佔比率求算當地勞力市場各產業綜合的女性就業需求指標。

## 分析結果

本研究主要關心的是家庭互動關係對妻子就業的影響，因此以下將著重於家庭互動因素，即夫方親屬互動、妻方親屬互動、以及是否有需居家照護家人，對妻子就業的影響。初步的列聯分析（表一及表二）發現就業型態與妻方互動有顯著相關然而和夫方互動關係不顯著。與妻方親屬同住或經常來往的，妻子較可能受雇他人，而與妻方較少來往者以不工作者較多。與妻方較常來往者中 32.6% 從事受雇工作，而較少來往的僅 18%。後者妻子 66.1% 未就業，而前者妻子未就業的降至 49.5%。

妻方互動對女性就業的影響是否因個人社經特性而不同？表二的列聯分析進一步比較家庭所得及妻子教育程度不同的情況下妻方互動對妻子就業之影響。家戶所得不同之間妻方互動的影響差異不大，無論高所得組或低所得組，較常與妻方來往的受雇他人的比率較高。然而妻子教育程度不同時，妻方互動的影響有差別。妻子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時妻方互動對就業型態有顯著影響，妻子教育程度為高中以上時妻方互動的影響不顯著。表二的百分比分配指出，在低教育組，與妻方親屬來往至少每月一次者比起來往較少者，受雇他人的比率增加 11%，而為家庭工作者亦增加 3% 至 5%，無工作者減少 14% 至 16%。

以上的初步分析結果與過去都市中層階級的研究發現不同。過去研究指出中層階級、教育程度高的婦女較多與娘家保持密切關係（崔伊蘭，1987）。本研究初步發現似指出，教育程度較低的妻子更可能依賴娘家網絡關係提供就業協助。不過，這些差異也許只是反應了年齡或居住地區的差別。因年齡較高者國中以下較多，而年齡較輕的，高

表一 夫方互動與就業型態之關係(N=1023)(%)

	至少每週一次或同住	至少每月一次	不到每月一次或不曾
家庭雇用	17.1	15.6	19.5
他人雇用	29.6	35.0	24.3
無工作	53.3	49.4	56.2
分類合計	510人	180人	333人

$$X^2=7.01 \quad P=.14$$

表二 妻方互動與就業型態之關係(N=995)(%)

	至少每週一次或同住	至少每月一次	不到每月一次或不曾
家庭雇用	17.9	18.5	15.9
他人雇用	32.6	30.5	18.0
無工作	49.5	51.0	66.1
分類合計	513人	243人	239人

$$X^2=22.79 \quad P=.0001$$

	〈妻子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高中以上		
	至少每週一次或同住	至少每月一次	不到每月一次或不曾	至少每週一次或同住	至少每月一次	不到每月一次或不曾
家庭雇用	22.3	19.9	16.9	12.9	15.9	9.4
他人雇用	24.2	24.2	13.5	42.1	42.7	46.9
無工作	53.5	55.9	69.6	45.0	41.5	43.8
分類合計	273人	161人	207人	240人	82人	32人

$$X^2=15.48 \quad P=.003$$

$$X^2=1.14 \quad P=.89$$

	〈家戶所得〉					
	低所得組			高所得組		
	至少每週一次或同住	至少每月一次	不到每月一次或不曾	至少每週一次或同住	至少每月一次	不到每月一次或不曾
家庭雇用	19.5	22.1	12.0	17.3	16.6	19.1
他人雇用	23.5	22.1	14.8	36.3	35.0	20.6
無工作	57.0	55.8	73.1	46.4	48.4	60.3
分類合計	149人	86人	108人	364人	157人	131人

$$X^2=9.14 \quad P=.06$$

$$X^2=12.27 \quad P=.02$$



中以上的較多。而年齡高低亦與家庭發展階段有關。在迴歸分析中控制了其他變數才可能得到較清晰的結果。

由上述家人互動關係與妻子就業的關聯性的初步分析可知家人互動關係對於妻子就業可能是一種助力而且對就業的影響可能因妻子的教育程度而不同。然而家人互動關係在另一種情境下也可能是一種阻力，本研究分析家中有需長期照護之家人的情境對妻子就業狀況的影響。在該情況下，女性照顧者的角色會被強調，因此當家中有照護需求時可能對妻子的工作有負面影響。

有居家照護需求的家庭，在樣本中有 115 案例，這些家庭的特徵如表三。由家戶所得、丈夫的職業、教育來看這些家庭的社經狀況分佈平均。妻子的教育程度來看，約三分之二國中以下，三分之一高中以上。由妻子結婚時的職位來說，有一半是在服務業或體力工。另 20% 為專業及技術性工作。以家庭型態而言，核心家庭與擴展家庭約各半，與妻方同住的有 10%。擴展家庭的比率比其在總樣本分配的比率高得多，可能因需照護的病人中丈夫的父母佔很大比率。有居家照護的家庭中 82% 是在兒女皆上學後的階段。居家照護的家庭屬於此階段的比率偏高，可能因需照護之病人有許多是高齡的父母或配偶，因此同住家庭也較可能是在發展較成熟的階段。

接下來要問的是：誰是照護者？樣本分配顯示，115 個案例中，有 63 家受訪者（即妻子）為主要照護者，其餘則為受照護者的配偶或兒子。表四顯示擔當主要照顧者的受訪者年齡偏高，四十五歲以上的佔了一半，三十歲以下的僅一成。他們的就業狀況多數是較低層職位或無工作。

家中有了需照護的病（老）人，對妻子的就業有何影響？表五顯示家中有病人時妻子受雇他人的比率較低而為家庭工作的稍高，然而差異並不顯著。一種可能的情形是：有否居家照護病人對於妻子就業的影響是因家庭經濟情況而異。因為家庭經濟狀況可能在妻子就業選

表三 居家照護家庭的特徵(N=115)(%)

家戶所得	
低所得	44.3
高所得	55.7
丈夫目前職位	
專門技術人員	33.9
服務工作及操作工	46.1
無工作	20.0
丈夫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54.8
高中以上	45.2
妻子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67.8
高中以上	32.2
妻子結婚時職位	
專門技術人員	21.7
服務工作及操作工	52.2
無工作	26.1
妻子年齡	
29歲以下	11.3
30-44歲	48.7
45-64歲	40.0
家庭型態	
核心家庭	48.7
擴展家庭	41.7
與妻方同住	9.6
家庭發展階段	
子女出生前	2.6
最幼子女三歲前	9.6
最幼子女三至六歲	6.1
最幼子女六歲以上	81.7

表四 照顧者為妻子的特徵(N=63)(%)

妻子年齡	
29歲以下	9.5
30-44歲	41.3
45-64歲	49.2
家庭發展階段	
子女出生前	3.2
最幼子女三歲前	11.1
最幼子女三至六歲	6.3
最幼子女六歲以上	79.4
妻子結婚時職位	
專門技術人員	15.9
服務工作及操作工	57.1
無工作	27.0
妻子目前職位	
專門技術人員	7.9
服務工作及操作工	33.3
無工作	58.7
妻子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69.8
高中以上	30.2

擇上提供全然不同的決策情境。表五的列聯分析中比較家庭收入不同的情況，發現在收入較高的家庭，有否居家照護病人與妻子就業有顯著的相關，然而在家庭收入低的家庭，相關卻不顯著。值得注意的是，在所得較高的家庭中有需照護病人時，受雇他人的比率大幅降低，為家庭工作則相對的大增。無工作的比率則兩者無差別，也與總樣本中無工作的比率相近。可能有家人需照護時，妻子傾向於自雇工作或為家庭工作，因時間上較有彈性，可兼顧工作與照護病人。這個可能性將在多變數分析中進一步釐清。

理論上，在有照護需求的家庭中，當妻子為主要照護者時，照護

病人對妻子就業的影響會更明顯。進一步分析在有居家照護病人者中妻子為主要照護者與否對其就業型態的影響，發現（表六）在 115 個有居家病人的個案中，妻子是否為主要照護者與其就業型態無顯著相關。然而控制家戶所得時，所得較高者，妻子為主要照護者時，受雇他人的比率比由其他人照護的降低 22%，而為家庭工作的比率增加 29%，其差異甚為顯著。比較不同教育程度之間，則無論教育程度高低，妻子為主要照顧者與否皆與就業型態無顯著相關（表略）。

以上分析說明居家照護，家庭經濟狀況與妻子就業之間的關係。然而並未控制其他相關因素。在以下邏輯迴歸分析裡控制了相關因素，居家照護對妻子就業的影響及其機制會有較清楚的呈現。在邏輯分析中控制了妻子年齡、教育程度、性別角色態度、居住地、遷移經驗、女性就業機會、家庭收入、子女數、家庭型態、及家庭生命週期。

由以上初步分析的結果得知，家人互動因素（夫方互動、妻方互動及居家照護）與家戶所得、教育程度的交互作用可能影響就業型態，因此，處理邏輯迴歸分析的策略由 additive model 轉向 interactive model 的考量。在分析模型中加入有關的交互作用項發現，除了居家照護與否與家戶所得的交互作用對就業型態有顯著影響，其他的交互作用如夫（妻）方互動\*家庭收入、夫（妻）方互動\*教育程度、居家照護\*教育程度，對婦女就業的影響皆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由於模型中加入「居家照護\*家庭收入」交互作用項後，log-likelihood 顯著增加，故最適模型應是除了主效應外加上「居家照護\*家庭收入」之交互項。（表七）

與過去研究結果相似的是邏輯分析的結果指出家庭結構型態對於妻子就業無顯著影響。這個結果可能表示靜態的家庭組成型態無法涵蓋動態的家人互動關係，因此無法預測妻子的就業行為。同樣的家庭組成形式在不同情境下會展現變化複雜的互動關係，對妻子就業可能是助力也可能是阻力。協助妻子家務使減少就業成本的親屬不一定同

表五 家中有無居家照護與就業型態之關係(N=1025)(%)

居家照護	沒有	有
家庭雇用	17.0	22.6
他人雇用	29.5	24.3
無工作	53.5	53.0
分類合計	902人	115人
	$X^2=2.70$ $P=.26$	

## 〈家戶所得〉

居家照護	低所得組		高所得組	
	沒有	有	沒有	有
家庭雇用	17.6	15.7	16.7	28.1
他人雇用	19.6	27.5	34.3	21.9
無工作	62.8	56.9	49.0	50.0
分類合計	296人	51人	606人	64人
	$X^2=1.54$ $P=.46$ $X^2=6.75$ $P=.03$			

表六 妻子為主要照顧者與否與就業型態之關係(N=115)(%)

	妻子照顧	其他家人
家庭雇用	30.0	14.5
他人雇用	20.0	29.1
無工作	50.0	56.4
分類合計	60人	55人

$$X^2=4.32 \quad P=.12$$

## 〈家戶所得〉

	低所得組		高所得組	
	妻子照顧	其他家人	妻子照顧	其他家人
家庭雇用	16.7	14.3	43.3	14.7
他人雇用	30.0	23.8	10.0	32.4
無工作	53.3	61.9	46.7	52.9
分類合計	30人	21人	30人	34人
	$X^2=.38$ $P=.83$		$X^2=8.79$ $P=.01$	

表七 多項邏輯迴歸分析

	就業型態		
	非家庭雇用/無工作	家庭雇用/無工作	非家庭雇用/家庭雇用
年齡	.01	-.01	.01
教育			
國中以下	a	a	a
高中以上	.64**	-.08	.72**
性別角色態度(母親就業)	.21***	.14**	.08
性別角色態度(夫妻分工)	.15**	.17**	-.02
居住地			
鄉村	a	a	a
城鎮	-.59**	-1.14***	.55*
都會區	-.85***	-.78**	-.06
遷移經驗			
五年以上	a	a	a
五年以下	-.04	-.02	-.02
女性就業密集度	-.03	-.02	-.01
家庭收入			
低	a	a	a
高	1.08***	.64*	.44
缺漏值	-.57	.17	-.74*
子女數	-.25**	.06	-.31**
家庭型態			
核心家庭	a	a	a
擴展家庭	.15	.20	-.05
與妻方同住	.03	.02	.01
家庭發展階段			
子女出生前	-1.14*	-1.42	.28
最幼子女三歲前	-.96***	-1.08**	.12
最幼子女三至六歲	-.47	-.77*	.30
最幼子女六歲以上	a	a	a
與夫方互動			
不到每月一次或不曾	a	a	a
至少每月一次	.11	-.05	.16
至少每週一次或同住	-.08	-.34	.26
與妻方互動			
不到每月一次或不曾	a	a	a
至少每月一次	.80**	.65*	.15
至少每週一次或同住	.69**	.70*	-.01
居家照護			
沒有	a	a	a
有	.20	.13	.06
居家照護 * 高所得	-1.53*	.47	-1.99**
居家照護 * 缺漏值	-.22	.37	-.59
INTERCEPT	-1.49	-1.45	-.04
LOG-LIKELIHOOD		-833.08	
X <sup>2</sup>		414.60	
DF		48	
N		947	

a: 參考類別 \* p &lt; .05 \*\* p &lt; .01 \*\*\* p &lt; .001

住，而家屬同住時，對妻子就業的影響亦因彼此角色互動情況而定；一方面固然可能取代妻子家務角色而對其就業有正面影響，另一方面，在父母權威較強的傳統家庭價值下，亦可能強調傳統的性別角色規範而對妻子就業有負面影響。這些複雜的家庭組織因素使得家庭同住型態與妻子就業的因果關係相當模糊。

以多項邏輯迴歸分析來察驗家人互動因素的淨效果，分析的結果顯示，控制了妻子的其他個人因素及家庭組織因素之後，妻方互動對其工作型態仍有顯著的影響，然而夫方互動與妻子就業型態沒有顯著相關，這是與前面單一變數的列聯分析相一致的。與妻方父母較時常來往的較可能就業，無論是受他人雇用或為自己家庭工作，而且與那些較少與妻方父母來往或父母不在的比較起來有顯著的差異。將 logic 轉算成百分比率，<sup>2</sup> 以就業相對於未就業的勝算機率比而言，與妻方父母較時常來往的比那些較少來往的，受雇他人的可能性增加 1 至 1.2 倍，而為家庭工作的可能性也增加一倍左右。

妻方互動對妻子就業的影響可能是由於娘家提供子女照顧或家庭勞務的協助。若是如此，可能某一群人比其他人更可能或需要得到娘家的協助。過去研究指出，較高教育的或較年輕的婦女可能較多與娘家維持密切關係（崔伊蘭，1987），因此較可能得到娘家的協助而減少就業成本，而收入較低的也可能比收入較高的家庭更需要親屬協助子女照顧。在邏輯分析模型中加入妻方互動與家庭收入以及與妻子教育程度的交互作用項，可看出妻方互動對婦女就業的影響是否因著不同的社經背景而有差別。

邏輯分析的結果顯示妻方互動與教育程度，或與家庭收入的交互作用皆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表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程度的

2 邏輯迴歸係數取反對數即為該類別的勝算機率比值 (odds ratio)，減去參考類別之機率比值（即減 1）即得增減之百分比值。

交互作用對工作型態的影響有明顯的趨勢，與過去以中產階級為對象的研究結果不同。

表八顯示，在教育程度較低者，娘家互動對就業與否影響較大；與娘家來往較密切者，就業的可能性較高，無論受雇他人，為家裡工作皆然。每月互動一次以上者比較少來往者，從事他雇工作的可能性高 1.7 倍至 2 倍，為家裡工作的可能性高一倍左右。這個結果雖沒有統計上顯著性，卻是值得注意的趨勢。可能因為教育程度較低的就業妻子本身收入較低、社會關係較有限，較可能依靠娘家協助家務、育兒或工作資訊。以托兒而言，對妻子就業家庭而言，娘家照顧既可靠又省錢；對娘家而言，亦可能收入不高而需要這份貼補。

至於居家照護對於妻子就業的影響，邏輯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表七）有否照護需求對妻子工作的影響沒有達到統計上顯著性，然而病人照護與家庭收入卻有顯著的交互作用影響妻子的就業型態。在所得較高的家庭，家有病人需照護時，妻子受雇他人的可能性顯著降低。家人照護對妻子就業影響的主效應不顯著可能是由於樣本中有照護需求的個案比例偏低，以至於邏輯迴歸係數的估計標準誤增加所致，因此家人照護對妻子就業影響在經濟狀況不同家庭之間的差異仍是值得

表八 妻方互動與妻子教育程度對就業型態之交互作用

	就業型態		
	非家庭雇用/無工作	家庭雇用/無工作	非家庭雇用/家庭雇用
教育程度(國中以下)			
與妻方互動不到每月一次或不曾	a	a	a
與妻方互動至少每月一次	1.11	.70	.41
與妻方互動至少每週一次或同住	1.00	.77	.23
教育程度(高中以上)			
與妻方互動不到每月一次或不曾	a	a	a
與妻方互動至少每月一次	-.14	.50	-.64
與妻方互動至少每週一次或同住	-.11	.45	-.55

G=5.36 DF=4 N.S.

a: 參考類別



注意的發現。

在表九中，表內數字為表七的交互作用項的 log odds 轉算為不同家庭所得組中，居家照護效果的 log odds 的結果。在高所得組中，就受雇他人相對於不工作的機率比而言，家有需照護者時妻子受雇他人的可能性比無需照護的家庭減少 73%；就受雇他人相對於為家庭工作的機率比而言，家有需照護者時妻子受雇他人的可能性比無需照護的家庭減少 85%。然而在低所得組中，無論家中有否需照護者，妻子的就業型態幾乎無差異。可能的原因是，在家庭所得較高時，妻子作為照顧者的角色壓力較大，其家庭時間價值高於勞動市場時間價值，故就業的可能性較低，若就業，則較可能選擇為家庭工作或自雇工作，因時間較有彈性。在家庭所得較低時，妻子的市場時間價值高，雖然作為照顧者的角色壓力大，然而仍須工作以維持生計，在此狀況下調適的方式可能是降低照護的品質；可能的安排是，妻子從事非正式就業，在時間上較有彈性可以同時兼顧家庭經濟及照顧病人，或者妻子為了家庭生計不得不繼續全職工作，病（老）人由家人輪流照顧。

由迴歸模型中家庭收入對妻子就業的顯著的正向影響，亦支持了以上的推論。本研究發現家庭所得越高，妻子越可能就業，在就業者之中，就業型態為他人雇用或家庭雇用則在家庭所得不同者間無顯著差異。這與妻子工作為了家庭經濟壓力的假設相反。可能是因為在

表九 居家照護與家庭收入對就業型態之交互作用

	就業型態		
	非家庭雇用/無工作	家庭雇用/無工作	非家庭雇用/家庭雇用
家庭收入(低所得)			
無照護需求	a	a	a
有照護需求	.20	.13	.06
家庭收入(高所得)			
無照護需求	a	a	a
有照護需求	-1.33*	.60	-1.93**

a: 參考類別 \*  $p < .05$  \*\*  $p < .01$

1990年代的台灣家庭，一般來說，收入普遍提高，已脫離了以維生為目的的經濟型態，進入以消費為目的的家庭經濟。一般家庭皆受到家庭消費的壓力，如兒女教育投資，或維持某種生活品質需要購置的家庭設備。加上，由於社經地位較高者比地位較低者容易取得合適的工作機會，家庭收入對於妻子的就業便產生了正面的效果。當為了家庭消費的目的成為女性就業主要的趨力的情況，家庭面臨有因年老或疾病需長期照護時，女性的照顧角色與家庭消費角色相較之下，前者顯然是會被認為時間價值較高的。以不同的家庭經濟狀況而言，家庭收入較高的妻子比較可能是以家庭消費而不是家庭生存的就業動機，因此無怪乎當家有照護需求時，家庭收入較高的妻子比較可能選擇不工作或調整工作型態。

以妻子的照顧角色作為就業的阻力而言，照顧角色成為阻力的程度可能因妻子的教育程度而有差別。由家庭經濟最大效用的原則來看，家庭成員中工作能力較高的其市場時間價值較高，因此可能會減少照顧家人或家務活動的時間 (Becker, 1965)。教育程度較高的妻子市場時間價值較高，其工作性質亦較持續性，因照顧病人而中斷或減少工時的可能性較低，照顧角色成為就業阻力的可能性較低。因此本研究預測居家照護對妻子就業的影響在教育程度不同的妻子間有差異。

然而邏輯分析的結果顯示家中有否需照護的病人與妻子教育程度的交互作用並不顯著。由此結果可知，當家有照護需求時，妻子就業調適行為並不因教育程度而有差別。有兩種可能的解釋：一、家有需照護病人與否，妻子就業型態有差別(或有調整)，而且差別(或調整)的方向，在教育程度高低之間沒有顯著差異。二、無論妻子教育程度高低，有照護需求與沒有此需求的家庭之間，妻子就業型態沒有差別，或妻子不因照護需求而調整就業型態。由於迴歸模型中居家照護的主效應顯示，家中有照護需求與否，妻子的就業型態並沒有顯著差異，因此一般而言，第一種解釋獲支持的可能性較低，第二種解釋成立的

可能性較高。而由迴歸模型中，教育程度對女性就業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教育程度較高者較可能選擇受雇工作，由此推論，具體的解釋可能是，教育程度較高的妻子可能傾向受雇工作，而且這傾向不因爲家中有照護需求而有顯著差別；教育程度低的妻子傾向爲家庭工作或不就業，而這傾向也不因家中有照護需求而有顯著差別。對教育程度較高的妻子而言，人力資本增加所帶來市場時間價值的增加可能超過家有照護需求時增加的家庭時間價值，因此妻子較少可能選擇不工作或調整就業型態，然而可能減少工時或請假來調適照顧角色。另一方面教育程度較低的就業妻子較可能傾向非正式就業或爲家庭工作，而這樣的就業型態較可能與妻子的照顧角色相容，因此家庭有照護需求與否之間妻子就業型態沒有顯著差異。

由以上家庭有否照護需求與家庭收入有顯著的交互作用但與妻子的教育程度的交互作用卻不顯著的分析結果指出，妻子照顧角色成爲就業阻力的程度因家庭經濟狀況而異，妻子人力資本條件並未造成顯著不同。

在邏輯迴歸分析模型中其他相關因素對婦女就業型態的影響與過去的研究發現甚一致。妻子的性別角色態度、居住地、子女數及家庭生命週期對妻子就業型態有顯著影響。性別角色態度較傾向現代性或自主性的較可能就業，至於選擇受雇他人或爲家庭工作則無顯著差異。以居住地而言，與都市地區婦女比較起來，鄉村婦女較可能就業，然而受雇他人或爲家庭工作則無顯著差異。子女數越少越可能受雇他人，子女越多越可能爲家庭工作或不工作。由家庭發展階段來看，與子女上學後的階段比較，有學齡前幼兒的婦女較不可能工作，尤其子女三歲前的階段，停止工作的可能性更高。子女上學前後之間妻子受雇他人或爲家庭工作則無顯著差異。此外，控制其他因素後，勞力市場的女性就業機會對妻子就業型態的影響不顯著。可能的解釋是，已婚婦女傾向於非正式部門的工作，即使是受雇他人也以非規約性的居多，

而此類工作較不受勞力市場上就業機會的影響。

## 結論

本研究根據 1991 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察驗家人互動因素與妻子就業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家人互動關係對妻子就業行為是一個助力也是一個阻力，因家庭情境而異。本文指出了過去研究以靜態家庭結構型態預測已婚婦女就業行為的缺失，由於家庭組織影響個人行為機制的複雜性，必須深入家庭網絡關係以及角色互動過程才可能解釋家庭對女性就業行為的影響。研究結果指出夫方親屬的來往對妻子就業無影響，然而妻方親屬的來往卻顯著的有利於妻子的就業，可能因妻方親屬協助家務及育兒，降低了妻子就業的成本。妻方親屬的助力在低教育的妻子中尤其明顯，可能是經濟的考量。妻方親屬的影響亦支持了 Gallin and Gallin's (1985) 的論點，他指出在台灣的經濟發展中，妻方的網絡支持關係是影響一般家庭經濟地位的取得頗重要的因素。

本研究結果證實了妻方親屬互動關係對妻子就業的正面影響，卻無法證實夫方親屬互動關係對妻子就業行為的影響，部份原因可能是由於缺乏親屬互動內容的資料。在從夫居的持續傳統下核心家庭對於妻方親屬較無撫養或支持的義務，因此與妻方父母互動的內容比較可能是對核心家庭的協助或支持，這樣的互動性質可能傾向減少妻子就業成本，因此以互動頻率為指標可以預測妻子的就業行為。然而核心家庭與夫方父母的互動範圍較廣，互動內容可能增加也可能減少妻子的家庭時間價值及其就業成本，以互動頻率為指標不易預測妻子就業行為。在未來研究中若有親屬互動具體內容的資料將可釐清這一點。

本研究亦指出家庭組織在某些情境下家人互動對妻子就業有負面影響。例如當有家人疾病或年老需人照護時，妻子的照顧者角色往往

成爲就業的阻力。此因台灣社會在缺乏長期照護的公共資源下，個人有照護需求時，家庭便是最主要的資源。家庭有照護需求時，家人的角色會經歷調適的過程。以妻子的照顧者角色而言，本研究沒有充分證據證明當家庭有照護需求時妻子的照顧角色優先，然而分析結果顯示，在家中有需照護病（老）人時，收入高的家庭的妻子較可能離職或調整就業型態來配合照顧工作，收入低的家庭妻子就業型態並不因爲照顧角色而有顯著不同，可能收入低的家庭因需要妻子的工作收入而採取不同的照顧調適，例如妻子同時兼工作及照顧角色，或家人輪流照顧。

對家庭收入較高的妻子而言，當家中有人臥病或年老需照顧時妻子未就業的可能性高，也許在生活事件發生後離開工作，然而亦有可能因爲妻子一直未就業，臥病的家人才可能長留家中照護。在這一點，因無貫時性的動態資料，無法看出家庭在居家照護的生活事件前後或過程中的調適過程，難以論斷因果關係。可以確定的是在此情境下，妻子照顧者的角色優先於經濟角色。

邏輯迴歸分析的結果也指出，當家庭有照護需求時，妻子教育程度較低者並未因其市場時間價值較低而比教育程度高者更可能離職或改變就業型態來調適照顧角色，這結果指出台灣的已婚女性由於非正式就業型態的普遍，在家有照護需求時較可能同時兼顧經濟角色與照顧角色，因此在家庭經濟效率的考量下較少可能離職或改變就業型態來調適照顧角色。

總而言之，家庭互動作爲妻子就業的助力或阻力顯示了家庭組織對女性角色安排的影響。女性的工作角色及照顧角色時間的安排是家庭發展策略的結果。一般狀況下家庭經濟需求、家務及子女照顧的需求、女性本身的人力資源因素、性別角色態度皆可能影響已婚女性就業，而親屬網絡支持（尤其妻方親屬）則較可能是妻子就業的助力。當家庭組織受到家人的價值或行爲的影響或面臨一種生活事件（如家

人因年老或疾病需長期照護)時,傳統的性別分工規範持續下,妻子的家庭角色(如照顧角色)被強調,家庭組織的生存或發展需求可能決定了家庭內的性別分工及妻子的照顧角色,此時家人互動關係可能成爲妻子就業的阻力。然而由於女性就業型態的多樣性,妻子爲了家庭經濟的考量可能選擇可以同時兼顧照顧角色的工作,或者在原來工作內改變工作時間來調適照顧角色。

本研究發現家庭經濟效率原則是影響女性就業或照顧角色的重要考慮,在這樣的原則下,在有照護需求的家庭,女性教育程度較高時由於市場時間的價值較高比較可能會持續工作而在原來的就業型態內調適照顧角色。在同樣的原則下,家庭收入較高的妻子由於家庭時間的價值較高比家庭收入較低者更可能離職或改變就業型態以便調適照顧工作。然而本研究由於資料的限制,在家庭有照護需求時女性照顧角色的優先性及其影響女性就業的程度,需在後續的研究中對家庭調適照護角色的過程及家人的角色互動做深入研究才可能有肯定的結論。

## 附錄一 已婚婦女從業身份別

年別	雇主	自雇	無酬家屬	受雇者			BASE N
				小計	受政府 雇用	受私人 雇用	
1980	1.81	17.61	33.12	47.46	10.69	36.77	1,315,356
1985	1.93	14.97	29.88	53.22	9.78	43.44	1,790,825
1990	1.68	12.23	25.98	60.11	11.30	48.81	2,135,364

資料來源：勞工統計月報(特載：台灣婦女生育與就業報告)  
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報告

## 附錄二：樣本特性分配(單位：%)

## 年齡

20—29	13.9
30—39	41.9
40—49	24.0
50—59	13.8
60—64	6.4
總數	1025

## 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64.6
高中以上	35.4
總數	1025

## 從業身份

家庭雇用	17.6
他人雇用	28.8
無工作	53.6
總數	1023

目前的職業	
專門技術監督買賣等	19.7
服務農林漁牧體力工	24.9
無工作	55.4
總數	1025
籍貫	
本省閩南人	76.6
本省客家人	9.1
大陸各省市	10.9
原住民	2.9
其他	0.5
總數	1023
居住地	
鄉村	26.0
城鎮	39.1
都會區	34.9
總數	1025
遷移經驗	
五年以上	87.1
五年以下	12.9
總數	1025
家庭收入	
低(五萬以下)	73.2
高(五萬以上)	26.8
總數	872
丈夫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53.3
高中以上	46.7
總數	1025



子女數	
0	3.0
1—2	41.2
3—4	44.5
5—10	11.2
總數	1025

家庭型態	
核心家庭	66.0
擴展家庭	27.5
與妻方同住	6.4
總數	1025

家庭發展階段	
子女出生前	3.4
最幼子女三歲前	13.5
最幼子女三至六歲	12.1
最幼子女六歲以上	71.0
總數	1025

夫方互動	
不曾	29.6
不到每月一次	3.1
至少每月一次	17.6
至少每週一次	22.2
同住	27.5
總數	1025

妻方互動	
不曾	23.0
不到每月一次	1.3
至少每月一次	24.3
至少每週一次	44.7
同住	6.6

---

總數	999
居家照護	
沒有	88.7
有	11.3
總數	1019

## 參考書目

### 內政部

1989 臺灣地區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報告，台北。

### 伊慶春、高淑貴

1986 「有關已婚婦女就業的性別角色態度」中研院三民所專題選刊(七十)。台北：南港。

### 呂玉瑕

1983 婦女就業與家庭角色、權力結構之關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56:111-143.

1994 城鄉經濟發展與已婚婦女就業——女性邊緣化 (Female Marginalization) 理論試探。人口學刊 16:107-133.

1996 台灣家庭企業的婦女角色初探。於陳肇男、劉克智、孫德雄、江豐富主編，人口、就業與福利論文集。中央研究院經濟所專書，台北。

### 胡幼慧

1995 三代同堂的迷思與陷阱。台北：巨流。

### 胡幼慧、周雅容、Parish

1995 「代間的交換與意涵：臺灣老年婦女的家務變遷研究」臺灣地區人口、家庭與生命品質研討會論文。

### 唐先梅

1996 家庭生命週期與丈夫參與家務工作之研究。「當前台灣社會與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國立中央大學，1996年4月。

### 莊英章

1972 「臺灣農村家族對現代化的適應：一個田野調查實例的分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34:85-98.

### 陳肇男

1996 晚年離子獨居——台灣例子。台灣社會學刊，19:57-93.

### 陳寬政、賴澤涵

1980 「我國家庭制度的變遷——家庭形式的歷史與人口探討」，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專題選刊 (二十六)，台北。

### 張素梅

1988 「婦女勞動參與率的研究——聯立模型分析」經濟論文叢刊 16 (2):175-196.

### 謝雨生

1982 家庭生命週期與婦女勞動參與之研究。碩士論文，台大農推系。

劉鶯訓

1985 「有偶婦女就業與所得分配」台北市銀月刊 16 (9):p1-28.

1988 「有偶婦女勞動參與的多重選擇模型」經濟論文叢刊 16 (2):P133-148.

謝繼昌

1981 「中國家庭的定義與研究」, 見李亦園及喬健所編著中國的民族、社會與文化。台北: 食貨。

Anastas, Jeane W., Janice L. Gibeau, and Pamela J. Larson

1990 "Working Families and Eldercare: A National Perspective in an Aging America."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35(5):405-11.

Barnett, Rosalind C., and Grace K. Baruch.

1987 "Determinants of fathers' participation in family work."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9:29-40.

Becker, Gary

1965 "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 *The Economic Journal* 299:493-517.

Blau, Peter M.

1964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Blau, Francine D. and Merianne A. Ferber

1986 *The Economics of Women, Men and Work*.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Bowen, William and T. Aldrich Finegan

1969 *The Economics of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ang, Ching-hsi (張清溪)

1980 "Determinants of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Taiwan: A Micro Cross-Sections Analysis." *Economic Essays*, Vol.IX, No. 1.

Eggebeen, David J. and Dennis P. Hogen

1990 "Giving between the Generations in American Families" Working Paper No. 1990-21. Population Issues Research Center,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Franklin, Susan T. and Barbara D. Ames, Sharon King

1994 "Acquiring the Family Eldercare Role: Influence on Female Employment Adaptation." *Research on Aging*, Vol.16 No.1,

March 1994 27-42.

Gallin, Bernard and Rita Gallin

- 1985 "Matrilateral and Affinal Relationships in Changing Chinese Society." in *The Chinese Family and Its Ritual Behavior*, edited by Hsieh Jih-chang and Chuang Ying-chang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p.101-116.

Hart, Keith

- 1973 "Informal Income Opportunities and Urban Employment in Ghan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 Studies* 11(1):61-89.

Hill, M. Anne

- 1988 "Female Labor Supply in Japan."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XXIV(1):143-159.

Lee, Mei-lin (李美玲)

- 1994 "Living Arrangements of Taiwan Elderly."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9.

Lu, Yu-hsia (呂玉瑕)

- 1991 "Kin Networks and Women's Employ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91 Symposium on Modern Life Adjustment and Mental Health, at Kauhsung, July 5-6, 1991.
- 1992 Married Women's Informal Employment in Taiwa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Part C: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人文及社會研究彙刊) Vol.2, No.2, pp.202-217.
- 1993 "Sex Role Attitude and the Employment of Married Women—A Detroit Area Study." *Journal of Women and Gender Studies* (婦女與兩性學刊), No.4, P.137-174.

Mincer, Jacob

- 1962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Married Women: A Study of Labor Supply." in NBER, *Aspects of Labor Force Econom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organ, S. Philip and Kiyosi Hiroshima

- 1983 "The Persistence of Extended Family Residence in Japan: Anachronism or Alternative Strate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April):269-281.

Portes, Alejandro, Saskia Sassen-Koob

- 1987 "Making it Underground: Comparative Material on the Informal Sector in Western Market Economics." *AJS* 93(1):30-61.

- Scharlach, Andrew E. and Sandra L. Boyd  
1989 "Caregiving and Employment: Results of an Employment Survey." *The Gerontologist* 29(3):383-87.
- Souza, Paulo R. and Victor E. Torman  
1976 "The Informal Urban Sector in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114(3):355-365.
- Sweetser, D. A.  
1963 "Assymetry in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Relationships" *Social Forces*, 41:436-52.
- Thorton, Arland, Duane Alwin, and Donald Camburn  
1983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ex-Role Attitude and Attitude Change." *ASR* 48(April):211-227.
- Wang, Sung-hsing (王崧興)  
1985 "On the Household and Family in Chinese Society." *The Chinese Family and Its Ritual Behavior*, edited by Hsieh Jih-chang and Chuang Ying-chang. Taipei: Inst.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p.50-60.

# 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對台灣 已婚婦女就業與收入之影響

陸先恆\* 胡美珍\*\*

## 摘 要

運用《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民國七十九年的資料，以女性的經濟福祉為標的，本文探討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對已婚婦女在最小小孩六歲以後的就業與收入的影響。本文發現，民國 45 年前後出生的婦女與民國 30 年前後出生的婦女相較，已婚婦女工作與幼兒養育兼顧的比例上升了大約 70%，可是直到民國 45 年前後出生的科夥為止，仍有超過六成的婦女在生育幼兒前後未能（或未選擇）連續全職。不幸的是，本研究證實，生育與幼兒養育互補性對婦女往後就業機會有很顯著的影響。其中尤其對低教育程度的婦女影響特別大。在對往後所得的影響上，低所得婦女則是最不利的一群。即便如此，初中教育程度以下的婦女若在生育前後停止工作，仍至少有 1/3 會在最小小孩六歲以後回到就業市場。這比以往研究所預期的要高。分析結果顯示，生育與工作的互補性並不全然是 Mott & Shapiro (1983) 所主張的投入程度問題。政策上更不應以改投入程度為重點。若以婦女福祉為依歸，主要的政策走向應以提升婦女教育程度，降低低所得、低教育程度婦女幼兒養育的成本，以及對完成幼兒養育任務的婦女加強就業輔

---

\* 威斯康新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 威斯康新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候選人。

導。本文也發現，生育前後已婚婦女持續工作的比例仍在持續上升，為因應更多的學齡前托兒需求，應設法提高學齡前托兒供給的質與量。對最小小孩六歲以上的婦女而言，就業與所得機會沒有省籍的差異。因此，以後可以利用主計處收集的大樣本資料研究類似的問題。本文也指出以往研究所用的「為結婚離職」、「為生育離職」這一分類若不以行為（生育與結婚行為的相鄰性）為判準，容易產生誤導。若以行為作判準，且控制住生育前後是否工作，以前研究所強調的「為結婚離職」對婦女往後就業的重要性並不存在。在結論裡，我們也詳細討論了本文收入決定模型與就業決定模型中值得往後研究進一步探討的要點。



# Complementarity of Work and Fertility and its Effects on Mid-Life Income and Employment among Mothers in Taiwan

Hsien-Hen Lu and Mei-Chen Hu

## **Abstract**

Utilizing the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of 1990,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and fertility, as defined by Mott and Shapiro (1983), and its effects on the mid-life income and employment of ever married mothers in Taiwan. This research documents an increasing trend in the complementarity of work and fertility across age cohorts. In the latest cohort covered by the current research, 67% of mothers could still not work full time continually before their youngest children reached age 6. In other words, the increasing trends might continue. We find that the complementarity of work and fertility in Taiwan has been closely related to women's mid-life income and employment. The most disadvantaged group is women with education lower than high school. Evidence also shows that interpreting the complementarity of work and fertility by women's "commitment," as suggested by Mott & Shapiro (1983), is not sufficient.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policies that help women make their own choices for their long-term economic well-being. Instead of improving women's "commitment" to work, we suggest that more education, higher quality child care facilities, and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helping mid-life women

find jobs that they want are more important. Evidence shows that ethnicity does not change the odds for mid-life employment and income of ever married mothers. To conduct similar research in the future, we encourage the use of governmental data sets that have larger sample sizes but ignore information on ethnicity. We also point out that the two categories of "quitting a job for the sake of marriage" or "quitting a job for the sake of birth" applied by previous research can be misleading if we do not define the actual timing of birth and marriage. If we define "for the sake of marriage" by "getting married but not having a baby in 3 years," we find that "quitting a job for the sake of marriage" is not as important as has been suggested in previous research. In our conclusion, we also discuss issues requiring further research.

# 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對台灣 已婚婦女就業與收入之影響

以往研究顯示，已婚婦女在生育幼兒前後<sup>1</sup> 參與就業市場的狀況影響婦女往後的就業與收入狀況（左建軍 1990；Mott and Shapiro 1983；Mincer and Ofek 1982）；而婦女的就業與收入<sup>2</sup> 又決定婦女的經濟福祉，以及家庭與社會權力關係。本研究認為，掌握台灣婦女養育幼年子女對婦女就業與收入關係的經驗事實，將有助政府與企業界針對最有需要的部份婦女，制定對其經濟福祉與經濟自主性有利的社會政策。基於此一研究動機，本研究採用民國七十九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資料，對「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sup>3</sup>，與完成生育階段已婚婦女的「經濟福祉」之間的關係作一經驗探究，以期回答兩個社會人口學的問題：在台灣，生育前後就業與否，對婦女往後就業與收入影響有多大？誰是最受影響的一群？並對「工作與幼兒養育互

- 
- 1 文中生育幼兒「前後」，或生育「前後」，是指生育幼兒的準備期到最小小孩上小學這一生命週期的階段。具體的操作型定義詳見第三節。
  - 2 在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問項中並未清楚言明，收入是指勞動收入或任何收入。若依就業或自營狀況去看無勞動收入來源的婦女對該問項的回答，發現有 15% 到 20% 的人所回答的每月個人收入並非為 0。由此可見，此處的收入應同時指勞動與非勞動收入，也就是 income。
  - 3 本文中「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是指「在生育幼兒的前後參與勞動市場的程度」。誠如某些評論人指出，工作與幼兒養育本有其「衝突性」。然而本文並不在探討這兩項工作在「本質上」是「互補」的或是「衝突」的，只是以「行為事實」為判準，去區分勞動市場工作與幼兒養育並存的程度，並定義並存的程度為「互補性」。至於此一並存互補的行為所導致的後果很多，對婦女與小孩可能有正面或負面的影響，本文只探討此一並存互補的程度對婦女往後經濟福祉的影響。

補性」在已婚婦女往後就業與收入上所產生之影響的可能來源作一初步的探討，以作為未來研究與政策制定的參考。

為釐清本文主要研究問題的社會意涵，第一節簡要地歸納以往理論與研究發現就業與收入對婦女地位與福祉的重要性，並指出：婦女在生育幼兒前後是否離職有其社會結構面的要件，而非純粹「生物」性或純粹「個人選擇」的結果。因此，若以婦女地位與福祉為考量，則「生育前後婦女是否參與勞動市場？若不參與勞動市場，是否會對往後的就業與收入造成揮之不去的負面影響？」不只是一般經濟學家所關心的「勞動供給」問題，而更是「社會正義」的課題之一。第二節文獻回顧的部份主要探討以往理論與經驗研究不足的地方，並協助本文建立「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在婦女就業與收入上如何造成影響的工作假設。以往國內研究在「生育與幼兒養育互補性」對婦女經濟福祉的影響程度與社會分化上雖不能提供滿意的答案，但有助於本文鎖定未被充份探究或應該在推論時加以控制的面向。在對就業的影響上，雖有 Mott & Shapiro (1983) 對美國婦女的理論與經驗研究做前導，但是他們將「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解釋成婦女對工作的投入 (commitment) 程度在理論與實證上都值得作進一步的商榷。為初步比較「投入程度」等偏好因素與非偏好因素對婦女就業的影響，本文除了建議採用對態度的直接測量之外，還依循 Micer (1962, 1985) 與其同僚 (Goldin 1990; Bowen and Finegan 1969; Smith and Ward 1985; Leibwitz et al. 1994) 在婦女勞動參與研究上的理論貢獻，設計檢證勞動市場需求面與供給面<sup>4</sup> 對婦女就業在台灣社會中相對重要性

4 若供給面的效果大於需求面的效果，則 Mott & Shapiro 所謂「婦女對工作投入程度」才有可能是在社會變遷中婦女就業與否的主要因素之一。若需求面（亦即市場結構，與因需求上升所導致的薪資上升等）因素主導婦女是否出去就業，則即使婦女投入程度會受社會規範因素而有變遷，此一變遷的背後仍是由社會與經濟結構所主導。

的工作假設。在對收入的影響上，本文依據 Mincer & Ofek (1982) 的人力資本復原理論，與 Desai & Waite (1991) 的生育離職成本理論指出：對「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的經驗研究可初步顯示幼兒養育的成本高低。第三節具體定義各變項，並簡要地討論本文所使用的樣本與統計模型。研究發現與限制則放在第四節與第五節。

## 一、問題

近年，台灣與世界各經濟高度發展的國家無不致力改善婦女福祉。在影響婦女福祉的諸多面向中，女性就業與女性收入是決定女性經濟自主性、家事分工、終止不理想的婚姻關係與女性家庭權力關係的兩個重要面向。資源理論 (resources theory) 認為資源的多寡決定已婚婦女家庭分工與權力關係 (伊慶春、蔡瑤玲 1989; Coltrane and Ishii-Kuntz 1992; Bergen 1991; Spitze 1988; Ross 1987; Maret and Finlay 1984; Rodman 1972; Blood and Wolfe 1960)。所以，為提升婦女地位，應注意增加與保障婦女的收入。雖然國內外的研究，在資源理論對家庭權力與夫妻分工的解釋力上並不是全無爭議 (參見：伊慶春、蔡瑤玲 1989; 呂玉瑕 1982; Coverman, 1985)，而且國內實證研究顯示國人夫妻財產常可共享 (鄭為元 1985)，但婦女個人的收入直接影響婦女本身所擁有的經濟自主性則是不爭的事實。無論這一自主性對男女權力關係與夫妻角色有何影響，或如何被男女權力及夫妻角色所影響，收入本身應獨立地視作女性個人經濟福祉的重要保障 (Fuchs, 1988)。女性就業不只是現存社會制度下提升婦女收入的主要來源，在控制收入的情形下，國內外的研究更顯示從事有薪給的工作，在家庭權力關係，夫妻分工，以及終止不理想婚姻的機會上甚至有比收入或其他個人資源更大的直接影響 (伊慶春、蔡瑤玲 1989; Tsuya and Bumpass 1995; Presser 1994; Tzeng 1993; Bergen 1990; Booth et

al. 1982)。另一方面，女性在現代工業公共經濟領域工作參與增加，也直接或間接影響整體女性的工資，並改變社會整體的性別關係(Goldin 1990; Smith and Ward 1985; Davis 1984)。馬克思主義者甚至將女性重新與公共經濟活動整合等同於婦女解放(Engels, 1978 [1884]: 744)。

然而，研究顯示，已婚婦女在生養幼兒前後的就業，往往是所有女性生命週期(life course)中最容易中斷工作的階段(Waite 1980; Oppenheimer 1973, 1974)。以往國外的研究亦顯示，生產新生嬰兒前後的已婚婦女，是在長期婦女增加勞動參與的社會群體中最後增加的一群(Moen 1992; Waite 1981; Oppenheimer 1973)。早期研究相信，這階段的低就業率就是已婚婦女在生命週期的過程中，性別角色專門化的一部份(Myrdal and Klein 1956)，或認為這是工業社會中因應家庭階段性需要的一種反應(Oppenheimer 1974)。因此，二十年前美國社會學家甚至預言，即使婦女勞動力持續上升，生產新生嬰兒前後的已婚婦女的勞動參與將不會有很顯著的變化(Oppenheimer 1973)。然而，近十年的研究逐步推翻了這些論點。例如，Annemette Sorensen (1983) 運用大樣本，對同一受訪者作長期的追蹤訪問，發現生產前後已婚婦女離開與進入勞動市場，不必然基於同一組考慮因素。換言之，性別角色專門化起碼不是唯一的因素。近期的研究反而發現，美國最近三十年在女性勞動市場上，最持續而快速成長的一群人是已婚而且正育有未上學幼童的婦女(Moen 1992; Lu 1995)。雖然這一增加率與三十年前這群婦女是最不可能出去就業的社會事實相關。但是，重要的是這一變遷點出了以往已婚婦女生育前後的超低就業率是一社會歷史事實，不是一生物事實<sup>5</sup>所造成的。而且，這一生

5 有關女性的社會性別(gender)，與生物性別(sex)的區分在女性主義爭取女權或自主權的運動中是很重要的議題(參見：Okin 1989; Mackinnon 1987;

育前後的低就業率，並不是現代社會所必需的。最近的研究雖然仍相信生育的生物事實會使婦女生育前後出去就業的成本大幅提高，但這一期間不會太長。根據理論與實證的估計，這期間應在一年之內(Leibowitz et al. 1994, 1992)。更重要的是，基於社會應有的正義，這種生物性成本不應影響婦女就業的持續性；或若婦女為養育子女而中斷工作，社會應有適當的相應措施使婦女在往後的就業與收入上不受影響(Moen 1989; Wolfe 1989)。美國的實證研究發現丈夫在生育前後的就業會相應地高於平均水準(Waite et al. 1985)，這或許是以往社會對婦女提供補償的來源。但這種仰仗丈夫的補償方式往往與對婦女權利與社會地位不利的社會權力關係息息相關(O'Brien 1981)，對婦女應有的經濟自主性(Fuchs 1988)也不具有保障。所以不應視為對婦女而言可長期仰仗的唯一機制。在提升女性福祉的前提下，政府與業界應有更積極的作為(Fuchs 1988; Wolfe 1989)。然而，若台灣社會欲積極地跨出這一步，首先必需瞭解目前婦女生育子女前後就業狀況如何影響女性往後就業與收入。尤其應瞭解誰是最受影響的一群？影響的程度有多大？作為一個研究的起步，本文將只針對已婚婦女之間作比較。

##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目標

以往對婦女生育前後的就業狀況在婦女往後的就業與收入上「影響程度多大？」的研究並不多。對本文所關心的：「誰是最受影響的一

---

Jagger 1983; O'Brien 1981; Archer and Lloyd 1987 [1982])。社會性別是由社會與歷史所造成，甚至是權力關係的結果。雖然最近有研究證據顯示，生物性的因素對女性行為差異的確有重要的解釋力(Udry 1994)，然而女性行為與角色受社會權力關係決定，則是不爭的事實。問題是如何有效的指出何為社會性別，何為生物性別。其中理論性的細節因與本文不直接相關，在此略而不談。

群?]更少有探討。國內的研究尤其欠缺。國外的研究有助於我們推測生育前後的就業狀況對婦女往後的經濟福祉的確有負面的影響，以及應考慮那一些與就業市場有關的重要面向，但却無法為我們解答本文要問的問題在台灣的現況。此外，國外的研究在理論解釋上也有瑕疵。國內現有的研究雖間接指出已婚女性生產前後就業狀況對後來就業的重要性，然而依然對本文所問的問題沒有明白的答案。

### ✓(一)生育前後就業對往後就業的影響

Mott and Shapiro (1983) 是最主要一篇直接與本文所探討主題類似的多變項經驗研究，然而即使是這一篇研究，也有一些有待克服的缺陷。Mott and Shapiro (1983) 運用美國《國家勞動市場經驗縱列調查》(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Work Experience) 1968 年輕女性 (14—24) 的資料，發現在控制住教育、丈夫收入、受訪者當地的勞動市場狀況、居住地區、最近一個小孩出生幾個月，以及現有小孩人數等變數之後，生育前後的就業的確對已婚婦女 1978 的就業有顯著的影響。Mott and Shapiro (1983) 的研究有解釋上的問題。他們直接將生育前後的就業與否解釋為婦女對工作投入 (commitment) 的程度，但並沒有控制婦女對生育前後應否持續工作的主觀態度，這是不恰當的。因為，投入與否完全是行動者對工作的主觀意願。以行為當作意願，等於假設社會結構的現狀對女性參與勞動力的狀況無關。依前一節所陳述的理由，本文懷疑這一解釋的恰當性。相對地，本文認為，研究婦女在生育前後的就業對往後就業的影響，在政策意涵上我們應注意的是生育前後婦女就業的傾向對她們後來就業的機會與收入產生何種影響、影響的程度、以及對那些社會次團體影響最不好，而不是改變已婚婦女的投入程度。

主觀意願與社會結構條件若用經濟學家研究婦女勞動力的語言來分析，可以說主觀意願及其改變是屬於勞動供給面的；而社會結構條



件則同時可能涉及供給面與需求面的問題。Mincer (1962) 和他的同僚根據 Robbins (1930) 的理論主張：女性就業模型中的「收入效果」(income effect) 與「薪資效果」(wage effect)<sup>6</sup> 何者影響較大，無法由理論預測，必須由實證研究結果去推估；而且收入效果中應區分暫時收入 (transitory income)，與永久收入 (permanent income)，混淆兩者無法真正比較收入與薪資效果的相對強弱。根據 Mincer (1962) 與他的同僚所作的一系列實證研究與比較研究的結果 (Goldin 1990; Mincer 1985; Cain 1966; Bowen and Finegan 1969; Smith and Ward 1985) 發現，在他們所觀察的當代社會中，薪資效果大於收入效果。換言之，市場上對婦女勞動力需求所造成的工資與工作條件的改善，在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1940 年之後女性大量進入勞動力的過程裡，扮演著主要的角色。這一結論指出女性勞工本身的態度所推動的供給面的改變在諸多現代社會中並不重要。

這樣的結論不只幫助我們質疑 Mott and Shapiro (1983) 對他們研究結果解釋的恰當性，而且也指出在研究已婚婦女就業時，應以永久收入去控制已婚婦女的收入效果比較恰當。Mott and Shapiro (1983) 的研究也忽略了這一區別，採用了丈夫的總收入。為校正此一缺失，本文將採用這一領域經濟學家常用的策略 (例如：Leibwitz et al. 1994; Leibwitz 1975; Cain 1966)，以丈夫的教育程度與妻子的教育程度為收入效果與薪資效果的化約模式 (reduced form)。若我們見

6 丈夫的收入 (income) 對妻子而言是純粹的收入效果，妻子自身的薪資 (wage) 或收入 (income) 則同時包涵收入效果與薪資效果。收入越高，就業的機率越低，反之薪資越高，就業的機率越高。Mincer 等人則主張：若妻子薪資對就業的效果大於丈夫收入的效果，則我們應可推論薪資效果大於收入效果，因為模型中妻子自身薪資的係數其實既包涵了理論上是負的收入效果，與不可直接觀察的純薪資效果。Mincer 等人以這種方式定義收入效果與薪資效果的另一作用是在用薪資效果測量市場需求面的拉力，而以收入效果測量供給面的反面力量。

到妻子的教育程度對妻子的就業效果大於丈夫的教育程度對妻子的就業效果時，表示在當前的台灣社會，薪資效果大於收入效果，增加女性勞動參與的主動力是來自於需求面；反之則表示收入效果大於薪資效果，增加的主動力是來自供給面。<sup>7</sup>

國內近期對婦女勞動參與的研究很多（例如：羅紀瓊 1986；張清溪 1982, 1980；謝雨生 1982；張素梅 1982；蔡青龍 1988；左建軍 1980）。可是誠如蔡青龍（1988）指出，缺乏合用的縱列（longitudinal）資料，所以對本文所欲探究的主題，以往並沒有直接的探討。相應於本研究所欲探究的問題，以往國內婦女勞動參與的研究只有一些描述性或間接的資料。其中最接近本文探討主題的，要算一些探究婦女勞動再參與的文章（蔡青龍 1988；左建軍 1990）。蔡青龍（1988）是描述性的探討，左建軍（1990）是針對任何離職原因的是否回復工作而做的研究。兩文都指出，台灣婦女最盛行的離職原因是結婚與生子，其中尤以結婚離職所佔的比例最高。在重返就業市場的傾向上，蔡青龍（1988）根據一至五年平均復出的比例指出：結婚離職比生育離職復出的速度慢。兩篇文章皆指出，除了因教育年限增加所導致的年輕科夥（cohort）<sup>8</sup> 參與率下降之外，女性勞動參與有隨科夥上升的趨勢。代表人力資本的教育程度與工作經驗都受到二者的重視。蔡青龍（1988）更認為教育程度最低的婦女傾向於不會工作，而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傾向於持續工作；具有高中高職程度者比較可能停止工作。

對婦女勞動再參與的研究不考慮「生育前後是否離職」對往後就業機率的影響，比較重視一旦離職，何種人，在何種情況下比較可能復職。然而本文則強調，在台灣婚姻與幼兒養育對婦女是否留在勞動

7 參見注 6。

8 cohort 有人翻譯為「世代」或「年輪」，本文採用瞿海源與蕭新煌（1982）合編的《社會學理論與研討會論文集》中所使用的翻譯「科夥」。因為這既是音譯又是意譯，頗為傳神。

市場上，可能仍是一重要的負面因素。此負面效果的重要性不只是在勞動供給上，更在婦女角色對婦女經濟福祉上有其實質意義，所以應該個別處理。蔡青龍（1988）與左建軍（1989）的描述性分析初步指出生育前後離職的負面效果。然而，現有的研究均未對此一負面影響的程度與分佈在台灣的現況作過詳盡的解析。本文假設婦女是否在生育小孩前後就業對她往後的就業機會有顯著的負面影響。這種影響應獨立於其他生命週期的階段所取得的人力資本效果之外。為測量生育前後就業對婦女往後就業機會的影響，本文將以女性生命週期中子女上小學為一切分點，探討婦女生育前後的就業與她們往後就業機率之間的關係。

在「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對最小小孩六歲以後已婚婦女的就業分佈上，本文將以省籍與教育程度各子群體的狀況為分析的重點。省籍的就業傾向差異常被國內研究提及（如：林忠正、林鶴玲 1993），但國內以往常用以研究婦女勞動參與的主計處資料並無詳細的省籍資料，《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正可彌補這一缺漏。另外，教育程度常被建議為提升婦女就業主要的政策手段。蔡青龍（1988）的描述性分析指出各教育程度群體的成員會有不同的離職與持續工作傾向。左建軍（1989）則指出在理論上，教育程度對婦女再就業同時有正負兩種影響，在實證上，教育程度的影響也隨年齡層而有所不同。對不同的教育程度的婦女而言，生育前後的離職是否對往後的就業有不同的影響，以往研究並不能給予直接的答案。若生育前後離職對不同教育程度的成員影響有差異，則顯示，長期而言除了提升婦女教育程度對提升女性就業是重要的，如何協助婦女降低生育對就業機會的負面影響，也應依教育程度而有不同的措施。

## ✓(二)生育前後就業對目前收入的影響

如上一節所說，本文重點在婦女生育前後就業對其經濟福祉的影

響。在女性經濟福祉的諸多面向中，婦女的個人收入是一重要的指標 (Fuchs 1988)。為對婦女生育前後就業對婦女福祉的影響作較完整的瞭解，本文亦將討論最小小孩六歲之後的已婚婦女收入是否受生育前後就業的影響。

以往國外研究顯示，婦女生育小孩比其它一般中斷工作的原因有較長的離職時間。離職期間越長，對工資會有越不利的影響 (Mincer and Ofek 1982)。依人力資本理論典型的工資決定模型 (Mincer 1974; Willis 1986)，職業中斷之所以會對收入造成影響，有兩大可能原因，其一是工作經驗所造成的人力資本累積受到中斷，其二是間斷式的工作對間斷前後總工作經驗所造成的折扣。然而，Mincer and Ofek (1982)，以縱列式資料，發現復職者的人力資本價值雖在復職的初期會有貶值的現象，但人力資本價值在復職後會迅速地復原。<sup>9</sup>

此外，美國社會學家 Sonalde Desai 與 Linda J. Waite 最近的研究 (Desai and Waite 1991) 指出：婦女生育前後離職與否並非受到該工作是否是一女性為主的工作所決定，而是受到離職本身所造成的成本所決定。需要越多在職訓練的職位，女性離職的成本越高，生育前後離職的機會越小。

若如 Mincer and Ofek (1982) 所指出的：人力資本的成本受折扣的程度長期而言是會復原的；也如 Desai and Waite (1991) 的離職成本理論指出的：離職與否是與在生育前後工作所能得到與累積的在職訓練相關；則我們可視生育小孩前後離職的選擇，主要基於原先所在職位平均在職訓練的投資與累積所造成的收入增加，低於幼兒養育的成本。如此，我們可以假設：若我們看見生育前後離職而後復職的人收入受到影響，則表示幼兒養育的成本很高，所以生育前後的婦

9 由於本文所採用的《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並不是縱列式的資料，所以我們將無法區分工作經驗的效果與因中斷所造成的打折或復原的效果。

女願意承擔因離職照顧小孩對所帶來的（目前與未來的）收入損失。若生育前後離職對最小小孩六歲以後的收入影響十分有限，則表示生育前後離職者所得到的平均在職訓練投資原本就很低，<sup>10</sup> 或業者並不重視婦女的工作經驗。<sup>11</sup> 如果我們發現幼兒養育成本很高，則政策上應設法降低幼兒養育的成本。若我們發現離職者平均在職訓練投資很低，或業者普遍不重視工作經驗，則短期的政策重點應放在輔助婦女重新就業。

以《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資料，本文希望能部份地回答台灣婦女生育前後的就業狀況，對婦女在最小小孩六歲之後是否就業影響程度有多大？那些次群體受影響？在生育前後中斷工作是否對婦女目前收入造成影響？影響有多大？那些次群體是最受影響的一群？下一節將略述本文所使用的資料，研究的設計，以及因資料所產生的一些限制。

### 三、資料來源與研究設計

本研究將採用民國七十九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二期第二次》〈問卷 I〉的女性樣本 (1260 人)，去除未婚或尚未生小孩的樣本 204 人<sup>12</sup> 之後；爲了要區分生命週期的階段，本文又進一步將樣本限制在最小小孩年齡六歲以上(去除 322 人)，再去除未回答工作與生育

10 當然，這個邏輯不一定能夠反推。

11 至於如何區分究竟是「在職訓練投資低」或是「業者普遍不重視工作經驗」不是本文的重點。無論是這二者之中的那一個，政策重點都應該是「輔助婦女重新就業」。

12 所有樣本中沒有未婚生子而目前婚姻狀況是未婚的女性受訪者。所以實際樣本選擇有小孩已排除未婚的樣本。

互補性問項者 (10 人)，實際分析的主樣本是 724 人。<sup>13</sup>

「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是指結婚後到最小小孩六歲以前是否在勞動市場上工作，以兩虛擬變項來代表：第一個變項的操作定義為：若「結婚後還沒有小孩時」，以及「當有一個小孩還沒有進入幼稚園的時候」，以及「當有一個孩子還沒入小學的時候」均回答「曾外出做全天工作」者標為 1 其他標為 0；第二個虛擬變項是在這三期曾出外工作但並不全都是做全天工作者標為 1，其他標為 0。

主要的依變項有兩個。第一個依變項「最小小孩六歲後曾就業」亦為一虛擬變項，其定義為：若「當最小小孩子開始上小學之後」，或「當小孩子都離開家之後」曾外出作全天工作，或曾外出做兼差工作；或者是目前「為自己工作」、「為別人工作」、或「為家人工作」並且有固定薪資者標為 1，其他標為 0。另一依變項「目前收入水準」是等級變項。依實際樣本分佈與原問卷的區分，本研究將目前婦女個人每月收入水準歸為四等：(1)無收入；(2)10,000 元以下；(3)10,001 元～30,000 元之間；(4)30,001 元以上。

在探討生育前後就業對往後婦女就業機會影響的問題上，本文採用生命週期的策略，將婦女受養育子女的牽絆分成最小小孩上小學前與上小學後。由於台灣小學教育的在校時間很長，使婦女大幅降低托兒的成本。反之，國內幼稚教育並未納入正規義務教育範圍，所以個人所負擔的托兒成本相對的較小學後要高出很多。根據這個道理，本文將這兩段視為對婦女出外工作阻礙不同的兩個階段。這樣的分類，假設六歲以後的就業機率は屬於同質，並假設最小小孩六歲之後不再生另一胎。雖然在現實世界，這兩個假設都可能有例外，但對第一個

13 詳細的原始抽樣設計，與資料收集的細節請參見瞿海源(1991)。分析收入的樣本更進一步去除收入拒答或無資料，以及現已退休的樣本。實際分析樣本為 667 人。因為此一樣本在各變數的分佈與主樣本類似，所以表一基本描述統計的部份只報導主樣本的分佈。

假設本文將用最小小孩年齡分組來控制，若小學以後的就業不是同質，則就業的機率應隨最小小孩年齡而變化。第二個假設是否成立雖然無法直接在模型中控制，但以目前國人的生育間隔習慣，應屬極少數，<sup>14</sup> 不應影響本文主要的結論。

由於最小小孩六歲之後是否曾從事有薪給的就業機率是一二元變項，本研究對「六歲以後是否曾就業」作多變項統計分析時，將採用 probit 模型。此模型假設實際就業機率是由觀察到的就業與否的狀況所表現出的不可觀察的標準化連續性機率分佈，模型中的獨立變項即用以預測這一機率的大小（參見：Agrasti 1990; Maddala 1983）。

本文在估計目前收入的問題上，主要是採用 ordered probit 的統計模型。因為「收入水準」在問卷中實際是等級變數，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可以恰當避免等級變數數值集中的現象<sup>15</sup> 在傳統 OLS 模型上所可能造成的偏差。更重要的是，以 ordered probit 模型可以適當處理對無工作者的收入能力欠觀察 (truncation)，在傳統 OLS 模型所可能導致的偏差（參見：Greene 1993; Maddala 1983; Zavoina and McElvey 1975）。換言之，本文假設所觀察到的收入等級是一不可見的連續機率的指標，<sup>16</sup> 不同等級之間成一比例關係。分析所用的

14 平均生育間隔在六年或六年以上的婦女在我們分析的樣本中只佔 3.7%。在所有樣本中目前只生一胎的只有 20 人（約佔總樣本的 2.7%）。生育間隔在六年或六年以上的樣本中，目前最小小孩在 10 歲以下的只有 8 人；目前只生一胎，且最小小孩在 10 歲以下的樣本數只有 9 人。兩者合併也不過 17 人，約佔總研究樣本數的 2.3%。所以實際有可能違反此一假設的樣本數應佔總分析樣本數的 1% 以下。即使這 1% 的婦女會再生育，本文所得到的結論會不適用的比例相信更低於 1%。

15 此一數值集中的現象，有人稱之為天花板作用 (ceiling effect)。

16 另一策略可以不需要像 ordered probit 模型一樣將不可見的連續變數標準化 (Stewart 1983)，因測試結果顯示不會影響本文主要結論，為使各模型結論可相互參照，本文仍採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此外，因為在所有結婚的樣本中，生育小孩的樣本約高達 97%，所以本文假設，在台灣已婚婦女決定「是否生育小孩」，對本文研究主題的影響十分有限，不需要另外控制。

主要模型中假設「最小小孩六歲之後是否就業」為一外生 (exogenous) 變項。為檢驗「最小小孩六歲之後的業狀況」是否是一個與「收入水準」殘餘項相關的內生 (endogenous) 方程式，本研究採用 ordered probit selection 模型，將決定工作的模型與決定目前收入高低的模型合併估計，以衡量兩者殘餘項的相關。若兩者殘餘項的相關在統計檢定上顯著，則最後的討論將以 ordered probit selection 模型為準，反之，將以 ordered probit 模型為準。在 ordered probit selection 模型中決定「就業」的模型將以與婦女就業有關的三個態度變項為工具變項，這三個態度變項是：問卷中第玖大項的第 26 題「(2)當婦女有份全天(職)的工作時，家庭生活總是會受到妨害」；「(4)女人要獨立的最好方式是有份工作。」；「(5)丈夫的責任就是賺錢，妻子的責任就是照顧家庭。」<sup>17</sup>。在 ordered probit selection 模型裡，行業別與部門別則被用來當作收入模型的工具變項。

態度變項在分析最小小孩六歲之後是否出外工作的模型中並沒有正式被包括進去，因為態度是目前的態度，而最小小孩六歲之後是否曾就業則可能是以前的行為。但是為了要大致瞭解態度變項的效果，本研究仍將在假設目前的態度與就業行為發生前一致的前題下，將態度放入最小小孩六歲之後是否就業的模型中，瞭解模型中控制態度是否會對主要結論發生影響。因為，在認知平衡的原則下，事後的態度有可能與行為靠攏，所以，態度有可能會傾向於使曾經發生過的行為合理化。基於這樣的理由，本研究以目前態度作為就業態度指標時，

17 第(3)題對目前是否就業的影響並不顯著，所以在本文最後討論的 ordered probit selection 模型中並沒有被包括在模型中。第(1)題所問的是小孩六歲以前的狀況，表面效度不合，也沒有納入最後的分析。態度的問題原被分為七個選項，在本文的分析中，「不知道」與「不瞭解題意」被歸在一類（即表二的「態度有未回答者」），其餘歸為兩類虛擬變項，一類支持婦女出外工作，另一類反對。無意見被歸在反對的一類。



假設態度的效果是被高估的。

除了以上所討論的變項之外，在估計最小小孩六歲以後是否曾經就業的模型中，本文所控制的主要變項還包括教育、年齡、省籍、結婚時工作狀況、是否純為結婚而停止工作、小孩人數、目前的婚姻狀況、丈夫的教育程度、以及目前居住地的城鄉別。<sup>18</sup>

本研究懷疑，蔡青龍（1988）與左建軍（1989）用主計處問卷中受訪者主觀報導的「為結婚而停止工作」與「為生育而停止工作」去測量離職原因，由受訪者的行為看來可能是很混淆的。例如，若我們檢查回答「為結婚而停止工作」的婦女是否在結婚後馬上生小孩便會發現，宣稱「為結婚而停止工作」的婦女，很可能在結婚之後立即便從事生育的活動。所以，本文嘗試設計「純為結婚而停止工作」這種新的測量方式來克服此一混淆。「純為結婚而停止工作」由受訪者行為上去區分那些在結婚的時候有工作但是結婚到生小孩之間沒有工作，而且由結婚到生第一胎的期間大於三年的人。

結婚時的工作狀況與是否從未工作被用來控制除了生育前後工作之外的工作經驗。此外，為了詳細判別不同行業的工作經驗對生育前後工作與否是否有不同的反映，本文更進一步將結婚時的工作狀況細分為：無工作、農業（行業碼 01-03）、製造業（行業碼第一碼 2 或 3）、商業（行業第一碼 6 或 9）、與其它行業。目前居住地的城鄉別被包括在模型中作為控制變項，因為國內許多研究顯示鄉村婦女就業高於都市婦女（例如：呂玉瑕 1994；張清溪 1990；劉鶯釧 1989；張素梅

18 此處的居住地區是目前的居住地區，換言之，此一變數只可視為居住傾向的指標。因為此一變項只是本文的控制變項，而且並沒有理論指出用此一居住傾向指標會使本文的主要結論受嚴重的影響，在單變項、雙變項與多變項的分析中，本研究也發現城鄉的效果與以往研究類似，所以本文仍採用問卷中這一部份的資料去控制居住地城鄉別的效果。此外，此處的離婚與寡居也是目前的婚姻狀況，這對最小小孩六歲時仍未離婚或寡居的婦女而言，也可視為對當時離婚或寡居傾向的控制。

1989)。

在估計目前收入的模型中，控制變項大致與就業的模型類似。在主要的分析模型中，丈夫的教育程度<sup>19</sup> 沒有被包括進來。目前工作的部門別與行業別除了被包括在 ordered probit selection 模型中作為工具變項之外，也在一般的 ordered probit 模型中用來控制結構因素所造成的收入差異，以與個人人力資本所造成的收入差異作區分。

## 四、研究結果

本節對研究結果的分析，分為單變項/雙變項與多變項兩節進行討論。單變項的部份是針對各變數的分佈狀況作一檢視，確定對各變數的測量無異樣。雙變項在就業的部份是各解釋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交叉表。因為收入是一不可觀察的連續變項，所以收入與各解釋變項一對一的關係仍由 ordered probit 模型在沒有控制其它變項的情形下來估計。雙變項描述主要是用來掌握多變項分析前各解釋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簡單關係。所以除了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描述的部份之外，並未採用任何統計檢定。多變項分析一節則依理論與統計去選擇最佳模型，並依此檢證本研究最主要的工作假設。

### (一)單變項/雙變項分析結果

表一陳述本研究所使用變數的簡要定義與分佈狀況，以及雙變項的交叉關係。大部份的變數的單變項分佈和雙變項交叉關係與以往文獻所報導的現象很一致。首先我們看到，幼兒養育與工作的互補性的

19 在就業狀況包括在模型中的情形下，沒有特別的理論讓我們相信丈夫的教育程度對妻子的收入應造成影響。實際的測試也發現，沒有丈夫教育程度的收入模型較精簡。

確與婦女在最小小孩六歲之後的就業與收入有很高的相關。教育程度與工作和收入的高低都成正相關。在六歲以後出去工作的機會上，大致有隨科夥遞增的趨勢。<sup>20</sup> 收入則以 40 到 44 歲的人最高，45 歲以上的婦女收入比較低。外省的婦女比閩南或客家婦女容易出去就業，也傾向於有較高的收入。結婚前的工作經驗，在單變項的比較上，並沒造成最小小孩六歲之後的就業傾向太大的差異，但是對現有的收入有顯著的影響，農業是唯一的例外。小孩人數越多則就業的機會越少，收入的水準也越低。離婚或寡居的人就業傾向高，則恰當地反映了離婚或寡居婦女的經濟需要。與以往的研究一致，我們看到《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樣本也顯示鄉村地區婦女在小孩都六歲以後參與就業的人口高於都市地區。可是鄉村地區婦女的平均收入卻沒有都市婦女高。丈夫的教育與妻子的就業及收入成正比，這反映的可能是丈夫與妻子在教育成就上高相關。除了這些與以往研究結論一致的分佈之外，表一也顯示出一些與以往文獻不同，或值得在討論多變項分析之前指出的現象。

根據《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我們可以估算由結婚到生第一胎小孩的時間間隔，我們也知道受訪者在生第一個小孩前是否有工作，以及在生育時是否有工作。依這些資料，我們可以找出那些是「因結婚而中止工作」與「為生小孩而中止工作」的人。若僅依此標準，的確如以往文獻所指出：「為結婚而中止工作的人」較「為生育而中止工作的人」多。可是，這兩種人平均由結婚到生育的年限，前者是 16.20 個月，後者是 19.23 個月，並沒有很顯著的差別。「為結婚而中止工作的人」生育的步調還稍快。若我們刻意要在結婚中斷工作的樣本中，找出並沒有在很短期間（短於三年）<sup>21</sup> 生小孩子的樣本，將發現這種樣

20 科夥是以年輪作為隱喻，第一輪的發生時間最早，越晚生出的年輪則輪數越高。換言之，科夥數越高則事件起始的時間越晚，通常年齡也較輕。

21 換言之便是結婚後兩年之內未懷孕者。

表一：變數名稱、定義、分佈與雙變項交叉關係

變數名稱	平均數(%)	最小小孩六歲後 就業比例(%)	ordered Probit收入模型 單變項效果*
總樣本數(100%)	724	724	667
最小小孩六歲以後曾就業	53.59	—	—
目前收入			
無收入	43.51		
少於 10,000	15.61	—	—
10,001-30,000	26.10	—	—
30,000以上	8.56	—	—
拒答或無資料	6.22	—	—
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			
生育前後皆全職	26.10	92.59	<b>1.11 (0.11)</b>
生育前後工作但不全是全職	22.65	62.80	<b>0.50 (0.11)</b>
生育前後無工作(參照組)	51.24	29.65	
教育			
小學或以下(參照組)	62.43	48.67	
初中、初職、國中(7-9年)	13.81	46.00	0.24(0.13)
高中、高職(10-12)	16.57	66.67	<b>0.72 (0.12)</b>
大專或以上(13年或以上)	6.63	85.42	<b>1.86 (0.15)</b>
拒答或無資料	0.55**	25.00	-0.43(0.60)
年齡			
20-34	11.19	58.02	<b>0.59 (0.16)</b>
35-39	25.28	60.66	<b>0.59 (0.12)</b>
40-44	20.86	53.64	<b>0.67 (0.12)</b>
45-49	12.71	54.35	<b>0.36 (0.15)</b>
50或更年長(參照組)	29.97	45.62	
省籍			
福建(參照組)	77.76	51.87	
客家	9.53	49.28	-0.04(0.16)
外省	9.39	67.65	<b>0.46 (0.13)</b>
山人或其他	3.31	66.67	0.05(0.28)
結婚時工作狀況			
無工作(參照組)	29.56	37.38	
農業(行業碼01,02,或03)	16.02	65.52	0.31(0.16)
製造業(行業第一碼2,或3)	29.14	54.03	<b>0.47 (0.12)</b>
商業(行業第一碼6,或9)	21.27	63.64	<b>1.00 (0.12)</b>
其它	4.01	68.97	<b>1.06 (0.20)</b>
是否為結婚而停止工作			
是	1.93**	35.71	—***
否	98.07	53.94	—

小孩人數			
1	2.76	75.00	<b>1.34(0.25)</b>
2	26.10	62.43	<b>0.71(0.11)</b>
3	33.43	52.89	<b>0.38(0.11)</b>
4 或更多(參照組)	37.71	46.52	
最小小孩年齡			
6-11	33.70	57.38	<b>0.50(0.10)</b>
12-17	27.76	55.22	<b>0.32(0.11)</b>
18 或更大(參照組)	38.54	49.10	
婚姻狀況			
寡居或離婚	6.49	74.47	<b>0.45(0.20)</b>
其他婚姻狀態(參照組)	93.51	52.14	
丈夫教育程度			
小學或以下(參照組)	44.34	48.91	
初中、初職、國中(7-9年)	15.19	44.55	-0.01(0.13)
高中、高職(10-12年)	17.40	50.00	<b>0.29(0.12)</b>
大專或以上(13年或以上)	15.61	69.03	<b>0.87(0.11)</b>
拒答或無資料	0.97**	85.71	0.37(0.75)
目前居住地			
台北市	14.36	54.81	0.16(0.13)
高雄市	7.32	35.85	-0.30(0.17)
縣轄市	11.33	54.88	0.01(0.14)
縣第一級	27.21	45.18	-0.09(0.11)
縣第二至五級(參照組)	39.78	61.72	
是否從未曾工作			
是	10.77	—	<b>-1.34(0.19)</b>
目前工作行業****			
農業(行業碼01,02,03,參照組)	8.56	—	
製造業(行業第一碼2,或3)	15.61	—	0.61(0.39)
商業(行業第一碼6,或9)	21.69	—	<b>1.27(0.37)</b>
其它	4.42	—	<b>1.42(0.40)</b>
目前工作部門****			
公共部門或學校	8.15	—	<b>1.07(0.21)</b>
私人部門(參照組)	20.45	—	
自雇、或為家人工作	21.69	—	<b>0.57(0.11)</b>

\* 括弧內是標準誤，黑體字是統計顯著水準在 0.05 的情形下顯著的變數。樣本去除收入資料不適用與退休者。

\*\* 樣本數小於 20。

\*\*\* 在最終模型中未包括的變數雙變項分析不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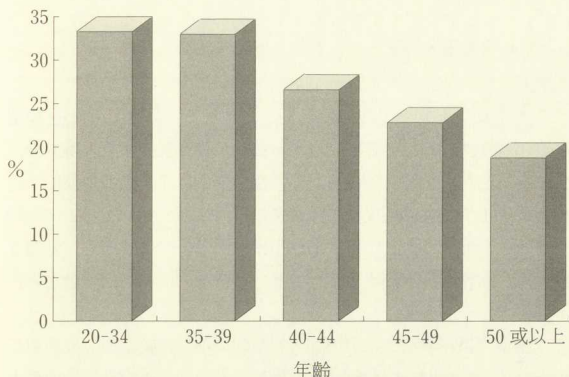
\*\*\*\* 未列出目前無工作者 49.72%。

本很少，由表一可看到，在這嚴格定義之下，行為事實合於「『純粹』為結婚而中止工作的人」大約只有全部研究樣本的2%。這些證據顯示，以往被主計處資料歸作「為結婚而中止工作」的女性受訪者，其實大多數在中止工作的時候已經將生育小孩與結婚排在相鄰的位置。所以國內傳統「為結婚而中斷工作」或「為生小孩而中斷工作」這樣的分類實際上的測量效度，有進一步深究的必要。

最小小孩的年齡與工資成反比，可能是由於教育程度隨科夥增加的程度，比工作經驗隨最小小孩年齡累積的程度大。表一雙變項的交叉關係，也沒有顯示曾經工作的比例隨小孩年齡增加。這更進一步證明，小孩年齡所反映的就業變化，大致與婦女年齡層所反映的類似，換言之，無論年齡層與最小小孩年齡，所反映的事實都是越年輕的科夥就業率越高。圖一顯示，若我們以年齡層當作科夥，幼兒養育與工作互補性有持續上升的趨勢。這趨勢與最小小孩六歲以後就業的趨勢大致相應，大約以二十歲到三十九歲為一級，四十到四十九歲為一級，另外五十歲以上為一級。但上升的速度比六歲以後就業的情形要快。生育前後連續性全職就業的比例由五十歲以上的19%上昇到35歲以下的33%。十五歲間<sup>22</sup>成長了0.7倍。若以最年輕的科夥為準，我們發現，本文所研究的樣本中，最近的生育科夥在生育幼兒前後約只有33%持續全職的在就業市場上工作，可上升的空間還很大。<sup>23</sup>換言之，若社會制度相應的部份允許，這一上升的趨勢應會持續。

22 若我們假設結婚的年齡分佈在各科夥間類似，則這十五歲的科夥差異大致可以反映十五年間的變化趨勢。

23 此一趨勢在所有年齡組之間都呈直線上升，越年輕的年齡層越高。然而20-34歲這一組比35-39歲這一組相差的程度卻特別低(見圖一)。這很有可能便是由於20-34歲這一組包括較年輕科夥中早婚的婦女(早婚婦女的教育程度較低)。換言之，對20-34歲這一個科夥的「互補性」有低估的傾向，實際的成長可能大於0.7倍。可惜本期的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並未包括第一次婚姻年齡的變項，所以早婚的效果無法在本文直接控制。



圖一：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比例在各年齡層的差異——  
以生育前後皆全職為標準

在本文所研究的樣本中，最小的小孩六歲到八歲之間婦女的就業比例各為 50%、58% 與 76%。由表一我們看到，六歲婦女就業的平均比例是 53%，介於六歲與七歲的平均就業水準之間。換言之，若婦女在最小小孩上小學之後才去市場上就業，她們很可能大多是在最小小孩上小學之後不久馬上便採取行動了。<sup>24</sup> 此外，若以從最小小孩六歲到八歲之間的婦女樣本所觀察到的這些數字去推估，我們發現對較年

24 即使我們假設婦女在小孩六歲以後的就業水準，對新的生育科夥會高達 90%，最小小孩六歲到八歲的就業比例仍顯示，所有在小孩六歲以後進入就業市場的婦女，超過半數是在最小小孩八歲以前便採取行動了。

輕的生育科夥而言，最小小孩六歲以後才就業的比例應佔所有六歲以後就業婦女的四分之一以上。<sup>25</sup>

## (二)多變項分析結果<sup>26</sup>

### (1)就業：

對六歲以後是否就業的問題，表二羅列了三個模型，第一個模型與第二個模型並列，告訴我們在生育與幼兒養育互補性放入模型後，那些變異是純與生育與幼兒養育互補性相關的。比較表二中模型一與模型二的  $L^2$  與自由度，模型二顯然是較佳的模型。換言之，「工作與幼兒養育的互補性」對已婚婦女最小小孩六歲以後的就業而言，是獨立於教育、結婚前的工作經驗、以及其它在模型一所控制的變數之外，一組不可忽視的因素。

模型三是在模型二之上再加入態度的變項。比較模型二與模型三顯示：「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在模型三與模型二中對就業的效果大致相仿，可見婦女本身的態度與「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高低並沒有很強烈的關聯。雖然前文曾指出，態度變項的效果在本文所可取得的資料下有高估的可能，所以本文不直接用  $L^2$  與自由度去比較模型二與模型三。然而，模型三仍提供給我們參考模型二中是否有重要的解釋變項與態度相關。由表二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本文主要關心的「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妻子教育」、「省籍」、「年齡」、以及「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和「妻子教育」之間的互動效果等變項的作用方向與顯著程度，大多不受態度變項的影響。基於態度變項在因果上的模

25 精確檢查婦女在最小小孩六歲之後的就業步調，得有完整的回顧性資料，或縱列式資料才行。目前本文所採用的《臺灣社會基本變遷調查》並沒有完整的回顧性資料，此處所推估的就業步調還有待往後取得這類資料時再作進一步的檢證。

26 在必要的段落，單變項分析的結果仍將與多變項分析的結果合併討論。



表二：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對最小小孩六歲以後就業與收入的影響；probit模型(就業部份)，與ordered probit模型(收入部份)估計結果：

變數名稱	最小小孩六歲以後的就業			目前收入***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				
生育前後皆全職	—	<b>2.30 (0.25)</b>	<b>2.28 (0.25)</b>	<b>0.31 (0.14)</b>
生育前後工作但不全是全職	—	<b>1.30 (0.18)</b>	<b>1.28 (0.18)</b>	0.17 (0.14)
生育前後無工作(參照組)	—			
教育				
小學或以下(參照組)				
初中、初職、國中(7-9年)	-0.01 (0.16)	0.37 (0.23)	0.40 (0.23)	0.23 (0.16)
高中、高職(10-12)	<b>0.42 (0.19)</b>	<b>0.69 (0.26)</b>	<b>0.75 (0.27)</b>	<b>0.37 (0.17)</b>
大專或以上(13年或以上)	<b>0.96 (0.32)</b>	<b>1.35 (0.62)</b>	<b>1.41 (0.62)</b>	<b>1.12 (0.26)</b>
年齡				
20-34	<b>0.65 (0.29)</b>	0.60 (0.33)	0.58 (0.34)	0.28 (0.31)
35-39	<b>0.63 (0.23)</b>	<b>0.60 (0.26)</b>	0.48 (0.26)	0.04 (0.27)
40-44	0.28 (0.20)	0.30 (0.23)	0.22 (0.23)	0.31 (0.24)
45-49	0.20 (0.18)	0.18 (0.21)	0.15 (0.21)	0.12 (0.21)
50或更年長(參照組)				
省籍				
福建(參照組)				
客家	-0.02 (0.17)	-0.01 (0.20)	0.04 (0.20)	-0.03 (0.21)
外省	0.37 (0.20)	0.35 (0.23)	0.40 (0.23)	-0.08 (0.19)
山地人或其他	0.22 (0.30)	0.46 (0.33)	0.42 (0.33)	0.27 (0.34)
結婚時工作狀況				
無工作(參照組)				
農業(行業碼01,02,或03)	<b>0.72 (0.17)</b>	0.18 (0.20)	0.20 (0.20)	0.34 (0.22)
製造業(行業第一碼2,或3)	<b>0.39 (0.14)</b>	0.06 (0.15)	0.07 (0.16)	0.20 (0.19)
商業(行業第一碼6,或9)	<b>0.48 (0.16)</b>	0.16 (0.18)	0.18 (0.18)	<b>0.37 (0.21)</b>
其它行業	0.49 (0.28)	0.04 (0.34)	0.08 (0.34)	0.15 (0.33)
是否為結婚而停止工作				
是	<b>-0.81 (0.37)</b>	-0.26 (0.39)	-0.20 (0.38)	—
小孩人數				
1	0.40 (0.36)	0.003 (0.42)	-0.04 (0.42)	<b>0.72 (0.28)</b>
2	0.14 (0.18)	-0.04 (0.18)	-0.04 (0.18)	-0.10 (0.16)
3	0.10 (0.13)	0.14 (0.14)	0.16 (0.15)	0.07 (0.14)
4或更多(參照組)				
最小小孩年齡				
6-11	-0.33 (0.22)	<b>-0.51 (0.24)</b>	-0.46 (0.25)	0.09 (0.25)
12-17	-0.07 (0.18)	-0.13 (0.20)	-0.06 (0.20)	0.01 (0.21)
18或更大(參照組)				

婚姻狀況				
寡居或離婚	<b>0.74 (0.23)</b>	<b>0.84 (0.25)</b>	<b>0.83 (0.25)</b>	0.25 (0.20)
丈夫教育程度				
小學或以下(參照組)				
初中、初職、國中(7-9年)	-0.22 (0.16)	-0.13 (0.18)	-0.11 (0.18)	—
高中、高職(10-12年)	-0.24 (0.16)	-0.18 (0.18)	-0.24 (0.19)	—
大專或以上(13年或以上)	0.08 (0.22)	-0.13 (0.24)	-0.19 (0.24)	—
目前居住地				
台北市	<b>-0.41 (0.17)</b>	<b>-0.58 (0.19)</b>	<b>-0.61 (0.20)</b>	—
高雄市	<b>-0.84 (0.21)</b>	<b>-0.95 (0.25)</b>	<b>-0.98 (0.25)</b>	—
縣轄市	-0.21 (0.17)	-0.07 (0.19)	-0.03 (0.19)	—
縣第一級	<b>-0.54 (0.13)</b>	<b>-0.58 (0.15)</b>	<b>-0.58 (0.15)</b>	—
縣第二至五級(參照組)				
是否從未曾工作				
是	—	—	—	0.11 (0.25)
目前工作行業				
農業(行業碼01,02,03,參照組)				
製造業(行業第一碼2,或3)	—	—	—	<b>1.13 (0.36)</b>
商業(行業第一碼6,或9)	—	—	—	<b>1.26 (0.35)</b>
其它行業	—	—	—	<b>1.68 (0.38)</b>
目前無工作	—	—	—	<b>-0.81 (0.33)</b>
目前工作部門				
公共部門或學校	—	—	—	<b>0.49 (0.28)</b>
私人部門(參照組)				
自雇、或為家人工作	—	—	—	<b>0.72 (0.12)</b>
家庭態度**				
態度(2)贊成婦女工作	—	—	<b>0.26 (0.13)</b>	—
態度(4)贊成婦女工作	—	—	<b>0.36 (0.16)</b>	—
態度(5)贊成婦女工作	—	—	<b>0.31 (0.14)</b>	—
態度有未回答者	—	—	<b>0.49 (0.23)</b>	—
生育前後皆全職*初中初職國中				
生育前後皆全職*高中高職	—	<b>-1.13 (0.47)</b>	<b>-1.13 (0.47)</b>	—
生育前後皆全職*大專或以上	—	-0.47 (0.45)	-0.57 (0.46)	—
生育前後有工作*初中初職國中	—	-0.59 (0.82)	-0.73 (0.82)	—
生育前後有工作*高中高職	—	<b>-0.84 (0.35)</b>	<b>-0.87 (0.36)</b>	—
生育前後有工作*大專或以上	—	<b>-0.92 (0.35)</b>	<b>-1.99 (0.36)</b>	—
生育前後有工作*大專或以上	—	<b>-1.78 (0.79)</b>	<b>-1.82 (0.79)</b>	—
常數項				
自由度	<b>-0.36 (0.14)</b>	<b>-0.67 (0.16)</b>	<b>-1.16 (0.24)</b>	-0.51 (0.37)
L <sup>2</sup>	693	685	681	636
樣本大小	863.65	671.94	658.37	1046.09
	724	724	724	667

\* 括弧內是標準誤，黑體字是統計顯著水準在 0.05 的情形下顯著的變數。本人及配偶教育無資料或未答在各模型中皆有所控制，但並未列出。

\*\* 態度(2)贊成婦女工作平均比例是 30.2%，態度(4)贊成婦女工作平均比例是 79.1%，態度(5)贊成婦女工作平均比例是 31.6%，態度有未回答者平均比例是 5.11%。

\*\*\*未包括「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的收入模型  $L^2=1051.34$ ，自由度=634。所以表中的收入模型是較佳的模型。

糊性、模型三的結果、以及本文的研究主題，以下所討論的多變項分析在就業的部份，將主要參考模型二進行。

比較雙變項與多變項的結果我們看到，當控制住妻子教育程度之後，丈夫的教育程度皆不顯著。<sup>27</sup> 由此可見，單變項分析的相關是由於丈夫與妻子教育程度相關所造成的。更重要的是，若 Leibwitz et al. (1994)，Leibwitz (1975)，與 Cain (1996) 以教育作為「永久收入」化約模型的策略是恰當的，則此一結果反映現階段的台灣社會，工資效果大於收入效果。換言之，此一結果指涉台灣的婦女就業與否，主要是由需求面所趨動。當然，此一結論還有待其它資料對永久收入作更精確的推估之後再進一步檢證。

若已婚女性在最小小孩六歲以後的就業，比較可能是由需求面而非供給面所趨動是恰當的推論，且模型三又顯示：「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的效果並未隨態度而改變，我們可以推論已婚婦女最小小孩六歲以後就業與否受婦女主觀偏好的決定是有限的。換言之，婦女就業的市場條件，與婦女本身的教育，在現階段應是提升婦女就業最主要的重點。

教育程度與幼兒養育與工作互補性的關係，為本研究的主要問題之一。首先，在模型一裡我們便看到，教育程度與六歲以後的就業機會成正比。教育程度越高，六歲以後就業的機會就越大。由表三，我們看出結婚時有工作的婦女中，受大專以上教育的人幾乎全部在生育前後連續全職，這與蔡青龍（1988）指出的：大專程度的婦女傾向於持續就業相符。由表三我們還看到，教育程度是高中高職，而且結婚時有工作的婦女，約只有 43% 在生育幼兒前後會持續做全職的工作，若生育幼兒前後完全中斷工作，有五分之三的婦女會在最小小孩上小

27 得到此結論的方式是將模型一中的妻子教育程度一變數拿掉。此時，先生的教育程度達到顯著水準。這一模型並未列出。

學之後，再回到就業市場上工作。對初中以下教育程度的婦女而言，表三顯示在所有結婚時有工作，但生育幼兒前後完全中斷工作的婦女中都還有約三分之一的人會再恢復就業。並不像蔡青龍（1988）所預期的：一旦中斷就業的幾乎都不再就業。但表三與模型二統計結果顯示，對小學或小學程度以下的婦女而言，生育幼兒前後是否持續作全職的工作對往後就業的機會，比對初中程度婦女的影響大。模型二、表三與圖二也都顯示若不中斷工作，小學、高中與大學程度的婦女在往後就業機會上很相似。但是，表三與圖二顯示，小學以下教育程度的婦女若在生育前後完全中斷工作，又想在最小小孩上小學後回到就業市場，其困難度比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上的婦女大一倍。表三與模型二顯示，這種困難度對初中與對小學的婦女而言是類似的。且不論這些細部的解析，我們可以說，現在在台灣婦女因生育中斷工作的人，受影響最大的是受初中或初中以下教育的人。對這一群人而言，若能在就業條件上使她們能在生育前後持續就業，將大幅提升這群婦女在中年以後的經濟獨立性。提升婦女教育程度，就長遠而言或許有效，但由表一我們可以看到，即使近來台灣婦女教育水平大幅提高，但是在已婚、最小小孩六歲以上的婦女之中仍有三分之二的婦女是初中的教育程度。<sup>28</sup> 短期而言，若要提升這群婦女與公共經濟領域的結合，成人教育、在職訓練、職業輔導可能是比較直接的手段。

模型一中，是否純為結婚而離職有顯著的效果，但是當模型二中放入生育與工作的互補性諸變項之後，此一變數的效果便消失了，可見若是能客觀地在行為上區分「為結婚離職」與「為生育離職」，「為生育離職」比「為結婚離職」對婦女有更大的影響。目前文獻所報導的「為結婚而離職」對女性就業的影響比「為生育而離職」大，可能

28 當然，以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樣本而言，這一比例主要反映了中年以上婦女的現況。

表三：結婚時有工作，最小小孩六歲之後曾就業比例——  
教育程度與工作生育互補性的關係

	小學	初中、初職、國中	高中、高職	大專或以上
生育前後皆全職	94.8(N=77)*	73.7(N=19)	95.2(N=42)	100(N=32)
生育前後無工作	32.2(N=90)	35.7(N=14)	61.5(N=13)	100(N=1)
總樣本數	295	75	97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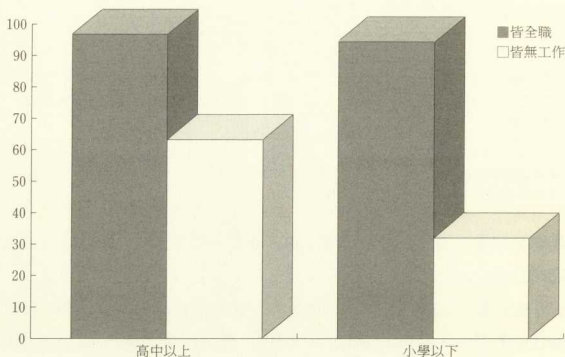
\*括弧內的樣本大小是每一格內的 100%，每一列在總樣本中的總數是每一列的最下一欄。總樣本中已排除結婚時未工作的婦女。本表也未報導生育前後工作但不是全職的教育程度分化，總樣本數與括弧內數字的差異便是這一組人的樣本數。

是由於測量工具的混淆所造成。由於社會變遷調查樣本落於這一範疇的婦女過少，此一結論尚待往後研究以更大的樣本作進一步檢證。

由模型一，模型二與圖一的比較，我們發現，若以最小的小孩六歲作一判準，20 歲到 39 歲的兩個科夥有最高的就業傾向。模型二加入了「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解釋了為什麼最年輕的 20-34 歲這一科夥在最小小孩六歲之後是否出去就業的機會上，比 40 歲以上的各科夥要高。但即使在加入這一組變數後，30 歲到 39 歲的科夥統計上仍比 40 歲以上的科夥要高。這有可能是隨婦女參與勞動力的比例增加，工作經驗對年輕科夥的婦女而言越來越重要。另一種可能性是 20 到 34 歲這一組樣本在生命週期上最有可能剛剛完成幼兒養育的階段，所以幼兒養育期就業狀況的解釋效果比其他科夥要強。但是，因為最小小孩子的年齡（可視為直接測量幼兒養育完成時間長短的變數）的效果已經控制，所以本文傾向於相信前者的解釋較恰當。

除了「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之外，其它控制變項也有一些值得往後研究借鏡的發現。雖然這些發現不是本文的重點，但也在此略作歸納，以利往後的研究。

比較多變項與單變項的統計結果，我們發現，省籍在雙變項的分析上有顯著的差異。尤其是外省婦女傾向於有較高的就業率。但由模型一我們發現，一旦教育、居住地、行業別、及婚姻狀況控制之後，



\* 縱軸為最小小孩六歲以後母親曾出外工作的機率

圖二：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對教育程度的相對重要性

外省籍在就業的傾向上不再比其它族群要高。<sup>29</sup> 換言之，起碼對已婚有小孩且小孩年齡皆在六歲以上的婦女而言，省籍在就業上的差異是虛假關係。若此一結論可概化到所有婦女，則應可鼓勵往後對婦女就業研究上放心使用主計處的大樣本。以主計處資料估計女性就業，不包括省籍，應不致有統計上顯著的誤差。

離婚或寡居的婦女有較高的就業率，這一效果獨立於「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教育、居住地等因素之外，恰當地反映了她們的經濟需要。但是由於離婚或寡居是目前的狀況，並不能完全捕捉離婚或寡

29 我們一個未表列的實驗模型中發現，省籍的效果主要與教育相關。若我們由模型一去除丈夫與妻子的教育程度，省籍的效果依然顯著。

居究竟是就業的因或就業的果，只能視為對目前工作機率的控制變項。確切的因果關係，與實際的效果，還有待往後的研究取得恰當的縱列式資料作進一步的檢證。<sup>30</sup>

## (2)收入：

在收入的模型裡，我們先將目前就業的狀況當作外生變數處理，而後以同樣的解釋變項，將就業狀況當作內生變項，用表二的模型三為就業狀況的決定結構，去測試在 ordered probit selection 模型中，就業與收入兩模型的殘差項是否有顯著的相關。由於態度變項與就業的關係顯著，可見在 ordered probit selection 模型中，我們使用態度變項作為工具變項去測試收入模型中就業與收入間殘差項間的相關程度是恰當的。結果我們得到殘差項相關程度的估計參數是 0.11，它的標準誤是 0.32，並沒有達到顯著水準。所以本文對收入部份的結論將以把就業當成外生變項的模型為準。

表一與表四顯示「幼兒養育互補性」與教育對收入的影響可能類似。但是由表二，我們可以看到教育對收入的影響比「幼兒養育互補性」對收入的影響有效。這讓我們懷疑，表一與表四所見到的「幼兒養育互補性」與收入之間的關係，可能反映了「幼兒養育互補性」分佈背後的教育程度分佈。與就業模型很不一樣的是：我們在收入的模型裡，教育與「幼兒養育及工作的互補性」之間沒有交互作用。<sup>31</sup> 另外，我們發現，在 ordered probit 模型中，若將收入等級 10,000 以下的併作一級，則表二「目前收入」模型中的「生育前後皆全職」效果便不再顯著了。由此可見，表二收入模型中所見到的工作連續性變數的效果可能是捕捉了由收入是 0 升為收入是 10,000 的機率變化。若第

30 類似的因果推論問題可能也會出現在目前居住地的問題上，好在以往對所有婦女所作的研究結論與本文的實證結果類似。

31 因為交互作用不顯著，所以包括互動效果的統計模型並未收於表二或本文其它表列中。

二節第(二)小節的理論是恰當的，則工作連續性只對目前每月收入等級是 10,000 以下的婦女有影響顯示：對低收入能力的婦女而言，她們的收入能力無法負擔因工作所造成的幼兒養育成本。另一方面，同樣的理論也顯示，工作連續與否對其他等級收入影響不顯著的現象，很可能也反映了我們業界對生育前後已婚婦女在職訓練投資普遍偏低，或業界並不重視女性的工作經驗。

表四：有給工作者目前收入與教育及工作生育互補性的關係

	少於10,000	10,001-30,000	30,000以上	樣本數(100%)
工作與生育互補性				
生育前後皆全職	20.49%	50.00%	29.51%	122
生育前後曾工作	23.08%	64.62%	12.31%	65
生育前後無工作	34.12%	51.76%	14.12%	85
妻子教育				
小學	40.00%	55.71%	4.29%	140
初中、初職、國中	18.75%	68.75%	12.50%	32
高中、高職	9.84%	60.66%	29.51%	61
大專或以上	2.63%	23.68%	73.68%	38
總計	25.37%	54.04%	20.59%	272*

\*妻子教育的樣本實際為271，有一名受訪者未恰當回答其教育程度。

年齡對收入並沒有影響，可能是在女性勞動供給增加的同時，台灣有較多沒有工作經驗的年長婦女進入，壓低了工作經驗與年齡的相關。依美國的經驗，當婦女工作經驗全面提升之後，女性的平均工資相對於男性將會有顯著的改善。否則，不斷擁入的新進勞工將持續造成男女工資上的差異（比較：Smith and Ward 1985）。<sup>32</sup>

32 若我們比較表一年齡顯著的效果，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說年齡所代表的工作經驗差異，在表二多變項分析中已由直接測量工作經驗的變數作了恰當的控制。



在收入模型中，一個附帶發現是「寡居或離婚」的婦女並沒有比一般婚姻狀態下的婦女收入高；即使前面我們提過，「寡居或離婚」的婦女可能比其它婚姻狀態下的婦女在最小小孩六歲以後就業的機率高。若我們再考慮先生的收入，此一現象可能顯示台灣這些少數由婦女獨自撫養子女的家庭，在經濟資源上匱乏的徵兆。

生育以前的工作經驗對收入的影響，以對從事過商業工作的婦女影響較大。無論「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的變數是否控制，曾經在結婚之前從事商業的婦女都有收入的優勢。其他行業的婦女，收入則不因爲結婚前的行業有所不同，而只與目前的行業有密切關聯。換言之，商業的人力資本累積顯然對婦女往後的收入較有正面影響。此一現象更詳細的理論內涵仍有待往後的研究去發掘。

最後，與收入相關的另一個附帶發現是控制工作經驗與教育程度之後，部門別（公共、私人、或自僱…）與行業別（農業、製造業、商業…）對女性收入仍有顯著的影響。農業部門女性勞工的個人收入<sup>33</sup> 最不理想。若這與由表二「目前居住地」所反映的鄉村婦女高就業率相連，我們見到的是一個收入與參與不相稱的現象。<sup>34</sup> 這種現象可能與農村婦女本身的經濟與家事決策上的自主性相對偏低有關，或者農村婦女的高就業並不在農業部門發生。另一方面，我們發現自僱與爲家人工作的一群婦女收入較豐，但根據蔡淑鈴（1986）的研究，我們却看到自僱的比例有下降的趨勢。這又是另一個收入的趨勢與部門成長相反的狀況。有可能蔡淑鈴所觀察的是整體的現象，而已婚小

33 讀者應注意在模型中爲自己或爲家人工作的狀況已被控制，所以在統計上，表二收入模型中從事農業工作的婦女所得較低的傾向，應與自僱或無給式地爲家人工作無關。

34 一位本文的匿名評論者指出部門別所造成的收入差異可能是農村婦女所得偏低的結構因素之一，我們非常同意，只是此一結構因素並無法說明爲何農村地區婦女有較高的就業率。

孩在六歲以上的婦女在自僱產業的人數，仍有可能是上升的。無論實際的狀況是什麼，這些結果顯示以後對女性收入的研究，應不只注重人力資本因素的瞭解，而更應注意產業或部門間的制度條件對女性收入的影響。

省籍對收入的影響與對是否就業的影響類似。比較多變項與雙變項的統計結果，我們發現，省籍在雙變項的分析上有顯著的差異。尤其是外省婦女傾向於有較高的收入。但由模型一，我們發現，一旦教育、居住地、行業別、及婚姻狀況控制之後，<sup>35</sup> 外省籍的收入優勢便消失了。換言之，起碼對已婚有小孩且小孩年齡皆在六歲以上的婦女而言，省籍在收入上的差異也是虛假關係。若此一結論可概化到所有婦女，則應可鼓勵往後對婦女收入的研究上放心使用主計處的大樣本。以主計處資料估計女性收入，不包括省籍，應不致有統計上顯著的誤差。

## 五、結論

誠如本文第一節問題討論所指出，若幼兒養育導致工作中斷的傾向是社會對婦女的角色定位所造成，則在養育幼兒這一生命週期階段，婦女因承擔生育責任對其往後經濟福祉所造成的影響，不應只由各家庭或婦女個人來承擔。合理的社會制度應對婦女作適當的制度性協助。社會制度的安排或可增加婦女在生育前後持續就業的機會——例如：協助取得價廉質佳的托兒服務，提供足夠的育嬰假期給幼兒父母，以法令排除產業解僱生育幼兒的婦女等等——或可降低因中斷工作所導致的後果——例如：加強對生育子女之後婦女的就業（或再就業）輔導，在適當產業提供僱用生育子女之後婦女的政策誘因，

35 與就業的部份一樣，教育是解釋婦女收入上省籍差異的主要因素。

立法避免業界對生育幼兒之後的婦女的歧視等等。誠如本文一開始所指出，在找尋政策去協助婦女增加生育前後就業的可能性，或找尋政策去協助降低生育幼兒期間中斷工作對婦女往後經濟福祉的影響之前，我們必需先對目前台灣婦女因生育中斷工作的現況有一基本的認識。本文利用《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二期第二次》問卷一的資料，協助往後的研究與政策制定者認識目前台灣已婚婦女因生育而中斷工作的狀況，以及中斷工作對已婚婦女最小小孩六歲以後的就業機會與收入能力的影響。

本文將生育幼兒期間同時工作（或不工作）的狀況稱為「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並依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中所可取得的所有生育前後的就業狀況，測量已婚且最小小孩六歲以上的樣本「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的高低。借由此一測量，本文得以瞭解在《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二期第二次資料所能涵蓋的科夥間，平均有 26% 的已婚婦女在生育幼兒期間曾同時兼顧生育與連續全職工作兩項角色。此一狀況有隨科夥上升的趨勢，十五年的科夥差距大約上升了 70%。但直到民國 45 年前後出生的科夥，仍有超過六成七的婦女未能完全做到兩者兼顧。

不幸的是本文進一步發現，無論對婦女完成生育幼兒的生命週期之後的就業機會而言，還是收入能力而言，生育前後無法兼顧幼兒養育以及勞動角色對台灣婦女有明顯的負面影響。其中對她們往後就業機會的影響尤其大。

「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並沒有省籍的差異，但却對不同教育程度與收入的婦女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因生育而中斷工作在教育程度低於高中高職程度的婦女之間十分普遍。這一類婦女依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的估計，約佔調查所涵蓋所有最小小孩六歲以上婦女人數的三分之二。對這一群低教育程度的婦女而言，結婚時有工作但生育前後非連續全職工作的比例約佔四分之三，高出高中的 57% 與大學的

20%很多。但對每月收入一萬元以上的婦女而言，「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並沒有顯著的影響。養育幼兒前後是否中斷工作與婦女目前收入的關係主要來自低收入的婦女。這一群低收入的婦女，自然最有可能也是低教育程度的婦女。因此，對低收入，低教育程度的婦女，特別需要補助其托兒成本以助於她們持續就業，從而保有日後工作與個人收入的機會。

在最近的發展趨勢中，我們以科夥的就業分佈為證，推測生養幼兒前後婦女就業的傾向正在持續增加中。無論形成這一趨勢的社會力為何，托兒的需求應同時在成長。有效地預估此一趨勢，作好相應的制度性準備，應有助於婦女進一步與公共經濟活動的結合。

為降低因中斷工作所造成的成本，長期而言，提升婦女教育程度是改善現狀的良方。然而，短期而言，直接依婦女需要輔導就業才是比較實際的作法；因為大部份已婚且最小的子女是六歲以上的婦女已不可能再進入傳統的教育體系中提升其人力資本了。可惜的是由第二期第二次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本文無法涵括足夠的國教實施後的科夥。是否在婦女教育因國民教育全面提升之後，有新的問題與新的需要等在我們前面？有待往後的研究取得足夠涵括國教實施後樣本的資料才能揭曉。

本研究也初步發現國內最近的女性就業增加很有可能是由需求面的拉力所造成，而不是供給面的個人觀念的改變及小家庭需要等因素所造成。由此可見，以往 Mott & Shapiro (1983) 在這方面所作的解釋是值得商榷的。婦女對「投入程度」的改變並不足以用來理解最近台灣在已婚婦女之間持續增加的「工作與幼兒養育互補性」。經濟與社會結構可能是更重要的成因。然而，本文在這方面的探究只是一個開端，是否台灣婦女參與就業市場持續增加的現象與大部份已開發國家一樣是由需求面所帶動，有待更多的研究去檢證。

本文還指出以往在研究婦女離職問題中慣用的「為結婚離職」或

「為生育離職」等概念，有更進一步釐清的必要。以往的研究不從行為上區分其離職原因，認為在台灣大多數的婦女是「為結婚離職」。且「為結婚離職」的婦女較不容易復職。如果這一推論是對的，在行為上純為結婚而終止工作，並沒有在兩年之內懷孕的婦女應更不容易復職。但本文否定了這一個假設。結了婚就離職且兩年以上未懷孕的婦女少之又少（不到2%）。本研究也發現，若我們同時考慮「生育與幼兒養育互補性」（或可視之為：「為生育而離職」的行為）的狀況，婦女是否「為結婚離職」對她們在最小小孩六歲以後就業機會的影響並不重要。由於樣本的限制，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中行為上純粹「為結婚離職」的個案數過少，使得我們對這一與以往研究結論不同的結果持保守的態度。往後可找尋更大的樣本去檢查本文如下的結論是否恰當：「若由行為上區分為結婚離職或為生育離職，我們發現生育離職比結婚離職對往後婦女就業有較大的影響」。

本文另一些與收入和就業相關的附帶發現可能也對往後對（已婚）婦女收入與就業的研究有助益。1.在對婦女目前收入的探討中，本文發現人力資本理論不足以完全解釋收入的差異，部門與行業的差異也需要仔細的控制。2.本文初步證明省籍對婦女就業與收入沒有顯著的影響。因此使用官方大樣本資料時，沒有詳細的省籍分化資料應不會造成推論上的偏頗。3.最後，本文也發現，獨自撫養子女的婦女，在收入能力上並沒有任何優勢。雖然在台灣這類婦女的人數少到容易被忽略的地步（依本文的研究樣本，只約佔所有已婚且最小小孩六歲以上婦女的6.5%），但以她們的收入能力分佈，若沒有政府或親人在經濟上的補助，可能比一般婚姻狀態下的家庭要匱乏得多。4.在某些部門（如：自僱）與行業（如：農業）有收入與婦女勞動參與負向關聯的現象，值得往後研究作進一步深究。因本文主要研究目的所限，這些發現在本研究中只會針對最小小孩六歲以上的已婚婦女作檢證。

最後，本文建議往後研究應在資源許可的條件下收集詳盡的回溯

性資料，或縱列式資料。這種資料尤其是探討婦女勞動市場經驗、生育行爲、與婚姻狀態所必要。對本文所無法深究的態度與行爲之間的因果關係，居住地改變的影響等問題則非得收集縱列式的資料不可。

## 參考書目

左建軍

- 1990 〈台灣有偶婦女勞動再參與之經濟分析〉台灣銀行季刊, 41(4):253-285。

呂玉瑕

- 1992 〈婦女就業與家庭角色、權力結構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56:111-143。

- 1994 〈城鄉經濟發展與已婚婦女就業〉人口學刊, 16:107-133。

伊慶春、蔡瑤玲

- 1989 〈台北地區夫妻權力的分析：以家庭決策為例〉收於伊慶春、朱瑤玲主編《台灣社會現象的分析》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叢刊, 25:115-151。

張素梅

- 1988 〈婦女勞動參與率的研究——聯立模型分析〉經濟論文叢刊, 9(2)。

張清溪

- 1990 〈結婚、生育、與子女數對有偶婦女勞動供給的影響〉經濟論文叢刊, 9(2):167-223。

- 1979 〈失業率與台灣婦女勞動參與率〉中國經濟學會年會論文集, 97-115。

蔡青龍

- 1988 〈婦女勞動再參與的初步分析〉經濟論文叢刊, 9(2):149-175。

蔡淑鈴

- 1986 〈職業地位結構——台灣地區的變遷研究〉瞿海源與章英華編《台灣社會與文化變遷》，頁 299-351。

劉鶯釧

- 1988 〈有偶婦女勞動參與的雙重選擇模型〉經濟論文叢刊, 16(2):133-148。

謝雨生

- 1982 〈家庭生命週期與婦女勞動參與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農業推廣研究所碩士論文。

瞿海源(編)

- 1991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劃:第二期第一、二次調查計劃執行報告》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瞿海源、蕭新煌(編)

- 1982 《社會理論與方法研討會論文集》，中研院民族所專刊乙種。

羅紀瓊

- 1986 〈已婚婦女勞動參與的再思〉 經濟論文, 14(1):113-130。
- Agresti, A.  
1990 *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 New York: John Wiley.
- Archer, John & Barbara Lloyd.  
*Sex and Gend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rgen, Elizabeth. Bergen  
1990 "The Multidimensional Nature of Domestic Labor: An Investigation of Husbands' Participation." *NSFH Working Paper No. 36*.
- 1991 "The economic context of labor allocatio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2(2):139-157
- Blood, Robert O. Jr. & Donald M. Wolfe  
1960 *Husbands and Wiv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Booth, A., Johnson, D. R., White, L. and Edwards, J. N.  
1984 "Women, Outside Employment, and Marital Insta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0:567-583.
- Bowen William G. and T. Aldrich Finegan  
1969 *The Economics of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ain, Glen G.  
1966 *Married Women in the Labor Force: An Economic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ltrane, Scott and Masako and Ishii-Kuntz  
1992 "Men's Housework: A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4:43-57.
- Coverman, Shelley  
1985 "Explaining Husbands' Participation in Domestic Labor."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6:81-79.
- Davis, K.  
1984 "Wives and Work: Consequences of the Sex Role Revolu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0:397-417.
- Desai, Sonalde & Linda J. Waite  
1991 "Women's Employment During Pregnancy and after the First Birth: Occup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Work Commit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551-566.
- Engels, Friedrich



- 1978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In Robert C. Tucker (ed.) *The Marx-Engels Reader*. New York: Norton; orig. publ. 1884.
- Fuchs, Victor R.  
1988 *Women's Quest for Economic Equal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oldin, Claudia  
1990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An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eene, William H.  
1993 *Econometric Analysis*.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 Jaggar, Alison M.  
1983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otowa, New Jersey: Rowman & Allanheld.
- Leibowitz, A.  
1975 "Education and the Allocation of Women's Time," in F. Thomas Juster (eds.) *Education, Income, and Human Behavior*.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 Leibowitz, A., Jacob Klerman, and Waite L.  
1992 "Employment of New Mothers and Child Care Choice: Differences by Children's Ag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7(1):112-123.  
1994 *Time Trends in Recent Mothers' Labor Suppl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Rand Cooperation.
- Lu, Hsien-Hen  
1995 "Exploring Trends in Married Women Having Infants and Working the Labor Force 1961-1990." Paper presented at 1995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Annual Meeting*.
- Mackinnon, C.  
1987 *Feminism Unmodified: Discourses on Life and Law*.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addala, G.  
1983 *Limited Dependent and Qualitative Variables in Econometr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et, Elizabeth and Barbara Finlay

- 1984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Labor Among Women in Dual-Earner Famil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5:357-364.
- Mincer, Jacob
- 1962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Married Women." in H. G. Lewis (ed.) *Aspects of Labor Econom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63-105.
- 1985 "Intercountry Comparisons of Labor Force Trends and of Related developments: An Overview."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Jan. Supplement):S1-S32.
- Mincer, Jacob and Haim Ofek
- 1982 "Interrupted Work Careers: Depreci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7(1):3-24.
- Moen, Phyllis
- 1989 *Working Parents: Transformations in Gender Roles and Public Policies in Sweden*.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1992 *Women's Two Roles: A Contemporary Dilemma*. New York: Auburn House.
- Mott and Shapiro
- 1983 "Complementarity of Work and Fertility among Young American Mothers." *Population Studies* 37:239-252.
- Myrdal, A. and V. Klein
- 1956 *Women's Two Rol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O'Brien
- 1981 *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Okin, S.
- 1989 *Justice, Gender, and the Family*. New York: Basic Books.
- Oppenheimer, Balerie, K.
- 1973 "Demographic Influence on Female Employment and the Status of Wome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4):946-961.
- 1974 "The Life Cycle Squeeze: The Interaction of Men's Occupational and Family Life Cycles." *Demography*, 11(2):227-245.
- Presser, Harriet B.
1994. "Employment Schedules Among Dual-Earner Spouses and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by Gen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348-364.

Robbins, Lionel

1930 "Elasticity of Demand for Income in Terms of Effort." *Economica* June:123-129.

Rodman, Hyman

1972 "Marital Power and the Theory of Resources in Cultural Contex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3(1):50-69.

Ross, C. E.

1987 "The Division of Labor at Home." *Social Forces* 65:816-833.

Smith, James, and Michael P. Ward.

1985 "Times Series Growth in the Female Labor Force"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 (1, part2) Supplement, pp.S59-90.

Sorensen, Annemette

1983 "Women's Employment Patterns After 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5:311-321.

1983 "Children and Their Mother's Caree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2:26-43.

Spitze, G.

1988 "Women's Employment and Family Relations: A Review."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5:78-87.

Stewart, Mark B.

1983 "On Least Squares Estimation when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s Grouped."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37-753.

Tsuya, Norioko O. and Larry L. Bumpass

1995 "Gender, Employment, and Housework in Japan and U.S." Paper presented at 1995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Annual Meeting.

Tzeng, Meei-Shenn

1993 *Labor Market Experiences and Socioeconomic Effects on Marital Dissolution*. Doctor Thesis 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Udry, J. Richard

1994 "The Nature of Gender." *Demography* 31(4):561-573.

Waite, Linda J.

1980 "Working Wives and the Family Life Cycl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272-294.

- 1981 "U.S. Women at Work." *Population Bulletin* 36(2). Washington, D. C.: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Inc.
- Waite, Linda J., Gus W. Haggstrom, and David E. Kanouse  
1985 "Changes in the Employment Activities of New Par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0:263-272.
- Willis, Robert J.  
1986 "Wage Determinants: A Survey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Human Capital Earnings Functions." in Ashenfelter, Orley & Richard Layard (eds.)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 Wolfe, Alan  
1989 *Whose Keeper? Social Science and Moral Oblig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Zavoina, R. and W. McElvey  
1975 "A Statistical Model for the Analysis of Ordinal Level Dependent Variables."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 103-120.

# The Effect of Gender, Marriage, and Family o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 Case Study of Taiwan's Changing Society

Hsiang-Ming Justine Kung\*

## Abstract

Previous research o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conducted in Western societies has found that women are more distressed than men, and unmarried persons more distressed than married persons. Based on Gove's role theory, the constrained social role of married women accounts for gender difference in distress levels. Employed women would also be less distressed than women who are exclusively housewives because of the extra source of gratification from employment.

Earlier studies in Western societies have also revealed that the existence of supportive, extended family kinships buffer, or mediate, the risks of higher distress levels. However, most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family support has not distinguished live-in extended kin from those who only live nearby. It has thus been unclear whether different family structures can actually hinder member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By using data from the General Survey of Social Change in Taiwan (1990), this study finds that Chinese women in Taiwan, like women in

---

\* Department of Social Psychology, The World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Western societies, have higher scores o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However, Chinese women who are divorced, separated, or widowed experience the highest distress levels. On the other hand, Chinese men, unlike men in Western societies, tend to have bette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when they are divorced, separated, or widowed. Employment status fails to show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distress. This research also shows that the stem family structure benefits single persons most. Live-in extended kin in either stem families or large extended families are in fact advantageous to both married and divorced or widowed person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ean distress levels were found among mothers-in-law, daughters-in-law and women who lived with their biological parents after being married.

# 性別、婚姻與家庭對 心理焦鬱的影響： 變遷中的台灣社會個案研究

孔祥明

## 摘 要

根據過去西方社會對心理健康的研究顯示：女性的心理焦鬱程度比男性高。依照 Gove 的角色理論來解釋此一性別上的差異主要是來自己婚婦女所扮演的社會角色受到很大限制。因此，已婚婦女外出工作則會因增加情緒滿足的來源而減低其焦鬱度。此外，西方研究也指出若有擴大家庭成員提供支持亦可降低高度焦鬱的危險。然而，西方研究中却沒有文獻區分這些支持性擴大家庭成員是住在同一屋簷下，或是分住不同居所。因此，既有資料中並無法明確指出住在一起的擴大家庭成員到底是有助於降低個人心理焦鬱？抑或是易引起紛爭，增加焦鬱程度的來源？

本研究根據民國 79 年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分析所得，台灣地區女性不論何種婚姻狀況，其心理焦鬱度都高於男性。而且，在台灣尤以離婚、分居或喪偶女性焦鬱度最高，而離婚、喪偶或分居男性為最低，這一點是與西方完全不同的結果。婦女是否出外工作並不對台灣女性焦鬱度有顯著影響。另一方面，資料顯示有擴大家庭成員同住對個人心理健康是有助益的，尤其是對離婚、喪偶者幫助最大。

# The Effect of Gender, Marriage, and Family o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 Case Study of Taiwan's Changing Society

## I. Introduction

Modern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ization bring rapid economic growth as well as improved living standards to societies. They also bring tremendous changes in the traditional ways of life which, in turn, may create anomic situations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that are characteristic of modern society. Indee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s one of the best indicators of the human cost of modern technological societies.

However, little was known about the social patterns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modern Western societies before the 1960's (Mirowsky and Ross 1989). Beginning in the 1960's, numerous community surveys based on large, representative samples have revealed several unexpected findings (e.g., Gove and Tudor 1973; Gove and Geerken 1977; Kessler and McRae 1982; Rosenfield 1980; Hughes and Gove 1981; Gove et al. 1983; Pearlin et al. 1981). One of the unexpected findings was that women were more distressed than men (see Gove and Tudor 1973). The other was that unmarried persons were more distressed than married ones (see Coombs 1991; Bachrach 1975).

The majority of the hypotheses on the effect of gender and marriage o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have been proposed and tested in



Western societies. They have largely neglected the non-Western societies as well as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Difference may actually exist between Western and non-Western societies. For example, several community surveys carried out in non-Western societies (e.g., Orley & Wing 1979) did not find a female preponderance on minor psychiatric morbidity (MPM). Before we can assu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and between married people and those unmarried ones, it is valuable to assess these hypotheses in non-Western societies.

On the other hand, although it has been long recognized that a person's mental health is related to their family functioning, the effect of family structure o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s not among the well researched topics found in gender and marital status. In fact, almost no existing research in the Western societies examines the association of the functioning of the whole family as a structure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Studies of family in relationship to individual well-being usually reduce the family to individual psychodynamic terms instead of considering the functioning of the whole family (Bell 1985). In addition, most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family support do not distinguish live-in extended kin from those who only live nearby. It is unclear whether the live-in extended kin a source of stress or relief from distress. Hence, focusing on different types of family structures helps to clarify the effect of live-in extended kin.

Among the newly industrialized Asian societies,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has been considered a "miracl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Taiwan miracle" has led social scientists and politicians alike, in the developed as well as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find out what ingredients account for the success (Berger 1988; Hsiao 1988). However, while there were many studies of Taiwan that focused on the merits of economic growths, only few of them paid attention to the degradation of people'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s a

result of rapid social change. In addition, among the studies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most of them were descriptive studies done by psychiatrists (e.g., Lin 1959; Hwu et al. 1987; Yeh et al. 1987; Rin 1986, 1987; Cheng 1987, 1988, 1989a, 1989b, 1989c) and only few incorporated sociological analysis guided by theory (e.g., Hu 1990).

Because of the limited number of studies guided by sociological analysis, many important questions are left unanswered. For example, whether women in Taiwan are consistently more distressed than men has not yet been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It is also uncertain whether unmarried persons in Taiwan are more distressed than married ones. Moreover, are the live-in extended kin a source of stress or relief from distress?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find out whether the same finding in Western societies can be found in a non-Western society. In addition,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terns and causes of distress in Taiwan and contributes to prevent the degradation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experienced by people living there.

## **II. A Review of Studies in Western Societies**

### **A. Gender Difference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Many community surveys replicate the finding that women are more distressed than men. Yet, the source of such difference remains controversial. While some researchers argue that gender differences are due to response bias (Sudman and Bradburn 1974; Mechanic 1978) or female expressiveness in the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 (Phillips and Segal 1969; Briscoe 1982), others find no evidence to support such notions (e.g., Clancy and Gove 1974; Gove and Geerken 1977). On the other hand, various biological investigations also fail to account for the higher rates in women. Among these investigations, genetic studies, hormonal studies, studies of premenstrual tension and menopause are included (see Cheng 1989a:395).

In contrast to the response-bias, female personality and biological explanations, Gove and his associates,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attribute gender difference to the particularly negative aspects of sex and marital roles that women typically occupy (Gove and Tudor 1973). The published studies conducted in Western industrial nations since World War II consistently show that it is married women who have higher rates of distress than married men. This finding indicates that marriage is good for men: married men are happier and healthier than the unmarried (Bernard 1972). Marriage, on the other hand, is not as beneficial for women as for men. The difference in mental well-being is smaller between married women and unmarried ones (Lowe & Smith 1987).

Since the majority of adult women in the 1970's were exclusively housewives and men were the household heads and workers, Gove reasoned that, while family and work roles provided men with sources of gratification, many women had only one source of gratification, the family (Gove and Geerken 1977). Based on Gove's role theory, women who were employed would be less distressed than women who were exclusively housewives. Once women participated in the paid labor market, they had access to another social network that served as a major source of gratific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family (Gove and Geerken 1977). As evidence, a sizeable number of follow-up research supported Gove's role theory (eg., Gore and Mangione 1983; Gove and Geerken 1977; Rosenfield 1980; Kessler and McRae 1982; Aneshensel 1986).

However, this evidence is by no means consistent. In addition, employed wives are still more distressed than employed husbands. Despite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married women who participate in the labor forc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house work and children still falls on married women. Many studies (e.g., Shelton 1990) show that wives' employment has no association with husbands' time spent in domestic labor. Therefore, having a job as an alternative role does

not fully explain 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distress.

## **B. Marital Status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other well documented pattern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s that married people are less distressed than unmarried ones—never-married, divorced or separated, or widowed. It is easy to understand that divorced or widowed people are more distressed than married ones since both divorce and widowhood involve major changes in a person's psychological mind set, social relations, lifestyle and economic condition, and both divorce and death of spouse are seen as among the most difficult life events a person can experience (Gove and Shin 1989). Yet, the never-married adults are found to be almost as distressed as those who are divorced or separated, which contradicts the glamorous single status portrayed in the media.

The theory of "living-with-someone" proposes that living-with-someone generates an important network of social and economic ties that helps to create a stabilizing sense of security, belonging, and direction. While unmarried people often live alone, married people almost always live together (Mirowsky and Ross 1989; Ross et al. 1990). However, in their empirical test, Hughes and Gove (1981) find that unmarried people who live alone are no more distressed than those who live with other adults. The chief difference is between married people and others, not between those who live alone and othe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otection/support hypothesis states that while single persons lack continuous companionship with a spouse who provides support in dealing with daily stress, marriage typically provides married persons with social support of all forms, particularly the emotional kind (Coombs 1991; Cockerham 1981). Numerous studies find that social support decreases depression, anxiety, and general psychological distress (Turner 1981; Wilcox 1981; Dressler

1985; Pearlin et al. 1981; Ross and Mirowsky 1989).

However, marriage is not a guarantee: while a good marriage provides a sense of being cared for, a bad marriage can also be a source of stress. Research based on longitudinal data reveal that the difference in mental health between the "advantaged" married and the never-married somehow has declined progressively from the '70s to the '80s (Glenn & Weaver 1988; Lee et al. 1991). The analyses further indicate that never-married males and younger never-married females are happier in the late 1980s than in the 1970s, whereas married women are less happy.

### **C. Family Structure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Building on a long and widely shared view that social bonds and supportive interactions are important to a person's health and well-being, several empirical studies suggest that social support buffers or mediates the effect of life stress (eg., Dressler 1985; Dean and Lin 1977; Wilcox 1981; Lin and Ensel 1989; Cohen and Wills 1985). Others suggest that social support has direct, positive effects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eg., Turner 1981; Aneshensel 1986; Andrews et al. 1978; Aneshensel and Frerichs 1982; Farrell and Barnes 1993).

While it may be preferable and a source of support for extended family members to live nearby, living under one roof will not be desirable in most cases (Pietropinto 1986). In fact, extended family structure in some instances may make conflict more likely, as their members compete for support, loyalty, and commitment (Bell 1985). Moreover, as the in-law problem already exists in the majority of neolocal Western societies (Klemer, 1970), it is logical to suspect that the more intense daily interaction among extended family members living under the same roof will increase friction and problems. Based on the limited information available, it is unclear whether or not different family structures make the usually supportive extended kin become a hindrance to their member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e existing studies regarding social support, however, may provide some insights that are helpful to build the hypothesis in the latter section. In the dynamic interactional relationships, not only are the extended kin support providers, they also receive diverse forms of support. Previous researches reveal that kinkeeping (especially kinwork for older parents) often entails a great deal of hard work, no matter whether it is emotional, financial, or physical (Horowitz 1985; Abel 1991), and that hard work may produce high levels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Gerstel and Gallagher 1993; also see Schulz et al. 1990).

In addition, a prior study (Gerstel and Gallagher 1993) shows that it is the number of kin helped rather than the hours spent helping them that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depression for both men and women. Moreover, while caring for more parents does not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depression, it is caring for more adult children and caring for a larger number of other kin which a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high levels of distress for both men and women. On the other hand, high internal density or the degree of crowding in the home is widely assumed to exert a deleterious effect on the well-being of household members (Gabe and Williams 1987).

### III. A Review of Studies of Taiwan

Taiwan has been experiencing the stress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ideologies brought about by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For example, while the increase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equal education, and the reserved seats political system improve women'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status in Taiwan (Yi 1982; Yi and Gao 1986), most Chinese women are still constrained by the rigid traditional gender role expectations. Few community studies do find females in Taiwan suffer from higher prevalence of minor psychiatric morbidity

(MPM) or other specific psychiatric disorders (Cheng 1989a; Cheng 1988; Hwu et al. 1989).

Furthermore, regardless of the increasing divorce rate in Taiwan (Lin 1982),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at particularly discriminates against divorced or widowed women (Yao 1983), previously married women are found to have higher rates of MPM than their single and married counterparts. Between the latter two groups, the rates of MPM are similar (Cheng 1988). Yet, other research reveals marriage is detrimental to young married females. In her research, Hu (1990) finds that young married females have higher suicide rate than that of single women, and suicide is highly related to depression.

An extra social role as an employee does not necessarily function as a source of gratification for Chinese women. Although some researches find employmen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lowering women's depression (e.g., Hu 1990), others fin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f employment on women's MPM (Cheng 1988; Cheng 1989a) or on their general stress levels (Chang 1988). Yet, several other researches indicate that among married women, the employed ones complain more about minor problems bothering their daily lives than housewives do (Chang 1988). After all, employed wives are still main housekeepers in dual career families, and their employment status does not significantly change labor division in Chinese family either (Lu 1983; Chang 1988).

On the other hand, another extra role may be a possible source of stress to Chinese women is being in-laws in a stem family. Whil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rents and daughters are more intimate, the tensions between mothers- and daughters-in-law have often been experienced in most Chinese families through the generations (Baker 1979). Among the very few existing studies related to the effect of family structure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ome of them reveal that women living in a stem family experience higher stress rates

than those who live in a nuclear family (Chang 1988; also see Hu 1990:p.9). A high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is also found among the elderly living in a stem family (Hu et al. 1992).

Since family as a unit is always the top priority over its individual members in Chinese culture, people living in an extended family are more likely to be restrained by the obligations of powerful extended kinship systems (Baker 1979). In addition, the potentiality of internal conflicts due to human factor may also increase as extended kin increase in the households. Along with the previously discussed empirical findings, it is logical to suspect that living in a large extended family might be even more stressful than living in a stem family.

## IV. Methodology

### A. Hypotheses

After reviewing the research in Western societies and taking the current states of Taiwan into account, the author generate the following hypotheses to be tested. They are:

- H1:* Women in Taiwan have higher levels of distress than men.
- H2:* Married persons in Taiwan will be less distressed than those who are single and those who are divorced/separated/or widowed.
- H3:* Married women in Taiwan will show more distress than married men.
- H3a:* Married men will be the least distressed among men across all marital status.
- H3b:* Women who are divorced/separated/or widowed in Taiwan will be more distressed than married women and men who are divorced/separated/or widowed.
- H4:* Employed wives in Taiwan are less distressed than housewives but more distressed than employed husbands.



*H5:* Nuclear family residents, especially married persons, will be less distressed than stem family residents; they, in turn, are less distressed than those people who live in a large extended family.

There is no empirical finding ever to testify whether it is daughters- or mothers-in-law are more distressed. Based on the well established hierarchical system in the Chinese family, it is usually the mother-in-law who is likely to be the victor in any conflict (Baker 1979). Hence, the sixth hypothesis is as follows:

*H6:* In a stem family, daughters-in-laws are more distressed than mothers-in-law; they, in turn, are more distressed than those women who live with their biological parents after marriage.

## **B. Samples and Research Design**

This study is a secondary analysis based on a national survey data collected in January 1990 as part of the project, "A General Survey of Social Change in Taiwan" (NSC 78-0301-H001-23). It is funded through grant from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t is conducted by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under the directorship of Professor Hei-Yuan Chiu.

The data are drawn from a stratified random sample of Chinese in Taiwan aged 20 to 64 years old ( $N=2,531$ ). The population is stratified by residential areas first, then by age (20-34, 35-49, 50-64) and by gender (male vs. female). The residential areas are categorized into eight hierarchical strata based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ex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in Taiwan. Towns/and cities in each stratum are the primary selection units. The neighborhood communities within each primary unit are the secondary units. Respondents are the last to be drawn from each communities (for details of the sampling see Chiu 1991:pp.25-29). The respondents contain 1,191 (47%) men and 1,340 (53%) women; 1,146 (45%) of them aged 20-34, 925 (37%) of them aged 35-49, and 460 (18%) of them

aged 50-64.

Using the 1990 national survey data, this study is designed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gender, marital status, employment status, and family structure o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of the Chinese in Taiwan.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i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since it shows how exactly the means of the dependent variable vary from one group to another in each categorical independent variable. Moreover, ANOVA makes it easier to interpret the specific interaction effect.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research interests and to facilitate interpreting the specific interaction effect, each time only three independent variables are included in the model. In addition, there is a model contains only married sample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effect of stem family on married women'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 C. Measurement

The dependent variable,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s an unpleasant subjective state which takes two major form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 Mirowsky & Ross 1989; Barnett & Marshall 1991). It is measured by the sum of the answers to ten self-report questions regarding respondents' mental state in the two weeks prior to the interview. The 10 questions are originally from the 12-item version of the Chinese Health Questionnaire (CHQ-12), which is developed primarily for the screening of minor psychiatric morbidity in the community and primary care setting in Taiwan (for details see Cheng & Williams 1986; Chong & Wilkinson 1989; Cheng et al. 1990).

The criterion validity of the CHQ-12 is found to be acceptable. An earlier community study carried out in Taiwan shows that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misclassification rate of the CHQ-12 are 69.6%, 94.8%, and 11.4% respectively (Cheng 1988). A similar result is also found in a study based on patient sample in a medical center in Taiwan (Chong & Wilkinson 1989). Both studies show that the Cronbach's alpha coefficients from the reliability tests of the CHQ-12

are .84 and .83, which mean that they are highly reliable (Cheng 1988; Chong & Wilkinson 1989).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underlying dimensions among the CHQ-12, a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is performed on the 12 items. The author of this study find three factors with eigenvalue exceeding unity that accounted for 56% of the total variance. The first two factors, containing the first ten questions and accounting for 47% of the total variance, refer to somatic symptoms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They closely fit to the concept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defined previously. The last two questions that composed of the third factor, positive affection, are dropped from the analysis since they do not closely fit to the definition of distress discussed previously. The two questions are: "been getting along well with your family or friends?" and "been feeling hopeful about your future?".

The ten questions are answered on a four point scale with 0 being the lowest score ("not at all") and 3 being highest ("much more than usual"). The higher the total scores, the more distressed. Based on the 2,531 sample from the 1990 survey, the reliability of these 10 items is 0.84 which is also highly reliable. The question and the ten items are as follows: "In the past two weeks, how frequently have you:"

1. been suffering from headache or pressure in your head?
2. had palpitation and worried that you might have heart trouble?
3. had discomfort or a feeling of pressure in your chest?
4. been suffering from shaking or numbness of your limbs?
5. lost much sleep over worry?
6. been taking things hard?
7. been losing confidence in yourself?
8. been feeling that life is entirely hopeless?
9. been feeling nervous and strung-up all the time?

## 10. been worrying about your family or close friends?

The theoretical variables of interest include gender, marital status, employment status, and family structure. The variable "gender" needs no explanation.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nature, marital status is group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single, married, and those whose marriages have dissolved (including divorced, separated, and widowed). The cases of divorced/or separated and widowed are combined together because they are much fewer in numbers than those of the married persons or the single ones. Employment status is dichotomized into two categories: employed and unemployed. The unemployed refer to those who are not in the paid labor market, which includes housewives, students, the retired and those who are out of job.

The variable of "family structure" is based on the multiple-answer question "Who is currently living in your household?" It is measured in accordance with Gary Lee's (1987) definition of family structure: A family with only three social positions: husband-father, wife-mother, and offspring-sibling are counted as nuclear family. Any family with a position other than the three nuclear positions (husband, wife, child) appearing in the household will be coded as an extended family. However,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possible kinds of extended families. In order to have a more detailed categorization for this research, stem families ar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general extended families.

A stem family is measured as the household that includes one and only one married adult child who remains a member of his/her parents' household and brings his/her spouse and children to the household (Lee 1987). In addition, for the sake of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people who live in a stem family, those who live with their children-in-law ("oldlaw") are distinguished from those who live with their parents-in-law ("younglaw") as compared

to those who live with their biological parents ("ownparent").

Numerous researches indicate that physical health, age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also affect an individual'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Cheng 1987; Mirowsky and Ross 1989; Hollingshead and Redlich 1958; Dohrenwend and Dohrenwend 1969). However, these three variables are not of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 they are included only as control variables.

Physical health is measured by a self-report question regarding respondents' physical health condition in the two weeks prior to the interview. The respondents judge their physical health on a four point scale with 1 being very bad and 4 being very good. The variable of age is self explanatory and is included in its original continuous form. Socioeconomic status is measured by one's educational level since it i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one's occupational prestige and income. Respondent's educational level is categorized into 9 groups ranged from the lowest (illiterate) to the highest (graduate school) (see Table 1).

## V. Results

The first model tests the effect of gender, marital status and employment status on distress based on the whole sample. Results of this model are shown in Table 2. Table 2 indicates that women in Taiwan have higher mean level of distress than men and this relationship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05 level ( $p=.004$ ). This finding corresponds to findings on male-female difference in Western societies. Hypothesis 1 postulating that women will be more distressed than men is thus supported.

The second hypothesis examines whether married persons are less distressed than single persons and those whose marriages have dissolved. Although the main effect of marital status in Table 2 is not significant at .05 level ( $p=.08$ ), it does not mean that distress is

**Table 1. Frequencies and Percentages of Independent and Control Variables**

	N	(%)	Total
<b>Gender</b>			
Males	1,191	(47.1%)	
Females	1,340	(52.9%)	2,531
<b>Marital Status</b>			
Single	546	(21.6%)	
Married	1,850	(73.3%)	
Divorced/Separated/or Widowed*	129	( 5.1%)	2,525
<b>Employment Status</b>			
Employed	1,716	(67.8%)	
Non-employed	815	(32.2%)	2,531
<b>Family Structure</b>			
Extended Family	590	(24.2%)	
Stem Family	578	(23.7%)	
with Married Adult Child	85	(14.7%)	
with Own Parents	273	(47.2%)	
with Parents-in-law	152	(26.2%)	
Nuclear Family	1,266	(52.0%)	2,434
<b>Physical Health</b>			
Very Bad	20	( .8%)	
Bad	331	(13.1%)	
Good	1,259	(49.8%)	
Very Good	920	(36.3%)	2,530
<b>Age</b>			
20—34	1,146	(45.3%)	
35—49	925	(36.5%)	
50—64	460	(18.2%)	2,531
<b>Education</b>			
Illiterate	160	( 6.3%)	
Self-Taught	16	( .6%)	
Elementary School	678	(26.8%)	
Middle School	427	(16.9%)	
High School	738	(29.2%)	
5-year Professional School	117	( 4.6%)	
2/3-year Professional School	144	( 5.7%)	
College Graduate	222	( 8.8%)	
Graduate School	28	( 1.1%)	2,530

\*: The category of divorced/separated/or widowed will be summarized as "dissolved" in the following tables.

unaffected by marital status since marital status is included in the significant 2-way interaction. That is, the effect of marital status becomes significant when taking gender difference into account (details will be discussed later).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mean levels of the marital status shown in Table 2, married persons are indeed less distressed than single persons and those whose marriage have dissolved. Therefore, the author conclude that H2 is supported conditionally.

The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term between gender and marital status means that the effect of marital status on Taiwanese's mental condition depends on whether the person is male or female. For women in Taiwan, marriage makes them a slightly more distressed than single ones; divorce or widowhood is even more distressful. In contrast, marriage does make men in Taiwan less distressed compared to single men. Nevertheless, men with dissolved marriage are the least distressed compared to their single and married counterparts. A clear picture about this interaction effect o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s demonstrated in Figure 1.

From Figure 1 we can see that compared to married men, married women are indeed more distressed. This finding supports H3. Since married men in Taiwan are not the least distressed among men across all marital status as H3a indicates, H3a is not supported. On the other hand, H3b hypothesizes that women who are divorced/separated/or widowed will be more distressed than married women and men who are divorced/separated/or widowed. Figure 1 clearly shows that women whose marriages have dissolved are the most distressed group among men and women across all marital status. Therefore, H3b is supported.

The fourth hypothesis postulates that employed wives will be less distressed than housewives but more distressed than employed husbands. Based on results shown in Table 2, employment status doe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an individual's distress level: not by 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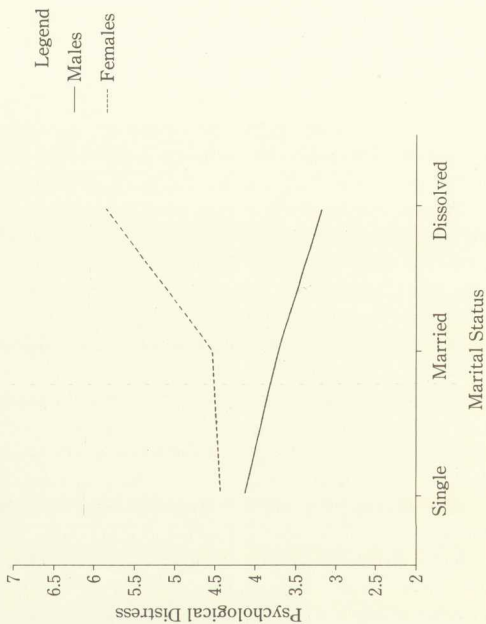


Figure 1. Psychological Distress by Gender and Marital Status



**Table 2. ANOVA for Psychological Distress by Gender, Marital Status and Employment Status**

	Mean	( N )
<b>GENDER</b>		
Male	3.79	(1,188)
Female	4.58	(1,335)
<b>EMPLOYMENT STATUS</b>		
Employed	4.09	(1,711)
Non-employed	4.47	( 812)
<b>MARITAL STATUS</b>		
Single	4.25	( 546)
Married	4.15	(1,848)
Dissolved	4.84	( 129)

	Male		Female	
	Mean	( N )	Mean	( N )
Single	4.12	(307)	4.42	( 239)
Married	3.70	(833)	4.52	(1,015)
Dissolved	3.17	( 48)	5.84	( 81)

Source	SS	DF	F	p-value
PHYSICAL HEALTH	8640.15	1	662.47	.000
AGE	15.55	1	1.19	.275
EDUCATION	4.33	1	.33	.565
A. GENDER	106.38	1	8.16	.004
B. EMPLOYMENT STATUS	4.76	1	.37	.546
C. MARITAL STATUS	66.05	2	2.53	.080
A×B	36.92	1	2.83	.093
A×C	152.16	2	5.83	.003
B×C	5.80	2	.22	.801
A×B×C	4.46	2	.17	.843
Residual	32710.17	2508		
Total	41874.34	2522		

self nor through the 2-way or 3-way interaction terms. Hence, H4 is not supported by the data. Because of both the 2- and 3-way interaction terms involving employment status are not significant, the variable employment status is dropped from the subsequent analysis for the sake of clearly interpreting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Overall, the first ANOVA model explains 21.4% of the total variance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ccording to the  $R^2$  (.214) from the multiple classification analysis (MCA) (not shown in Table 2).

In the second ANOVA model, the author tests H5—nuclear family residents, especially married persons, are less distressed than stem family residents and they are both less distressed than those people who live in large extended families. The significant 2-way interaction term between family structure and marital status ( $p=.026$ ) in Table 3 indicates that marital status has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comparing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family structures o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Results shown in Table 3 contradict the fifth hypothesis. The live-in extended kin are actually beneficial to a person'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no matter which marital status he/or she possess. From the results shown in Table 3 we see that single persons benefit most from living in a stem family and they suffer from higher distress levels when living in a nuclear family. On the other hand, for persons whose marriages have dissolved, living in a nuclear family without the presence of extended kin is most distressful as compared to living in stem or extended families. The same pattern is found among married persons though the difference of their mean distress levels is not in a sharp contrast as that of divorced/or widowed persons. Based on this finding, the author conclude that H5 is not supported. The multiple R square ( $R^2$ ) from MCA shows that the second ANOVA model accounts for 20.3% of the total variance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 $R^2=.203$ ) (not shown in Table 3).

To examine H6, the third model is constructed based only on

**Table 3. ANOVA for Psychological Distress by Gender, Marital Status, and Family Structures**

	Mean	( N )
<b>GENDER</b>		
Male	3.74	(1,125)
Female	4.52	(1,302)
<b>FAMILY STRUCTURES</b>		
Extended Family	4.04	( 587)
Stem Family	4.08	( 578)
Nuclear Family	4.25	(1,262)
<b>MARITAL STATUS</b>		
Single	4.03	( 489)
Married	4.16	(1,835)
Dissolved	4.64	( 103)

	Extended		Stem		Nuclear	
	Mean	( N )	Mean	( N )	Mean	( N )
Single	3.94	(136)	3.18	( 60)	4.25	(293)
Married	4.09	(408)	4.16	(499)	4.20	(928)
Dissolved	3.91	( 43)	4.74	( 19)	5.37	( 41)

Source	SS	DF	F	p-value
PHYSICAL HEALTH	7731.47	1	599.05	.000
AGE	18.91	1	1.47	.226
EDUCATION	5.15	1	.39	.528
A. GENDER	76.85	1	5.96	.015
B. FAMILY STRUCTURES	26.26	2	1.02	.362
C. MARITAL STATUS	17.94	2	.70	.499
A×B	16.21	2	.62	.534
A×C	89.47	2	3.47	.031
B×C	143.48	4	2.78	.026
A×B×C	38.21	4	.74	.565
Residual	31052.24	2406		
Total	39359.18	2426		

married samples. This hypothesis postulates that in a stem family, daughters-in-law are more distressed than mothers-in-law, and both of them are more distressed than married women who live with their biological parents. Results presented in Table 4 show that the data does not support H6 since the 2-way interaction between gender and living patterns i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05 level. Nevertheless, the mean levels of distress reveal an interesting pattern: it is mothers-in-law who tend to be more distressed than daughters-in-law in a stem family. Both of them tend to be more distressed than those women who live with their biological parents after marriage. The multiple classification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third model explains 27.2% of the total variance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 $R^2 = .272$ ) (not shown in Table 4).

## VI.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As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proceed, Taiwan experience an increase of the female labor force, and to a lesser extent, improvements in women's social, political, and legal statuses. In spite of all these changes,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women in Taiwan are still significantly more distressed than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regardless of their marital status. That is, women in Taiwan are almost destined to experience higher levels of distress than men. Marriage does not reduce but rather increase single women's distress level which is already higher than that of single men's. Being divorced or widowed is even worse. On the contrary, single men benefit from getting married. Divorce or widowhood is even more advantageous for men in terms of the lowest psychological distress level they have experienced.

One factor may account for the highest level of distress experienced by women whose marriages have dissolved is their weaker economic power. Since many women in Taiwan withdraw from the

**Table 4. ANOVA for Married Persons' Psychological Distress by Gender and Living Patterns**

	Mean	( N )
<b>GENDER</b>		
Male	3.89	(246)
Female	4.50	(244)
<b>LIVING PATTERNS</b>		
Oldlaws	5.50	( 68)
Ownparents	3.78	(272)
Younglaws	4.37	(150)

	Male		Female	
	Mean	( N )	Mean	( N )
Oldlaws	5.14	( 28)	5.75	( 40)
Ownparents	3.73	(207)	3.92	( 65)
Younglaws	3.82	( 11)	4.41	(139)

Source	SS	DF	F	p-value
PHYSICAL HEALTH	1977.75	1	170.39	.000
AGE	13.21	1	1.14	.287
EDUCATION	4.33	1	.37	.542
A. GENDER	0.03	1	0.00	.959
B. LIVING PATTERNS	5.41	2	0.23	.792
A×B	1.28	2	0.05	.946
Residual	5583.01	481		
Total	7667.19	489		

paid labor force after they get married, they become financially dependent on their husbands. Hence, they suffer severely from the decline of their income after their marriages have dissolved. For women who still work in the labor market, segregation from the highly paid jobs and the problem of under-paid may also account for the decreasing of their total income.

Another possible factor may be that Chinese women whose marriages have dissolved are traditionally discriminated against in the

marriage market. It is relatively more difficult for women than for men to remarry. The third reason which may account especially for divorced women's high distress is the deprivation of the rights of child custody and the visiting rights. Court rulings traditionally favor the father.

The reason why men whose marriages have dissolved are less distressed than men or women with other marital status is unclear. It is suspected that the difference may be attributed to the patriarchal structure that Chinese men always enjoy. Traditionally, Chinese men are granted more privilege than women to divorce their spouses. In addition, as the society becomes more open, men in Taiwan may enjoy even more freedom nowadays to end an unhappy marriage rather than to tolerate it as their predecessors did. Moreover, Chinese men are more likely than women to have an active sexual relationship in their post-marital life since the thousand-year-old patriarchal system permits more freedom in male sexual behavior than in female. Such relationships are related to a positive stat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Gove and Shin 1989).

Other possibilities may be that it is common for men to enjoy the sole custody of children after they divorce. They do not have to suffer from the deprivation of visitation rights with their children. They may also benefit more economically in their post-marital life. Most men in Taiwan are the sole breadwinners in their family, marital dissolution may substantially increase their relative income.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a secondary analysis, it is difficult to detect whether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distress between divorced and widowed people in Taiwan. Further investigation based on first hand data in this topic is in great demand.

The effect of employment on married women's mental well-being is not evident in this study. The insignificant result may be attributed to the traditional sociocultural expectations placed on married women within the strong family bond. They count their

blessings by keeping house, taking care of the children and serving their husbands. Women in Taiwan thus generally accept this nurturant role as their obligation. Even for employed women, working in the labor force may not be a personal choice but rather a consequence of the desire to subsidize family income. Therefore, Chinese women emphasize their familial roles more than their career roles. Since the role of homemaker is not necessarily associated with Chinese women's poo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employment in labor market does not necessarily serve a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gratification for them either.

Contradicting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and previous research findings,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live-in extended kin actually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people'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regardless of their marital status. However, while single persons benefit most from living in a stem family, married and divorced/or widowed persons benefit most from living in a large extended family. Evidently, the presence of more extended kin in the same household function as a relief rather than a source of stress for people who have experienced difficult life events. Live-in extended kin also work as an important social support for married as well as for single persons when they are in need. This finding generally indicates the importance of live-in extended kin to individual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implies that nuclear family structure is definitely not distress free.

Yet, this study fails to provide a significant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hypothesis that in stem families, daughters-in-law are more distressed than mothers-in-law. This insignificant result may be due to the problem of measurement that comes from the limitation of secondary analysis. However, the mean levels of distress signal a pattern contradicts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That is, in a stem family, being mother-in-law seems to be more distressed than being daughter-in-law. This pattern might reflect the changing status of the elderly in

modern Taiwan. Living with a married child and his/or her family no longer guarantee a joyful life for the elderly. Instead, this kind of living arrangement may bring them higher distress levels. As the population keeps growing old in Taiwan, a suitable living arrangement for the elderly needs to be given more attention in future research.

Finally,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 of the secondary analysis and the limited variables included to analyze a complex phenomenon such as psychological distress, each of the three model explains no more than 30% of the total variance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t is suggested that a more sophisticated model with comprehensive variables included based on first-hand data is necessary for future research. In spite of all these problems, the findings from this research shed light on how gender, marital status, employment status and family structure affect individual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Taiwan. They help to pinpoint the source of the problem, and hopefully to help directing policy makers toward a meaningful policy-making accordingly.



## References

- Abel, E. K.  
1991 *Who Cares for the Elderly? Public Policy and the Experiences of Adult Daughter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Andrews, G., C. Tennant, D. M. Hewson, and G. E. Vaillant  
1978 Life Event Stress, Social Support, Coping Style, and Risk of Psychological Impairment,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66:307-316.
- Aneshensel, Carol S.  
1986 *Marital and Employment Role-Strain, Social Support, and Depression among Adult Women*, Stevan E. Hobfoll, ed., pp. 99-114. Washington: Hemisphere Publishing Corporation.
- Aneshensel, Carol S. and Ralph R. Frerichs  
1982 Stress, Support, and Depression: A Longitudinal Causal Model,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0:363-376.
- Bachrach, Leona L.  
1975 *Marital Status and Mental Disorder: An Analytical Review*. Survey & Reports Branch, Biometry Division,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Baker, Hugh D.  
1979 *Chinese Family And Kinship*.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arnett, Rosalind C. and Nancy L. Marshall  
199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s Work and Family Roles and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Women, Work, and Health: Stress and Opportunities*, Marianne Frankenhaeuser, Ulf Lundberg and Margaret Chesney, ed., pp. 111-136. New York: Plenum Press.
- Bell, Norman W.  
1985 Extended Family Relations of Disturbed and Well Families, in *The Psychosocial Interior of the Family*, Gerald Handel, ed., pp. 157-173. New York: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 Berger, Peter L.  
1988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in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Peter L. Berger and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ed., pp. 3-11.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Inc.
- Bernard, Jessie  
1972 *The Future of Marriage*. New York: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 Briscoe, M. E.

- 1982 *Sex Differences i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Medical Mon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upplement 1.
- Chang, Chieh-Chen
- 1988 Stress of Married Women and Its Relationships with Employment, Family Structure, and Life Cycle. 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 Occasional papers No. 2.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Cheng, Tai Ann
- 1987 Cross-Cultural Studies in Minor Psychiatric Morbidity: Review and Reassessment, *Chinese Psychiatry* 2(1):3-11.
- 1988 A Community Study of Minor Psychiatric Morbidity in Taiwan, *Psychological Medicine* 18:953-968.
- 1989a *Sex Difference in Prevalence of Minor Psychiatric Morbidity: A Social Epidemiological Study in Taiwan*, *Acta Psychiatry Scandinavia* 80:395-407.
- 1989b Symptomatology of Minor Psychiatric Morbidity: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Psychological Medicine* 19:697-708.
- 1989c Urbanization and Mental Health, *Chinese Psychiatry* 3(1):3-8.
- Cheng, Tai-Ann and Paul Williams
- 1986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a Screening Questionnaire (CHQ) for Use in Community Studies of Mental Disorders in Taiwan, *Psychological Medicine* 16:415-22.
- Cheng, T. A., J. T. Wu, M. Y. Chong, and P. Williams.
- 1990 Internal Consistency and Factor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Health Questionnaire, *Acta Psychiatry Scandinavia* 82:304-308.
- Chi, Peter S. K.
- 1991 Economic Aspect of Changing Family Structure in Taiwan, *Human Ecology Forum* 19(4):24-27.
- Chiu, Hei-Yuan.
- 1991 *The Executive Report of the General Survey of Social Change in Taiwan*.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Chong, Mian-Yoon and Greg Wilkinson
- 1989 Validation of 30- and 12-item Versions of the Chinese Health Questionnaire (CHQ) in Patients Admitted for General Health Screening, *Psychological Medicine* 19:495-505.
- Chou, Bih-Er, Cal Clark, and Janet Clark
- 1990 *Women in Taiwan Politics: Overcoming Barriers to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a Modernizing Societ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Clancy, Kevin and Walter Gove.
- 1974 Sex Differences in Mental Illness: An Analysis of Response Bias in Self-Repor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0:205-16.

- Cockerham, William C.  
 1981 *Sociology of Mental Disorde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 Cohen, Sheldon and Thomas A. Wills.  
 1985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8(2):310-57.
- Coombs, Robert H.  
 1991 Marital Status and Personal Well-Being: A Literature Review, *Family Relations* 40:97-102.
- Dean, Alfred, and Nan Lin  
 1977 The Stress-Buffering Role of Social Support,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65(6):403-17.
- Dohrenwend, Bruce P. and Barbara Snell Dohrenwend  
 1969 *Social Status and Psychological Disorder: A Causal Inquiry*. New York: Wiley-Interscience.
- Dressler, William W.  
 1985 Extended Family Relationships, Social Supports, and Mental Health in a Southern Black Community,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6:39-48.
- Farrell, Michael P. and Grace M. Barnes  
 1993 Family Systems and Social Support: A Test of the Effects of Cohesion and Adaptabili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Parents and Adolescen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5:119-132.
- Freedman, R., Ming-Cheng Chang and Te-Hsiung Sun  
 1982 Household Composition, Extended Kinships and Reproduction in Taiwan: 1973-1980, *Population Studies* 36(3):395-411.
- Freedman, R., Baron Moots, Te-Hsiung Sun and Mary Beth Weinberger  
 1978 Household Composition and Extended Kinship in Taiwan, *Population Studies* 32(1):65-80.
- Gabe, Jonathan, and Paul Williams  
 1987 Women, Housing, and Mental Heal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17(4):667-79.
- Gerstel, Naomi and Sally K. Gallagher  
 1993 Kinkeeping and Distress: Gender, Recipients of Care,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5(3):598-607.
- Glenn, N. D. and C. N. Weaver  
 1988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of Marital Status to Reported Happines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0:317-324.
- Gore, Susan and Thomas W. Mangione  
 1983 Social Roles, Sex Roles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dditive and Inter-

- active Models of Sex Difference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4:300-12.
- Gove, Walter R. and Michael R. Geerken  
1977 The Effect of Children and Employmen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Married Men and Women, *Social Forces* 56(1):66-76.
- Gove, W. R. and M. Hughes  
1983 *Overcrowding in the Household: An Analysis of Determinants and Effect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Gove, Walter R. and Hee-Choon Shin  
1989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Divorced and Widowed Men and Women: An Empir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0(1):122-44.
- Gove, Walter R. and Jeannette F. Tudor  
1973 Adult Sex Roles And Mental Ill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4):812-35.
- Gove, W., M. Hughes, and C. B. Style  
1983 Does Marriage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Well-being of the Individual?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4:122-31.
- Hardy, Melissa A.  
1993 *Regression with Dummy Variables*.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 Hollingshead, August and Fredrick C. Redlich  
1958 *Social Class and Mental Illness: A Community Study*.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Inc.
- Horowitz, A.  
1985 Family Caregiving to the Frail Elderly, in *Annual Review of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M. P. Lawton and G. Maddox, ed., pp. 194-246.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 Hsiao, Hsin-Huang Michael  
1988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Empirical Explorations, in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Perter L. Berger and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ed., pp. 12-23.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Inc.
- Hsu, Liang-Hsi and Chung-Cheng Lin  
1984 Family Structure and Social Change: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Single Parent Family,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8:1-22.
- Hu, Yow-Hwey  
1990 Gender, Social roles,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Journal of Women and Gender Studies* 2:1-18.
- Hu, Y. H., Y. J. Chou, and N. W. Bai  
1992 Three Generation Family and Alternatives: Attitudes toward Living

- Arrangements for the Elderly in Urban and Rural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ASA annual meeting in Pittsburgh.
- Hughes, Michael M. and Walter R. Gove  
1981 Living Alon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Mental Healt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48-74.
- Hwu, Hai-Gwo, Eng-Kung Yeh, Ly-Yun Chang, and Yuan-Ly Yeh  
1987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and Administration of Community Psychiatric Service: Prevalence of Specific Psychiatric Disorders and Manpower of Community Psychiatric Service, *Chinese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3(1):43-55.
- Hwu, H. G., E. K. Yeh, and L. Y. Chang  
1989 Prevalence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Taiwan Defined by the Chinese Diagnostic Interview Schedule,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a* 79:136-147.
- Inkeles, Alex  
1983 *Exploring Individual Modern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essler, Ronald C. and James A. McRae  
1982 The Effect of Wives' Employmen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Married Men and Wome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216-27.
- Klemer, R. H.  
1970 *Marriage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 Lee, Gary R.  
1987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 *Handbook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Marvin B. Sussman and Suzanne K. Steinmetz. ed., pp. 59-80. New York: Plenum Press.
- Lee, G. R., K. Seccombe, and C. L. Shehan  
1991 Marital Status and Personal Happiness: An Analysis of Trend Dat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3:839-844.
- Lin, Nan and Walter M. Ensel  
1989 Life Stress and Health: Stressors and Resourc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382-399.
- Lin, Tsung-Yi  
1959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on Mental Health,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1(1):24-33.
- Lin, Yi-Nan  
1982 The Trend of Divorce Rates and Its Differences in Taiw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5. Taipei. (in Chinese)
- Liu, Tsing-Yun and Ming-Tu, Lee

- 1974 The Relationship of Modernization and the Change of Family Structure, *The Journal of Social Development* 21:31-50. (in Chinese)
- Lowe, G. D. and R. R. Smith  
1987 Gender, Marital Status, and Mental Well-Being, *Sociological Spectrum* 7:301-307.
- Lu, Yu-Hsia  
1980 Women's Attitudes toward Career Role and Family Role Underthrough Taiwan's Social Chang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50:25-66. (in Chinese)  
1983 Women's Labor-Force Participation and Family Power Structure in Taiw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56:111-143. (in Chinese)
- Mechanic, D.  
1978 Sex, Illness, Illness behavior and the Use of Health Services, *Social Science Medicine* 12B:207-214.
- Mirowsky, John and Catherine E. Ross  
1989 *Social Causes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Nelson, M. and E. K. Abel  
1990 *Circles of Care*. Albany: SUNY Press.
- Orley, J. and J. K. Wing  
1979 Psychiatric Disorder in Two African Villages,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36:513-520.
- Pearlin, Leonard I., Morton A. Lieberman, Elizabeth G. Menaghan, and Joseph T. Mullan.  
1981 The Stress Proces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2:337-56.
- Phillips, Derek L. and Bernard E. Segal  
1969 Sexual Status and Psychiatric Symptom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4:58-72.
- Pietropinto, Anthony  
1986 The Extended Family, *Medical Aspects of Human Sexuality* 20(1):105-12.
- Rin, Hsien  
1986 The Impact of Social Change on Mental Disorders, in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aiwan*, Hei-Yuan Chiu and Ying-Hwa Chang, ed., Vol. 2., pp. 591-616.  
1987 Pattern of Sex and Age Difference at First Visit for Psychiatric Out-Patients: Changes of a Period of 21 Years, *Chinese Psychiatry* 1(1):13-24.
- Rosenfield, Sarah  
1980 Sex Differences in Depression: Do Women Always Have Higher Rate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1:33-42.

- Ross, Catherine E., John Mirowsky, and Karen Goldsteen  
1990 The Impact of the Family on Health: The Decade in Review,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2:1059-78.
- Ross, Catherine E. and John Mirowsky  
1989 Explaining the Social Patterns of Depression: Control and Problem-Solving or Support and Talking,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30:206-219.
- Schulz, R., P. Visintainer, and G. Williamson  
1990 Psychiatric and Physical Morbidity Effects of Care-Giving, *Journal of Gerontology* 45:181-91.
- Shelton, B. A.  
1990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Tasks: Does Wife's Employment Status Make a Differenc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1:115-135.
- Sudman, S. and N. Bradburn  
1974 *Response Effects in Surveys*. Chicago: Aldine.
- Turner, R. Jay  
1981 Social Support as a Contingency i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2:357-67.
- Weinstein, Maxine, Te-Hsiung Sun, Ming-Cheng Chang, and R. Freedman  
1990 Household Composition, Extended Kinship, and Reproduction in Taiwan: 1965-1985, *Population Studies* 44(2):217-39.
- Weitzman, Lenore J.  
1985 *The Divorce Revolution: the Unexpected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for Women and Children in Americ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Wilcox, Brian L.  
1981 Social Support, Life Stress,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 Test of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9(4):371-86.
- Yao, Esther S. Lee  
1981 Successful Professional Chinese Women in Taiwan, *Cornell Journal of Social Relations* 16(1):39-55.  
1983 *Chinese Women: Past & Present*. Mesquite, TX: Ide House, Inc.
- Yeh, Eng-Kung, Hai-Gwo Hwo, and Yuan-Lih Yeh  
1987 Social Changes and Prevalence of Specific Mental Disorders in Taiwan, *Chinese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3(1):31-42.
- Yi, Ching-Chun  
1982 The Dual Role of Married Career Women: Expectation, Conflict and Adjustment, in Essays on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Chau-Nan Chen, Yu-Lung Kiang, and Kuan-Jeng Chen, ed., pp. 405-430. Taipei:

Institute of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 Series No. 9. (in Chinese)

Yi, Ching-Chun and Shu-Gui Gao

1986 Married Women's Employment and Its Effects on Sex-Role Attitude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70:1-27. (in  
Chinese)



# Persistence and Changes in Chinese Family Values: The Taiwanese Case\*

Yung-Mei Tsai\*\* Chin-Chun Yi\*\*\*

##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possible modernization effects on Taiwanese family values. Data were drawn from the 1991 Social Change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younger, more educated, and more urbanized respondents clearly exhibit more modernized family orientation than their older, less educated, and less urbanized counterparts. However, this effect is most pronounced on individualistic-oriented values as indicated by attitudes toward marriage and divor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llectivistic values pertain to the family itself, and kinship in particular, with no tru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ound between younger, more educated, more urbanized respondents and their older, less educated, and less urbanized counterparts. We maintain that selected adaptations to modernization effects rather than wholesale change are norms.

---

\* We wish to thank Drs. Chao-nan Chen of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Nan Lin of Duke University, USA, and William Parish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for their very helpful comments on an early draft of this paper as presented in the Social Change Conference. We also wish to thank the very helpful comments of three anonymous reviewers of the same draft.

\*\* Texas Tech University, U.S.A.

\*\*\*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 中國家庭價值觀的持續與改變： 台灣的例子

蔡勇美、伊慶春

## 摘 要

本文主要的目的是探討現代化對中國家庭價值觀所可能產生的影響。資料取自中央研究院民國八十年之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二期第二次。現代化指標包括：居住地之都市化程度、教育程度、以及年齡。家庭價值觀則區分為婚姻與離婚方面、一般家庭看法、和親屬互動方面。研究架構之基本假設將婚姻與離婚方面之價值觀視為個人取向且較可能受到現代化之影響；一般家庭和親屬方面之價值觀則隸屬於集體取向且較附著於傳統中國家庭價值。同時，鑑於台灣婦女受教育以及勞動參與率之改變皆較男性為大，故假設現代化的影響對女性樣本亦應產生較顯著的效果。

結果發現較年輕、教育程度較高、居住地都市化程度較高之受訪者果然比年紀較大、教育程度較低、居住地都市化程度較低者更可能具備較明顯的現代化之家庭價值觀。然而此差異主要是在個人取向之婚姻和離婚態度方面。至於家庭和親屬之集體取向的家庭價值觀之分析指出，現代化之影響似乎未達到顯著的效果。此外，性別比較的發現亦證實女性的家庭價值的確比男性更受到現代化指標的影響。因此，我們認為當台灣社會經歷急遽變遷之際，個人取向之家庭價值觀可能伴隨著改變，但是基本的傳統家庭價值觀念仍然繼續保持。換言之，現代化對中國家庭價值觀的影響呈現出選擇性的個人取向的適應，而非整體規範的變革。

# Persistence and Changes in Chinese Family Values: The Taiwanese Case

## Introduction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Taiwan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Coombs and Sun, 1981; Tsai, 1982; Weinstein, et al., 1990; and Yi, 1993) has raised many intriguing questions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ers. These questions in general fall into two broad areas. The first area has to do with the identification of factors leading to this rapid economic growth. (Tai, 1989; Redding, 1993; Hwang, 1988; Barrett and Whyte, 1982; Li, 1989; Gold, 1985). The second area of efforts which seems to receive more attention among Taiwanese scholars has to do with the assessment of impacts brought about by the large-scale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on the society in Taiwan. One of the most noted themes addressed by these researchers is: whether or not the cornerstone of the Chinese society—the family institution—has maintained its dominant influence in the societal operation (Yang, 1985, 1988) and to what extent has the family withstood this overwhelming impacts brought about by these societal changes (Yi, 1993).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a host of researchers examined this very theme by focusing on how modernization process may affect various aspects of the family institution in Taiwan. Although the majority of these researches focus on the effects of modernization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family (Chu, 1988, 1993; Yi, 1991; Yi

and Lu, 1993), several other areas of the Chinese family have also received attention. The first of these is on the effects of modernization on family form in contemporary Taiwan (Lai and Chen, 1980; Yi, 1985; Chen, et al., 1989; Chi, 1990; Chang and Chi, 1991): whether the nuclear or the stem family is the dominant form of the family today. The second area has to do with the effects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es on changing family composition, 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 (Wang and Chen, 1987), and on rural-urban migration (Chi, 1989; Yi, 1985; Chang and Chi, 1991; Chang, 1993). In this domain of interests, the emergence of single family household as a significant new family form was discussed (Shu and Lin, 1984, 1989); divorce patterns and trends were investigated (Lin, 1982; Li, 1984); the elderly parents' living arrangement as one aspect of the defini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family types was also noted (Lo, 1987; Chen, 1992; Yi and Chu, 1993). Modernization once again is considered a triggering factor accounted for the change in this aspect of family institution.

The third area of research efforts centers arou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Thornton, et al., 1984; Thornton and Fricke, 1987) with a greater interest and effort being placed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Sun, 1985; Chen, 1992; Lee, et al., 1994; Chang, 1994). The role of the daughter-in-law or of the married daughter which has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has been documented (Tsui, 1987; Hu, 1995). The issue of family values has been included in many of these studies (e.g., Coombs and Sun, 1981; Yi, 1994; Sun, 1985; J. Chang, 1991; Chu, 1994).

Previous works have shown that regarding the core ideology of filial piety, fundamental values remain strong even among overseas Chinese while the actual practice has changed (Yang and Yeh, 1990; Chu, 1994). To delineate specific changes in the substance of filial piety, Chuang and Yang (1991) point out that self-orientation has replaced the traditional other-orientation, the continuation of family line is no longer regarded as significant, and the expectation of one-

way respect from children to parents has changed into mutual beneficial principle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However, the value of having children is continued being argued to symbolize the family happiness, the continuation of descendants, and the economic protection for aged parents (Sun, 1982; Liu, 1976). This utilitarian nature in the value of children is in fact shared by other family values and has thus characterized the Chinese family change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Li, 1982).

However, most recent research interests on family values seem to shift toward examin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dult children and their elderly parents, especially on co-residence when aged and on financial support (Yi, 1985; Sun, 1985; Chang, 1994); and on child rearing practice. In a series of reports, it was found that though modernization did have effect on actual discipline of children's behaviors, the Western values were not as readily accepted (Chu, 1986, 1994). Specifically, traditional values of child-rearing are preserved while actual practice leans toward less authoritarian patterns in the family socialization process in Taiwan.

It is obvious that the interplay between traditional values and modern Western influence has resulted in changes in various aspects of Taiwanese family processes (Yi, 1994). The above selected review clearly shows that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s usually taken as the given theoretical background. Research design, in general, aims at examining whether a specific structure or function of the family institution converges with those of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 More specifically, Taiwan is assumed to experience the same type of socio-cultural revolution as thos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before it. The drastic change has been categorized into the scientific, the industrial, and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Falding, 1991). This triple revolution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and its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among which is to change the family institution toward a conjugal form, a modifie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and a practical orientation of family values (Goode, 1963; Falding, 1991; see also Berger and Berger, 1991 for a contrary view point).

It is also discovered that while many aspects of the family institution do indeed follow patterns predicted by the modernization model, there are aspects of the traditional family institution that appear to endure and persist. For example, Thornton, Chang, and Sun (Thornton, et al., 1994) found increasing independence of mate selection and increasing incidence of premarital sex and pregnancy following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Taiwan. In this same study they also found persisting patterns of co-residence and familial obligations among the extended family structures (see also Logan, et al., 1995 on the enduring co-residence in urban China in the 90s). It is, therefore, critical to differentiate those persisting aspects of the family institution from those undergoing changes prescribed by the modernization model.

In this paper, effects of the high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rapid social change on the family values in Taiwan will be examined in terms of values on marriage, divorce, familial, and kinship. This broad area has been studied across various disciplines, but requires more systematic and coherent analyses (see also Yi, 1993 and Li and Chung, 1987 for addition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Part of our focus will be on whether or not, following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 family values are more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 However, our main emphasis will be on differentiating those family values that persist and those that change. In the next section, we will present our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evident that during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 non-Western world had made selective adaptations to the impacts from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business organizations among the overseas Chinese (Redding, 1993), and even in th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supposedly the most modern of all institutions in Taiwan (Lin et al., 1995), the continuing domination of tradi-

tional Chinese familism and famili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re observed and documented. Hsieh (1980) found selective adapta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value orientations among the Taiwanese in his study. Li (1985) found selective changes among the Taiwanese folk religious ritual practices. Weinstein and his associates (Weinstein et al., 1990:223) found, for example, that between 1973 and 1985, the percentage of nuclear households in Taiwan remains quite stable overall, although among the Mainlanders the percentage actually declines.

What then are the bases of these selective adaptations of the traditions and the modernity? In the area of family change, Thornton and Fricke (1987:749) consider one such base as "actor-based in the sense that . . . such transformation as emanating from the behaviors of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in response to changing cultural and economic constraints and in pursuit of a hierarchy of goals." Falding (1991) similarly expects the rise of rationality and individualism as the bases of individual actions and initiations. In other word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ndividuals will make rational choices for their own personal interests but within the cultural and economic constraints. In many cases, the traditional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Chinese family institution, are so formidable that they are not subject to change.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family names by a son and the support and respect for the elderly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are not negotiable.

In this context of family structure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s discussed above, Freeman and his associates (Freeman et al., 1982) found that the majority of elderly parents in Taiwan continue to reside with their adult, married children. Similarly, Lee, Parish, and Willis (Lee et al., 1994) fou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Taiwan is both patrilineal, altruistic and corporative in nature. Logan, Bian, and Bian (Logan et al., 1995), cited earlier, found co-residence among three generations a norm for urban

Chinese families in China even in the 90s. Kamo and Zhou (1994) similarly found the living arrangements of elderly Chinese and Japa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traditional, despite the passage of time and the assimilation into the American culture in other aspects of their lives.

It seems, therefore, reasonable to assume tha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amily institution will persist, especially in the areas of continuing the patrilineal family names and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the two cardinal rules of Confucius' filial piety. For this reason, having a child—especially a son will be seen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family institutio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mutual support among the kin will also be considered essential. These we believe are the areas of the family institution that are not to be challenged. What then do the more modernized individuals have in terms of making rational and individual choices about family matters? It is our contention tha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amily institution is like a “house” with its definite rules and values. An individual has choices of what he or she wants to do before entering into the house, but once he or she is in it, the choices are made for him/her. Similarly, if an individual found the “house” to be rather inhospitable, he/she may be given a choice to leave or a chance to consider leaving as an alternative, but to change the rules of the “house” to meet his or her new needs is probably the last option. Herein lies our research hypotheses.

## Research Questions and Design

Based on the above discussion, it seems clear that in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modernization on the family values, we should expect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matters concerning marriage and divorce, but not concerning familial and kinship matters. In other words, we should expect a greater degree of changes in family values pertain-



ing to marriage and divorce following modernization. By the same token, we should expect a lesser degree of change or no change at all concerning the family values pertaining to family and kinship matters.

To assess the validity of these two assertions or propositions properly, Taiwan is a particularly appropriate case for this task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First, Taiwan is undergoing modernization and rapid socioeconomic change as a society, especially during the last two decades (Weinstein et al., 1990). Second, Taiwan, being a Chinese society with a very strong tradition of the family institution, is ideal for this purpose. Third, with the rapid increase in per capita income, the level of education,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political as well as social life; with the rapid urbanization and the most recent efforts toward gender equality; and with the increasing life expectancy (Yang and Chu 1987; Yi and Chu, 1989), we are essentially offered an opportunity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these changes on family values.

The data we use for this study come from the 1991 Social Change Survey in Taiwan, conducted by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survey was based on an island wide, randomly selected representative sample. Since no comparable data on family values of early periods are available, we are not able to conduct longitudinal comparisons of the changing family values following modernization for the present study. To compensate for this deficiency, we will use ecological and life-course variables to approximate changes. In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we will describe specifically our treatments and measurements of the variables in this study.

## **Modernization**

As a catch all term, modernization is used here to represent the rapid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toward the direction of those of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 To borrow Falding's (1991) theme, this

modernization process can be represented by the triple revolution of greater emphases on the scientific, the industrial, and the democratic development. Judging from various indicators reported by scholars, it seems reasonable to make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changes observed in Taiwan represents this very process (Yang and Chu, 1987; Yi and Chu, 1989).

To tap this modernization process with the ecological and cross-sectional variables, we have chosen the levels of urbanization, the levels of education, and the age in cohorts of respondents as the proxies. Specifically, we take it to be true that the more urbanized is a respondent's place of residence (e.g., the largest city of Taiwan, Taipei, as one extreme), the more modernized this respondent is likely to be. Therefore, it follows that his or her family values would be more resemble those of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 Similarly, the more educated is a respondent, in terms of number of years of schooling completed, the more modernized he/she is, and, therefore, the more his or her family values would be closer to those of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 Following the same reasoning, we assume that the older is a respondent, the less he/she is modernized, and, hence, the less likely he or she will subscribe to the modern family values. The use of age as one indicator of modernization does have some potential confounding effects in the present context as cohorts also reflect the stage of life cycle. For example, the young newly wed and the empty nest cohorts may have more similar values than those in the middle cohorts who are in the child rearing stage. If this turns out to be the case, then the linear effect assumption of modernization will also be affected. Despite this possibility, we will proceed to use age as an indicator of modernization in this study.

In our treatment of the levels of urbanization, we classify our respondents into three different categories: those who reside in the largest and the most urbanized of all cities, Taipei; those who reside in the other major cities of Taiwan; and those who reside in town-

ships and rural villages. The level of education is classified into those having an elementary-level education or less, those having completed junior high school or equivalent, those having completed high school, those having completed junior college, and those having completed college or more. The assumption here is that the more education is a respondent, the more modernized he or she will be, and, therefore, the more likely he or she will uphold the family values toward those of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 The age is grouped into five different cohorts: those between ages 21 and 24, those between ages 25 and 34, those between ages 35 and 44, and those between ages 45 and 54, and those 55 years or older. Again, we make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older is a respondent's cohort, the less modernized he or she is. Thus, the older cohorts are less likely than their younger cohort counterparts to subscribe to the modern Western family values.

Another aspect of the rapid social change that has just begun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family researchers in Taiwan is the steady increase of the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its subsequent effects on the family institution (Yi, 1994). Today, women in Taiwan are more educated and participate in the labor force in greater numbers than ever before. Their rates of change in both formal schooling and in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re greater than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Thus, as a further test of the effects of modernization on family values, we should observe a greater degree of effects of modernization on family values among the women than among the men. Specifically, modernization should exert a greater effect on changing women's family values toward the modern Western patterns than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Put differently, the differences in subscribing to the modern family values between our female most urban respondents and their least urban counterparts should be greater than their respective male counterparts. The same should be true for the level of education and the cohort effects.

The above discussion can be summarized by the following two sets of research hypotheses. The measurements of family values will be discussed immediately followed the statements of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below:

Hypothesis 1a: The younger is a respondent, the more likely he or she will subscribe to the modern family values pertaining to marriage and divorce; however, he or she is no more likely than his or her younger counterparts to subscribe to family values pertaining to the familial and kinship matters.

Hypothesis 1b: The more educated is a respondent in terms of number of schooling completed, the more likely he or she will subscribe to the modern family values pertaining to marriage and divorce; however, he or she is no more likely than his or her less educated counterparts to subscribe to family values pertaining to the familial and kinship matters.

Hypothesis 1c: The more urbanized is a respondent's place of residence, the more likely he or she will subscribe to the modern family values pertaining to marriage and divorce; however, he or she is no more likely than his or her less urbanized counterparts to subscribe to family values pertaining to the familial and kinship matters.

Hypothesis 2: The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in terms of a respondent's place of residence (1a above), level of education in terms of a respondent's years of schooling completed (1b above), and

age (1c above) on subscriptions to the modern family values pertaining to marriage and divorce are greater among the women than among the men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should exist in terms of the familial and kinship matters.

What are the so-called modern family values stated in the above hypotheses? This is the task to which we now turn. However, before we begin our discussion on modern family values,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modernization is a very complex concept which encompasses many variety or dimensions of life. The three indicators of modernization used here are but some aspects of it. A question comes to mind immediately and that is: why are not more modernization indicators used for the present study? The answer is simple. Our purpose here is to test whether or not modernization will bring about the expected changes in family values. If it does then it should show up by these indicators. If these indicators do not show expecte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family values, then a case can be made that other modernization indicators be used. Let us now turn to the measures of the family values in general and the modern family values in particular.

## **Family Values**

Family values are generally considered as the normative aspects of the family institution (Coombs and Sun, 1981). Filial piety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amily in terms of bearing a son to carry the patrilinear names and to care for and show reverence toward the elderly is one such value (Hsu, 1967; Yi, 1993). The Social Change Survey in Taiwan asked respondents a series of questions pertaining to their attitudes toward marriage, divorce, family, and kinship relations. These questions are used in this study to tap the Chinese fam-

ily values. For ease of presentation and to follow our theoretical arguments stated early, we group and classify these questions into three areas: those pertaining to marriage and divorce, those pertaining to familial matters, and those pertaining to kinship. In the next section, we will list these questions in statement forms and explain why they are more traditional and/or modern.

Family values pertaining to filial piety and its correlates and to collectivistic orientations are considered more traditionally Chinese, whereas those pertaining to individualistic and egalitarian (democratic) orientations are considered more modern Western (Goode, 1963; Falding, 1991; Hsu, 1967; Yi, 1993). Given these general guides, we will now describe the family values used in this study. As pointed out earlier we group and classified family values into three subareas, anticipating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modernization on them. To reiterate, we expect a significant and consistent effect of these modernization indicators on the first group of family values, that is those items pertaining to marriage and divorce. On the other han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f these modernization indicators on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groups, that is those items pertaining to the familial and the kinship matters, is expected. The following is a further discussion of family values in these three subareas.

## **Marriage and Divorce Values**

Included in the 1991 Social Change Survey are seven statements pertaining to values on marriage and divorce. These include:

- (1) Financial security as an advantage of a marriage.
- (2) People wanting to have children should get married.
- (3) Marriage without children is not complete.
- (4) Homosexual couples have the right to get married.
- (5) When a marriage is in trouble, divorce is better for children.
- (6) When a marriage is in trouble, divorce is better for wives.

- (7) When a marriage is in trouble, divorce is better for husbands.

Respondents were asked whether they strongly agreed, agreed, had no opinion, disagreed, strongly disagreed, or were unable to decide on these questions. The first three questions are considered more traditionally oriented. Marriage in the traditional patriarchal family institution is a union of two families for the purposes of continuing family lines and providing financial security for all involved, especially for the wives. Thus, respondents with higher modernization values are less likely to agree on these questions than their less modernized counterparts. The last four questions stress individual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y are, for this reason, considered as being more modern Western. Thus, respondents with higher modernization values are expected to agree more on these statements than their less modernized counterparts.

## **Familial Values**

In this same survey, seven statements related to familial values were asked. These include:

- (1) Single moms can raise their children just as well as their couple counterparts.
- (2) Single dads can raise their children just as well as their couple counterparts.
- (3) Children are considered more trouble than worthwhile.
- (4) Children interfere with parents' freedom.
- (5) The family is becoming less important in modern society.
- (6) A person's career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family.
- (7) People without children lead an empty lives.

Respondents once again were asked whether they strongly

agreed, agreed, had no opinion, disagreed, strongly disagreed, or were unable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For the same reasons stated above, the first six statements are considered more modern Western as they all are more individualistically oriented. The last statement is considered more traditional. Thus, following the modernization theory, those with higher modernization values are expected to be more likely than their less modernized counterparts to agree with the first six statements, while the opposite is the case for the seventh statement listed above. However, as we stated above, in the Chinese case at the present context, we would expect no significant effect of modernization on these items as they all pertaining to familial matters.

### **Kinship Values**

Five statements asked in this survey are related to respondents' opinions concerning kinship matters. They were asked about their attitudes toward these questions in the same ways as those on marriage and divorce and on the familial matters. These statements are:

- (1) One should not fuss with family members on money.
- (2) The more relatives one has the better.
- (3) One should not refuse siblings request for help.
- (4) Kin are still the best persons to ask for help.
- (5) The most trustworthy persons are still the kin members.

All of these statements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kinship and are collectivistic oriented. They are, therefore, considered more traditional. Thus, following the modernization theory, we would expect respondents with higher modernization values to be more likely than their less modernized counterparts to agree with these questions. However and for the same reasons stated above, we



would expect no significant effect of modernization on this in the present context in Taiwan.

## Statistics Analysis

Two types of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he first is a simple cross tabulation comparison, reporting the percentage of respondents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modernization who agree and disagree with these three sets of statements. To examine the hypothesis that modernization has a stronger effect on female respondents than men, we report these percentages for both men and women. To support this hypothesis, we expect a greater degree of differences in percentage agreement on these items among female respondents than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modernization. The second statistical technique used is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with all the modernization variables (i.e., level of urbanization, level of education, and age) included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with sex and marital status as the control variables.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are the family values statements. We excluded the no answers, and unable-to-answers responses as missing values. While some researchers, especially among economists and psychologists, may raise the question about using "strongly agree," "agree," "no opinion," "disagree," and "strongly disagree" answers as interval level measures, it is a very common practice among sociologists. It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e present paper to address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is treatment. In the next section, we report our findings from these analyses.

## Findings and Discussion

We present the findings of the analyses in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are the results from tabular analyses where the effects of each of the three modernization variables is discussed one at a time.

This is followed by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where all three modernization variables are included in the equations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with sex and marital status as the control variables.

### Effects of Modernization on Attitudes toward Family Values: the Case of Age Effects

Table 1 reports the results of the effects of age in cohorts on respondents' attitudes toward these family values. These results can be examined in three ways. First are the overall percentages of agreements on each question by each cohort. This information tells us the current state of positive endorsements for each question by Taiwanese respondents. These percentage distributions will provide benchmarks for cross-cultural and future comparisons. For example, while a very high overall percentage of respondents agree to the question that "one should not fuss with family members over money matters," (from 67.2% by females, 21-24 years old cohort, to 89.7% by females, 55 and older cohort), the same may not be said about the statement that "homosexual couples have the right to get married," as demonstrated by the very low percentage of approval (from 8.5% to 22.9%).

**Table 1 Effect of Age and Gender on Family Value**

Family Values	Chi <sup>2</sup>	Age					(N)	
		21-24	25-34	35-44	45-54	55+		
<b>MARRIAGE and DIVORCE (%)</b>								
Financial security as marriage advantage	agree(men) *		37.7	49.3	49.0	60.9	64.2	(616)
	disagree(men) *	.000 #	50.5	41.5	40.2	29.7	27.8	(445)
	(N)		(77)	(347)	(398)	(192)	(162)	(1176)
	agree(women) *		37.2	42.7	52.8	59.0	75.5	(619)
	disagree(women) *	.000	57.5	53.1	40.9	33.1	14.4	(507)
	(N)		(113)	(386)	(396)	(166)	(139)	(1200)
Wanting children should get married	agree(men) *	.000	58.4	66.8	73.7	81.6	91.2	(897)
	disagree(men) *		32.5	25.6	18.9	14.3	5.3	(230)
	(N)		(77)	(355)	(407)	(196)	(170)	(1205)

	agree(women)*		50.0	63.1	71.1	82.8	88.9	(869)
	disagree(women)*	.000	37.9	31.0	24.4	10.0	7.6	(293)
	(N)		(116)	(393)	(402)	(180)	(144)	(1235)
Marriage without children not complete	agree(men)*		38.5	50.4	61.0	69.5	78.1	(721)
	disagree(men)*	.000	44.9	39.0	28.0	20.5	15.4	(350)
	(N)		(78)	(349)	(400)	(200)	(169)	(1196)
Homosexuals couples right to get married	agree(women)*		41.9	53.0	66.5	76.2	82.5	(770)
	disagree(women)*	.000	44.4	34.9	25.3	16.0	13.3	(334)
	(N)		(117)	(387)	(391)	(181)	(143)	(1219)
When marriage in trouble divorce better for kids	agree(men)		8.5	15.1	11.3	9.7	11.3	(127)
	disagree(men)	.038	53.5	65.4	72.1	77.0	67.4	(728)
	(N)		(71)	(324)	(355)	(165)	(141)	(1056)
When marriage in trouble divorce better for wives	agree(women)		22.9	18.4	11.4	8.7	12.0	156
	disagree(women)	.000	54.1	62.7	69.3	71.0	77.8	(714)
	(N)		(109)	(354)	(352)	(138)	(117)	(1070)
When marriage in trouble divorce better for husbands	agree(men)*		22.8	21.9	19.0	11.9	14.0	(223)
	disagree(men)*	.000	49.4	58.2	64.9	71.3	72.1	(783)
	(N)		(79)	(361)	(410)	(202)	(172)	(1224)
When marriage in trouble divorce better for wives	agree(women)*		41.5	25.8	21.3	10.2	6.7	(268)
	disagree(women)*	.000	40.7	53.9	59.7	72.2	79.2	(760)
	(N)		(118)	(399)	(409)	(187)	(149)	(1262)
When marriage in trouble divorce better for husbands	agree(men)*		45.6	40.7	37.2	32.7	26.2	(446)
	disagree(men)*	.000	24.1	36.0	40.6	50.0	56.4	(513)
	(N)		(79)	(361)	(409)	(202)	(172)	(1223)
When marriage in trouble divorce better for husbands	agree(women)*		56.8	50.6	39.1	29.8	20.1	(515)
	disagree(women)*	.000	31.4	31.6	36.9	51.1	61.7	(502)
	(N)		(118)	(399)	(409)	(188)	(149)	(1263)
When marriage in trouble divorce better for husbands	agree(men)*		43.0	39.3	35.9	33.7	27.3	(438)
	disagree(men)*	.000	27.8	38.2	44.3	50.0	57.0	(540)
	(N)		(79)	(361)	(409)	(202)	(172)	(1223)
When marriage in trouble divorce better for husbands	agree(women)*		55.9	48.6	36.9	26.1	20.1	(490)
	disagree(women)*	.000	28.8	30.1	35.9	51.6	59.1	(486)
	(N)		(118)	(399)	(409)	(188)	(149)	(1263)
<b>FAMILIAL</b>								
Single moms raised children as well as couples	agree(men)		40.8	53.8	56.0	63.2	60.6	(666)
	disagree(men)	.005	47.4	31.1	35.0	27.5	28.5	(385)
	(N)		(76)	(351)	(400)	(193)	(165)	(1185)

	agree(women)		57.0	55.5	59.7	61.8	63.4	(704)
	disagree(women)	.286	29.8	34.1	32.9	32.9	30.6	(392)
	(N)		(114)	(384)	(395)	(170)	(134)	(1197)
Single dads raised children as well as couples	agree(men)		37.7	45.8	43.8	49.7	48.8	(535)
	disagree(men)	.212	46.8	40.0	46.8	38.2	39.6	(497)
	(N)		(77)	(345)	(395)	(191)	(164)	(1172)
Children are more trouble than worth	agree(women)		34.5	29.7	29.2	35.9	39.1	(375)
	disagree(women)	.645	45.5	57.8	60.2	56.9	53.4	(667)
	(N)		(110)	(377)	(387)	(167)	(133)	(1174)
Children interfere with parents' freedom	agree(men)		27.0	29.2	28.9	36.2	31.1	(354)
	disagree(men)	.630	55.4	59.3	62.9	54.8	62.2	(697)
	(N)		(74)	(339)	(388)	(199)	(164)	(1164)
Children interfere with parents' freedom	agree(women)		34.0	30.4	31.7	33.1	38.5	(381)
	disagree(women)	.538	49.1	61.8	63.1	58.9	54.8	(702)
	(N)		(106)	(372)	(385)	(175)	(135)	(1173)
Family less important in modern society	agree(men)		50.6	42.3	33.5	39.9	32.4	(458)
	disagree(men)	.002	39.0	48.3	60.3	54.5	59.4	(654)
	(N)		(77)	(352)	(406)	(198)	(170)	(1203)
Family less important in modern society	agree(women)		50.0	45.8	33.9	40.4	40.3	(504)
	disagree(women)	.011	42.2	48.6	60.9	53.9	55.6	(661)
	(N)		(116)	(391)	(404)	(178)	(144)	(1233)
Career more important than family	agree(men)		8.9	8.6	9.3	12.6	12.7	(122)
	disagree(men)	.609	34.2	34.6	34.8	32.7	38.2	(422)
	(N)		(79)	(361)	(408)	(199)	(165)	(1212)
Career more important than family	agree(women)		6.0	6.8	7.1	7.0	9.7	(90)
	disagree(women)	.043	29.3	32.3	31.9	33.5	48.6	(425)
	(N)		(116)	(399)	(407)	(185)	(144)	(1251)
People without children lead empty life	agree(men)		20.5	15.5	12.1	17.5	21.6	(191)
	disagree(men)	.223	15.4	17.8	16.7	18.0	13.5	(201)
	(N)		(78)	(349)	(406)	(200)	(171)	(1204)
People without children lead empty life	agree(women)		6.9	5.3	7.1	14.0	17.9	(110)
	disagree(women)	.010	24.1	17.1	16.9	18.8	21.4	(231)
	(N)		(116)	(397)	(408)	(186)	(145)	(231)
People without children lead empty life	agree(men) *		43.8	49.1	67.9	72.7	83.8	(748)
	disagree(men) *	.000	38.4	37.4	21.6	17.0	12.0	(294)

	agree(women)*		34.5	51.3	68.3	83.1	88.0	(777)
	disagree(women)	.000	47.8	38.5	22.8	11.9	7.7	(324)
	(N)		(113)	(384)	(394)	(177)	(142)	(1218)
<b>KINSHIP</b>								
Not to fuss with family member on money	agree(men)		78.5	77.5	75.4	78.9	83.6	(947)
	disagree(men)	.176	5.1	6.4	4.7	3.5	5.3	(62)
	(N)		(79)	(360)	(406)	(199)	(171)	(1215)
	agree(women)*		67.2	73.8	76.6	82.2	89.7	(961)
	disagree(women)	.000	8.6	5.9	5.4	1.6	2.8	(62)
	(N)		(116)	(393)	(406)	(185)	(145)	(1245)
The more relatives the better	agree(men)*		56.6	66.0	71.3	74.4	84.1	(862)
	disagree(men)*	.000	25.0	14.5	12.0	11.1	2.9	(147)
	(N)		(76)	(359)	(408)	(199)	(170)	(1212)
	agree(women)*		57.8	70.1	76.6	85.9	91.8	(948)
	disagree(women)*	.000	19.8	14.2	6.7	5.9	2.7	(121)
	(N)		(116)	(395)	(406)	(185)	(146)	(1248)
Not to refuse siblings request for aid	agree(men)		27.6	34.0	21.6	27.4	29.8	(329)
	disagree(men)	.774	19.7	14.3	13.5	15.2	13.7	(171)
	(N)		(76)	(350)	(394)	(197)	(168)	(1185)
	agree(women)		37.7	20.7	19.8	17.4	31.3	(274)
	disagree(women)	.164	14.0	14.2	16.5	19.7	17.2	(194)
	(N)		(114)	(387)	(393)	(178)	(134)	(1206)
Kin are best persons to ask for help	agree(men)		60.8	59.3	54.3	54.9	68.2	(704)
	disagree(men)	.254	15.2	8.4	9.8	10.3	7.6	(115)
	(N)		(79)	(356)	(409)	(195)	(170)	(1209)
	agree(women)		66.9	60.8	57.7	56.5	69.7	(761)
	disagree(women)	.929	11.0	6.0	7.4	10.3	8.3	(98)
	(N)		(118)	(398)	(407)	(184)	(145)	(1252)
Most trustworthy are still kin	agree(men)		73.4	77.9	67.9	67.7	77.6	(872)
	disagree(men)	.864	10.1	5.7	6.2	5.6	5.3	(73)
	(N)		(79)	(353)	(402)	(198)	(170)	(1202)
	agree(women)		71.2	66.1	68.2	66.7	78.1	(860)
	disagree(women)	.159	10.2	6.3	4.4	9.3	5.5	(80)
	(N)		(118)	(398)	(406)	(183)	(146)	(1251)

\* Linear direction of change, increase or decrease, is as expected.

# Probability of Mantel-Haenszel test for linear association. The no opinion category has been omitted as the percentages of this category can be derived by subtracting both agree and disagree categories from 100%.

The second set of information, one that examines Hypothesis 1a, the effects of modernization on attitudes toward family values, is a comparison among different age cohorts. We take a more stringent criterion in testing this hypothesis. Specifically, for this hypothesis to be supporte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linear increase or decrease in percentage distributions for each statement by these cohorts has to be evident. For example, in examining this hypothesis on the first item in Table 1, "financial security is a major advantage of marriage," we should conclude that the hypothesis is supported by the data if we observe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linear increase of the percentage agreement from the lowest among the youngest cohort (those in the 21-24 age group) to the highest among the oldest cohort (those in age 55 or older). A linear increase or decrease is indicated by an asterisk next to the "agree" label.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s indicated by the Chi Square probability presented under the Chi Square column. As shown in Table 1, first row, this turns out to be the case. However, this is only the first step of Hypothesis 1a. The second step of Hypothesis 1a states that th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linear increase or decrease is true only on those items under marriage and divorce matters but not on those items under familial and kinship matters. We shall return to the examination of Hypothesis 1a after we finish explaining the third area of Table 1 that can be examined.

This third set of information that can be examined in Table 1 is a comparison between men and women by cohorts. As can be recalled, we expect the effects of modernization on family values to be more pronounced for women than for men. If this were true, it should show up in two ways. First, the percentage changes across cohorts on each of these statements should be greater for women than for men. This indeed is the case for the first statement. We see the changes for men are from 37.7% for the 21-24-year-old cohort to 64.2% for the 55-year and older cohorts, an increase of 26.5%,

while for women these changes are significantly greater for the same cohorts from, 37.2% to 75.5%, an increase of 38.3%. The second way for this to be true is to see the overall numbers of significant effects or simply the total number of asterisks for men and for women. In other words, the number of asterisks should be greater for women than for men. Table 1 shows the number of asterisks for women is nine, while for men it is eight. The difference is not high enough in this comparison for us to conclude that cohorts' overall effect is greater for women than for men. This of course is a very informal way of making comparison and one that may not be persuasive. Thus, to test Hypothesis 2 more formally, we ran two separate regression analyses, one for men and the other for women, using these family value items as dependent variables and the three modernization variables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with marital status as the control variable. We shall discuss this hypothesis in a later section.

To what extent is Hypothesis 1a supported by data presented in Table 1? First, with the exception on the item, "homosexual couples have the right to get married," effects of age (cohorts) on marriage and divorce items are all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linear increase or decrease as shown by the Chi square probabilities and the asterisks. This is further shown by lack of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linear increase or decrease on items pertaining to familial and kinship matters. Younger Taiwanese respondents are more likely to think that they should have choices on marriage and divorce matters but not on familial and kinship matters. This confirms our hypothesis in the metaphor that one can choose to enter or to leave the "house" of family and kinship, but he or she cannot change the rules once inside the "house." Second, among the significant effects of cohorts on marriage and divorce items, the ones that receive the higher percentage approvals are those on divorce and on linking children to marriage. This is a very clear indication that younger respondents no longer

consider it essential to stay in a bad marriage. The other questions that receive a high percentage approvals are values related to kinship: "not to fuss with family members on money" and "most trustworthy people are still one's kin." Both of these confirm the familism arguments pointed out above by Redding (1993) and by Lin and his associates (Lin et al., 1995). Third, among the statements that received the lowest percentage approvals are "homosexual couples have the right to get married," "family is less important in modern society," and "career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family." This is a further indication of the persistence of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and kinship.

## **A Recap**

Does cohort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family values? Yes, it does, but only on those value pertaining to the values items concerning marriage and divorce.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 cohort does not affect those values pertaining to the family and kinship matters. Does cohort show a greater effect on family values among female respondents than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Yes, but they are limited to the items concerning divorce. In other words, younger female cohorts show a much greater degree of approvals than their older female cohorts on divorcing from a bad marriage, and these differences are much greater than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On matters concerning children, the respondents tend to exhibit an overall, more traditional attitude. Continuing family lines and raising children within the family appear to be an unshakeable value.

## **Effects of Modernization on Family Values: The Case of Educational Effects**

Does level of education affect respondents' attitudes toward these family values? Table 2 presents the results of our analyses. Using the same criteria as those reported in the section on cohort in



Table 1 above, we see a much less significant overall effect than those by cohorts. College-educated male respondents are more likely than their less educated counterparts to agree that divorce is better for both husbands and wives than staying in a bad marriage. College-educated female respondents are significantly less likely to agree that "financial security is an advantage of a marriage," with a very low percentage of only 13.8% approval compared to their elementary-level educated counterparts at 70.6% approval. Less educated respondents, males or females, especially those with only the elementary-level education, show a very high percentage agreement on the matters concerning kinship matters.

**Table 2 Effect of Education and Gender on Family Values**

Family Values	Chi <sup>2</sup>	Education					N	
		elem school	junior high	high school	junior college	college & grad		
<b>MARRIAGE and DIVORCE (%)</b>								
Financial security as marriage advantage	agree (men) *		69.7	59.6	45.2	36.7	23.9	(606)
	disagree (men) *	.000#	20.7	30.3	47.6	50.0	64.1	(442)
	(N)		(357)	(228)	(334)	(98)	(142)	(1159)
	agree (women) *		70.6	54.1	38.6	27.3	13.8	(614)
	disagree (women) *	.000	21.7	40.5	57.5	70.9	77.1	(499)
	(N)		(503)	(185)	(334)	(55)	(109)	(1186)
Wanting children should get married	agree (men)		84.2	75.9	72.1	55.7	66.7	(897)
	disagree (men)	.000	10.9	17.7	21.7	34.0	24.3	(224)
	(N)		(368)	(237)	(341)	(97)	(144)	(1187)
	agree (women)		82.9	71.6	57.1	50.0	57.3	(858)
	disagree (women)	.000	12.5	24.7	36.3	40.7	30.0	(291)
	(N)		(527)	(194)	(336)	(54)	(110)	(1221)
Marriage without children not complete	agree (men)		72.0	59.4	52.7	49.0	58.7	(714)
	disagree (men)	.000	19.1	31.6	38.3	36.7	25.9	(345)
	(N)		(372)	(234)	(332)	(98)	(143)	(1179)
	agree (women)		76.0	59.2	54.4	42.6	46.8	(761)
	disagree (women)	.000	18.2	29.8	35.4	42.6	34.9	(330)
	(N)		(517)	(191)	(333)	(54)	(109)	(1204)

Homosexuals couples right to get married	agree (men)		7.7	13.0	12.7	14.8	17.4	(126)
	disagree (men) (N)	.002	74.2 (299)	67.3 (208)	69.5 (308)	60.2 (88)	63.0 (138)	(716) (1041)
	agree (women)		7.4	19.0	17.8	20.8	23.6	(154)
	disagree (women)* (N)	.000	76.1 (419)	67.2 (174)	61.5 (304)	60.4 (53)	48.1 (106)	(706) (1056)
When marriage in trouble divorce better for kids	agree (men)		11.9	16.2	22.4	27.3	20.7	(218)
	disagree (men) (N)	.000	71.4 (377)	66.4 (241)	60.8 (344)	54.5 (99)	56.6 (145)	(774) (1206)
	agree (women)		10.4	17.2	30.2	27.3	47.7	(261)
	disagree (women) (N)	.000	74.3 (541)	63.1 (198)	47.2 (341)	49.1 (55)	32.4 (111)	(751) (1246)
When marriage in trouble divorce better for wives	agree (men)*		26.1	36.8	41.9	43.4	45.8	(440)
	disagree (men) (N)	.000	53.7 (376)	41.7 (242)	33.7 (344)	34.3 (99)	34.7 (144)	(503) (1205)
	agree (women)		25.9	44.9	55.1	41.8	58.0	(505)
	disagree (women) (N)	.000	54.0 (541)	34.8 (198)	24.3 (341)	45.5 (55)	25.0 (112)	(497) (1247)
When marriage in trouble divorce better for husbands	agree (men)*		26.9	34.7	40.2	42.4	46.2	(432)
	disagree (men)* (N)	.000	54.8 (376)	46.3 (242)	37.3 (343)	35.4 (99)	33.8 (145)	(530) (1205)
	agree (women)		23.7	42.4	53.1	45.5	55.4	(480)
	disagree (women) (N)	.000	52.7 (541)	34.3 (198)	22.6 (341)	41.8 (55)	25.0 (112)	(481) (1247)
<b>FAMILIAL</b>								
Single moms raised children as well as couples	agree (men)		60.4	62.4	53.0	49.5	49.0	(658)
	disagree (men) (N)	.002	29.8 (359)	27.4 (234)	34.1 (334)	39.2 (97)	39.9 (143)	(380) (1167)
	agree (women)		62.5	62.2	54.2	54.7	55.0	(699)
	disagree (women) (N)	.044	29.9 (502)	34.0 (188)	34.2 (330)	39.6 (53)	33.9 (109)	(385) (1182)
Single dads raised children as well as couples	agree (men)*		48.3	47.8	44.1	42.3	40.4	(526)
	disagree (men) (N)	.072	41.2 (352)	40.1 (232)	43.2 (333)	44.3 (97)	48.2 (141)	(493) (1155)
	agree (women)		34.9	22.8	31.2	34.6	35.5	(371)
	disagree (women) (N)	.776	54.8 (493)	68.9 (180)	55.7 (327)	53.8 (52)	51.4 (107)	(659) (659)

Children are more trouble than worth	agree (men)		33.7	33.9	29.5	28.1	20.7	(350)	
	disagree (men)	.002	56.7	58.9	57.5	62.5	72.9	(687)	
	(N)		(356)	(224)	(332)	(96)	(140)	(687)	
	agree (women)		33.9	39.0	29.7	23.1	27.2	(376)	
	disagree (women)	.140	60.1	53.3	61.6	65.4	62.1	(693)	
	(N)		(501)	(182)	(320)	(52)	(103)	(1158)	
Children interfere with parents' freedom	agree (men)		37.0	36.6	38.3	42.9	38.9	(451)	
	disagree (men)	.239	56.5	57.3	52.6	48.0	52.8	(645)	
	(N)		(370)	(232)	(342)	(98)	(144)	(1186)	
	agree (women)		39.4	39.0	39.5	47.3	50.5	(496)	
	disagree (women)	.061	55.2	55.4	53.7	50.9	44.9	(655)	
	(N)		(525)	(195)	(337)	(55)	(107)	(1219)	
Family less important in modern society	agree (men)		11.0	12.0	9.3	7.1	6.9	(118)	
	disagree (men)	.996	38.6	34.7	31.1	32.3	36.6	(417)	
	(N)		(365)	(242)	(344)	(99)	(145)	(1195)	
	agree (women)		8.1	8.1	7.4	0.0	3.6	(88)	
	disagree (women)	.887	36.8	30.5	31.2	29.1	36.9	(419)	
	(N)		(532)	(197)	(340)	(55)	(111)	(1235)	
Career more important than family	agree (men)		19.5	14.6	13.8	18.8	11.1	(188)	
	disagree (men)	.398	17.6	18.0	15.3	15.6	16.0	(198)	
	(N)		(374)	(239)	(334)	(96)	(144)	(1187)	
	agree (women)*		13.2	7.6	5.3	1.8	0.9	(106)	
	disagree (women)	.002	20.5	11.1	18.0	21.8	22.0	(229)	
	(N)		(536)	(198)	(339)	(55)	(109)	(1237)	
People without children lead empty life	agree (men)		78.1	66.1	58.8	41.1	53.6	(740)	
	disagree (men)	.000	14.8	23.8	31.1	41.1	30.4	(298)	
	(N)		(366)	(227)	(325)	(95)	(138)	(1151)	
	agree (women)*		82.5	65.8	51.5	30.8	26.4	(767)	
	disagree (women)	.000	12.9	27.4	34.8	57.7	54.7	(321)	
	(N)		(520)	(190)	(328)	(52)	(106)	(1196)	
<b>KINSHIP</b>									
Not to fuss with family members on money	agree (men)*		82.8	80.1	78.7	72.4	64.6	(934)	
	disagree (men)	.000	3.2	7.1	3.5	5.1	9.7	(60)	
	(N)		(372)	(241)	(342)	(98)	(144)	(1197)	
	agree (women)		85.1	75.0	69.4	83.6	64.2	(961)	
	disagree (women)	.000	3.2	4.7	8.0	1.8	6.4	(61)	
	(N)		(537)	(192)	(337)	(55)	(109)	(1230)	

The more relatives the better	agree (men) *		78.8	71.9	69.0	61.9	60.8	(850)
	disagree (men)	.000	7.0	11.2	15.8	14.4	16.1	(144)
	agree (women) *		86.9	76.5	67.8	59.3	55.5	(937)
	disagree (women)	.000	4.5	9.2	14.5	18.5	16.4	(119)
	(N)		(534)	(196)	(339)	(54)	(110)	(1233)
Not to refuse siblings request for aid	agree (men)		23.3	26.6	31.4	27.1	32.6	(324)
	disagree (men)	.095	13.3	16.0	15.3	14.6	12.8	(169)
	(N)		(361)	(237)	(334)	(96)	(141)	(1169)
	agree (women)		22.8	16.5	24.0	27.3	27.3	(271)
disagree (women)	.015	19.3	13.3	15.2	9.1	10.9	(190)	
(N)		(509)	(188)	(329)	(55)	(110)	(1191)	
Kin are best persons to ask for help	agree (men)		58.3	54.8	61.1	62.2	56.9	(697)
	disagree (men)	.652	9.5	6.6	8.8	13.3	13.9	(114)
	(N)		(369)	(241)	(339)	(98)	(144)	(1191)
	agree (women)		59.1	60.1	59.3	72.7	67.6	(751)
disagree (women)	.136	8.2	5.6	9.5	3.6	7.2	(97)	
(N)		(536)	(198)	(337)	(55)	(111)	(1237)	
Most trustworthy are still kin	agree (men)		71.0	66.8	74.9	79.2	79.2	(863)
	disagree (men)	.047	5.5	7.1	6.2	7.3	4.9	(72)
	(N)		(365)	(241)	(338)	(96)	(144)	(1184)
	agree (women)		67.7	64.0	67.7	78.2	79.3	(848)
disagree (women)	.071	6.3	6.6	6.8	3.6	6.3	(79)	
(N)		(536)	(197)	(337)	(55)	(111)	(1236)	

\* Linear direction of change, increase or decrease, is as expected.

# Probability of Mantel-Haenszel test for linear association. The no opinion category has been omitted as the percentages of this category can be derived by subtracting both agree and disagree categories from 100%.

Based on the results presented in Table 2, we can conclude that level of education does not have the expected effects on marriage and divorce values, however, on values concerning familial and kinship matters the results are as expected. Thus, Hypothesis 1b does not receive the same extent of support as that of Hypothesis 1a. Part of this is due to our insistence of linear increase or decrease. In fact, the college and graduate educated cohort was the one group that distorted the picture. We will examine both Hypotheses 1a and

1b later when we jointly consider relative effects of the three modernization indicators in regression analysis.

## **A Reap**

Does the level of education as one important indicator of modernization affect the respondents' attitudes toward these family values?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is a very restricted and qualified yes. They are only restricted to a few values concerning divorce and kinship matters. By and large,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s are there, but they are not in linear direction of change as expected. Effects of education on female respondents' attitudes toward these values are surprisingly nonexistent in the sense that they are not linearly 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If comparisons were made only on the two extreme levels of education, those with elementary education and those with college education, then we do obser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m. For this reason we should conclude that the effects of modernization in terms of education on family values occur only on comparisons between two extreme categories. These results do not show clear support of Hypothesis 1b as we intended.

## **Effects of Modernization on Family Values: The Case of Urbanism**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urbanism as an indicator of modernization, we classify our respondents on the basis of their place of residence into three groups: those from the largest and the most cosmopolitan city of Taiwan, Taipei; those from other major cities; and those from the rest of the island nation. Table 3 presents the results of the comparisons among respondents from these three different areas. Three outstanding observations can be made from this table. First, significant effects in terms of linear increase or decrease of the urbanism, in terms of the place of residence, appear to be more

dispersed and to spread into all three categories of the family values more than either level of education or cohort discussed above. Second,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gender seem more clear than the level of education and cohort as well. For male respondents, with some minor exceptions, the significant effects appear almost exclusively on the family items, while, for female respondents, the same appear for marriage and divorce and more limited for kinship items. Third, urbanism clearly has a stronger effect for our female respondents than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Table 3 Effect of Urbanism and Gender on Family Values  
Level of Urbanization of the Place of Residence**

Family Values		Chi <sup>2</sup>	Rural Regions	Major Cities	Taipei	N
<b>MARRIAGE and DIVORCE</b>						
Financial security as marriage advantage	agree (men)		53.5	55.5	41.0	(616)
	disagree (men)	.018#	36.9	32.8	51.4	(445)
	(N)		(803)	(229)	(144)	(1176)
	agree (women)*		55.2	48.3	41.6	(619)
	disagree (women)*	.000	38.9	43.1	54.0	(507)
	(N)		(766)	(232)	(202)	(1200)
Wanting children should get married	agree (men)		74.8	75.2	71.2	(897)
	disagree (men)	.384	18.6	18.6	22.6	(230)
	(N)		(833)	(226)	(146)	(1205)
	agree (women)*		73.5	65.5	63.5	(869)
	disagree (women)*	.003	21.6	26.3	29.1	(293)
	(N)		(800)	(232)	(203)	(1235)
Marriage without children not complete	agree (men)		60.8	61.5	55.5	(721)
	disagree (men)	.244	28.8	26.4	36.3	(350)
	(N)		(819)	(231)	(146)	(1196)
	agree (women)*		64.9	63.7	55.8	(770)
	disagree (women)	.060	26.5	26.9	31.7	(334)
	(N)		(786)	(234)	(199)	(1219)

homosexuals couples right to get married	agree (men) *		12.0	12.1	12.3	(127)
	disagree (men) *	.989	68.8	69.1	69.2	(728)
	(N)		(719)	(207)	(130)	(1056)
	agree (women)		14.2	11.4	19.5	(156)
	disagree (women) *	.018	69.3	65.2	58.9	(714)
	(N)		(684)	(201)	(185)	(1070)
When marriage in trouble divorce better for kids	agree (men)		18.7	14.8	20.9	(223)
	disagree (men)	.738	64.5	62.7	62.8	(783)
	(N)		(840)	(236)	(148)	(1224)
	agree (women) *		19.4	22.0	27.5	(268)
	disagree (women) *	.000	64.3	54.4	51.2	(760)
	(N)		(814)	(241)	(207)	(1262)
When marriage in trouble divorce better for wives	agree (men) *		35.0	38.1	41.9	(446)
	disagree (men)	.014	44.8	35.6	35.8	(513)
	(N)		(839)	(236)	(148)	(1223)
	agree (women) *		36.9	47.7	48.1	(515)
	disagree (women) *	.000	44.3	33.2	29.3	(502)
	(N)		(814)	(241)	(208)	(1263)
When marriage in trouble divorce better for husbands	agree (men)		34.6	38.6	38.5	(438)
	disagree (men)	.046	46.7	38.1	39.2	(540)
	(N)		(839)	(236)	(148)	(1223)
	agree (women) *		34.4	46.1	47.6	(490)
	disagree (women) *	.000	44.2	29.9	26.0	(486)
	(N)		(814)	(241)	(208)	(1263)
<b>FAMILIAL</b>						
Single moms raised children as well as couples	agree (men) *		58.8	51.1	49.7	(666)
	disagree (men) *	.015	30.9	33.5	39.5	(385)
	(N)		(811)	(227)	(147)	(1185)
	agree (women)		60.1	55.5	57.7	(704)
	disagree (women) *	.252	31.5	34.4	35.8	(392)
	(N)		(769)	(227)	(201)	(1197)
Single dads raised children as well as couples	agree (men)		48.6	39.1	39.7	(535)
	disagree (men) *	.007	40.1	46.2	49.3	(497)
	(N)		(801)	(225)	(146)	(1172)
	agree (women) *		34.7	27.2	26.5	(375)
	disagree (women) *	.029	55.3	58.0	61.2	(667)
	(N)		(754)	(224)	(196)	(1174)

Children are more trouble than worth	agree (men) *		28.8	29.5	40.7	(354)
	disagree (men) *	.041	61.1	58.6	55.2	(697)
	(N)		(799)	(220)	(145)	(1164)
	agree (women)		32.8	33.6	29.8	(381)
	disagree (women)	.574	59.7	58.3	62.1	(702)
	(N)		(752)	(223)	(198)	(1173)
Children interfere with parents' freedom	agree (men) *		37.3	39.1	40.5	(458)
	disagree (men)	.247	55.9	50.9	51.4	(654)
	(N)		(825)	(230)	(148)	(1203)
	agree (women)		40.0	44.9	39.7	(504)
	disagree (women)	.357	55.6	48.3	52.0	(661)
	(N)		(795)	(234)	(204)	(1233)
Family less important in modern society	agree (men) *		9.4	10.0	14.2	(122)
	disagree (men) *	.023	36.0	35.9	26.4	(422)
	(N)		(833)	(231)	(148)	(1212)
	agree (women)		7.1	6.7	8.2	(90)
	disagree (women) *	.020	36.2	32.8	26.6	(425)
	(N)		(806)	(238)	(207)	(1251)
Career more important than family	agree (men) *		16.5	16.0	11.8	(191)
	disagree (men)	.226	15.9	19.9	16.0	(201)
	(N)		(829)	(231)	(144)	(1204)
	agree (women) *		10.1	8.5	3.9	(110)
	disagree (women)	.340	20.2	19.9	9.7	(231)
	(N)		(810)	(236)	(206)	(1252)
People without children lead empty life	agree (men)		65.7	59.6	61.4	(748)
	disagree (men) *	.069	23.3	28.9	29.3	(294)
	(N)		(801)	(228)	(140)	(1169)
	agree (women) *		66.5	62.6	56.9	(797)
	disagree (women) *	.013	25.3	26.0	33.5	(318)
	(N)		(786)	(227)	(197)	(1210)
<b>KINSHIP</b>						
Not to fuss with family members on money	agree (men)		80.1	72.1	74.7	(947)
	disagree (men)	.067	5.1	4.3	6.2	(62)
	(N)		(836)	(233)	(146)	(1215)
	agree (women) *		80.1	72.0	71.4	(961)
	disagree (women)	.018	4.7	7.2	3.4	(62)
	(N)		(806)	(236)	(203)	(1245)



The more relatives the better	agree (men)		71.8	72.2	65.8	(862)
	disagree (men)	.480	12.2	12.2	11.6	(147)
	(N)		(836)	(230)	(146)	(1212)
	agree (women)*		79.1	71.5	68.8	(948)
	disagree (women)*	.001	8.3	11.5	13.2	(121)
	(N)		(808)	(235)	(205)	(1248)
Not to refuse siblings request for aid	agree (men)		29.0	24.7	25.9	(329)
	disagree (men)	.313	14.1	15.4	14.7	(171)
	(N)		(815)	(227)	(143)	(1185)
	agree (women)		24.1	20.2	20.4	(274)
	disagree (women)	.498	16.2	17.2	14.4	(194)
	(N)		(772)	(233)	(201)	(1206)
Kin are best persons to ask for help	agree (men)		58.8	54.8	60.3	(704)
	disagree (men)	.483	8.5	12.6	10.3	(115)
	(N)		(833)	(230)	(146)	(1209)
	agree (women)		61.0	55.7	65.5	(761)
	disagree (women)	.507	8.0	8.1	6.8	(98)
	(N)		(811)	(235)	(206)	(1252)
Most trustworthy are still kin	agree (men)		71.2	71.9	81.3	(872)
	disagree (men)	.158	5.7	7.5	6.3	(73)
	(N)		(830)	(228)	(144)	(1202)
	agree (women)		68.3	66.2	73.4	(860)
	disagree (women)	.074	7.2	7.7	1.9	(80)
	(N)		(810)	(234)	(207)	(1251)

\* Linear direction of change, increase or decrease, is as expected.

# Probability of Mantel-Haenszel test for linear association. The no opinion category has been omitted as the percentages of this category can be derived by subtracting both agree and disagree categories from 100%.

Specifically, we see that our more urbanized male respondents are more likely than their less urbanized counterparts to agree that "children are more trouble than they are worth," "children tend to interfere with parents' freedom," and "the family is less important in modern society." All of these are a clear departure from the more traditional values of filial piety (i.e., bearing a son to carry family names). For women respondents, our more urbanized respondents

are more likely than their less urbanized counterparts to agree that "divorce from a bad marriage is better for children, for wives, and for husbands" and less likely to agree that "financial security is an advantage of a marriage," "marriage without children is not complete," "not to fuss with family members on money," and "the more relatives the better." Our more urbanized female respondents, like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show a clear departure from the more traditional family values of kinship and marriage.

What do these findings mean in terms of Hypothesis 1c? First, we see that urbanism seems to have the greatest effects on our female respondents on marriage and divorce values. This is as predicted by Hypothesis 1c and Hypothesis 2. We shall return to this point later. Second, we also see urbanism having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familial values, especially for our male respondents. This is contrary to the prediction of Hypothesis 1c. Third, the effect of urbanism on kinship values is still quite limited. This is as prediction by Hypothesis 1c.

## **A Recap**

The effects of urbanism are clearly more dispersed and, therefore, more pervasive than either level of education or cohort. It has a greater effect on female respondents than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significant effects. However, the significant effects of urbanism on women are almost exclusively limited to matters on marriage and divorce, and on some limited kinship items. On the other hand, the significant effects of urbanism on men tend to be restrictive on familial items.

## **Effects of Modernization on Family Values: The Case of Simultaneous Consideration of Cohort, Level of Education, Urbanism and Gender**

From the above discussion, it seems clear that the effects of each

of the modernization indicators, cohort, level of education, and urbanism, on family values are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Cohort' effects are more concentrated. Level of education to our surprise does not seem to show many overall effects. Urbanism shows dispersed and widespread effects and also shows a stronger effect for women than men as well. To explore the collective and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these modernization indicators further and to examine the hypothesis of greater modernization effects for women, we ran three separate regression analyses. First, we included these three modernization indicators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with sex and marital status as control variables. The control variable sex was taken out from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regression analyses where the former was limited to male respondents and the latter female respondents respectively. In each of these three regression analyses, all family values discussed above and reported in Tables 1, 2, and 3 are used as dependent variables and are examined one at a time. A natural question can be raised concerning our treatment of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The question is: why not create indices of these value items by combing them in someway through such techniques as factor analysis, scale construction, etc. There are a number of reasons why we did not choose to do so. First, we grouped those items on the basis of what they represent and pertain to on theoretical ground, instead of using statistical procedures to group them. Second, these items represents different aspects of each category. Grouping them as indices though may increase R square of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each item may get lost in the process. Third, by combing these items, we will not be able to differentiate those significant items from those not significant. The results of these analyses are reported in Table 4.

**Table 4 Effect of Modernization on Family Values:  
A Regression Analysis**

Family Value	Marital Sex (married) <sup>a</sup>	Urbanism (female) <sup>b</sup>	Education (high) <sup>c</sup>	Age (high) <sup>d</sup>	R Square (old) <sup>e</sup>	
<b>MARRIAGE and DIVORCE</b>						
Financial security as marriage advantage (agree)	-.152	-.070	-.000(-)	-.267*(-)@	.008*(+)	.136**
	men -.170		.037	-.242*	.003	.102**
	women -.130		-.034	-.291*	.013*	.176**
Wanting children should get married (agree)	-.142	-.131*	-.018(-)	-.110*(-)	.018*(+)	.094**
	men -.216*		.020	-.095*	.018*	.096**
	women -.032		-.049	-.134*	.017*	.090**
When marriage in trouble divorce better for kids (agree)	.224*	.189*	.101*(+)	.144*(+)	-.011*(-)	.084**
	men .197		.044	.094*	-.010*	.046**
	women .240		.148*	.201*	-.011*	.123**
When marriage in trouble divorce better for wives (agree)	.094	.073	.141*(+)	.094*(+)	-.015*(-)	.060*
	men .175		.135*	.075*	-.019*	.040**
	women -.014		.146*	.115*	-.020*	.084**
When marriage in trouble divorce better for husbands (agree)	.117	.121*	.144*(+)	.098*(+)	-.013*(-)	.059**
	men .156		.100	.081*	-.008*	.031**
	women .070		.183*	.114*	-.019*	.092**
Homosexuals couples right to get married (agree)	.168*	.108*	.036(+)	.093*(+)	-.005*(-)	.039**
	men .301*		-.024	.058*	-.004	.032**
	women -.027		.083*	.143*	-.006	.056**
<b>FAMILIAL</b>						
Single moms raised children as well as couples (agree)	.220*	.043	-.062(+)	-.054(+)	.008*(-)#	.016**
	men .204*		-.104*#	-.069*#	.009*#	.029**
	women .239*		-.026	-.038	.006	.009
Single dads raised children as well as couples (agree)	.320*	-.254*	-.097*(+)#	-.011(+)	.005(-)	.033**
	men .263*		-.125*#	-.053	.004	.020**
	women .374*		-.076	.039	.007	.019**
Children are more trouble than worth (agree)	.199*	.036	.058*(+)	-.075*(+)#	-.000(-)	.012**
	men .177		.118*	-.101*#	-.002	.021**
	women .211		.003	-.042	.003	.006
Children interfere with parents' freedom (agree)	.140	.024	.057(+)	.000(+)	-.007*(-)	.014**
	men .128		.050	-.017	-.011*	.019**
	women .140		.059	.025	-.003	.010
Marriage without children incomplete (agree)	-.103	.025	.007(-)	-.031(-)	.023*(+)	.075**
	men -.150		.058	-.013	.021*	.064**
	women -.034		-.036	-.054	.025*	.091**
People without children lead empty life (agree)	-.271*	-.055	-.015(-)	-.118*(-)	.022*(+)	.142**
	men -.333*		-.019	-.067*	.019*	.107**
	women -.167		-.007	-.180*	.024*	.187**

Family less important in modern society (agree)		.021	-.032	.075*(+)	-.020(+)	-.003(-)	.008**
	men	.104		.063*	-.008	.002	.008
	women	-.177*		.086*	-.033	-.008*	.025**
Career more important than family (agree)		-.095	-.130*	.017(+)	-.021(+)	.003(-)	.015**
	men	-.036		-.034	-.017	.003	.006
	women	-.173*		.061*	-.022	.002	.019**
<b>KINSHIP</b>							
Not to fuss with family members on money (agree)		-.030	-.030	-.035(-)	-.055*(-)	.007(+)	.029**
	men	-.111		-.017	-.056*	.003	.020**
	women	.070		-.051	-.054*	.012*	.043**
The more relatives the better (agree)		-.105	.053	-.047(-)	-.107*(-)	.017*(+)	.082**
	men	-.063		-.022	-.094*	.014*	.050**
	women	-.164		-.070	-.115*	.021*	.121**
Not to refuse siblings request for aid (agree)		.079	-.076	-.017(-)	.024(-)	.005*(+)	.006**
	men	-.037		-.036	.027	.005	.005
	women	.241*		.002	.012	.004	.010
Kin are best persons to ask for help (agree)		.029	.068	.026(-)	.003(-)	.003(+)	.003
	men	-.018		-.003	-.000	.003	.001
	women	.093		.052	.003	.003	.004
Most trustworthy are still kin (agree)		.073	-.023	.056(-)	.028(-)	.006*(+)	.008**
	men	-.007		.027	.033	.003	.004
	women	.178		.081*#	.021	.009*	.016**

a: Marital status is coded as 1 = married, 0 = not currently married.

b: Sex is coded as 1 = male, 2 = female.

c: Urban is coded as those in Tables 1-3, 1 = rural regions, 2 = major cities, and 3 = Taipei.

d: Education is coded the same as those in Tables 1-3, the higher is the value, the higher is the level of education.

\*: Indicat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0.5 level, t test, two tail for marital status and sex, one tail for urban, education, and age.

#: Indicating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ffect but in opposite direction from predicted.

@: Indicate the expected direction of effect, positive or negative.

\*\* : Indicating F test for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f R square.

For ease of presentation and for the purpose of examining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stated in this study, we can focus our attention by looking at the results from Table 4 in four major ways. First, we shall focus on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these three modernization indicators: urbanism, education and cohort. Which of these three modernization indicators when considered simultaneously seem to exert a greater effect on overall family values? Second, we shall focus on examining Hypotheses 1a, 1b and 1c. These hypotheses

state that modernization (indicators) should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values pertaining to marriage and divorce matters (whether men or women) but should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n values pertaining to familial and kinship matters. How do the results presented in Table 4 stacked up to these hypotheses? Third, we shall focus on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modernization for men and for women as stated in Hypothesis 2? Fourth and finally, we shall highlight those value items that show more consistent change and those items that persist without being affected by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the remainder of this section, we shall discuss each of these questions in turn.

The first question we raised above is: which of the three modernization indicator seems to exert a greater effect on overall family values. An examination of Table 4 shows "age" to have the greatest overall effect followed closely by "education" with "urbanism" as a distant third. This is based on the number of overall significant effects. Of the 57 equations presented in Table 4, "age" shows having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31 of them, with "education" on 27 of them and "urbanism" 14 of them. If we restrict ourselves on items pertaining to marriage and divorce matters, then education shows a slightly higher effect. In the hindsight, this seems to make sense in that both education and age reflect longitudinal nature of a person's life while urbanism is more cross-sectional in nature.

The second focus is on examining Hypotheses 1a, 1b, and 1c. For these hypotheses to be supported as can be recalled we should observe significant effects of each of these modernization indicators on value items pertaining to marriage and divorce matters but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n value items pertaining to familial and kinship matters. With some exceptions, such as "marriage without children incomplete," "people without children lead empty life," and "the more relatives the better," Hypothesis 1a, the effect of age, seems to receive a very definite support from results shown in Table 4. With

the exceptions of items such as "people without children lead empty life," "not to fuss with family members on money," and "the more relatives the better," Hypothesis 1b,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also receive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results. With some minor exceptions, Hypothesis 1c, the effect of urbanism, receives a modest support from the results. All of the above discussion is based on the number of expected, positive or negative indicated in the parentheses of each variable, significant effect.

The third question we raised above is the differential effect of modernization on family values for men and for women. Hypothesis 2 states that modernization should exert a greater effect on family values for women than for men. We can use two types of information shown in Table 4 to support this hypothesis. First, since we ran the exact same variables in each of the 19 equations for men and for women, we can compare the number of expected significant effects of each. In this case, we expect to see a higher number of significant effects for women than for men. The second piece of information that can help determine this is to see the R squares on those equations for women and for men. Equations for women should show higher R squares than same equations for men. Let us proceed to see if both of these are indeed the case.

Of the 19 equations, each with three modernization variables, for a total of 57 variables compared, the total number of significant effects for women is 26, or 45.6% while for men it is 20, or 35.1%. In terms of the R square comparison, of the 19 equations compared, 12 of them show a higher R square for women while on five of them show higher R square for men with two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us, we should conclude that overall, modernization does have a modestly higher effect on family values for women than for men.

Fourth and finally, what family values items examined in this study seem to receive more consistent change and what items seem to persist without change? If we were to restrict ourselves on those

family value items that receive significant effects by all three modernization indicators in at least two of the three equations as consistent change, then we see the following family value items:

"When marriage in trouble divorce better for kids."

"When marriage in trouble divorce better for wives."

"When marriage in trouble divorce better for husbands."

All three of these are about divorce being better than staying in trouble marriage. In singling out those family value items that seem to persist without change, if we were to restrict ourselves to those receive not more than one significant expected direction of effect from any of the three modernization indicators, then we observe the following family value items:

"Single moms raised children as well as couples."

"Single dads raised children as well as couples."

"Children are more trouble than worth."

"Children interfere with parents' freedom."

"Marriage without children incomplete."

"Career more important than family."

"Not to refuse siblings request for aid."

"Most trustworthy are still kin."

All of the above items are either familiar or kinship matters. This is another way of showing support to the first set of hypotheses.

## Conclusion

In this paper, we use cohort, level of education, and urbanism in terms of place of residence of respondents from the 1991 Social Change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to tap the modernization effects on family values. We found that younger, more educated, and more urbanized respondents clearly exhibit more modernized family orientation than their older, less educated, and less urbanized counterparts. However, this effect is most likely to be limited to the modern, individualistic-oriented values items shown in this study in terms of their attitudes toward marriage and divorce and especially on divorce. However, when it comes to the matters concerning the family itself, and the kinship in particular, no truly consistent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re exhibited between our younger, more educated, and more urbanized respondents and their older, less educated, and less urbanized counterparts. Chinese family and kinship values once again appear to persist, despite the rapid social change and high economic growth that Taiwan has been undergoing during the last few decades. This major finding is quite consistent with the findings by Redding (1993) on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enterprises and even the Chinese styl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found by Lin and his associates (Lin et al., 1995). However, when comparison is made on the effects of modernization on family valu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we found the effects to be greater for women than for men as we expected it to be.

However, it must be pointed out that even though modernization seems to have significant and expected effects on family values concerning marriage and divorce, we also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level of approval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youngest cohort, those between 21 and 24 years of age, the general levels of approval or agreement to these statements asked are only around one third. This brings out the weaknesses and the contributions this paper provides. The weaknesses are obvious. We do not know how much changes these approval percentages represent over time. It would definitely be much better if we could make statements like: these changes represent "x" percentage points increase or decrease over "y" period of time. However, we have in this study set the tone and

established the benchmarks for cross-cultural and future comparisons. We think this is as much a contribution as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modernization on family values.

## References

- Bahr, Stephen J. ed.  
 1991 *Family Research: A Sixty Years Review, 1930-1993*, Vol. I and II.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 Baker, Hugh D.  
 1979 *Chinese Family and Kinship*. New York: The Macmillian Press, Ltd.
- Barrett, Richard B. and Martin K. Whyte  
 1982 "Dependency Theory and Taiwan: An Analysis of a Deviance Cas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5):1064-89.
- Berger, Brigitte, and Peter Berger  
 1991 "The Family and Modern Society." Pp. 27-42 in *The Family Experience, A Reader in Cultural Diversity*, edited by Mark Hutter. New York: Macmillian Publishing Company.
- Chang, Ming-cheng, R. Freeman, and Te-Hsiung Sun  
 1981 "Trends in Fertility, Family Size Preferences and Family Planning Practice: Taiwan 1961-1980."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12(5,1981): 211-28.
- Chang, Ying-hwa  
 1991 "Changing Family Household Patterns (in Chinese)." *Thought and Word*, 1991(4), 85-113.  
 1993 "Changing Family Composition and Family Values: The Case of Taiwan (in Chinese)." The Fourth Conference on Modernization and Chinese Culture.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Beijing University.  
 1994 "Family Composition and Parental Care Patterns in the Changing Society: The Case of Taiwan (in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ology* 23:1-34.
- Chen, Kuanjeng, Edward Tu and I-hou Lin  
 1989 "Family Formation and Change in Taiwan (in Chinese)," Pp.311-35 in *Analyses of Social Phenomena in Taiwan*, edited by Chin-chun Yi and Shui-ling Chu. Taipei, Taiwan: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 Chen, Xiangming  
 1985 "The One-child Population Policy, Modernization, and the Extended Chinese Famil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7:193-202.
- Chi, Li  
 1989 "Effects of Rural Urban Migration on Household Composition in Taiwan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ogy* (Taipei, Taiwan) 13:67-104.

- 1990 "Nuclearization of Family in Taiwan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in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ology* 20:41-83.
- Chiao, Chien, ed.  
1991 *Chinese Family and Its Change* (in Chinese).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Hong Kong Asian Institute.
- Chu, Shui-ling  
1986 "A Study of Child Rearing Practices in a Changing Society (in Chinese)."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Taipei, Taiwan) 10:115-36.  
1993 "Modernization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 (in Chinese)." Symposiu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edited by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Taipei.  
1994 "Changing Family Ethics." *Family Ethics and Human Right*. Dec. 3, 1994.
- Cohen, Melvin L.  
1976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oombs, Lolagence C. and Te-Hsiung Sun  
1981 "Familial Values in a Developing Society: A Decade of Change in Taiwan." *Social Forces* 59:1229-55.
- Falding, Harold  
1991 "Family Life and Family Values in Modern Soc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the Unity of Science* 4 (3, Fall 1991) 253-72.
- Furstenberg, Frank F., Jr.  
1966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American Family: A Look Backwar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1:326-37.
- Gold, Thomas B.  
1986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Armonk, N.Y.: M.E. Sharpe.
- Goode, William J.  
1963 *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Glencoe Free Press.
- Greenhalgh, Susan  
1984 "Networks and Their Nodes: Urban Society in Taiwan." *China Quarterly*, 99:529-52.
- Hsieh, Kuo-chiao  
1980 "Traditional Values Adaptation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aiwan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ogy* (Taipei, Taiwan) 5:63-80.
- Hsu, Francis L.K.  
1967 *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Kinship, Personality, and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tter, Mark, ed.  
1991 *The Family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Macmillan.

- Kamo, Yoshinori and Min Zhou  
1994 "Living Arrangements of Elderly Chinese and Japa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6:544-58.
- Lai, Tse-han and Kuanjeng Chen  
1980 "Historical and Demographic Perspectives of the Chinese Family Size (in Chinese)."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Taipei, Taiwan) 5:25-40.
- Lee, Yean-ju, Parish, William L. and Robert Wills  
1994 "Sons, Daughter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Taiw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9(4, Jan. 1994):1010-41.
- Li, I-Nan  
1982 "Trends and Differentials in Divorce Rates in Taiwan (in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ology* 15:143-71.
- Li, Mei-ling  
1984 "Social Differentials of Divorce in Taiwan (in Chinese)."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Taipei, Taiwan) 8:23-46.
- Li, Yih-yuan  
1982 "Family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in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54:7-23.  
1985 "Traditional Folk Religious Rituals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Chinese)." Pp.73-92 in *Modernization and Signification*. Taipei, Taiwan: Kuei Kuan Books.  
1987 *Bibliography of Studies of the Chinese Family* (in Chinese). Taipei: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 Lin, Nan, Chin-chun Yi, Ying-hwa Chang and Yung-mei Tsai  
1995 "Sociocultural Regime in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The Family Enterprise of Private College in Taiwan." *Asiatique Studies/Etudes Asiatiques*, XLIX, No.1.:173-195.
- Lo, Chi-chiung  
1987 "Changing Elderly Family Structure in Taiwan During the Past Decade (in Chinese)." *Taiwan Economic Forecast* 18(2):83-107.
- Logan, John R., Fuqin Bian  
1995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the Urban Chinese Family: The Case of Living Arrangement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Lu, Yu-hsia  
1983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Family Power Structure in Taiwan (in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56:111-43.
- Parish, William L. and Martin K. Whyte  
1978 *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edding, S. Gordon

- 1993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 Shu, Ramsey and Chung-cheng Lin
- 1984 "Family Structure and Social Chang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ingle Headed Households in the U.S. and Taiwan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ogy* (Taipei, Taiwan) 8:1-22.
- 1989 "Family Structure and Social Change: A Further Analysis (in Chinese)." Pp.26-55 in *Analyses of Social Phenomena in Taiwan*, edited by Chin-chun Yi and Shui-ling Chu. Taipei, Taiwan: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 Spitze, Glenna and John R. Logan
- 1990 "Sons, Daughter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2(May, 1990):420-30.
- Sun, Te-Hsiung
- 1991 "Changing Chinese Family: The Case of Taiwan (in Chinese)." Pp. 33-51 in *Chinese Society and Its Change*, edited by Chien Chaio.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Hong Kong Asian Institute.
- Thornton, A., Hui-Sheng Lin, and Mei-Lin Lee
- 1987 "Social Change, the Family, and Well-be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Welfare, Academia Sinica.
- Thornton, A., Ming-cheng Chang, and Te-Hsiung Sun
- 1984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Family Formation in Taiwan." *Demography* 21(4, 1984):475-99.
- Thornton, Arland and Thomas E. Fricke
- 1987 "Social Change and the Famil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from the West, China, and South Asia." *Sociological Forum* 2(4, 1987):746-79.
- Tsai, Wen-hui
- 1982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Taiwa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ology* 15:63-80.
- Tsui, Ming
- 1989 "Changes in Chinese Urban Family Structur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1(August):737-47.
- Wang, Temu and Kuanjeng Chen
- 1987 "Modernizati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Family Composition: A Test of a Social Change Theory (in Chinese)." *Changing Taiwanese Society*, edited by Kuo-shu Yang and Hei-yuan Chu. Taipei, Taiwa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Ward, Russell, John Logan and Glenna Spitze
- 1992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 and Child Needs on Coresidence in Middle

- and Later Lif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4(February, 1992):209-21.
- Weinstein, Mscomr, Te-Hsiung Sun, Ming-Cheng Chang  
1990 "Household Composition, Extended Kinship, and Reproduction in Taiwan: 1965-1985." *Population Studies* 44:217-39.
- Wen, Chung-I  
1991 "Industrialization and Changing Family Relations Taiwan (in Chinese)." Pp.171-81 in *Chinese Family and Its Change*, edited by Chien, Chaio.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Hong Kong Asian Institute.  
1989 "Family Structure and Its Related Factors: An Analysis of Taipei City (in Chinese)." Pp.1-24 in *Analyses of Social Phenomena in Taiwan*, edited by Chin-chun Yi and Shui-ling Chu. Taipei, Taiwan: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 Yang, Kuo-su and Hei-yuan Chu, eds.  
1989 *Changing Taiwanese Society* (in Chinese). Taipei, Taiwa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Yi, Chin-chun  
1985 "Different Family Type Preferences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Taiwan (in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ology* 17:1-14.  
1989 "An Analysis of Marital Power in the Taipei Metropolitan Area: An Example Familiar Decision-making (in Chinese)." Pp.115-51 in *Social Phenomena in Taiwan: An Analysis*, edited by Chin-chun Yi and Cathy Chu. Taipei: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1993 "Studying Social Change: The Case of Taiwanese Family Sociologists." *Current Sociology* 41(1):41-67.  
1994 "Child care Arrangements of Employed Mothers in Taiwan." Pp.235-54 in *Women, the Family, and Policy—A Glob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Esther Ngan-lin Chow and Catherine White Berheide. Albany, N.Y.: SUNY University Press.
- Yi, Chin-chun and Shui-ling Chu  
1989 *Social Phenomena in Taiwan: An Analysis* (in Chinese). Taipei, Taiwan: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 Yi, Chin-chun and Ying-hwa Chang  
1995 "Change of Family Structure and Marital Power in Taiwan (in Chines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台灣民衆之孝道觀念的變遷情形\*

葉光輝\*\*

## 摘 要

由於早期（1984年以前）國內學者在探討國人孝道觀念的變遷觀點時，大多是(1)缺乏實徵證據支持的論述，或是(2)欠缺以成人樣本為對象的討論。另外，在後期（1984年以後）以成人樣本為對象的相關實徵研究中，又都不是針對此一研究主題，提出理論根據而進行探討的系統化研究，以致於這類研究結果相當零亂分歧。鑑於上述的缺失，本文嘗試提出一項四個作用因素（威權、情感、交換及宗教）的討論架構，用以說明它們與民眾孝道觀念消長情形的關係。當以第二期第五次「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的部分相關資料，進行分析探討後發現：在台灣社會近一、二十年的變遷過程中，由於工業化、都市化、民主化以及多元化等因素的影響，使得親子間原有的威權與交換連結關係明顯減弱，因而衝擊降低了「抑己順親」與「護親榮親」等孝道觀念在民眾心目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由於親子間的情感連結及宗教因素的功能仍持續維存或逐漸增強，使得「尊親懇親」與「奉養祭念」等孝道觀念，依然在民眾心目中佔據相當的重要地位。

---

\* 對於「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計畫能提供機會，讓作者參與調查問卷的撰題及使用整套研究資料進行分析，在此要特別感謝由瞿海源教授所帶領的全體工作人員，由於他們的辛苦與努力，才有此論文的問世。再次的謝謝他們。本文曾於「變遷中的台灣社會研討會」上提出報告，並承黃光國教授評論意見作了局部修改。事後，並經兩位匿名審查者之意見，作了最後之定稿修改，特此一併致謝。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Changes in the Taiwan People's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Kuang-Hui Yeh

## Abstract

When local scholars discussed the topic of changes in the Taiwanese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prior to 1984, their discussions exhibited two shortcomings. The first problem was that most scholars lacked empirical evidence to support their viewpoints. The second problem was that even if researchers possessed empirical evidence, they had few adults as subjects, and did not us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designed for the Specific topic resulting in inconsistent research. In dealing with these shortcomings, this paper presents a preliminary model containing four factors (authority, affection, exchange, and religion) that contribute to changes in a person's filial concept. This study analyses data from the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1994).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in the last decade, the processes of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pluralization in Taiwan's society have weakened the authority and exchange links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These changes have decreas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i-chi-shun-chin" and "hu-chin-jung-chin" filial concepts. However, the "tsun-chin-ken-chin" and "feng-yang-chi-nien" filial concepts remain highly important due to sustained or strengthened religious functions and links of affec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 台灣民衆之孝道觀念的變遷情形

## 一、前 言

自古以來，萬事萬物都一直處在轉變之中。有些事物它的轉變速率快而且明顯，有些事物則相當緩慢，甚至感覺不到它的變化。對於事物的變化現象，我們真可以用「唯一不變的就是變的原則」這句話來形容。基本上，任何事物都先具有一原型，事物的轉變就是在這原型的特徵屬性下，沿著特徵屬性的量與質的兩條軸線發生變化。中國人的孝道觀念的變遷情形也是如此，它最早的特徵屬性是屬於宗教性的，主要是爲了宗廟祭祀祖先的意義與功能。到了西周時期，它的特徵屬性產生出鞏固政治權力的意義與功能。及至春秋孔子時期，孝的倫理規範意義才凸顯出來(韋政通 1969; 徐復觀 1975)。不過在春秋時期，孝的宗教性與政治性的意義仍持續保留著，祇是已沒有像以往那麼被強調罷了。春秋戰國以後，孝道觀念的意義仍舊在原有的特徵屬性下沿著量或質的向度在演變。

陶希聖(1983)曾將孝道觀念意義在中國社會的變化情形，區分成四個明顯不同的時期，首先是「孝的史前期或蘊釀期」，大約在殷商時代，此時「應善待父母」的孝觀念並不明顯。當時王位的繼承是兄終弟及，不是父死子繼。因此，下一代的王，祭祀上一代的王是「多父」或「眾父」，並不僅有一個。對於自己的生父並沒有也不能特別的禮遇。其次是「相對主義倫理觀時期」，大約在周代至西漢時期。周代以後，父系的、父權的、族外婚與長子繼承的社會組織興起、家族制度也跟著發達，孝的倫理觀念因此產生了。此一時期，孝道是一種將

親子自然情感與社會制度相結合的典制。當時強調的倫理觀念是相對的，所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雖然孔門言論提倡的是「父慈子孝」屬於相對主義的倫理觀，但在禮記中卻有：「言孝不言慈」，其道理何在？基本上，當時社會的觀念認為天下父母慈愛子女之心，是出於天性。亦即父母對子女的慈愛是出於真誠，無需特別講求。但是子女對於父母的孝心，就不是那麼簡單、平實與真誠。因此，孝道被建制成為一項相當重要的教化德目。第三是「絕對主義倫理觀時期」，大約從西漢後期開始，在宋、明時期達到最頂點。宋代的理學與道學，乃是對唐代盛行的老佛學風的大反動，同時它主張加強家族對其成員的束縛及控制。由於家族制度趨向嚴謹，孝道的倫理觀念遂變成絕對主義的。父輩有絕對的獨裁權，子輩須絕對屈從。民間也有如「父教子死，子不敢不死」的諺語。其時，宋、明律法對於不孝之人刑法的嚴酷，幾使得為人子女者聞孝心驚，甚至到了「恐孝」的地步。這些都是孝道極權化或絕對化的表現。最後是現代的「先言慈再言孝時期」。昔日言孝不言慈，孝道中的責任主要落在子女身上，端看子女孝不孝敬父母，而不責備父母。在今日，由於昔日的家族主義社會已逐漸轉變成為個人主義社會，責任的歸屬也漸漸從子女身上轉到父母身上。此時，對於子女的教育方式，強調的是勉勵代替約束，責任代替權威，其間必需講求方法與技巧。上述關於陶氏對孝道觀念在中國社會的演變情形所作的分期，雖然還有些可討論的地方，但這樣的分期卻清楚的呈現出孝道觀念在中國社會的演變與多元面貌。

對於孝道觀念在中國社會中的多元意義，還有其他學者循著朝代的交替，提出更詳細的討論（徐復觀 1975；葉光輝 1995a）。基本上，討論孝道觀念演變情形的學者，都認為孝道觀念的轉變，是與其週遭的生態環境的變化情形密切關聯，它包括了社會、經濟、政治及文化等層面。許烺光（Hsu 1971）就曾經討論到，同樣都相當重視孝道德性對民眾教化功能的中國與日本社會，為何在二十世紀初期，面對西

方帶來的工業化與現代化的衝擊壓力時，中國人的反應模式是，把儒家孝道觀念認為是阻礙社會工業化與現代化的首惡，必須加以打倒或揚棄；而日本人卻不認為孝道德性會妨礙其社會發展，不僅未出現反孝的言論運動，並且直至今日，還認為是該社會工業化與現代化的人文核心。許氏認為中日兩個社會原先所重視的孝道意義的本質並沒有差別（日本社會孝道觀念的源流是該政府派學生至中國學習後帶回），但在本世紀初期，兩者為因應外界挑戰而調整孝道觀念作法的明顯差異，主要是來自於兩個社會中人際網絡的表現方式不同所致。也就是由於社會的生態環境不同，同樣的孝道觀念在回應外來壓力的挑戰時，產生了不同的因應型態。因此，作為一項主要的社會教化德目，孝道觀念的內涵在量或質方面，必須隨著所處大環境的變動有所轉變，以因應外界的需求的道理是相當清楚的。然而對於當代社會科學研究者而言，更重要的關注點是，孝道觀念在現代社會中到底產生了那些實質的變化？它又有那些特徵屬性是穩定不易改變的？而到底是那些重要因素造成這些特徵屬性的變與不變？以及這些變與不變的特徵屬性對於社會及個人又會造成那些影響？唯有對上述問題的瞭解，才能對於因孝道觀念的變化，在社會發展及個人生活兩方面所造成的問題，提供有效的建議意見。因此，本研究主要是想以實徵的方式，探討台灣民衆孝道觀念的變遷情形及其相關因素，以作為未來規畫社會發展及改善個人生活與適應的參考。

## 二、文獻探討

近十年來，台灣社會整體的變化速率是有目共睹的。其中，恐怕以1987年政府宣佈解除長達四十年的戒嚴令，並開放黨禁、報禁所造成的影響衝擊最大。這些開放的措施，使得原本定於一尊的價值思想觀念頓時解除其束縛力，影響所及是各式各樣的價值取向觀點如百家

爭鳴紛紛出籠，一時之間讓人覺得亂象叢生無所適從。事實上台灣民眾的孝道觀念，在這些社會及政治生態環境的改變之前，就因工業化與都市化發展，造成家庭結構的變化及人際關係的複雜化，而促使部分關心社會發展的學者，不斷的倡導與呼籲應該以所謂的「新孝道」或是「現代孝道」來因應社會的變遷。不論是對「新孝道」或「現代孝道」的提倡，這些人文及社會科學者都有志一同的傳達了一個觀念，即傳統社會沿留下來的孝道觀念、想法或作法有些是不合時宜的，應該加以去除或調整。至於是那些孝道觀念、想法或作法不合時宜，學者間並沒有具體一致的共識。其中有些學者是從原則性的層面來討論孝道觀念變遷與因應之道的問題，如楊國樞（1985）曾提出為因應現代化社會的發展趨向，在傳統社會中的舊孝道觀念所具有的五項特徵，即強調延展性、角色性、他律性、獨益性及劃一性的特徵，應該配合社會發展需求，因應調整成強調局限性、感情性、自律性、互益性及多樣性等屬於新孝道觀念的特徵。李鑒（1983）也認為應該配合時代的需要，對孝賦予現代的意義，而主張現代孝道的四項原則：理性的孝、民主的孝、科學的孝及愛敬的孝。<sup>1</sup> 明顯的，前面三項原則是因應變遷社會下的主張，而後一項原則主張是孝道基本精神的沿續。不過李鑒先生同時也指出這四項符合現代意義的孝道原則，基本上就是孔子所提倡的孝道理念，它們應當是千古不變的常數，而會隨時代改變的，僅是屬於實踐方式的「孝行」罷了。對於這四項原則特徵是否千古不變，可能還有待爭論；但對於孝行的實踐方式應隨社會變遷而調整的看法，卻是學者們一致認同的。因此有不少學者從現代孝行的具體作法提出建言。如黃堅厚（1977,1982）羅列了不同年齡階段（分兒童、求學及成年時期）團體所應奉行的孝行項目。陳立夫（1972）及陳大齊（1973）各分別提出六項行孝要點。其他還有黃得時（1982）

1 李鑒先生所謂科學的孝，就是能夠明辨是非的孝。

的九項、葉楚生（1973）的三項及葉霞翟（1970）的兩項等等，提出建言的學者為數不少。

### （一）成年子女孝道觀念與行為的變遷情形的實徵研究

然而上述不論是從原則或具體行為的角度，針對社會變遷所提出的新孝道或現代孝道的觀念與行為的文章，基本上有兩項特點值得討論。第一，這些提出的新孝道或現代孝道的觀念與行為，除了黃堅厚先生所提出的以外，其餘的都是研究者個人主觀認定的觀點，而非實徵研究的結果。雖然這些都是研究者對於孝道領域多年研究的心得，但大多是屬於研究者對於民眾孝道觀念的期許及主張，而不是一般民眾實際持有的孝道觀念。因此，實在有必要對一般民眾所持有的孝道觀念進行實徵研究，以瞭解現今民眾所持有的孝道觀念究竟為何。第二，即使如黃堅厚先生的觀點，是經由實徵研究結果提出的，但其研究對象僅局限於學生樣本，並未涵蓋成人樣本。就一般理解，學生樣本與成人樣本所面臨的孝道問題是大不相同的，兩者各自持有的孝道觀念當然也有所差異。基本上，成人子女比學生子女所遭遇的孝道問題要複雜許多，涉及的層面也較廣泛、直接，因此就孝道問題討論範圍的完整性與急切性而言，從事以成人子女為對象的實徵研究是更有意義的。底下將對近年來以台灣地區成人樣本為對象，探討孝道觀念變遷情形的實徵研究結果進行回顧與討論。

孫得雄（1984）針對台灣地區生育態度與行為的變遷研究，其中得到與孝道觀念變遷有關的研究結果如下：在1970、1973及1980年三次的調查中，受訪婦女認為現代的青年人較以前的青年人不願意盡孝道、婚後不願意與父母同住、不願意婚前把部分薪金給父母使用及聽從父母意見的比率大幅升高。該研究同時發現不同教育程度與城鄉樣本間的差距也隨著時間的更替而大為縮小，這結果反映出同樣的想法在一般成年婦女間變得更為普遍化。雖然這僅是受訪婦女在心理感

受上的主觀反應，但或多或少反映出一般民眾在孝道觀念的實際變遷情形。

陳淑瓊(1986)以全體高雄成年子女為抽樣對象的調查結果顯示：在590位民眾的態度中發現子女孝敬、奉養父母的意願很高，尤其在幫助父母，不疏遠父母、照顧父母以及尊崇體恤老年人，不以老弱落伍的刻板印象視之的態度，表現相當高的一致性。另外，孝道觀念中服從取向的降低，即子女不再屈從於父母的權威，而朝向理性、彈性取向的孝道觀念發展，是最明顯的變遷結果，尤其在教育程度愈高的子女身上愈是如此。還有在理想家庭形式與父母居住安排方式上，傳統的折衷式家庭和輪伙頭的奉養方式仍是民眾最喜好的。

黃光國(1988)以第一期「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資料，將其中屬於「道德觀念」量表的研究資料進行分析的結果顯示：在十二項通常會被人們認為是「錯誤」行為的項目中(如報所得稅時以多報少、不遵守約定或諾言等等)，兩項與孝道有關的行為「將父母送入養老院而不親自奉養」、「不祭祀祖先」，分別位居十二項人們通常認為是錯誤行為的最高及次高的排序。這結果反映「親自奉養父母」和「祭祀祖先」仍然普遍受到台灣民眾的重視。

李宓昀(1989)以37位成人採個案訪談的方式，針對孝道觀念在台灣社會的變遷情形，得到下列結果：孝道的權威意識減弱，子女不再對父母百依百順，而孝行的表現方式也變得較有彈性，不再僵固與型式化。同時由於經濟發展造成功利、現實的思想濃厚，現代人的孝道觀念傾向於重物質、輕精神。另外，由於居住及工作型態的改變，使得「隨侍」與「奉養」父母的要求逐漸難為，因此受訪者大多表示不該再以此兩項標準來衡量子女的孝行表現。

何友暉等人(Ho, Hong & Chiu 1990)則以111名包括各式社經背景的台灣及香港成人進行的調查研究得到：不論是台灣或香港地區的受試樣本，在該研究編製的孝道量表上，總平均單題的分數是在中



點以下，因此認為整體孝道價值在現代華人社會中，受重視的情形已經減為中等程度。不過對於這一結果，作者卻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是針對該研究的孝道量表題目內容的討論。若依其文章說明是修訂自何氏 1974 年自編的孝道量表 (Ho & Lee 1974)，則檢視該量表題目所包含的孝道觀念，大多是取自儒家經典條文，並且是強調單向性與權威性的內容，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父母在時，子女的身體和錢財都應屬於父母」。因此得到上述的結果，應是可以理解的。其次是用作推論所根據的統計數據，是以整體孝道量表的平均分數除以題數後，得到總平均單題的分數(在 7 點量表上，總平均單題的分數是 3.9)所下的結論。對於這樣的統計推論，是否能逕下民眾對孝道價值的重視已減為中等程度的結論，作者持保留態度。關於此點，後面還有其他的討論。

莊耀嘉、楊國樞 (1991) 也以量表調查的方式，得到傳統孝道內涵中如祭念雙親、使親無憂、顯揚親名、事親以禮及諫親以禮等項目，在現今台灣社會的成人中，認為應該重視同時也實際遵行的程度相當高，是屬於孝道基本核心的部分。而在順從雙親、繼承志業、為親留後、子為親隱及陪侍在側等項目上，則已經不是那麼受到重視及遵行，因而顯示出在這些孝道項目上，已逐漸降低其重要性的變遷趨向 (上述是作者從該文呈現的成人資料表格中重新整理的結果)。

作者從個體的孝道認知結構類型與發展的研究 (葉光輝 1992) 中發現：在整體社會結構急遽變遷的台灣社會中，有部分傳統的孝道觀念已趨於式微，且由新的孝道觀念所取代。這些已趨式微的孝道觀念包括泛孝主義觀及父系優勢觀，它們已由局限孝道觀 (孝道運作的涵蓋範圍局限在親子之間) 及平權正義孝道觀 (不以性別或父權而以就事論事的公平原則來處理孝道問題) 所取代。另外有部分傳統孝道觀念雖仍為多數的現代人遵守，但已顯示出變遷的趨向。這些逐漸變遷的孝道觀念，包括從親權子責孝道觀 (親代擁有權利，子代負有責任)、

固定實踐模式孝道觀（實踐孝道有其最佳或標準的模式）及角色取向孝道觀（肯定親子角色名份對個人孝行表現具絕對影響力），逐漸向親子權責並存孝道觀、權變實踐模式孝道觀及情感取向孝道觀轉變。這些現象顯示：由於台灣社會的經濟型態、社會組織、家庭結構及政治體制等方面都已發生重大變遷，導致了個人的生活方式與價值取向的改變，爲了有效適應新的個人生活方式及追求新的理想目標，因此，雖然仍舊肯定孝道本身的價值，但在行動方式與認知觀點上，不得不有所調整及轉變，以配合現代社會的需要（楊國樞 1983）。

章英華（1994）以 1991 年第二期第二次「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中的「家庭觀念」問卷的資料，探討台灣社會的家戶組成與奉養態度的變遷情形。其中對父母的奉養態度是以對父母的居住安排及生活費安排的態度來討論，結果發現：從子女的角度來分析，願意與父母同住的百分比明顯的低於願意提供生活費的百分比（63 比 90），但仍然佔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高比例。而子女這兩項意願的百分比，同時也明顯的高於從父母的立場表示願意與已婚子女同住及接受子女供養的百分比（46 與 58）。這結果似乎意涵著，整體而言，子女仍然相當程度的重視對父母的奉養規範。但當自己身爲父母時，可能是體諒子女的辛勞或寧願自立自主，因而較不願意與子女同住或接受供養。

事實上根據作者由兩處（羅紀瓊 1987；行政院主計處調查報告 1986-1992）對台灣地區六十五歲以上老人居住安排現況資料的整理（葉光輝 1995b），發現雖然年老父母與子女共同居住的比率仍佔絕大多數（至少六成三以上）；但從逐年變化的趨向來看，年老父母獨居（包括個人獨居或僅與配偶居住）的比例是逐漸增加的，而與子女共同居住的比率是逐漸降低的（見表 1）。除此之外，還有一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逐年遞減的年老父母與子女同住的比率中，其中，年老父母與已婚子女同住的比率是逐年降低的，但與未婚子女同住的比率卻是逐年

增加的。推論產生這結果的可能原因，或由於已婚子女有第三代小孩，或由於夫妻同時上班工作，因此在已婚子女的家庭中常需要第一代老人充當褓姆、管家或幫忙家事。正是這種對年老父母剩餘價值的利用，與傳統兒孫繞膝、享受天倫之樂的理想相去太遠，再加上現今年老父母在家中的地位與權威大不如前，因而促使年老父母自己希望獨居的意願與比例增加，而並非全然是已婚子女不願與父母同住的因素造成。

綜合上述對成人孝道觀念變遷情形的實徵研究的回顧，底下將對

表 1 臺灣地區近十六年來老人（六十五歲以上）的居住安排（%）

年	老人(夫婦)獨住	與已婚子女同住	與未婚子女同住	其他居住安排	總計
1976	8.79	66.86	16.82	7.53	100
1977	9.34	65.64	19.31	5.71	100
1978	8.90	64.52	20.60	5.98	100
1979	11.78	60.06	22.59	5.60	100
1980	12.79	60.61	20.99	5.61	100
1981	13.24	60.16	21.24	5.36	100
1982	12.80	59.59	22.31	5.31	100
1983	14.16	58.93	21.55	5.36	100
1984	15.40	56.81	22.35	5.44	100
1985	17.28	55.27	23.03	4.41	100

(上表摘自羅紀瓊, 1987)

年	獨居	僅與配偶同住	與子女同住	與親朋同住	現住安養機構	其他	總計
1986	11.58	14.01	70.24	3.03	0.78	0.36	100
1987	11.49	13.42	70.79	3.02	0.64	0.46	100
1988	13.73	14.98	67.88	2.44	0.36	0.60	100
1989	12.90	18.17	65.65	2.18	0.87	0.23	100
1991	14.52	18.70	62.93	2.42	1.19	0.24	100

(上表整理自行政院主計處調查報告, 1986, 1987, 1988, 1989, 1991)

這些研究彼此間的幾項特點提出討論：(1)不同研究對孝道觀念所探討的層次並不相同。有些研究是把孝道當作是一整體概括的概念進行探討，有些卻是從孝道觀念所包含的特徵屬性進行探討，另有些則是從孝道觀念所衍生的具體行為內容進行討論。作者(葉光輝 1995a)曾經由孝道觀念在中國社會的歷史演變情形，指出孝道實際上是一具有多元意義的概念。它不僅包含了多項內容，而且從最極權的意義到最平權的意義，從最尊貴的主張到最卑微的主張，在歷代中國社會中都有人述及或提倡。因此，探討孝道觀念的變遷情形時，實在應該針對它不同的特徵屬性或具體行為內容逐一討論，而不適宜以一整體概括的概念來進行討論。除此之外，有些研究是從個體的孝道態度進行探討，有些研究則是從個體的實際孝行表現從事討論。孝道態度與實際孝行是兩種不同層次的孝道表現，前者主要是包含對孝的認知(孝知)、對孝的意願(孝意)及對孝的感情(孝感)；而後者是對孝真正的實際表現，它可能因個人的經驗、能力及外在現實條件因素的影響，而與前者之間存有差距(楊國樞 1985; 葉光輝 1992)。因此進行孝道觀念變遷問題的探討時，這兩種不同層次的孝道表現宜分開討論。(2)不同研究對孝道觀念變遷情形的結論並不一致。有些研究結果顯示孝道觀念已逐漸式微或不受重視，有些研究結果則得到子女孝敬、奉養父母的意願仍然相當高，因此肯定孝道觀念在現代社會的重要性與價值。這些相互不一致的結果，實際上是由於前項特點因素造成的。一般而言，把孝道當作是一整體概括的概念或採用實際孝行來探討的研究結果，大多顯示孝道觀念漸趨式微。而採用孝道特徵屬性或具體行為內容並且是對其態度進行探討的研究結果，則發現有些特徵屬性(如權威意識、泛孝主義、父系優勢、僵化實踐模式、角色取向等)及具體行為內容(如百依百順、傳宗接代、繼承志業、隨侍在側等)確實漸趨式微或減弱其強度；但還有些特徵屬性(如平權意識、權變實踐模式、情感取向等)及具體行為內容(如祭念雙親、孝敬奉養父母、使親無

憂、事親以禮等)，仍然維持相當的重視程度或逐漸增加其強度。因此當採取以特徵屬性或具體行為內容，作為探討孝道觀念變遷情形的研究素材時，不僅所欲討論或說明的內涵會較具體清楚，而且研究的結果也會有較高的一致性。(3)這些研究都未提供一具體明確的比較基準，作為探討孝道觀念變遷情形的參考基礎。由於這些研究大多是採用橫斷式的 (cross sectional) 而非貫時性的 (longitudinal) 研究設計，因此對於變遷情形所作的討論，大都是根據組內 (within subject) 差異的比較結果，如以平均中點或個體內的不同特徵屬性與具體行為內容相互間的差異作比較。採用這種比較方式逕行推論的最大問題，在於無法確知這些變遷結果是何時發生 (民國初年時期或近十年來才逐漸發生) 的現象，以及這些變遷速率的快慢情形。正因為開始變遷的時間及變遷的速率無法確知，因此對於到底是那些因素造成這些特徵屬性及具體行為內容產生變遷的討論，就大打折扣了。所以當現實條件及時間因素都允許時，貫時性的研究設計是研究變遷問題的最佳途徑。

## (二) 影響民衆持有孝道觀念的重要因素及其作用力的消長

當欲探討一般民衆所持有之孝道觀念的變遷情形，基本上與下述兩個問題的澄清有著緊密關聯。第一個問題是「一般民衆到底受那些因素的影響而持有孝道觀念」；第二個問題是「這些影響因素隨著時間的演進後其作用強度的消長情形如何」。作者認為當認清了上述兩個問題的實質結果後，一般民衆所持有的孝道觀念的變遷趨向，自然就浮顯出來。不過對於這兩個問題的處理，在過程上是有次序性的。亦即對於第二個問題的回答，必須建立在已經澄清了第一個問題後才能著手進行，也才有意義。底下先行討論第一個問題。傳統中國社會雖然很重視孝道，歷代君王也不斷的透過政令規定、標舉孝行楷模及列為舉才重點等社會教化宣導的方式，將孝道德目深植民間。而且民間百

姓也多透過家規、家訓等家庭教化的方式將具體的孝道觀念傳遞給個人。然而不論是經由任何種類的教化途徑，仍然無法確保每一受教化的個體都會接受或內化這些孝道觀念，來作為個人與父母互動時的行為準則。不過，一旦個人願意接受或內化這些孝道觀念，則它可能是源自於一個或以上的影響因素的作用結果。這些可能的影響因素最主要是包含下列四項：

(1)威權因素。它是古代中國社會裡最強勢的一個作用因素，不僅影響力大，而且運作的管道也相當廣泛。由於親子關係基本上是一個權力與資源分配並不均等的互動關係，因此彼此間難免會發生磨擦與衝突。在此情況下，社會及家庭組織為了使運作及其成員的互動順暢和諧，很自然的就建立起法律、輿論、家規或教育等威權途徑，並配合運用親子間權力與資源不平等的既有基礎，而灌輸或強迫子女接受或內化這種應該敬愛與善待父母的規範。這是一種社會控制的手段，也是在威權社會下隨處可見的重要影響因素。

(2)情感因素。國內人文學者長久以來一直信奉著「父子之道，天性也」的主張。他們認為父慈子孝是人的自然本能，是不學而知、不慮而能的良知良能，是子女與父母之間很自然的情感流露。不過社會科學者卻認為慈心或孝心是經由後天學習來的。他們認為人或許有善心，但必定相當脆弱，而且它並不同於「慈心」或「孝心」。換言之，願意關心或善待他人之心或許是天生的，但關心或善待的對象並不必然及於父母或子女身上。而作者更進一步的認為，願意接受或內化孝道觀念雖然受趨利避惡的學習法則的制約，但親子雙方的情感聯結則在學習歷程中扮演著重要的影響角色。良好的親子情感關係，正是促使子女願意接受或內化無條件為父母付出與犧牲的關鍵要素。這也正是所謂的報答親恩與反哺回饋的行為賴以存在的必要條件。當然此處所講的情感聯結或情感關係雖會隨著子女的成長或外在的情境條件，產生多次的蛻變，但長久互動所沈澱下來的情感聯結關係卻是穩定並

具影響性的。

(3)交換因素。個體的任何行動多少都帶有目的性的。親子間的互動當然也無可避免。「養兒防老」就是在未具體規畫任何老人福利制度的傳統社會中，父母賴以保障自己年老生活無虞的期待。同樣的，子女願意尊敬或善待父母也可能是期待由擁有優勢權力與資源的父母處，獲得任何好處的考量下的表現。這是一種工具性目的的交換行為，而且是人類交往互動中一項很根本的行為。不過在中國傳統社會的孝道行動中，交換因素的作用場除了直接發生在互動親子的身上外，還發生在跨代間的親子身上。換言之，子女尊敬與善待父母，除了冀望從父母處獲得好處外，同時它也提供了示範作用，而冀望自己的子女也能一樣的尊敬與善待自己。因此發生在孝道上的交換作用，是同時具有交互（reciprocity）與遞移（transmission）兩種特性的。

(4)宗教因素。宗教源起於人類感覺到生命的卑微有限、存在的缺憾痛苦，而對宇宙及其威權的永恆無盡興起一種茫昧敬畏的心情；同時爲了撫慰這種卑微之情，勗勉其在世上奮發之志，便以一種超離現世的絕對觀念，與一種不可以理智解釋的神祕經驗來引導人心進入永恆寧靜的境界（曾昭旭 1977）。所以「超絕」與「神祕」是宗教的特質，具有勗慰人情志的功用（梁漱溟 1926）。孝最原始的意義是祖先崇拜，原就具有宗教特性。儒家提倡孝道，並未將此特性去除，除了生事愛敬之外，死後的葬祭追遠，仍舊相當重視。因此有些個體願意關心與善待父母，尤其是死後的父母，多少是希望透過宗教中的超絕與神祕特質的作用，達到勗慰情志的功能。此外，在原始的宗教觀念中，原本就兼具有祈福避禍屬功利思想的功能。所以個體願意接受或內化傳統孝道觀念中對死後父母的追念祭祀，多少是受宗教中的勗慰情志與祈福避禍功能的影響。

雖然影響個體願意接受或內化孝道觀念的因素應有很多，但上述討論的四項因素應該是較爲重要，也是對大多數人而言，較爲共同的

作用因素。由於本研究探討的主題是從鉅觀而非從微觀的層次來討論孝道觀念的變遷情形，因此對於第二個問題——即作用因素的消長情形的討論，將僅針對這四個因素在社會整體面作用強度的消長情形進行討論。由於在時間向度的不同階段裡，這四個因素各有不同的作用強度。雖然孝道觀念在中國社會綿延發展了二千多年的歷史，但在此文中並無必要也無能力針對這綿延長久的不同時間點——去討論。因此底下僅將針對這一、二十年來，在台灣社會的變遷發展中，上述四項作用因素影響力的消長情形作一討論。

近一、二十年來由於台灣社會整體的發展是朝向民主化與多元化，因此可以清楚的感受到，透過威權因素作用迫使個體接受或內化孝道觀念的強度明顯的減弱。威權因素作用強度的減弱，不僅發生在孝道觀念的教化歷程上，在其他諸如政治、經濟及社會文化發展等層面，也都可以看到相同的結果。關於威權因素在孝道觀念教化歷程作用強度的衰退，吾人可從社會通過對保護子女免受虐待與傷害的立法，個人自由主義、平權意識及女性主義觀念不斷的高漲來加以瞭解。這或許可用來解釋與威權因素的作用相關的一些孝道特徵屬性，如權威意識、父系優勢、僵化實踐模式及角色取向等；以及一些相關的具體孝道行為，如百依百順、傳宗接代及繼承志業等，為何都漸趨式微或減弱強度。

其次是情感因素作用強度的消長情形。有學者（Berger, Berger & Kellner 1973）指出，雖然傳統家庭組織提供給個人需求滿足的最主要功能是在經濟方面，但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與家庭結構的變化，家庭組織的經濟功能已逐漸衰退，代之而起的是滿足情感需求的功能。這些學者認為對傳統的家庭組織而言，滿足其成員情感方面的需求，一直不是其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但對於現代的家庭來說，情感因素所扮演的地位卻愈來愈重要。因此，當原依賴威權與角色因素所建立起來的親子聯結關係，在威權與角色的作用力相繼衰減後，它必須立即



填補上其他的作用力，來繼續支撐這一聯結關係免於瓦解斷裂的局面。對於向來重視家族主義觀念的中國社會下，情感因素似是被用以替補威權與角色因素的替代作用力之一。這正是陶希聖（1983）在討論孝道觀念的變遷情形時指出的，現代台灣社會是一個「先言慈再言孝」的時代；在此時代下父母對子女的教化方式，強調的是勉勵代替約束，責任代替威權等屬於「愛的教育」的方式。因此近一、二十年來台灣社會變遷發展中，情感因素的作用力是逐漸增加的。

第三是交換因素作用強度的消長情形。誠如前面討論的，作用在傳統中國人身上的孝道觀念的交換因素，是同時兼具有直接交互與世代遞移兩種特性的。然而在孝道觀念中的直接交互特性，是奠基在父母擁有優勢權力與資源條件下的結果。一旦父母所擁有的優勢權力與資源條件的情況不存在時，欲發生工具性交換作用的機率就大幅減少。由於近一、二十年來台灣社會的變遷中，父母原有的威權力量已大幅減弱；同時由於現代化與工業化發展的作用，使得父母在家中所掌握的資源量也沒有以前多，再加以一些現實物質條件的限制，如資源取得的管道大多是從家庭以外，還有子女因求學或工作而與父母分開等等，都大幅減少了交換因素作用的頻率。至於在世代遞移特性的交換作用上，也由於擴大家庭或三代同堂家庭的數目銳減，致使子女觀察學習的機會降低，當然同樣的也降低了交換因素作用的頻率。

最後是宗教因素作強度的消長情形。與孝道觀念教化較有密切關聯的宗教信仰主要是民間宗教，它也是台灣民衆的宗教信仰中，最主要也是人數最多的信仰類型。依學者（瞿海源、姚麗香 1986）調查發現在 1970 年以後，民間宗教在寺廟的數目方面出現快速成長的趨向；而且在宗教特徵上也愈趨世俗化與普遍化。另外，有學者（吳寧遠 1995）使用了「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中四筆與宗教行為與態度相關的貫時性資料（民國 73 年、78 年、79 年及 81 年的資料）進行分析，發現台灣的民間宗教並不因社會的現代化而減少信徒人數，

相反的，反而使其信徒更朝向現代化—即理性化、多元化與個人化的方向發展。同時由於民間宗教的適應力相當強，因此多數學者認為在現代化的台灣社會中，民間宗教仍有相當的發展空間。從上述的研究討論中顯示，與孝道觀念內化歷程相關的宗教因素的作用力，在近一、二十年變遷的台灣社會中仍是持續存在的。

經由上述對兩個與孝觀念變遷密切關聯的問題的討論，我們可以想見的是，孝道觀念內化歷程中原來受威權與交換因素作用的特徵屬性與具體行為，在現代台灣民眾心目中的重要性，將趨於減弱；而原來受情感與宗教因素作用的特徵屬性與具體行為，將繼續或逐漸增強其強度。底下我們將使用「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的相關資料，來探討台灣民眾孝道觀念的變遷情形。

### 三、研究方法

#### (一)研究資料的來源與處理

本研究係以第二期第五次「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收集的部分資料進行分析討論的。該次調查研究的時間是在 1994 年的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底之間，係採用三階段分層等機率抽樣的原則進行抽樣。第一階段是以台北、高雄兩院轄市，及台灣省所轄的縣市內的鄉鎮市區為單位進行抽樣，第二階段是以所抽出的鄉鎮市區中再抽出村里單位，第三階段是以抽出的村里單位中再抽出受訪個案。其中各階段各單位的抽樣，採抽取率與單位大小成比例 (pps) 的方式進行，使得每位民眾被抽取的機率保持相等。此次調查研究的抽樣總數為 9272 人，而期望完成的人數為 4000 人。由於此次調查研究共包含兩套問卷 (文化價值組與宗教組)，因此每套問卷期望完成的人數各為 2000 人。至於實際完成的人數，在問卷 I (文化價值組) 為 1853 人，而問卷 II (宗教組) 為 1862 人，合計 3715 人。本研究使用的資料是屬於問卷 I

(文化價值組)共 1853 人的資料。這些資料都是由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工作室負責抽樣、訪員訓練、調查督導及資料收集等整個調查執行的工作。資料收集完成後，並由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計畫的研究助理們，負責資料整理及檢誤的工作。因此整個資料的代表性、可靠性及嚴謹性應該是足以信賴的。

##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工具是以該次調查研究問卷 I 的「家庭價值」分量表中，與測量孝道觀念有關的九題題目為主要分析素材。這九題孝道题目的來源是取自楊國樞、葉光輝與黃曬莉等人 (1989) 所編製的孝行量表修改而成。楊氏等人的孝行量表原係由禮記、四書、孝經及著名家訓等各類典籍中，節錄有關孝道具體內涵的描述，經內容分析與參考相關文獻的討論後，歸納出共包含十五項孝道的主要內涵，然後再依據這十五項孝道內涵所撰寫的 52 題題目，最後經由因素分析與概念性分析得出「尊親懇親」、「抑己順親」、「奉養祭念」及「護親榮親」四類主要成分的標準化量表。本研究的九題孝道題目是從這四類成分中，分別取出在該成分下較具代表性的 3 題 (原共有十二題)，經修飾文字並經是次調查研究的預試刪題後組成的。其中，第一、二題屬於原「尊親懇親」的成分，第三、四、八題屬於原「抑己順親」的成分，第五、六題屬於原「奉養祭念」的成分，第七、九題屬於原「護親榮親」的成分的题目。在本研究中我們稱這九題題目為「孝道觀念量表」。作答方式是請受試者就這九題孝道行為對個人自身生活的重要性作評估，同時從「0」到「4」的答項中，選出一項代表個人真正感受的評估項目。其中「0」表示「不重要」，「4」表示「絕對重要」，分屬答項的兩個極端，其他「1」到「3」則分別代表依數字增加而遞增的相對重要性。另外，還有「無意見」、「不瞭解題意」、「不願意回答」等答項提供受試者其他的作答選擇。除此之外，本研究還利用了調查研究

問卷 I 中的個人基本背景資料，作為本研究進行分析的探討變項。

### (三)研究樣本

本研究進行分析的資料是以台灣地區 20 歲以上至 64 歲以下的民眾為抽樣對象所得到的結果。全部有效樣本數為 1853 人，其中男性佔 47%；女性佔 53%。依年齡區分，20~29 歲佔 21.9%、30~39 歲佔 36.4%、40~49 歲佔 24.6%、50~59 歲佔 11.7%、60~64 歲佔 5.5%。籍貫屬本省閩南佔 68.5%、本省客家佔 15.2%、大陸各省市佔 15.1%、原住民佔 0.9%、其他佔 0.3%。依婚姻狀況區分，則未婚佔 18.2%、已婚佔 76.4%、同居佔 0.3%、離婚或分居佔 2.8%、配偶去世佔 2.2%。在教育程度方面，小學或以下程度者佔 29.7%、國初中程度佔 14.3%、高中程度者佔 31.6%、大專程度者佔 22.6%、研究所程度以上者佔 1.6%。同時各不同行業及不同專技程度（其分類可參考瞿海源（1994）主編的計畫執行報告）的樣本也都包括在內。從以上對樣本組成特性的說明，本研究樣本應可作為台灣地區成人民眾的代表性樣本。

##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 (一)孝道觀念的變遷情形

誠如前面討論提及的，探討變遷的問題時，最適宜的研究設計是採用貫時性的研究方法。雖然本研究的題目是取自楊國樞等人（楊國樞、葉光輝、黃曬莉 1989）編製的孝行量表，但題目的文字已作了局部修飾，同時作答的選項也從原先的四點量尺改變成五點量尺。因此，若要以楊氏等人的調查結果作為比較的參考基準，則有題目內容調整與分數轉換的雙重困擾。是故，本次對孝道觀念變遷情形的探討，仍是以橫斷式的組內與組間的相互比較為主。不過要特別提出說明的是，雖然橫斷式資料的比較無法用以討論諸項孝道觀念個別的「變遷程度

與速率」的相關問題，但它仍然可以用來作為不同孝道觀念間「受重視程度」的比較基礎。而當這種受重視程度的比較顯現出可辨識的差異，同時這些差異的成因又可以找到與時間演進情形具有密切關聯的因素來加以說明時，則這些受重視程度的差異比較，或可作為討論觀念變遷的參考指標。

當檢視全體樣本在孝道觀念量表各題答項的分佈情形（見表 2），可以發現以「父母去世，不管住得多遠，都親自奔喪」及「對父母的養育之恩心存感激」這兩題評估為「絕對重要」的比例最高，都超過 70% 以上，而且在其他答項的反應也都以偏「絕對重要」端的比例較高。顯見在孝道觀念中的「親自奔喪」及「感念親恩」的想法仍是現今台灣民眾最重視的孝道內涵，它們應該是一般民眾所持有的孝道觀念中的核心成分，堅定不移。基本上，民眾對「親自奔喪」與「感念親恩」兩項孝道觀念的內化歷程，主要是受前述討論的四項作用力中的宗教與情感兩項因素影響的。正如前述討論的，由於宗教與情感兩項作用因素，或持續或逐漸增強其效力，因此這兩項孝道觀念現今仍極高度的受到重視。其次，在「無論父母對你如何不好，仍然善待他們」及「奉養父母使他們生活更為舒適」這兩題上，評估為「絕對重要」的比例也在 50% 上下，同時在其他答項的反應也都以偏「絕對重要」端的比例較高。這結果反應出現今台灣民眾孝道觀念中的「尊敬父母」及「奉養父母」觀念依舊濃厚，仍然持續受到重視，因此應該也是屬於孝道觀念中相當核心的成分。同樣的，作者認為「尊敬父母」與「奉養父母」兩項孝道觀念的內化歷程，多少也是受宗教與情感兩項作用因素的影響，致使它們仍維持相當高的受重視程度。

至於在「為了顧及父母的面子，為他們說些好話」及「做些讓家族感到光彩的事」這兩題屬於「護親榮親」的孝道觀念上，台灣民眾在五個答項的分佈比例相當平均，顯示這樣的觀念仍然受到中等程度的重視。還有在「結婚後和父母住在一起」這題屬於「陪侍在側」的

表 2 孝道觀念量表各題重要性評估的分佈結果

	不重要				絕對重要				無意見		楊國樞等人研究(1989)的資料結果**			
											對父親的孝道態度		對母親的孝道態度	
	0	1	2	3	4	4	3	2	1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 對父母的養育之恩心存感激	0.4	7.1	6.6	13.4	72.3	0.2	3.50	(0.93)	2.76	(0.52)	2.89	(0.34)		
2 無論父母對你如何不好, 仍然善待他們	1.2	10.6	9.3	23.6	53.2	2.1	3.19	(1.07)	2.32	(0.78)	2.47	(0.65)		
3 放棄個人的志向, 達成父母的心願	25.5	20.8	18.0	16.4	9.4	9.9	1.59	(1.34)	0.53	(0.73)	0.58	(0.74)		
4 結婚後和父母住在一起	18.7	19.4	16.0	17.7	16.9	11.3	1.94	(1.42)	1.31	(0.92)	1.45	(1.03)		
5 奉養父母使他們生活更為舒適	0.8	12.1	12.6	23.6	49.5	1.4	3.10	(1.09)	2.63	(0.59)	2.73	(0.50)		
6 父母去世, 不管住得多遠, 都親自奔喪	0.5	7.2	5.3	11.8	74.4	0.8	3.53	(0.93)	2.81	(0.47)	2.79	(0.54)		
7 爲了顧及父母的面子, 爲他們說些好話	12.0	20.3	18.2	24.4	18.8	6.3	2.19	(1.33)	1.68	(0.88)	1.60	(0.85)		
8 爲了傳宗接代, 至少生一個兒子	33.0	15.9	11.8	14.1	17.9	7.3	1.66	(1.55)	1.20	(1.06)	1.24	(1.03)		
9 做些讓家族感到光彩的事	11.9	20.8	18.0	24.3	18.4	5.6	2.20	(1.33)	2.30	(0.88)	2.26	(0.82)		

\*: 此表所計算的平均數與標準差是在排除回答「無意見」、「不瞭解題意」及「不願意回答」等樣本後的結果。

\*\*：此項資料是自楊氏等人研究(1989)的原始資料中整理出來，該研究資料是在1987年間蒐集，它特將對父親與對母親的孝道態度(認知部分)分開測量，其中陳述孝道觀念的題目的文字與本研究對應的題目略有不同，但整體意思大致相同。另外該量表答項祇有0至3等四點選項。

孝道觀念上，台灣民眾在五個答項的分佈比例已稍有往「不重要」端偏的趨向，但並不是相當明顯。這結果和以往在同住意願的調查結果相類似，即雖然願意同住的比例佔多數，但贊同分住的比例卻有逐漸增加的趨勢（見表 1）。其中性別應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影響因素，底下將對它有所討論。針對上述討論的「護親」、「榮親」及「陪侍在側」等三項孝道觀念的內化歷程，作者認為主要是受交換作用因素的影響，然而由於現代父母所掌握的權力與資源明顯的減弱，再加上家庭結構的改變，因此交換作用因素的影響力正逐漸降低，而致使這三項孝道觀念受重視程度正逐漸往不受重視端偏移。最後在「爲了傳宗接代，至少生一個兒子」此代表「父系傳承」成分，及在「放棄個人的志向，達成父母的心願」此代表「抑己順親」成分的孝道觀念上，分別有佔多數的 33% 及 26% 的人認為「不重要」，明顯的往「不重要」端偏移。這結果顯示孝道觀念中父子軸或父權優勢的特性，以及對父母百依百順或無條件順從的孝道觀念已大幅減弱。尤其在女性主義者抗議男女間種種不平等的呼聲，以及民眾強調理性平權的意識，在台灣社會逐漸高漲之際，這樣的結果是可以理解的。而「傳宗接代」與「抑己順親」兩項孝道觀念的內化歷程，作者認為主要是受威權作用因素影響的，然而當與上述兩項孝道觀念相關的法律、輿論、家規及教育等威權途徑相當明顯的減弱其作用力時，這兩項孝道觀念受重視的程度，自然而然的就大幅降低。

前面提到由於涉及題目內容調整與分數轉換的雙重困擾，從較嚴謹的研究設計的角度來看，本研究的資料並不能視爲是楊國樞等人（1989）研究的貫時性資料，因而無法用以討論個別孝道觀念的「變遷程度與速率」的問題；但對於這兩次的橫斷式資料，由於包含了相類同的孝道觀念，因此仍然可以用來比較這些孝道觀念在間隔七年時間的兩次研究中「受重視程度」的差異情形。針對表 2 所呈現結果比較，可以發現即使楊氏等人是將對父親與對母親的孝道態度分開測量，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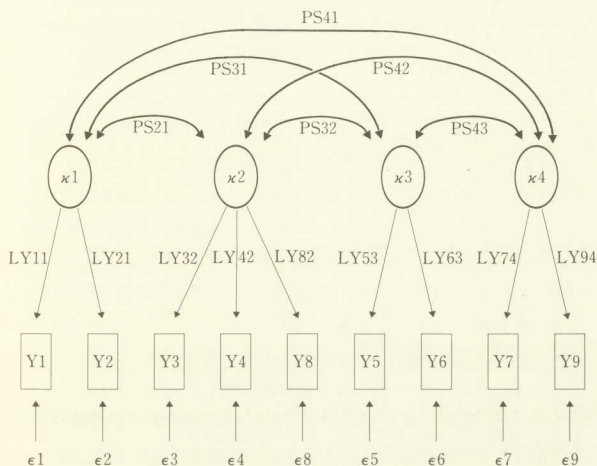
在各項孝道觀念上所顯示的受重視程度與相對排序，整體而言，與本研究的結果是相一致的。這意涵著本研究所討論的孝道觀念，在七年的時間演進與社會結構變遷下，其整體的變遷「趨向」是相同的，意即屬於核心的孝道觀念仍舊持續受到民眾相當的重視，而屬於變遷的孝道觀念則逐漸的減弱在民眾心目中的地位。

## (二)孝道觀念的因素結構

由於本研究的孝道觀念題目是取自楊國樞等人編製，由四個主要孝道因素所組成的標準化量表的代表性題目經修飾後組成。因此，本研究特別對這九題孝道題目的因素結構，建構成依圖一所示的四潛在因素結構模型進行檢證。在進行因素模型檢證時，對於在九題孝道觀念題目的反應上，祇要有選答「無意見」、「不瞭解題意」及「不願意回答」等答項的樣本資料，由於會干擾分析結果，一律採取列刪除(listwise deletion)的方式加以刪除，最後是以資料完整有效的1423名樣本進行分析。由於經篩選後的樣本數仍然相當大，足以進行模型複核效度(cross validation)的檢驗。因此，本研究首先隨機選取半數樣本使用驗證式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方法檢驗該模型的適合度，經採用適用於任何分配的概化最小平方法(AGLS)估計參數，結果發現卡方值為97.44，P值等於.001。這結果本應否定此模型，但由於卡方值的計算會受樣本數的增加而變大(Bentler & Bonett, 1980; Gerbing & Anderson, 1993)，可是當減少樣本數時，對於根據大數法則原則所建立的模型檢驗程序，雖然能降低卡方值，而產生接受模型的結果。<sup>2</sup> 不過這種以小樣本數所進行的模

2 經由隨機抽取樣本數為200的模型檢驗程序，求得卡方值27.32，P值是.20，明顯看到卡方值隨樣本數的減少而變小，並獲得接受模型的結果。另外，此一小時本檢驗的其他指標的數值分別如下，GFI: .98; AGFI: .95; NFI: .86; NNFI: .95; CFI: .97。





$Y_i$ : 代表孝道觀念量表的各題題目。

$\epsilon_i$ : 代表孝道觀念量表的各題題目無法由第一階的潛在因素解釋的誤差部分。

$\kappa_j$ : 代表孝道觀念量表四個第一階的潛在因素，分別為「尊親懇親」、「抑己順親」、「奉養祭念」及「護親榮親」四個因素。

$LY_{ij}$ : 代表第  $i$  題題目在第  $j$  個第一階的潛在因素的因素負荷量。

PS: 第一階的潛在因素兩兩彼此間的相關係數。

圖一 孝道觀念的四個潛在因素模型

型檢驗，不僅對不同模型間的比較不具區辨力，同時對於模型的確立也較不具代表性。因此，對於大樣本模型適合度的判斷，一般傾向採用適合度指標（GFI）或調整後的適合度指標（AGFI）來判斷，而不考慮卡方值的大小。從表 3 的統計值及參數估計值顯示，GFI 與 AGFI 皆達 .94 以上，代表此模型是相當可以接受的。不過同時也發現在此四因素模型中的第一個（ $\chi 1$ ）與第三個（ $\chi 3$ ）潛在因素，及第二個（ $\chi 2$ ）與第四個（ $\chi 4$ ）潛在因素間都達到 .85 以上的高相關。這似乎反映著這四因素模型還有更高階的潛在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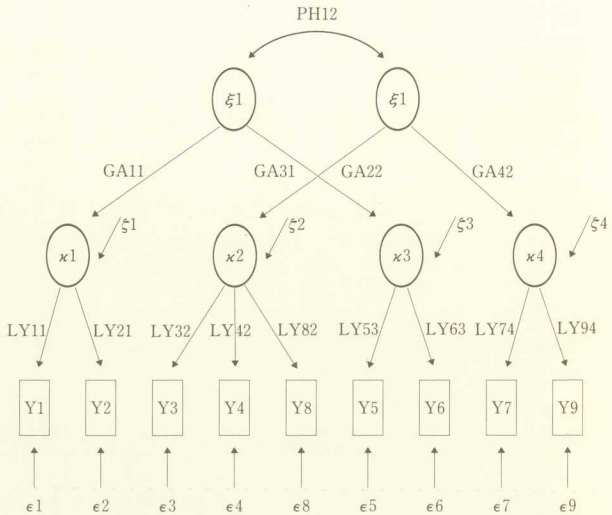
因此，本研究再將原圖一模型修改成圖二型式，亦即在原有的圖一模型之上增加兩個第二階的潛在因素（ $\xi 1$  與  $\xi 2$ ），各分別影響著第一階的第一個（ $\chi 1$ ）與第三個（ $\chi 3$ ）潛在因素，及第二個（ $\chi 2$ ）與第四個（ $\chi 4$ ）潛在因素，並重新加以檢證。經由將全體研究樣本依單雙數折半進行模型複核效度（cross validation）檢證，由表 4 的統計值及參數估計值顯示，新模型在兩組半數樣本的 GFI 與 AGFI 也都達到 .93 以上，證實該新模型假設是符合樣本資料的。亦即孝道觀念量表的九題題目，可分別由第一階的四個潛在因素所解釋，這四個潛在因素依楊氏等人的量表界定，可分別命名為「尊親懇親」、「抑己順親」、「奉養祭念」及「護親榮親」；同時，這四個第一階的潛在因素中，第一與第三個因素及第二與第四個因素，又可分別由另外兩個較高階的因素所解釋，這兩個較高階的因素依組成內容考量，本研究暫時命名為「尊懇奉祭雙親」及「抑順護榮雙親」因素。由於組成「尊懇奉祭雙親」因素的題目，主要是屬於仍然受到民眾相當重視而未有太大變遷的孝道觀念，因此，本研究另以「核心孝道觀念」因素稱呼；而組成「抑順護榮雙親」因素的題目，主要是屬於或逐漸減低或大幅降低其重要性的孝道觀念，因此，本研究另以「變遷孝道觀念」因素稱呼。

表3 孝道觀念的四因素模型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統計值及參數估計值

樣本數	卡方值	自由度	p	GFI	AGFI	NFI	NNFI	CFI
712	97.436	21	.001	.973	.942	.868	.813	.891
參數估計值及標準誤*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LY 11	1.000 a			.847				
LY 21	1.131 (.051)			.853				
LY 32	1.000 a			.715				
LY 42	1.092 (.065)			.745				
LY 53	1.000 a			.880				
LY 63	.755 (.051)			.761				
LY 74	1.000 a			.726				
LY 82	.893 (.059)			.559				
LY 94	1.014 (.048)			.730				
TE 11	.247 (.031)			.282				
TE 22	.301 (.042)			.271				
TE 33	.860 (.071)			.489				
TE 44	.860 (.084)			.445				
TE 55	.258 (.053)			.258				
TE 66	.369 (.035)			.225				
TE 77	.771 (.071)			.473				
TE 88	1.579 (.085)			.687				
TE 99	.776 (.064)			.468				
PS 11	.630 (.067)			1.000				
PS 21	.347 (.036)			.462				
PS 22	.899 (.080)			1.000				
PS 31	.638 (.049)			.853				
PS 32	.492 (.042)			.550				
PS 33	.888 (.069)			1.000				
PS 41	.441 (.043)			.600				
PS 42	.746 (.056)			.873				
PS 43	.644 (.044)			.737				
PS 44	.859 (.074)			1.000				

a 括弧內數字為標準誤，部份參數由模型設定，無標準誤。

\* 所有參數皆顯著大於0，估計方法為AGLS: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 method (based on arbitrary distribution theory, asymptotically distribution free theory)。



$Y_j$ ：代表孝道觀念量表的各題題目

$\epsilon_j$ ：代表孝道觀念量表的各題題目無法由第一階的潛在因素解釋的誤差部分

$\kappa_k$ ：代表孝道觀念量表四個第一階的潛在因素，分別為「尊親懇親」、「抑己順親」、「奉養祭念」及「護親榮親」四個因素。

$LY_{jk}$ ：代表第  $j$  題題目在第  $k$  個第一階的潛在因素的因素負荷量。

$\zeta_k$ ：代表第  $k$  個第一階的潛在因素無法由第二階的潛在因素解釋的誤差部分。

$GA_{jk}$ ：代表第  $j$  個第一階的潛在因素在第  $k$  個二階的潛在因素的因素負荷量。

$\xi_k$ ：代表孝道觀念量表兩個第二階的潛在因素，分別為「核心孝道觀念」及「變遷孝道觀念」兩個因素。

$PH_{12}$ ：兩個第二階的潛在因素彼此的相關係數。

圖二 孝道觀念雙階層的潛在因素模型

表 4 孝道觀念的四因素模型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統計值及參數估計值

組別	樣本數	卡方值	自由度	p	GFI	AGFI	NFI	NNFI	CFI
第一組	712	102.93	22	.001	.972	.942	.860	.811	.884
第二組	711	119.46	22	.001	.968	.934	.807	.727	.833

參數估計值及標準誤*				
	第一組		第二組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LY 11	1.000 a	.843	1.000 a	.821
LY 21	1.145(.051)	.854	1.225(.065)	.843
LY 32	1.000 a	.715	1.000 a	.661
LY 42	1.105(.065)	.751	1.008(.073)	.639
LY 53	1.000 a	.889	1.000 a	.873
LY 63	.728(.049)	.757	.648(.052)	.683
LY 74	1.000 a	.745	1.000 a	.708
LY 82	.867(.058)	.542	1.055(.078)	.591
LY 94	1.020(.050)	.751	1.104(.057)	.785
TE 11	.248(.031)	.289	.210(.031)	.325
TE 22	.297(.042)	.271	.267(.037)	.291
TE 33	.861(.071)	.490	.975(.077)	.563
TE 44	.848(.084)	.436	1.114(.077)	.590
TE 55	.241(.050)	.209	.220(.040)	.237
TE 66	.361(.034)	.428	.340(.032)	.533
TE 77	.720(.068)	.445	.845(.068)	.498
TE 88	1.618(.083)	.706	1.574(.092)	.651
TE 99	.721(.060)	.436	.646(.068)	.384
GA 11	.657(.043)	.843	.595(.045)	.900
GA 22	.788(.042)	.831	.760(.046)	.873
GA 31	.955(.036)	1.000	.792(.037)	.942
GA 42	.948(.037)	1.000	.921(.039)	1.000
PS 11	.176(.033)	.291	.080(.027)	.189
PS 22	.278(.053)	.309	.115(.058)	.237
PS 33	.000(.033)	.000	.070(.043)	.112
PS 44	.000(.024)	.000	.192(.058)	.000
PH 11	1.000 a	1.000	1.000 a	1.000
PH 21	.699(.030)	.699	.675(.029)	.675
PH 22	1.000 a	1.000	1.000 a	1.000

a 括弧內數字為標準誤，部份參數由模型設定，無標準誤。

\* 除 PS 33 外，所有參數皆顯著大於 0，估計方法為 AGLS: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 method (based on arbitrary distribution theory, asymptotically distribution free theory)。

### (三)人口相關變項與孝道觀念的關係

既然孝道觀念量表的潛在因素結構已經確立，它們可分別由較低階的「尊親懇親」、「抑己順親」、「奉養祭念」及「護親榮親」等四個潛在因素，或較高階的「尊懇奉祭雙親」（或核心孝道觀念）與「抑順護榮雙親」（或變遷孝道觀念）兩個潛在因素加以解釋。因此，底下將針對不同人口變項群體在上述六類孝道觀念因素的差異情形進行探討，以進一步瞭解這些人口變項在孝道觀念變遷上可能的影響。當然對於不同群體間所持有的孝道觀念的探討，是屬於組間（between groups）變異的分析。雖然它並不是直接探討變遷程度與速率的問題，但從這些組間變異的討論，多少也有助於對台灣民眾孝道觀念變遷情形的瞭解，尤其是各類群體之孝道觀念可能的變遷趨向。底下是針對幾個人口變項群體所持有的六類孝道觀念的變異數分析。

#### 1. 性別

首先是討論性別變項的效果。從表 5 可以看到在第一階與第二階共六類孝道觀念因素上，除了「護親榮親」因素外，性別變項的影響效果都達到顯著水準以上；而且在影響趨向上，都是男性較女性樣本更重視這些孝道觀念。產生這一結果的原因，推測可能的來源有三：(1)即使民眾孝道觀念中父權優勢的特性已大幅減弱，但對於孝敬父母這一規範，認為兒子比女兒具有較大責任的觀念，仍然為大多數人所遵循。(2)雖然在此次調查研究中，已特別界定本孝道觀念量表中所指涉的「父母」一詞，是指自己的親生父母，但對於佔大多數的已婚女性樣本而言，很難避免將「父母」一詞對應到「公婆」身上，因此自然而然的降低了對孝敬「公婆」的重視程度。(3)由於近年來台灣社會中女性主義意識迅速發展，或許因此抑制了女性對由父權體制下所發展出來的孝道觀念的重視程度。

表5 人口相關變項在孝道觀念因素上的變異數分析

孝道因素名稱	尊親懇親		抑己順親		奉養祭念		護親榮親		核心孝道觀念		嚮應孝道觀念	
	平均數	F 值	平均數	F 值	平均數	F 值	平均數	F 值	平均數	F 值	平均數	F 值
性別												
男	6.82	6.09*	5.57	12.63***	6.83	13.96***	4.46	0.03	13.65	11.25***	10.04	5.84*
女	6.59		4.96		6.48		4.44		13.07		9.40	
年齡												
20-30 歲	6.93	3.65**	5.02	6.64***	6.85	3.97**	4.76	4.79***	13.79	4.26**	9.78	5.13***
31-40 歲	6.81		5.13		6.79		4.52		13.60		9.64	
41-50 歲	6.60		4.95		6.44		4.06		13.04		9.01	
51-60 歲	6.39		6.10		6.40		4.51		12.79		10.61	
61-64 歲	6.43		6.28		6.58		4.76		13.01		11.04	
教育程度												
小學或以下	6.33	9.33***	5.93	12.38***	6.37	5.77**	4.37	2.12	12.70	8.78***	10.31	3.68*
國(初)中	6.65		5.33		6.60		4.15		13.25		9.48	
高中職	6.89		5.13		6.78		4.51		13.66		9.64	
大專(學)或以上	6.92		4.54		6.83		4.63		13.75		9.16	
個人每月平均收入												
無收入	6.27	12.16***	4.94	1.85	6.34	7.22***	4.13	2.93*	12.61	11.24***	9.06	2.21
三萬元以下	6.63		5.44		6.57		4.52		13.20		9.96	
三萬元至七萬元	7.03		5.27		6.91		4.52		13.94		9.78	
七萬元以上	7.02		4.93		6.89		4.79		13.91		9.72	
家庭每月平均收入												
國萬元以下	6.28	7.41***	5.44	3.49*	6.25	5.35**	4.30	1.20	12.53	7.36***	9.74	.59
兩萬元至七萬元	6.66		5.43		6.65		4.40		13.31		9.84	
七萬元至十二萬元	6.98		4.91		6.86		4.59		13.84		9.49	
十二萬元以上	6.94		4.66		6.76		4.68		13.70		9.34	
親子關係滿意度												
低(80分以下)	6.56	2.35	4.81	7.03**	6.54	1.29	4.33	1.13	13.10	2.10	9.14	5.00*
高(80分以上)	6.74		5.37		6.67		4.49		13.41		9.86	
城鄉差距												
省四級	6.72	8.42***	5.71	8.73***	6.76	4.08**	4.53	5.12***	13.49	7.06***	10.24	7.38***
省二、三級	6.34		5.35		6.39		4.19		12.73		9.50	
省一級	6.72		5.39		6.67		4.58		13.40		9.97	
省縣市	7.22		5.66		6.99		4.77		14.21		10.43	
高雄市	6.09		3.80		6.23		3.60		12.31		7.40	
台北市	6.80		4.35		6.64		4.47		13.44		8.82	

\*: p<.05 \*\*: p<.01 \*\*\*: p<.001

## 2. 年齡

其次是分析年齡變項與孝道觀念間的關係。從表 5 中可以看到，年齡變項在六類孝道因素的影響效果都達到顯著水準以上。其中在「尊親懇親」與「奉養祭念」等屬於「核心孝道觀念」的因素上，年輕的受試樣本（40 歲以下）比年長的受試樣本較重視這類型的孝道觀念。但相反的，在「抑己順親」等屬於「變遷孝道觀念」的因素上，反而是年輕的（50 歲以下）比年長的受試樣本較不重視這類型的孝道觀念。不同年齡層群體在本質上，除了因年歲大小不同而反映著世代（cohort）的差異外，更深一層的意義是他們對接受新生態環境衝擊的涵化（acculturation）速率也不相同。一般而言，年輕者對於外在新文化觀念衝擊影響的接受程度，亦即受涵化的速率，明顯的大於與快於年長者。因此，上述結果正好反映出由於年輕者受社會變遷相關因素的影響效果遠大於年長者，因此在屬於「變遷孝道觀念」的重視程度上，就反應出較大的衰退；至於在「核心孝道觀念」的重視程度的比較上，雖然此類型孝道觀念不太受社會變遷相關因素的衝擊，但年輕者可能是受理想主義與情感因素的影響，而年長者可能是就現實條件因素來考量，因此造成了相反方向的差異結果。

## 3. 教育程度

接著是分析教育程度變項與孝道觀念間的關係。從表 5 中可以看到，除了「護親榮親」因素外，教育程度變項在其他五類孝道潛在因素的影響效果都達到顯著水準以上，不過對於不同因素的影響方向並不相同。其中對於「尊親懇親」及「奉養祭念」等屬於「核心孝道觀念」的因素，高教育程度者比低教育程度者較為重視。但對於「抑己順親」等屬於「變遷孝道觀念」的因素，相反的卻是高教育程度者比低教育程度者較不重視。如果教育程度變項可被當作是現代化程度的



指標之一，而現代化正代表著社會變遷的趨向，則上述結果可視為受現代化影響較大的高教育程度者，尤其是大專教育程度以上的群體，由於受現代化社會變遷影響的效果較大，因而在「變遷孝道觀念」上的衰退程度，遠大於受現代化影響較小的低教育程度者。至於在「核心孝道觀念」上，由於是屬於孝道的核心觀念，並不會受到社會變遷相關因素的太大影響，而是較受到現實條件因素的作用。高教育程度者通常代表著在盡孝的現實條件上是較優勢的一群，因此在這類型孝道觀念的重視度上，就較容易表現出較高的關注。

#### 4. 個人與家庭每月平均收入

上述討論述及，由於屬孝道的核心觀念並不易受社會變遷相關的因素但卻較易受現實條件因素的影響，因此當把個人與家庭的每月平均收入變項納入分析時，這樣的主張觀點就更加獲得肯定了。從表 5 可以看到個人與家庭每月平均收入變項對「尊親懇親」與「奉養祭念」等屬於「核心孝道觀念」的因素，都產生顯著的影響效果；而且都是高個人與家庭收入者較低收入者更重視這類型的孝道觀念。另外由於個人與家庭每月平均收入兩變項，並不是屬於與社會變遷相關聯的因素，因此雖然對「變遷孝道觀念」有關的因素產生了零星的顯著作用效果，但並沒有造成任何明顯一致的影響趨勢。

#### 5. 親子關係滿意度

親子關係滿意度變項是由受試樣本對個人現在的親子關係，在區分成 100 等分下，評定自己主觀的滿意程度來界定的。本研究採用以眾數 80 百分等級為分界點，將樣本區分成高低滿意組進行比較分析。從表 5 可以看到雖然此變項祇對「抑己順親」等屬於「變遷孝道觀念」因素造成顯著的影響效果，但在六類的孝道潛在因素上，都是高滿意組比低滿意組呈現較高的重視。推斷形成這一結果的原因，可再次以

對核心與對變遷孝道觀念的影響來源並不相同的觀點加以解釋。由於對核心孝道觀念而言，在特徵屬性上原就屬於不易受外在因素影響的成分，因此雖然親子關係滿意度變項對這些成分的表現，造成了程度高低不同的一致趨向，但並未能達到顯著差異的水準。至於對變遷孝道觀念的特徵屬性的作用，由於它們是易受外在因素影響的成分，因此作用的效果就較易擴大而達到顯著差異的水準。至於親子關係滿意度變項特別在「抑己順親」孝道觀念上產生顯著作用的結果，正與國外子女順從行為 (compliance) 研究的發現上是相一致的。它們發現能與父母親建立安全依附關係比不能建立安全依附關係的小孩，表現出較多的順從行為 (Honig 1985)；另外在父母親能表現出較多應答性行為 (responsiveness) 的情況下，亦即父母親對子女所引發的互動行為能採取合作或配合的方式應對，而不是企圖主導或掌控整個親子互動過程，則子女也會對父母親接續的要求作出較多的順從行為 (Parpal & Maccoby 1985)。

## 6. 城鄉差距

城鄉差距變項的分組是以台灣省經動會所採用的都市化等級的畫分為基準，其中分級的判準是以對地方經濟發展的綜合性都市化指標為基礎 (洪永泰 1992)。此變項原本畫分成八等級，其中台北與高雄兩個院轄市分別歸為第一及第二等級，五個省轄市歸為第三等級，第四到第八等級則是將台灣省的各鄉鎮市，依據眾多社經人口發展指標綜合歸納，畫分成五類，分別是省一級 (都市化程度較高者) 至省五級 (都市化程度最低者)。

在本研究的資料中並沒有省五級的樣本，另外考慮到各分組樣本人數的均等性，而將省二、省三兩級合併成一組，因此此變項共分成六組。從表 5 的變異數分析結果可以看到，城鄉差距變項在六類孝道潛在因素上的影響效果皆達到顯著水準以上。其中在「尊親懇親」及

「奉養祭念」等屬於「核心孝道觀念」的因素上所形成的差異效果，主要是源自於高雄市民眾比其他地區民眾較不重視這些孝道觀念的結果所致。至於在「抑己順親」及「護親榮親」等屬於「變遷孝道觀念」因素上的差異效果，則是源自於兩個都市化程度較高的院轄市民眾比其他省市地區民眾較不重視這些正變遷的孝道觀念所致。這一結果又再次的支持這些正逐漸變遷的孝道觀念，容易受到與社會變遷相關的因素（此處是都市化程度）影響的主張。另外值得一提的發現是，高雄市民眾對所有孝道觀念因素的重視程度，都是全台灣地區民眾中最低的；但相反的，省轄市的民眾則對所有孝道觀念因素的重視程度，幾乎都是全台灣地區民眾中最高的。對於形成後者的原因，推測可能是因為省轄市樣本群中包含了像台南市與台中市等相當重視傳統文化的古都所致；至於形成前者的原因，則相當耐人尋味。

## 7. 複迴歸分析

經由上述的單變項變異數分析，我們看到所討論的人口相關變項，對台灣民眾孝道觀念的變與不變都或多或少產生了影響。但上述這些討論都是在未控制其他變項條件下的結果。本研究進一步想探討的問題是，在同時控制其他作用變項的條件下，這些個別變項是否仍然保有它的影響力。因此，我們另外進行了複迴歸分析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從表 6 的分析結果發現當同時控制了其他作用變項的條件下，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城鄉差距等四個變項仍然保有它們對台灣民眾孝道觀念的影響力；但個人與家庭每月收入及親子關係滿意度等變項的影響力則幾乎消失不見了。其中，性別變項的影響力仍然呈現出在除了護親榮親外的所有其他類的孝道觀念上，男性比女性更加重視的結果；而在年齡變項的影響力上，則祇留下年輕者比年長者更加重視「尊親懇親」與「奉養祭念」等屬於「核心孝道觀念」的作用效果。至於在教育程度變項的影響力上，則仍顯示高教育程度者

表 6 人口相關變項在孝道觀念因素上的複迴歸分析

孝道因素名稱	尊親惡親		抑己順親		奉養祭念		護親榮親		核心孝道觀念		變遷孝道觀念	
	Beta	T 值	Beta	T 值	Beta	T 值	Beta	T 值	Beta	T 值	Beta	T 值
性別(男)	.05	1.89 <sup>+</sup>	.11	4.02 <sup>***</sup>	.10	3.70 <sup>***</sup>	-.01	-.26	.09	3.35 <sup>***</sup>	.06	2.29 <sup>*</sup>
年齡	-.05	-1.84 <sup>*</sup>	.04	1.39	-.06	-1.99 <sup>*</sup>	-.01	-.37	-.07	-2.22 <sup>*</sup>	.04	1.43
教育程度	.11	4.10 <sup>***</sup>	-.13	-4.57 <sup>***</sup>	.07	2.18 <sup>*</sup>	.08	2.75 <sup>**</sup>	.08	2.64 <sup>**</sup>	-.05	-1.71 <sup>+</sup>
個人每月平均收入	.06	2.22 <sup>*</sup>	-.01	.21	-.02	-.79	-.05	-1.81 <sup>+</sup>	.02	.67	-.03	-1.08
家庭每月平均收入	-.01	-.25	.03	1.01	-.00	-.08	.02	.75	.01	.25	.03	.93
親子關係滿意度	.01	.54	.03	.97	.02	.68	-.00	-.05	.02	.68	.02	.60
城鄉差距	-.04	-1.27	-.12	-4.47 <sup>***</sup>	-.05	-1.66 <sup>+</sup>	-.07	-2.53 <sup>**</sup>	-.04	-1.44	-.13	-4.77 <sup>***</sup>
R	.13		.22		.15		.09		.16		.14	
R <sup>2</sup>	.02		.05		.02		.01		.02		.02	
N	1423		1423		1423		1423		1423		1423	

+: p < .10 \*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比低教育程度者較重視「尊親懇親」與「奉養祭念」等屬於「核心孝道觀念」，但較不重視「抑己順親」等屬於「變遷孝道觀念」的作用效果。最後城鄉差距變項的影響力上，則祇留下高都市化地區的民眾比低都市化地區的民眾較不重視「抑己順親」、「護親榮親」等屬於「變遷孝道觀念」的作用效果。綜合上述的複迴歸分析結果，基本上對作用於「核心孝道觀念」與「變遷孝道觀念」特徵屬性的來源是不相同的主張是支持的。其中與社會變遷相關的因素，譬如代表都市化程度的城鄉差距變項、代表現代化程度的教育程度變項及受女權運動思潮影響的性別變項，主要是作用在「變遷孝道觀念」的特徵屬性上。而這些社會層面的作用因素反映在個人對孝道觀念的內化歷程上，正如前面所討論的，主要是它們降低了威權因素的影響及減少了交換因素的作用頻率，因而降低了民眾對這類型孝道觀念的重視程度。相反的，對於「核心孝道觀念」的特徵屬性，則並不太受這些與社會變遷因素的影響，而是受到延續傳統觀念的性別變項、反映理想主義與情感因素的年齡變項及代表盡孝條件較具優勢的教育程度變項的影響。

## 五、總結討論

本研究是以第二期第五次「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的資料，探討台灣民眾孝道觀念的變遷情形。本研究認為作為社會的一項主要教化德目，孝道觀念的內涵必須隨著周遭大環境的變動，而在量或質方面有所調整是相當明確的道理。由於台灣社會近十年來在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等方面都有顯著的變化，因此正是探討孝道觀念變遷情形的大好時機。不過在探討其變遷問題時，宜針對它不同的特徵屬性或具體行為內容逐一討論。同時為了明確探知各項特徵屬性或具體行為內容開始變遷的時間與變遷的速率，應採用貫時性的研究設計進行討論。可惜本研究並未能找到適當的貫時性研究資料來進行

比較分析，因而此處僅能就橫斷式的資料結果，進行組內與組間的比較討論。雖然橫斷式資料的比較無法直接討論孝道觀念的「變遷程度與速率」的問題，但透過與其他和時間演進有密切關聯的因素的關係的討論，橫斷式的資料仍然可以間接的回答觀念變遷的問題。綜合本研究的分析結果，大致得到下列幾項較有意義的結果與推論：

(一)本研究以九項孝道具體內容受民眾重視程度的情形進行探討，並透過與楊國樞等人研究(1989)的相對應資料的比較發現，台灣民眾對這九項孝道觀念的態度，在1987年至1994年這兩個時間點間的趨向是相當吻合一致的。它反應出在這七年快速變遷的台灣社會下，某些層面的孝道觀念是穩定不變的，而某些層面的孝道觀念是逐漸衰退或減弱的。至於民眾對這九項孝道具體內容的態度趨向的情形大致如下：

1. 「親自奔喪」、「感念親恩」、「尊敬雙親」及「奉養雙親」等四項具體孝道內容，至今仍然受到台灣民眾相當程度的重視。這些孝道內涵應該是屬於孝道觀念中的核心成分，歷久不衰。同時作者認為這些孝道內涵的內化歷程，主要是受情感因素與宗教因素的作用。因此當親子間的情感聯結，與宗教中所提供的勸慰情志及安定人心的作用，持續受到民眾的重視時，這四項孝道行為內容仍將在民眾的孝道觀念中佔據重要的分量。

2. 「榮親」、「護親」及「陪侍在側」等三項具體孝道內容，現今受台灣民眾重視的程度已減為中等，是屬於正逐漸變遷中的孝道觀念。作者認為這三項孝道內涵的內化歷程，主要是與交換因素的作用有關，亦即很容易受現實物質條件的影響。因此當親代不再能滿足子代對經濟與資源的需求時，或現實物質條件不允許子女做到時，例如子女必須離開父母的身邊就學就業，這三項孝道行為的表現就會逐漸減弱。

3. 「傳宗接代」及「抑己順親」等兩項具體孝道內容，現今受台灣民眾的重視程度已大大降低，是屬於正趨式微的孝道觀念。作者認為

這兩項孝道內涵的內化歷程，主要是與威權因素的作用有關。因此當親代對子代的威權影響途徑大幅減弱時，這兩項孝道行為內容自然而然的就趨於衰退。

(二)經由對九項孝道觀念的因素結構的分析結果，本研究得到台灣民眾對孝道觀念的認知，可以由四個潛在的因素來反映。這四個因素分別是「尊親懇親」、「抑己順親」、「奉養祭念」及「護親榮親」。這一結果間接對楊國樞等人（1989）所編製的孝道量表的因素結構主張，再次的給予支持；同時也更加確定這四個潛在因素是傳統孝道觀念中的主要成分。不過，在本研究中另外發現，在這四個潛在因素之上，還存在著兩個更高階的孝道因素。它們分別是由「尊親懇親」及「奉養祭念」所組成的「核心孝道觀念」因素；以及由「抑己順親」及「護親榮親」所組成的「變遷孝道觀念」因素。這兩個高階因素的孝道內涵，作者認為民眾對前者的內化歷程，主要是受情感及宗教因素的作用；而民眾對後者的內化歷程，主要是受威權與交換（工具性）因素的作用。正因為主要教化歷程的管道不同，因此在社會變遷過程中，這兩類型孝道內涵所遭受到的衝擊影響也不相同。

(三)經由探討一些人口相關變項對六類型孝道因素觀念的變異數及複迴歸分析，本研究再次肯定影響不同類型孝道觀念的途徑並不相同。同時發現男性、年輕及高教育程度的民眾比較重視包括「尊親懇親」、「奉養祭念」等屬於「核心的孝道觀念」；而男性、低教育程度及低都市化地區的民眾則比較重視「抑己順親」等屬於「變遷的孝道觀念」。

總之，在台灣社會近一、二十年的變遷過程中，由於現代化、都市化、工業化、民主化以及多元化等因素的影響，使得親子間原有的威權與交換聯結關係明顯減弱，因此對屬於「變遷孝道觀念」的內涵的衝擊影響較大，從而降低了它們在民眾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由於親子間的情感聯結以及宗教因素中的勗慰情志與安定人心的功能，正逐漸增強或持續中，因此對屬於「核心孝道觀念」的內涵，

就會持續在民眾的心目中佔據重要的地位。

除了上述具體的結論外，對於本研究的探討分析與結果，也有下列幾項檢討：

1. 首先，本研究雖受到資料型態的限制，而僅採用橫斷式的研究設計，但對於變遷問題的探討，仍應採用貫時性的研究設計方法。「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的設計型態，正好符合這樣的需求。因此我們期盼在五年或十年後，可以累積相當完整的貫時性資料時，再對台灣民眾孝道觀念的變遷問題從事進一步的探討。

2. 由於本研究所探討的一些人口相關變項對民眾孝道觀念的解釋力仍然相當有限，因此對於一些可能產生重要影響的因素，如個人的家庭結構型態與對家庭價值的觀念等，以及使用一些特別的統計分析方法，如潛在類別分析法 (latent class analysis) (葉光輝，劉長萱 1995; Rost 1988, 1992)，將民眾依所持有的孝道觀念類型加以分類，並估計出各類別人數佔全體母群的百分比，都實有必要繼續加以深入探討。這些分析相信對孝道觀念的變遷問題必能提供較完整的認識。因此這些議題與研究方法應該可以作為未來更進一步的研究方向。

誠如文章開頭所採用的一句話「對於事物的變化情形，唯一不變的就是變的原則」。對於孝道觀念變遷問題的探討，任何時間開始著手探討都不會太晚，但明顯的，任何時間的任何研究都不能被當作是一個結束性的研究。因此在這種型態的研究主題下，重要的是研究者發現了什麼 (what)，並進一步的探討為什麼 (why) 產生這樣結果的原因，以及告訴讀者們到底是如何 (how) 會產生這樣結果的歷程。本研究雖然在這三者上都提出了說明與解釋。但未來仍需要更多的證據來加以肯定。



## 參考書目

### 行政院主計處

1990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老人狀況調查報告，行政院主計處編印。

1992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老人狀況調查報告，行政院主計處編印。

### 李宓昫

1989 社會結構變遷中之孝道分析——一種個案訪談研究。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盛

1983 孝道的現代意義。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孝道與孝行研討會論文集，頁 19-22。台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 吳寧遠

1995 社會變遷中的台灣民間宗教。發表於 1995 年 6 月 6 日至 10 日中研院民族所主辦之「大型社會調查研究經驗交流暨變遷中的台灣社會研討會」之論文。

### 洪永泰

1992 民意調查的抽樣設計。研考雙月刊 16(1):22-32。

### 徐復觀

1975 中國孝道思想的形成演變及其在歷史中的諸問題。見徐復觀著：中國思想史論集(第四版)，頁 155-200。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 章政通

1969 中國孝道思想的演變及其問題。現代學苑，第 3 卷，第 5 期，頁 1-10。

### 莊耀嘉、楊國樞

1991 傳統孝道的變遷與實踐：一項社會心理學之探討。見楊國樞、黃光國主編：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爲(1989)，頁 135-175。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孫得雄

1984 台灣地區生育態度與行爲的變遷。見瞿海源、章英華主編：台灣社會與文化變遷(上冊)，頁 133-178。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乙種第十六號。

### 陶希聖

1983 孝道與孝行研討會發言記錄。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孝道與孝行研討會論文集，頁 19-22。台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 陳大齊

- 1973 如何做父親。見中央月刊編輯：倫理哲學講話。台北：中央月刊社。
- 陳立夫  
1972 人理學研究，頁 62。台北：中華書局。
- 陳淑瓊  
1986 高雄市成年子女對父母態度之研究—孝道倫理探討。中山大學學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 梁漱溟  
1989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一版）。上海：上海書店。
- 黃光國  
1988 義務性道德與功利性道德：台灣社會中的道德判斷及其相關變項。見楊國樞、瞿海源主編：變遷中的台灣社會（下冊），頁 447-471。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乙種第二十號。
- 黃得時  
1982 孝道之本義與行孝之步驟。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倫理道德的理論與實踐，頁 251-272。台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 黃堅厚  
1977 從心理學的觀點談孝並分析青年對孝行的看法。國立師範大學教育心理學報，第 10 期，頁 11-20。  
1982 現代生活中孝的實踐。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研討會論文集，頁 283-297。台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 章英華  
1994 變遷社會中的家戶組成與奉養態度—台灣例子。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刊，第 23 期，頁 1-34。
- 曾昭旭  
1977 試論孝道的本源及其陷落。鵝湖月刊 3(6)。頁 2-10。
- 葉光輝  
1992 孝道認知的類型、發展及其相關因素。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1995a 孝道困境的消解模式及其相關因素。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79 期。  
1995b 年老父母的居住安排與孝道觀念。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
- 葉楚生  
1973 如何做母親。見葉楚生撰：倫理哲學講話。台北：中央月刊社編輯。

葉霞翟

- 1970 人群關係與家人關係。南投霧峰：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出版。

楊國樞

- 1983 新孝道與新慈道，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孝道與孝行研討會論文集，頁 113-122。台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 1985 現代社會的新孝道。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現代生活態度研討會論文集，頁 149-174。台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亦見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 19 卷，第 1 期，頁 56-67。又以「中國人之孝道觀念的分析」為題收入楊國樞著：中國人的蛻變。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88）。

楊國樞、葉光輝、黃曬莉

- 1989 孝道的社會態度與行為：理論與測量。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65 期，頁 171-227。

瞿海源、姚麗香

- 1986 台灣地區宗教變遷之探討。見瞿海源、章英華主編：台灣社會與文化變遷（下冊），頁 655-685。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乙種第十六號。

羅紀瓊

- 1987 「近十年來臺灣老人家結構變遷的研究」，臺灣經濟預測，18 卷 2 期，頁 83-107。

Bentler, P. M. & Bonett Douglas G.

- 1980 Significance Tests and Goodness of Fit in the Analysis of Covariance structur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8(3):588-606.

Berger, P. L., Berger, B. and Kellner, H.

- 1973 *The homeless mind: modernization and consciousness*. New York: Random House.

Gerbing, David W. & Anderson James C.

- 1993 Monte Carlo Evaluations of Goodness-of-Fit Indices fo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In Bollen Kenneth A. Long J. Scott (eds.), *Tes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Inc.

Ho, D. Y. F., Hong, Y. Y., and Chiu, C. Y.

- 1990 Filial piety and family-matrimonial traditionalism. In Jeng, C. W. & Miao Yui, S. C. (eds.), *Proceedings of CCU-IC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ral Values and Moral Reasoning in Chinese Societies*. Taipei: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Ho, D. Y. F., and Lee, L. Y.

- 1974 Authoritarianism and attitudes toward filial piety in Chinese teacher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92:305-306.

Honig, A. S.

- 1985 Compliance, control, and discipline. *Young Children*, 40:50-58.

Hsu, F. L. K.

- 1971 Filial piety in Japan and China: borrowing, variation and significanc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2:67-74.

Lin, C.

- 1990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mong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A study of filial piety. In Jeng, C. W. & Miao Yui, S. C. (Ed.), *Proceedings of CCU-IC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ral Values and Moral Reasoning in Chinese Societies*. Taipei: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Parpal, M., & Maccoby, E. E.

- 1985 Maternal responsiveness and subsequent child compliance. *Child Development*, 56:1326-1334.

Rost, J.

- 1988 Rating scale analysis with latent class models. *Psychometrika* 53: 327-348.
- 1992 LACORD-Latent class analysis for ordinal variables (2nd). Germany: IPN-Institute for Science Education.

# 嚴酷教養方式之代間傳承\*

吳齊殷\*\* 高美英\*\*\*

## 摘 要

本文以社會學習模型來模塑嚴酷教養方式的代間傳承。本研究以一主要樣本（391 個雙親家庭）及另一附加樣本（71 個雙親家庭）分段評量此社會學習模型。在主要樣本裡，每一個雙親家庭至少有一名年齡 11 到 16 歲間的青少年子女。本研究所有變項之資料，乃完全由第二代之父或母所提供。運用路徑分析方法，本研究發現祖父母（第一代）採取嚴酷教養方式者，其子女（第二代之父母）採取同樣的教養方式的可能性即愈高。此外，本研究同時發現教育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變項，它具有「潛移默化」的功效，可幫助第二代父母減少其嚴酷教養的行為。

---

\* 本論文使用資料部份係採自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支助之「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計劃。該計劃係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執行，資料則由社會變遷研究小組所提供。本文作者在此也要感謝瞿海源教授允許作者在其研究計劃「世界價值觀研究」之電訪預試問卷裡，加入一些與本文有關之問項，藉此獲取本文所需之實證資料。

原稿在「變遷中的台灣社會」研討會中宣讀，感謝評論人林文瑛教授及多位與會學者提供寶貴意見。三位匿名評審人對本文的評論與建議，對作者即將進行之研究計劃提供極大之助益，謹此誌謝。本論文之論點與缺失蓋由作者自行負責。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Harsh Parenting

Chyi-In Wu and Meei-Ying Kao

## **Abstract**

A social learning model was developed to investigat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harsh parenting. The model was tested by a major sample with 391 two-parent families and an additional sample with 71 two-parent families. In the study, each family in the major sample had at least one male or female adolescent (all between 11 and 16 years old). The second generation (the parents) was the only respon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a face-to-face nationwide household survey. In addition, a telephone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collect data related to harsh parenting. This telephone survey also interviewed the parents. Using the Path Analysis method, the analyses of the present study showed that the more frequently the grandparents harshly parented their children, the higher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ir children (the parents) would use the same strategies to rear their offsprings. Moreover, education is a critical variable which could decrease the behavior of harsh parenting.

# 嚴酷教養方式之代間傳承

## 一、緒論

### (一)西方的實證研究

西方的許多實證研究業已發現，若長期暴露於嚴酷的或暴虐的教養之下，青少年兒童的身心發展，將更可能面臨多樣化的危機。例如：偏差違法行爲 (delinquency)、精神病狀 (psychopathology)、學業失敗 (academic failure)、同儕齟齬 (difficulties with peers)、以及藥物濫用 (substance abuse) 等等 (Hotaling, Finkelhor, Kirkpatrick, and Straus 1988; Maccoby and Martin 1983; Rohner 1986; Simons, Conger, and Whitbeck 1988; Wolfe 1987)。這些研究發現，促成了許多更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其中多數乃著重在嚴酷教養方式成因的探討。Steinmetz (1977, 1987) 的研究結果總結出：為人父母者採取嚴酷教養方式的最顯著的決定因素，乃是為人父母者在小時候即曾經有過類似的經驗。這個暴力循環 (cycle of violence) 的論點，溝連了傳統的「教養方式研究」的兩個主要關切點，亦即教養方式的「結果」與「成因」。要言之，小時候曾遭父母嚴酷教養的個人，長大後也因而可能採取類似的策略，來管教其下一代。如果吾人將「暴力循環」視為仿效 (modeling) 或社會學習 (social learning) 的過程，則此暴力循環的機制可以約略地分解成兩個可能的途徑：(1)個人經由直接的行爲仿效，觀摩學習上一代的教養行爲，並將此教養行爲轉施於其下一代，或(2)個人經由間接的社會學習過程，將上一代的管教方式認知為合情合理的行爲，進而涵養出事所當然的態度，而後根

據此態度再對下一代實施類似的教養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的許多實證研究也同時指出，小時候曾經經歷過嚴厲身心管教的個人，長大後似乎更有習慣性地對自己的配偶或子女動輒拳腳相向的傾向。一般而言，這樣的現象常常被歸因為：個人經由認知學習而孕育出認為「打罵其他的家庭成員乃是正當而且必要的」普遍性態度，進而依此態度而行，所造成的結果。

一般學者及平民百姓，大部份都具有「嚴酷教養方式有代間傳承傾向」的印象。然而，卻也有為數不少較細心的研究工作者指出，現存的實證研究資料所支持的以上的論證是有限制的（Burgess and Youngblade 1988; Jayartne 1977; Kaufman and Zigler 1987）。在 1960 年代及 70 年代初期，大部分這方面的實證研究都發現「被上一代嚴酷教養」與「嚴酷教養下一代」之間有著顯著強度的關連（Galdston 1965; Green, Gaines, and Sandgrund 1974; Silver, Dublin, and Lourie 1969; Steele and Pollack 1968）。然而，所有這些研究大都只針對個案或臨床上的「病患」做研究。除了使用不具代表性的樣本資料之外，這些研究也忽略了運用可相對比較的對比團體，致使以上的「發現」很難概化到一般的母體。70 年代晚期至 80 年代的研究開始注意到運用「比較團體」的方法，同時在變項的測量上也賦予更大的客觀性。這時期的研究大都顯示「被嚴酷教養之經驗」與「當下之教養手段」之間僅有「中度」的關係連結（Egeland, Jacobritz, and Papatola 1987; Herrenkohl, Herrenkohl, and Toedter 1983; Hunter and Kilstrom 1979; Strans 1983）。比起早期的研究，此時期的研究設計雖然有著極大的改進，這些研究仍然沒有克服一些方法上的弱點。這些方法上的弱點使得許多實證研究的「發現」，不只有一種特定的解釋方式，許多其他的對立解釋亦言之成理。其中最基本的限制乃在於此時期的研究，忽略了對社會經濟因素 (socioeconomic factors) 加以適當控制。事實上，有些早期的研究即已發現「家庭之低社



經地位」與「家庭之兒童虐待」之間有著顯著地關連性 (Bronfenbrenner 1977; Garbarino 1976; Strans, Gelles and Steinmetz 1980)。基於這些發現，則至少有兩條途徑，社會階級的因素可以被用來解釋代間教養方式的關係。首先，此代間教養方式的連結 (linkages) 可能僅僅只是反映出低社經地位家庭之社會階級的代間傳承。換言之，低社會階級出身的父母，從小生長在祖父母所建構的低層階級家庭氛圍裡，這樣的家庭多半需不斷面對許多生活的壓力，尤其是經濟上的壓力，而形成其特定的日常生活模式。而此日常生活模式往往由暴怒或暴戾之氣所構成，因而促進了嚴酷教養子女的可能性。因此，若要排除以上解釋的可能性，則研究者在探討普遍的代間教養關係的同時，必須控制第二代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變項。不幸的是，絕大多數的代間教養方式傳承研究，都沒有做到這個要求。少數做到此一要求的研究，在控制了人格、情緒、社經地位等變項之後，卻仍然發現「代間的嚴酷教養傳承關係」依然存在 (Simons et al. 1991)。換言之，這些研究指出「代間教養方式的傳承」並不能被簡單的化約成「社會階級的代間傳承」。根據 Kaufman 和 Zigler (1989) 的估計，曾經被嚴酷教養過的為人父母者，大約有五倍的機率，比未有此經驗的為人父母者，更可能採取同樣的方式來教養其子女。因此，仍有必要針對「代間教養方式傳承」的社會心理機制，加以深入研究。

一般而言，從事家庭歷程研究的學者都會同意：曾經有被自己的父母嚴厲教養經驗的成人，多半會立於沿用相同之教養方法，來養育自己子女的危險境地。但是這兩種現象之間的關連，其機制如何，在研究者之間則仍是眾說紛紜，看法各異。大部份早期的研究都著重在「代間傳承」是否存在的議題上，而較少將注意力放在探討此代間傳承現象的可能理論機制。

## (二) 台灣的實證研究

反觀國內這些年來對父母教養方式的研究，基本上仍在初始階段。台灣近年來對教養行爲的研究，大都偏重在教養行爲與其他的變項間關係的探討。例如：父母管教態度與青少年犯罪，教養態度與親子關係，親職功能與青少年社會行爲，親職功能與學業成就，親子關係與學校適應等等（吳秀碧 1981；黃春枝 1987；高淑貴 1990；賴爾柔 1989）。較少有研究完全針對教養行爲本身深入探討，而教養行爲之代間傳承的研究似乎尙未有文獻可循。一般而言，從文化的觀點來看，從事教養方式的研究應該扣緊文化意義的考量；因爲不同的文化可能有不同的對下一代的教養方式，而對教養的「施」與「受」也可能有不同的體認。例如，不同於西方的概念，傳統的中國式「勤教嚴管」，或甚至是「棒打出孝子」的教養觀念，在許多人看來可能是「愛的教育」而非屬嚴酷教養的行爲。易言之，在不同文化脈絡底下的同樣的教養行爲，在當事者的認知裡可能有著截然不同的意涵。因此，在套用西方的理論以嚐試解釋台灣地區的教養方式代間傳承的現象時，應特別謹慎，文化的因素應優先加以適當考慮。

然而，有趣的是，林文瑛與王震武（1995）在他們最近的研究中發現：在台灣地區，現代的父母在決定那一種行爲該受體罰之時，傳統的教育觀並不是主要的決定因素，其他的因素如父母的性格特質，或教育情境中的客觀因素等才是主導性的因素（林文瑛與王震武 1995，頁 34）。他們的研究同時發現：體罰是否發生，是依家庭而異的。一個視體罰爲有效教育手段的家庭，體罰便可能頻頻發生；反之，則可能很少或從未發生（林文瑛與王震武 1995，頁 39）。總結林文瑛與王震武二人的研究發現，吾人可獲得兩點推論：(1)屬於文化因素的傳統教育觀，在當代台灣地區，於父母教養其子女之時，並沒有發揮多大的影響力，反而是父母的性格及外在的客觀因素才是決定性的因素。

換言之，在探究台灣當代父母的教養行為機制之時，文化因素的影響，似乎並不是最重要的關鍵點，反而是家庭內外的「實務因素」，才是重點所在；(2)嚴酷教養方式是否被採用，是因家庭而異的，其中可能暗示了家庭內教養行為的代間傳承現象。總之，嚴酷教養乃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動態互動過程。近年來，台灣地區的家庭內暴力事件(domestic violence)有逐漸增長的趨勢，為遏止此家內暴力的循環再現，實有必要對嚴酷教養之代間傳承加以實証分析。

### (三)研究目的

本研究試圖克服以上所討論的，致使早期的研究成果受到制限的方法上的困境。首先，本研究使用一全國性的社會調查資料，其中包含一般社會大眾的樣本，個案研究或臨床病患的方法上的問題即可獲得解決。此外，本研究的模型分析，將教育程度與經濟地位等變項也包含在內，以控制社經地位的可能干擾因素。同時本研究為克服早期之研究在方法上的其他缺失，乃嚐試檢證連結嚴酷教養行為代間傳承的機制。

### (四)研究觀點

關於代間傳承的機制，本文前段所述之有關社會學習理論的觀點，基本上是兩條可能的路徑之間的爭辯，換言之，這兩條可能的路徑代表了兩大主要相互競爭的觀點。雖然這兩大相互競爭的觀點，基本上分享一個共同的命題：「嚴酷教養方式乃是經由仿效(modeling)與強化(reinforcement)兩種方式影響下一代」，但二者對於：下一代是如何學得嚴酷教養行為的過程、以及下一代在嚴酷教養中，到底學到甚麼東西，卻有不同的看法。第一個觀點，或所謂的直接路徑觀點，強調子女乃是經由親身體驗，直接體察到他們父母的教養行為而習得為人父母之道。也就是說，為人子女者從父母嚴酷的教養行為中，所

學習到的最顯而易見的教訓就是：嚴厲而高壓的手段乃是教養子女有效的而且正當的方法 (Straus et al., 1980)。要言之，此直接路徑觀點強調：身受嚴酷教養之為人子女者，從中所學習得到的乃是對「嚴酷教養方式的行為結果的認知」。Simons 等人 (1991) 即辯稱道：對於家庭裡日常的教養行為，一般人傾向於只有浮面的認識。因此，在沒有其他教養方式的可供比擬或對照之下，一般人很可能就會以他們的父母的教養方式作為師法的對象。所以，當個人幼時長期暴露於嚴酷的教養之下，自然而然地即會學習到：嚴厲而高壓的教養手段乃是管教子女的正常方式。長大後，他們就會自然而然地反映他們所習得的教養之道在他們與他們的下一代的互動之上。另一個觀點，即所謂的間接路徑觀點，則主張：第二代在身受嚴酷之教養之後，可能因此先發展出一些普遍化的規則或規範性的理解 (Bandura 1977, 1986)：認為為人父母者將嚴厲的體罰施於子女的身上，乃是正當可欲而且事實上是必要的課子或課女之道，然後再依此普遍化的規範性理解，將嚴酷教養方式轉施之於其子女身上。簡言之，身受嚴酷教養之為人子女者，透過對「嚴酷教養方式的正當性」的認知，因而「放心」地習得嚴酷教養之行為。綜上所論，為人父母者在親身體驗了上一代的「嚴酷教養」之後，可能在未有其他教養方式可供參考的情況下，直接將己身所受之管教方式反映、轉施在下一代身上；或者也有可能先經由相信「嚴厲的體罰乃是正當且積極的教養哲學與方法」，之後再照章實踐於下一代身上。

## 二、研究方法

### (一)分析架構

圖 1 顯示一個理論模型，用以檢証上述的兩種觀點。此理論模型指出：(1)若第一代祖父母的嚴酷教養行為乃是直接地經由仿效而影響

到第二代父母的教養行爲，則路徑 A 應是顯著的；(2)若嚴酷教養方式是間接地經第二代父母對教養行爲的態度養成，而由第一代傳承至第二代，則路徑 B 與 C 應該是顯著存在的。本研究擬以兩筆實證資料來檢證圖 1 所示之模型；而此模型檢證是在控制了社會經濟因素的情況下進行的。

## (二)研究設計

在理論模型中，本研究所使用的「嚴酷教養」這個構成概念 (construct) 所指涉的是：罰跪、打手心或屁股、打耳光及打身體其他部位等攻擊性行爲。因此本研究所指涉之「嚴酷教養」概念與「虐待子女 (child maltreatment or abuse)」的概念有所重疊但不等同，後者暗示一種二分的狀況：即父母有或沒有虐待其子女。相反地，本研究假設「嚴酷教養」乃是一連續之概念。也就是說，父母於教養子女之時，或多或少，或經常或偶爾都會有打罵的情形出現，所不同的只是頻率與程度的不同而已。爲免除與「虐待子女」的概念混淆，本研究之「嚴酷教養」的測量並不包括「忽略」此一專屬於虐待子女的特有現象，同時也不完全等同於會傷害身體的嚴重體罰。更精確的說，「嚴酷教養」在本研究中代表一個教養行爲的範疇，從沒有任何攻擊性行爲到暴力的攻擊都涵蓋在內，其具體行爲即爲以上所描述的罰跪、打手心或屁股、打耳光及打身體其他部位等行爲。

本研究之理論模型乃是以父親及母親兩組獨立資料（因各屬不同之家庭）分別檢證。雖然依一般的理解，在家庭裏父親乃是打罵小孩的主要執行者，但早期的教養行爲研究多半將父親的資料排除在外；因爲父親一般被認爲較少積極參與教養子女的工作，也不清楚其子女平常的行爲表現。但是，在教養的過程中，父母仍有可能因爲性別之故，而有不同的因應教養行爲模式。例如，以代間的傳承而言，父親對兒子與母親對女兒的影響，可能是家庭教養方法之傳承的兩條主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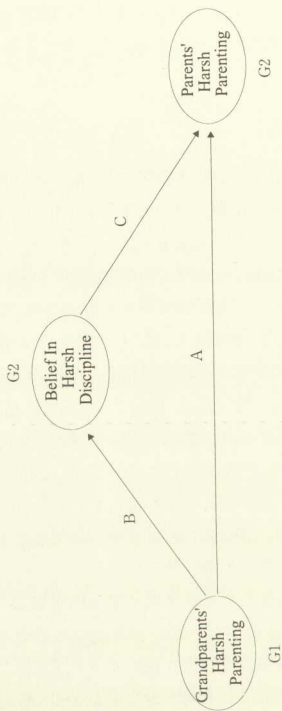


圖1 嚴酷教養方式代間傳承——理論模型

(Straus et al. 1980)。換言之，嚴酷教養方式的代間傳承機制，對父親及母親而言，可能有著不同的路徑。或許某一特殊的中介機制（例如：對訓誡的看法）可能只發生在某一性別的子女身上，而不對另一性別的子女產生任何作用。為釐清可能存在的性別差異，因此有必要分別處理。

### (三)資料來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經驗資料共有兩筆。其中一筆為台灣地區第二期第二次社會變遷基本調查（NSC80-0301-H001-31-B1）之資料，以下將以大樣本稱之。另一筆則為瞿海源教授所主持之「世界價值觀研究」預試電話訪問資料，以下將稱之為小樣本。台灣地區第二期第二次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主要是以家庭、教育與心理狀況為主。此次調查是從1990年10月開始執行，而於1991年7月中進行全台地區之正式面訪，於8月底完成資料整理（瞿海源1991）。大樣本以分層抽樣的方法進行抽樣工作。在正式施測時，為了訪問順利，避免拒訪或其他干擾因素起見，受訪者樣本以成功樣本數膨脹100%計算。因大樣本預計完成2,500份面訪，共抽出5,160個預備樣本。有關大樣本之詳細抽樣過程，請參閱瞿海源（1991）主編之「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劃：第二期第一、二次調查計劃執行報告」。所搜集到的資料在經過資料整理及檢誤之後，共得有效問卷2,488份。

由於大樣本中有關嚴酷教養方式代間傳承的資料，並不夠完整，因此作者乃構想在「世界價值觀研究」的問卷中，加入與大樣本之間卷中，有關嚴酷教養方式完全一模一樣的問題，以補大樣本之不足。此小樣本之調查，乃是以大台北地區的住宅電話號碼簿為抽樣母體名單，依簡單隨機抽樣原則，共抽出200人為樣本進行電話訪問，在為期三天的電話訪問中，共完成107份有效問卷。

#### (四)研究對象

由於教養方式代間傳承的研究，必須至少有三代之祖父母、父母及子女參與。因此，受訪者中必須是已婚且有子女者，才適合成為研究之對象，又本研究基於「教養經驗最好是當下之生活經驗，而非僅是存於記憶中之經驗」的考量，乃設定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已婚，且於受訪當時家庭中至少有一名年齡在 11 歲至 16 歲的子女者。將子女年齡設定在 11-16 歲之間的理由是因為子女在這段期間最可能受到父母的嚴格管教。在此預設條件下，大樣本中共篩選出 484 個合格樣本，而小樣本有 72 個合格樣本，本研究之資料分析主要即針對這些適合的研究對象而進行。有關此合適研究對象的基本資料，請參見表 1。

#### (五)研究步驟

本研究之大樣本的資料由面對面的訪問而得；小樣本的資料則經由電話訪問由電訪員填寫而得。所搜集的原始資料經由過錄、檢誤、除錯、基本資料分析等過程，製成電腦檔及使用手冊，供進一步分析之用。本研究採取路徑分析的方法，進行資料分析。本研究所進行之多變項分析，是以 list-wise 的方式對於在任一變項中具有遺漏值的樣本進行排除。亦即，模型中每一樣本在每一變項中都不能有遺漏值出現。因此，任何樣本只要在某一變項中含有遺漏值者，都將被排除在所分析的模型之外。所以，本研究最後在大樣本中共有 391 個有效樣本，其中男性 192 位，女性 199 位；而在小樣本中共有 71 個有效樣本，其中男性 37 位，女性 34 位。本研究之所有資料分析，即針對此 391 及 71 兩個有效樣本。統計檢測分析顯示，這些有效樣本與因含有遺漏值而被排除在分析之外的樣本，在基本資料變項上（即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收入等）並無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表 1 研究變項之平均數、標準差及間距

變項	大 樣 本				小 樣 本							
	父 (N=192)		母 (N=199)		父 (N=37)		母 (N=34)					
	mean	S.D.	range	mean	S.D.	range	mean	S.D.	range			
第一代祖父母之嚴酷教養	4.74	3.04	0-9	3.53	2.81	0-9	4.89	3.17	0-9	4.56	3.13	0-9
年齡	41.33	5.02	31-63	37.94	3.61	28-53	44.73	11.79	24-64	41.91	10.70	23-59
教育程度	3.40	1.57	1-7	3.02	1.25	1-7	6.89	2.26	3-11	6.38	2.17	1-11
家庭收入	3.97	1.18	1-7	3.95	1.20	1-8	—	—	—	—	—	—
對體罰之相信程度	9.92	2.03	5-15	10.01	1.78	5-15	10.30	1.91	7-15	9.71	1.61	6-14
第二代父母之嚴酷教養	—	—	—	—	—	—	2.70	2.80	0-9	4.38	2.57	0-9
對子女受到體罰之贊成度	9.88	2.01	5-15	9.86	1.92	5-15	—	—	—	—	—	—

——資料從缺

## (六)變項之測量

**第一代祖父母之嚴酷教養** 在大樣本及小樣本裡，受訪者（即第二代之父母），都被詢問以下四個有關嚴酷教養的問題，以評估第一代祖父母之嚴酷教養程度。

您小時候父母曾以下列方式處罰您嗎？

- (1) 打手心、屁股
- (2) 打耳光
- (3) 打身體其他部位
- (4) 罰跪

受訪者根據其經驗選答(1)是，或(2)否（本研究將2過錄為0）。本文為擴增「嚴酷教養」的變異程度，以符合「連續體」的概念，乃根據其嚴重性，將上列4個選項分為三組（即(1)與(4)各一組，而(2)與(3)在另一組），分別予以不同的權數（(4)組乘1，(1)組乘2，而(2)、(3)組乘3）。根據經驗原則，其基本假設為：「罰跪」基本上對身體並無直接危害，其嚴酷程度應屬輕微；而打手心及屁股乃是一般父母處罰其子女慣用之手段，其嚴酷程度應稍微重一點；而打耳光或打身體其他部位，則應該是屬於非常嚴厲的懲戒行為，其「嚴酷」之程度當屬最高。其次，將此4個選項加總，成為此「嚴酷教養」變項的測量指標，其可能分數間距則為0至9。本變項中，若受訪者所獲之分數愈高者，則反映出其所經歷之教養經驗，愈為嚴酷。

**年齡** 乃是以受訪者之出生年為依據（請參閱表1）。必須注意的一點是：本研究中的大樣本之年齡層分佈是從28至63歲（本研究限定：第二代父母的家中，必須至少有一名11至16歲子女，才被納為研究對象）。一來，這個年齡層的小孩，理論上最容易、也最有機會受到父母嚴厲的管教；二來，本研究企圖使受訪者所提供的回答，能夠較確切地反映出在受訪當時正進行中的，他們的日常生活的真實經驗，

而不只是已過往的經驗記憶而已。因此，本文所示之平均年齡，乃稍不同於原社會變遷計劃資料的平均年齡。

**教育程度** 在大、小兩樣本中，因原先問卷中之選項並不一致，因此分別處理。大樣本原有 25 個選項從「無」一直到「研究所以以上」，小樣本原有 15 個選項從「無」到「研究所」。本研究將大樣本之教育程度重整成 7 個分類，而小樣本重整成 11 個分類。原則上，受訪者在教育程度的分數愈高，代表其受教育程度愈高（請參閱表 1），大小樣本之平均教育程度都落於國中與高中之間。

**收入** 在社會變遷計劃之間卷中，受訪者曾被問及全家每個月的收入。本文即據此作為家庭每月總收入之測量，原問卷中共有 8 個選項從「無」到「超過 20 萬元以上」。平均家庭總收入在「3 萬至 5 萬元」之間（請參閱表 1）。小樣本之間卷只問及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及職業類別，惜無收入之資料。

**對體罰的相信程度** 在大、小兩樣本中，受訪者都分別被詢問以下的系列問題：

您在學校曾被老師用什麼方式處罰？您對這種處罰方式是否贊同？

- (1) 嚴重的諷刺和謾罵
- (2) 罰站
- (3) 挨打（打手心、或其他部份）
- (4) 打耳光
- (5) 其他方式對身體的處罰（青蛙跳、跑操場、舉重物、伏地挺身等）

受訪者可選擇 1.贊同，2.不贊同，3.看情形及 4.無意見。由於大樣本與小樣本中，皆無受訪者選取第四個選項的情形；本研究乃將選項重新過錄成 1.不贊同，2.看情形，3.贊同。而後，將這 5 個項目的分數加總起來，成為受訪者在此變項上的得分。本文希冀據此，建構出一較為

普遍性的態度傾向量度。根據社會學習理論，若受訪者自小即經常受到其父母的嚴厲管教，則他們更應該會顯現出，贊成學校體罰方式的傾向。於此變項上，分數愈高者，即反映出其對體罰的相信程度愈高。但是作者深知：以此作為認知歷程的指標變項，可能過度簡化了「認知歷程」。如此對稍後分析資料的推論，將會有極大的限制。但因資料困限，沒有其他更理想的測量可供選取，故勉而為之。

**對子女受到體罰的贊成度** 由於在社會變遷計劃的原問卷中，並未直接問及受訪者（即第二代父母）是否曾經以嚴厲教養的方式對待其子女，本文只好以此變項作為間接之測量。在社會變遷計劃中，受訪者也同樣都要回答下列問項：

您的孩子在學校曾被什麼方式處罰？您對這種處罰方式是否贊同？與上一變項的5個問項一模一樣，受訪者也被一一詢問他們是否同意上述那些體罰方式。選項亦重新過錄成：1.不贊同，2.看情形，與3.贊同。稍後5個項目的分數加總起來，即成為受訪者在此變項上的測量分數。同樣地，分數愈高，代表愈傾向贊同子女所受的體罰。

**第二代父母之嚴酷教養** 為彌補大樣本中無直接測量第二行父母之「嚴酷教養」的變項的缺憾，本研究之小樣本乃特地植入對第二代父母嚴酷教養方式的直接測量問項。小樣本中的已婚受訪者皆需回答下列問題：

您是否曾以下列方式處罰您的孩子？

- (1) 打手心、屁股
- (2) 打耳光
- (3) 打身體其他部位
- (4) 罰跪

整個出題與回答選項的方式與第一代祖父母之嚴酷教養的測量乃是完全相同，資料處理方式亦如一。在此變項上得分愈高者，表示其對子女的教養愈傾向嚴苛。

### 三、研究結果

表 1 總結本研究中每一研究變項的基本資料（包括平均數、標準差及間距等）。值得注意的是，大樣本中父親的平均年齡（41.33）比小樣本中父親之平均年齡（44.73）小了大約 3.4 歲，同樣地，大樣本中母親的平均年齡（37.94）也比小樣本中母親之平均年齡（41.91）小大約 4 歲。顯然，相對於小樣本而言，大樣本中的受訪者是平均年齡比較年輕的一批為人父母者。稍後在對研究結果進行推論時，這一點將特別小心地加以處理。另外，如前所述，在大樣本及小樣本中，第二代父母之平均教育程度，皆介於國中與高中之間，並無顯著差異。至於平均家庭收入，則父親或母親之平均每月家庭收入，在大樣本中，平均每月大約在 3 萬元至 5 萬元之間。表 1 當中，有關小樣本的資料有一非常有趣的現象，值得提出討論。第二代之父母（即受訪者自身）的嚴酷教養：母親的平均分數是 4.38，遠高於父親的平均分數（2.70）。有三個可能的解釋說明此一現象。其一，第二代之父親在教養其子女時，似乎比母親要來得「溫和」一些。其二，就是在第二代的家庭裡，仍是由母親負責大部份教養子女的工作，而為人父親者很可能較少「積極」參與教養子女的工作。最後，當然也有可能是隨機抽樣誤差所致。亦即，抽樣時剛好抽到一些對待子女比較不嚴厲的父親，及一些比較「勤教嚴管」的母親受訪者之故。表 2 所列的資料對此可以加以佐證。

表 2，仔細觀來，是個非常有趣的統計表。讀者或許可以從表 2 中，約略讀出台灣地區家庭是如何教養他們的小孩的情形。首先，無論是大樣本或小樣本，受訪者（第二代父母）宣稱曾受其父母以某種方式體罰者仍佔大多數。當他們還是孩童之時；不只是父親，連母親也難逃被嚴厲責打的噩運。然而，為人父者遭祖父母責罰的比例，大致上仍高於為人母者；尤其是在較嚴厲的體罰項目上。這一點符合一般人

表2 嚴酷教養之百分比

項目	大樣本				小樣本			
	父 (N=192)		母 (N=199)		父 (N=37)		母 (N=34)	
	第一代祖父母	自己	第一代祖父母	自己	第一代祖父母	自己	第一代祖父母	自己
1.打手心、屁股	81.3	—	70.4	—	67.6	59.5	70.6	79.4
2.打耳光	30.7	—	18.1	—	45.9	16.2	29.4	23.5
3.打身體其他部位	53.1	—	36.2	—	48.6	21.6	52.9	52.9
4.罰跪	59.9	—	49.7	—	70.3	37.8	67.6	50.0

——資料從缺

的日常印象。

基本上，我們可以想像第二代的父母們，大多數是在祖父母的打罵聲中，度過他們的童年。表 2 指出，在大樣本中，81.3%的為人父者及 70.4%的為人母者，有過被其父母打手心或打屁股的經驗，而小樣本中則分別為 67.6%（為人父者）及 70.6%（為人母者）。說明台灣地區上一代的家庭裡，父母以打手心或打屁股的方式來教養小孩是非常普遍的。對當時的小孩而言，甚且是家常便飯。同樣地，罰跪也是當時小孩普遍的共同經驗。表 2 顯示大樣本中有 59.9%的為人父者與 49.7%的為人母者，回答他們有被罰跪的經驗。在小樣本中，這個比例甚至更高達 70.3%（為人父者）及 67.6%（為人母者）。小樣本的百分比高於大樣本，有可能是因為小樣本中的第一代家庭因在時間上屬於比較更早一些（小樣本中，第二代父母的平均年齡較高）。因此，第二代遭嚴酷教養的機會可能更多。總之，在台灣地區第一代祖父母所組織的家庭裡，打手心、打屁股和罰跪等體罰方式，可以看成是當時家庭的「慣常」教養方式；且無性別上的差異，祖父母一律以同樣的方式管教其子女。

表 2 同時統計了打耳光及打身體其他部位等，更為嚴厲之體罰方式。在大樣本有 30.7%的為人父者及 18.1%的為人母者宣稱有被其父母打耳光的經驗；而小樣本中則分別為 45.9%（為人父者）及 29.4%（為人母者）有過類似的經驗。大小樣本共同點是，為父之人（當時的男孩）比為母之人（當時的女孩）更有機會遭此「毒手」。此性別上的差異，有可能是因為男孩比女孩更頑皮，因而更容易犯下會被如此對待的大錯。至於打身體其他部位：大樣本反應出同樣的趨勢，即為人父者（53.1%）比為人母者（36.2%）更容易遭其父母「打身體其他部位」的處罰。小樣本則有所不同，只有 48.6%的第二代父親和高達 52.9%的第二代母親有被打身體其他部位的經驗。此現象或許如前所推測的，有可能因樣本太小之故，並無統計上的顯著差異。然若非抽

樣誤差所致，則也有可能是受訪的第二代母親，正好較屬桀驁不馴的一群，因此她們被其父母「特別關照」的機會也就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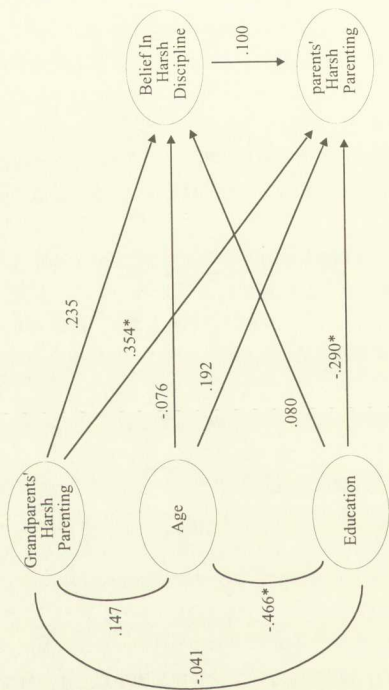
接下來，讓我們看看第二代父母的教養方式。由於大樣本中無此資料，故以下的說明完全是以小樣本為依據。表 2 指出，有 59.5% 的第二代父親及 79.4% 的第二代母親，承認他們曾經打過自己小孩的手心或屁股，比起第一代之祖父母，第二代的父親減少了對其子女打手心或打屁股的行為，但母親卻反而增加了。一般而言，第二代之父母以打手心或打屁股的方式來教養其子女的現象，於當代台灣地區的家庭中，似乎仍普遍盛行。罰跪的情形則有相當大幅度的降低，只有 37.8% 的父親及 50% 的母親承認他們有令其子女罰跪的紀錄。統而言之，第二代的父母自稱比他們自己的父母，較少以打手心或打屁股或罰跪的方式來教養他們自己的小孩。在打耳光及打身體其他部位等較為更嚴厲的體罰項目上，也有同樣的趨勢。除了為人母者在打身體其他部份的項目上沒有降低之外（有 52.9% 的第二代母親承認他們曾經打其子女的身體其他部份，這個百分比正好與其自身被打的百分比一模一樣），其餘的項目都減少了（16.2% 的第二代父親與 23.5% 的第二代母親承認曾打其子女耳光，另有 21.6% 的第二代父親回答曾打其子女的身體其他部份）。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變項雖不致有一一對應的關係，但兩者之間的相關係數是非常之高的。表面看來，似乎頗有「我的父母如何管教我，我就如何教養我的子女」的意味。稍後，本文的推論中，將再詳細討論此現象。與第一代的祖父母相比，根據第二代父母的自述，第二代的父母似乎更不輕易以此嚴厲的方式來管教其子女。到底是什麼原因以致於此？下一步的資料分析，即嚐試回答此問題。總之，初步的資料分析顯示：台灣地區的「嚴酷教養」情形，在代間傳承之中，似乎有改善的趨勢。表 2 的結果反映：第一代之祖父母比第二代之父母，更常使用較嚴酷的教養方法來管教其子女。這個發現與西方的實證研究結果是一致的（Simons et al., 1991）。表 2 同



時也反映出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第二代之父親雖然比第二代之母親受到更嚴酷的教養對待，但第二代之母親在採用嚴酷的教養方式的比例上似乎遠高於父親。這個現象乍看之下，似乎與代間傳承之仿效機制模式有矛盾之處。一個可能的解釋乃是：如前所述，父親可能較少頻繁地參與對子女的管教，故在比例上反而顯現比母親還低的嚴酷教養行為。但比例較低並不表示就比較不嚴酷，一個有趣而且應進一步探問的問題是：父親對子女的管教，是不是不參與則已，一旦參與即表示事態嚴重，必定以極為嚴酷的方式為之。本研究因無此方面的資料，故無法對此假設進行直接的檢證。但這是一個值得加以探究的論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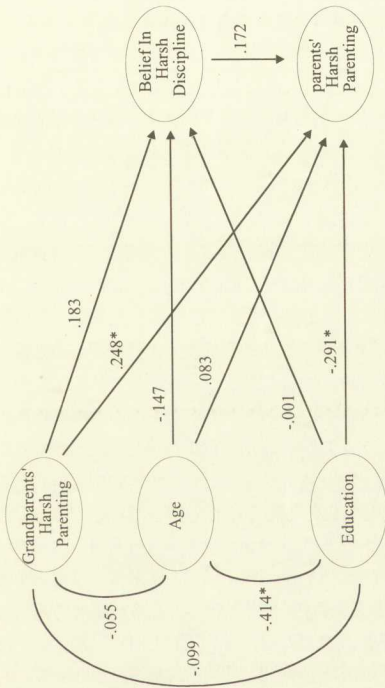
圖 2 及圖 3 顯示以小樣本來推定第一代之祖父母與第二代之父母的「嚴酷教養方式」之間的關係。圖 2 是第二代父親的路徑分析模型。圖 2 清楚的指出第一代祖父母之嚴酷教養方式，對第二代父親之嚴酷教養方式有直接且顯著的影響 ( $b = .354$ )。而祖父母的「嚴酷教養」對第二代父親之「對嚴厲體罰的相信程度」並無直接影響，且第二代父親之「對嚴厲體罰的相信程度」與其「嚴酷教養」行為亦無顯著相關。換言之，對第二代之父親而言，他們似乎並沒有先經過「形成接受的態度」、而後再「養成其嚴酷教養的行為」的過程，從而習得其父母教養子女的方法。圖 2 模型中，另一值得一提的現象是，教育似乎扮演了一個調節者 (moderator) 的角色。教育程度對第二代父親的嚴酷教養行為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 $b = -.290$ )，亦即教育程度愈高，愈會減少其對子女的嚴酷教養行為，此現象驗證了教育的功效。

圖 3 則是第二代母親的路徑分析模型。雖然各路徑所示之係數與圖 2 有所不同；圖 3 顯示了第二代之母親與父親一樣，遵循同樣的機制，習得第一代祖父母的教養方法。對於第二代的母親而言，圖 3 指出：第一代祖父母之嚴酷教養方式也直接地影響第二代母親的教養方式 ( $b = .248$ )。而祖父母之「嚴酷教養」對母親之「體罰相信程度」並



\*Significant at .10 level

圖 2 小樣本路徑分析模型——父親模型 (N=37)



\*Significant at .10 level

圖 3 小樣本路徑分析模型——母親模型 (N=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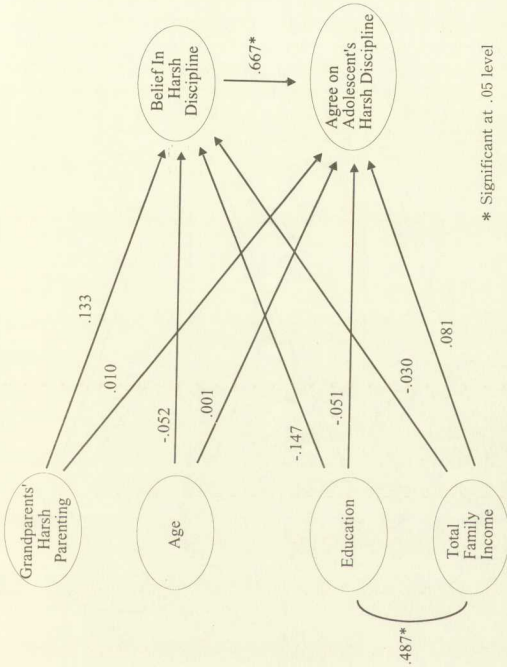
無顯著影響，同時，第二代母親之「體罰相信程度」與其「嚴酷教養」行為之間，亦無顯著相關。再者，教育同樣提供重要的影響力 ( $b = -.291$ )，負向地影響母親的嚴酷教養行為。亦即，教育程度愈高的母親，愈不傾向以嚴厲的體罰方式來管教其子女。

總結圖 2 與圖 3，直接路徑的觀點受到實證資料分析的支持。亦即，第二代為人父母者，並未有先「形成接受的態度(規範性的理解)」，而後再「養成其嚴酷教養的行為」的跡象，而是直接的從親身體驗、觀察學習到第一代祖父母的教養行為，從而施之於下一代。

圖 4 及圖 5，分別以大樣本中第二代父親及母親的兩份資料為依據，推定第一代與第二代之間的「代間教養傳承」模式。如前所述，由於大樣本中並沒有第二代父母自身的嚴酷教養行為資料；因此，圖 4 及圖 5 只能用來間接的驗證前面所提示的兩個觀點。圖 4 的模型中，第一代祖父母之「嚴酷教養」行為對第二代父親之「對體罰之相信程度」及「對子女被嚴厲對待的贊成度」都沒有顯著的影響。換言之，第二代父母先經由社會學習的過程，認同第一代祖父母的嚴酷教養方式，形成接受的態度，然後再養成其自身的嚴酷教養行為，這個間接的理論機制，在圖 4 的模型中，似乎也並沒有受到支持的跡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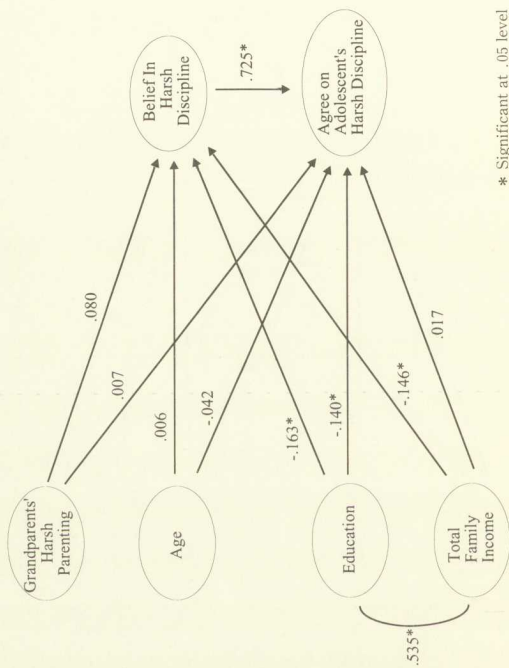
雖然圖 4 模型中第二代父親之「對體罰的相信程度」與「對子女被體罰的贊成度」相關甚高 ( $b = .667$ )，但其在研究方法上所指涉的問題，比其在理論上的可能意涵，更為本文所關切。詳細情況將在下面的總結與討論章節裡討論。圖 4 顯示，年齡對上述兩依變項都沒有顯著影響，意味著教養方式的代間傳承，在各年齡層中都相當普遍而穩定，這可能是因為教養乃屬相當長期的持續性行為所致。教育程度在第二代父親的模型上，對此二依變項也都沒有顯著影響，則比較令人意外。但如此並不意味教育對第二代父親的教養行為也沒有顯著影響，須以其他更完整的資料來論辯這層可能的關係。

圖 5 則是大樣本中，母親的路徑分析模型。圖 5 基本上反應出和



\* Significant at .05 level

圖 4 大樣本路徑分析模型——父親模型 (N=192)



\* Significant at .05 level

圖 5 大樣本路徑分析模型——母親模型 (N = 199)

圖 4 之父親模型一樣的情形。第一，第一代祖父母之嚴酷教養方式對第二代母親之「體罰相信程度」與「對第三代子女受到體罰之贊成度」也都無顯著影響；第二，年齡對此二依變項亦無顯著影響；最後，兩依變項間也是高度相關( $b = .725$ )，更反映出社會調查方法中，僅由單一受訪者提供資料來源的嚴重性。

圖 5 母親模型與圖 4 父親模型的不同點乃在於：教育與家庭收入對第二代母親教養態度的負向影響。教育程度與收入高度相關( $r = .535$ )，因此可以視為社經地位(SES)的兩個指標。圖 5 顯示教育程度對母親之教養態度(包括己身所受以及其子女所受)都有顯著的影響(分別是  $b = -.163$  及  $b = -.140$ )，而收入對母親之「對體罰的相信程度」亦有顯著之負向影響( $b = -.146$ )。換言之，社經地位愈高之第二代母親愈傾向不贊成使用嚴厲的體罰來對待其子女。至於圖 4 及圖 5 所示之可能的性別差異，其機制為何及是否具有理論意義，則囿於資料所限，本文並不能提供直接的佐證，需有更進一步的研究，才能加以論斷。總之，與圖 4 模型一般，圖 5 模型也佐證前述之間接的理論機制，似乎不受實證資料支持。但是，如同本文在前面研究方法部份所提及的：本文以「對學校老師體罰的贊成程度」作為認知歷程的指標變項，可能不是一個符合理想的測量。本文據此而作以上的推論，事實上是相當持保留態度的。本文將視此「推論」為一可實際檢證之研究命題，日後將以更適當的資料檢證之。

## 四、總結與討論

在對本研究的發現作進一步的推論之前，有些方法上的問題與資料本身的限制，應先被提出說明並討論。首先讓我們討論一下方法上的問題及其可能的影響。第一，本研究所取用的資料(包括大、小樣本)都僅由單一受訪者所提供；更具體而言，模型中的每一個變項的

資料，皆來自同一受訪者的自述。對於社會調查方法稍有認識者皆知，受訪者為使自己的回答看起來合乎邏輯，在作答時，往往會考量問卷中問題彼此之間的關聯性，而有所「調整」。因此，在確定根據資料分析所得之各變項間的關係，就是各變項之間的真正關係之前，吾人必須先考慮這樣一個狀況：即根據資料分析所得之各變項之間的關係，是否僅僅只反映出「所有的資料都來自同一受訪者」此一簡單的事實？第二，「單一受訪者」再加上「社會贊許度 (social desirability)」的考量，乃更可能扭曲了變項間真正的關係強度(可能高估或低估)。由於本研究所探討的是代間的教養行為，不只研究受訪者本身的態度及行為而已，同時也問及受訪者父母的教養行為。受訪者可能會過度誇大第一代的嚴酷教養行為，而對自己的嚴酷教養行為則過分低估。因此，本文在推論分析結果之時，把這方法上的問題也考慮在內。第三，本文雖以父親、母親來稱呼受訪者，但讀者必須記住，本研究中的父親、母親乃是來自不同的家庭，彼此間是獨立的。因此，資料所顯現的可能的性別差異，不能馬上被斷定真的就是性別差異，因為這些性別上的差異，可能僅僅是反應出不同的家庭之間的差異。一個比較理想的資料搜集方法，應是同時對同一家庭的父親及母親乃至第一代祖父母或第三代的子女，進行交叉訪問，如此即可有效解決以上所列的許多方法上的問題。最後，則是有關變項的測量問題，尤其是在態度變項的測量上。本研究原先構想建構一個更概化的「對暴力體罰行為的相信程度或贊成程度」之態度變項。因為，根據社會學習理論，個人如果經常遭受父母的嚴厲對待，則會傾向養成對攻擊性行為方式的普遍接受。但本研究因受資料所限，無法建構一個較全面性的態度測量變項，因此本文對研究結果基本上持審慎之態度。

本研究之資料分析發現(1)在台灣地區習慣以較嚴厲的教養方式對待子女的家庭並不在少數，(2)第一代之祖父母比第二代之父母更常以嚴厲的方式管教其子女。以上的發現，基本上說明了台灣地區家庭之



「嚴酷教養」正持續和緩中，這些發現與西方的經驗資料相吻合。有兩個可能的理論意涵來解釋此現象：(1)嚴酷教養之代間傳承模式，可能有泛文化的相似性；(2)本研究的方法與西方的研究方法如出一轍，以致有相同的發現。目前本文較傾向第二個解釋，但真象如何，有待進一步的經驗研究。本研究同時發現，第二代父母之所以會減少嚴酷之教養行為，主要可能是拜教育之賜，這點與西方的研究結果亦不謀而合。只是在台灣地區其影響之強度較西方的研究所發現者為弱。於此，本文提出兩個論點：(1)教育或許真有「潛移默化」之功效，能對個人之行為學習發揮「調和修正」的影響力；(2)是否尚有其他本研究未包括之重要變項與教育有互動之作用，而對台灣地區的教養行為產生不同於西方之影響。本研究所掌握的資料目前尚無法回答這個問題，需待接續之研究。

本研究最主要的發現是，「嚴酷教養」的代間傳承，似乎是依循直接仿效的機制，而非依循間接之「先形成規範性理解（即形成接受之態度），再養成同樣行為」的機制。這個發現也與西方的文獻資料契合，只是，台灣地區研究所發現的代間傳承的關係強度，仍然不如西方研究所發現者。這個同中有異的現象，到底是因何而起，值得進一步深思、探究。無論如何，對此研究發現的一個可能解釋是：教養行為對施者與受者而言，都是最熟悉而幾乎天天要面對的，而且通常都是由最親密的父母所執行的，因為太密集、太熟悉之故，個人只需「日日而演練之」透過不斷的施與受，即可輕易的學得己身所受的對待方式，並自然而然地施之於家庭中的下一代或其他人，而不需多此一舉地經過「態度養成」的步驟。

過去，台灣地區甚少有研究者專注於教養行為代間傳承的探討。本研究乃屬此項研究議題的一個開端。教養行為的代間傳承，基本上是家庭過程中重要的一環。事實上，不只是教養行為在家庭過程中進行代間傳承，許多其他的個人行為，如衛生行為（包括心理與生理）、

攻擊性行爲、健康行爲等，甚至態度的養成等等，也都透過家庭過程而有代間傳承的現象。家庭乃是個人日常活動的最重要場所之一，從搖籃到墳墓，個人的生命歷程與家庭過程是密切而不可分的。了解家庭內教養過程之機制對個人生命發展的影響，乃是了解個人行爲發展的一個重要切入點。因此，研究家庭中教養行爲的代間傳承，無疑的是非常重要而又迫切必行的。

## 參考書目

吳秀碧

1981 父母管教態度與犯罪少年自我觀念之關係。輔導學報 4:135-158。

林文瑛、王震武

1995 中國父母的教養觀：嚴教觀或打罵觀？本土心理學研究 3:2-92。

高淑貴

1990 影響青少年社會行為的家庭因素。婦女與兩性學刊 1:49-86。

黃春枝

1987 國中學生親子關係與學校生活適應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學報 55:83-140。

賴爾柔

1989 家庭親職功能及其青少年學業成就關係之研究。思與言 26 (6):606-630。

瞿海源主編

1991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二期第一、二次調查計劃執行報告。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Bandura, A.

1977 *Social Learning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1986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Bronfenbrenner, U.

1977 Toward an Experimental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American Psychologist* 52:513-531.

Burgess, R. L. and L. M. Youngblade

1988 Social Incompetence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Abusive parental practices. In G. T. Hotaling, D. Finkelhor, J. T. Kirkpatrick, and M. A. Straus (eds.), *Family Abuse and Its Consequences: New Direction in Research* (pp. 38-60). Newbury Park, CA: Sage.

Egeland, B., D. Jacobvitz, and K. Papatola

1987 Intergenerational Continuity of Abuse. In R. J. Belles and J. B. Lancaster (eds.),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Biosocial Dimensions* (pp. 255-276). NY: Aldine de Gruyter.

Galdston, J.

- 1965 Observations on Children Who Have Been Physically Abused and Their Par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22:440-443.
- Garbarino, J.
- 1976 A Preliminary Study of Some Ecological Correlates of Child Abuse: The Impact of Socioeconomic Stress on Mothers, *Child Development* 51:238-241.
- Green, A., R. Gaines, and A. Sandgrund
- 1974 Child Abuse: Pathological Syndrome of Family Inter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1:882-886.
- Herrenkohl, E. C., R. C. Herrenkohl, and L. J. Toedter
- 1983 Perspectives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Abuse. In D. Finkelhor, R. J. Gelles, G. T. Hotaling, and M. A. Straus (eds.), *The Dark Side of Families: Current Family Violence Research* (pp. 305-316). Beverly Hills, CA: Sage.
- Hotaling, G. T., D. Finkelhor, J. T., Kirkpatrick, and M. A. Straus
- 1988 *Family Abuse and Its Consequences: New Dimensions in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 Hunter, R. and N. Kilstrom
- 1979 Breaking the Cycle in Abusive Famil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6:1320-1322.
- Jayartne, S.
- 1977 Child Abusers as Parents and Children: A Review, *Social Work* 22:5-7.
- Kaufman, Joan and Edward Zigler
- 1987 Do Abused Children Become Abusive Par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57:186-192.
- Kaufman, Joan and Edward Zigler
- 1989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hild Abuse. In Dante Cicchetti and Vicki Carlson (eds.), *Child Maltreatment: Theory and Research on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ccoby, E. and J. A. Martin
- 1983 Soc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Family: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In P. Mussen (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pp. 1-101). New York: Wiley.
- Rohner, R. P.

- 1986 *The Warmth Dimension: Foundations of Parental Acceptance-Rejection Theory*. Newbury Park, CA: Sage.
- Silver, L., C. Dublin, and R. Lourie  
1969 Does Violence Breed Violence: Contributions from a Study of the Child Abuse Syndrom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26: 404-407.
- Simons, Ronald L., Rand D. Conger, and Les B. Whitbeck  
1988 A Multistage Social Learning Model of the Influences of Family and Peers upon Adolescent Substance Use, *Journal of Drug Issues* 18:293-316.
- Simons, Ronald L., Les B. Whitbeck, Rand D. Conger, and Chyi-in Wu  
1991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Harsh Parent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7:159-171.
- Steele, B. and C. Pollack  
1968 A Psychiatric Study of Parents Who Abuse Infants and Small Children. In R. Helfer and C. Kempe (eds.), *The Battered Child Syndrome* pp. 103-14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teinmetz, S. K.  
1977 *The Cycle of Violence: Assertive, Aggressive, and Abusive Family Interaction*. New York: Praeger.  
1987 Family Violence. In M. B. Sussman and S. K. Steinmetz (eds.), *Handbook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pp. 725-765). New York: Plenum Press.
- Straus, M. A.  
1983 Ordinary Violence, Child Abuse, and Wife-Beating: What Do They Have in Common? In D. Finkelhor, R. J. Belles, G. T. Hotaling, and M. A. Straus (eds.), *The Dark Side of Families: Current Family Violence Research* (pp. 213-234). Beverly Hills, CA: Sage.
- Straus, M. A., R. J. Gelles, and S. K. Steinmetz  
1980 *Behind Closed Doors: Violence in the American Family*. Beverly Hills, CA: Sage.
- Wolfe, D. A.  
1987 *Child Abuse: Implications for Child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Newbury Park, CA: Sage.



# 結構限制、運動參與、與異議性意識： 台灣民衆政黨支持的社會結構基礎初探\*

王甫昌\*\*

## 摘 要

本文的目的，在於探討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台灣政治與社會變遷的微觀社會結構基礎。作者指出，過去對於台灣政黨政治變遷的研究，往往是由民眾政治意識轉變的「結果」，來解釋民眾的政黨支持的轉變；對於民眾如何取得這些異議性政治意識（例如支持民進黨者的民主理念、台獨意識、或省籍意識等）的「過程」，則較少進行有系統的探討。由社會運動的觀點來看，這些異議性政治意識的取得，其實是在民眾參與反對運動活動的過程中，逐漸接受反對運動意識形態的結果。因此，民眾對於反對運動的活動參與頻率為什麼增加，乃成為解釋一九八〇年代台灣政治社會變遷的重要環節。相對於過去許多研究者認為威權控制鬆動使得民眾較敢參與的「動機論」，本文提出了部份民眾因為經濟結構的改變而較有時間參與反對運動活動的「結構（限制）論」，來解釋此一時期參與反對運動的增加。一九八〇年代以後，因為職業

---

\* 本文使用的資料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於一九九三年七月所執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之「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二期第四次調查資料（計畫編號：NSC 82-0301-H-001-050-B1），謹此致謝。本文初稿曾以「台灣民衆政黨支持的社會結構基礎」為題，宣讀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之「變遷中的台灣社會研討會」。作者感謝評論人王振寰教授的修改意見，及三位匿名評審人的審查意見。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

結構的轉變、工時的縮短、及民眾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台灣有較多的民眾擁有較多的「可自由支配的時間」，可以參與各種社會運動，包括反對運動的活動，進而使他們較可能支持民進黨。這乃是本文所謂的政治或社會變遷的「社會結構基礎」。在經驗分析的部份，本文運用了「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資料去驗證此一解釋。分析結果發現，異議性的政治意識形態，的確對於本省籍民眾的政黨支持有重要的影響；這些意識和他們對於反對運動的參與有密切的關係；而個人的社會結構位置又對於其運動參與形成助力或限制。



# **Structural Constraint,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nd Dissent Ideology: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Social Structural Bases of Party Support in Taiwan**

Fu-Chang Wang

##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to uncover the micro-social structural bases of socio-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during the 1980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previous studies on changes in party politics have tended to explain shifts in party support among the populace by their transformed political ideology, without examining the "process" of their transformations. The acquisition of dissenting ideologies, which includes democratic values, pro-Taiwan-independence attitudes, and ethnic consciousness is in fact a "result" of frequently participating in opposition movements. The issue, then, is: why did more people participate in opposition movements in 1980s? In contrast to arguments that emphasize increased motivation for participation as a result of regime permissiveness, this paper suggests an alternative structural explanation by arguing that people participated more because more of them became "structurally available", which in turn was a result of economic change. Due to changes in economic structure, the reduction of working hours, and highe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people had more discretionary time to spend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hence were mo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opposition movements in the 1980s. This constitutes the social structural basis of socio-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By analyzing the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Data" in terms of the proposed explanation, it is found that: 1) dissenting ideologies are important determinants of party support; 2)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ideologies is highly related to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nd 3) movement participation is greatly constrained or facilitated by one's position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 結構限制、運動參與、與異議性意識： 台灣民衆政黨支持的社會結構基礎初探

## 一、前言：政治變遷的社會結構基礎

對於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台灣社會所面臨的政治與社會鉅變，台灣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已經逐漸從不同學科的觀點，針對不同面向的社會變遷提出一些可能的解釋。在目前既有的研究或解釋中，一般而言，政治學者比較著重在分析這一段期間的政治變遷，特別是政黨競爭及政黨支持的議題，而社會學者比較將分析的對象鎖定在社會運動上；只有少數的研究者嘗試去處理二者之間的關係（例如，張茂桂 1989；吳介民 1990；Chu [朱雲漢] 1990）。這種分工現象，也可以進一步由台灣目前的社會運動研究的對象看出；例如，蕭新煌在界定一九八〇年代以來的台灣新興社會運動時，就沒有將政治反對運動納入社會運動的範疇（蕭新煌 1989）；一般人也很少將從「黨外」以來的政治反對運動視為社會運動（張茂桂 1994:34）。在這樣的分工下，有關台灣政治反對運動支持基礎的發展與擴張的現象，一直較少被學者以社會運動的觀點來加以解釋。<sup>1</sup>

政治學的觀點由於比較偏重「精英—政治過程」層次的分析，往

---

1 在本文中，作者並不打算討論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是否是社會運動，因為這個問題牽涉到對於社會運動意義及本質的界定，和本文主要的目的無關。在本文中，作者只是想運用社會運動的研究中所發展出來的若干概念，來解釋台灣政治反對運動發展中的一些現象。

往將對於政治變遷的解釋重點，放在精英，包括執政者及挑戰者，之間的互動之上（例如，鄭敦仁 [Cheng] 1989）；相對而言，對於民眾政治意識及行為的轉變「過程」的研究課題，比較不注意。即使是以個人層次的政治意識因素解釋政黨支持的經驗研究，也大多以民眾政治意識轉變的「結果」，來解釋其現在的政黨支持行為。例如，目前關於台灣民眾政黨支持的研究，已相當明確的說明了「族群意識」、「台獨意識」（或國家認同的分歧）、「民主的價值」、以及與上述因素相關的「選舉議題」等等政治意識元素，是影響民眾支持民進黨的重要原因（吳乃德 1993；徐火炎 1992, 1993；游盈隆 1993）。然而對於台灣民眾是如何取得、或發展出這些政治意識的「過程」，目前的研究較少做有系統的探討（陳明通 [1993] 是一個例外）。

然而，民眾如何取得、或發展出這些相對於官方說法的「異議性」政治意識元素，其實是解釋台灣政治變遷過程的重要環節。就解釋的層次來說，它們或許是台灣政治「變遷」的主要涵義之一。我們不能將這些政治意識元素的發生，都簡單的歸因給「二二八事件」以來的台灣政治結構所隱含的族群不平等、或國民黨的一黨威權統治，因為由對於「不平等的權力結構安排」形成集體認知，到對於這樣的安排形成一種「不公義」的集體詮釋之間，正是台灣反對運動在共識動員（爭取民眾支持其觀點）上最大的挑戰（王甫昌 1996）。尤其是對於在戰後出生長大、沒有親身經歷「二二八事件」的世代來說，這項挑戰更是困難。在國民黨長期以來對於異議者及挑戰其權威的意見打壓、並以動員戡亂的理由，建構及傳輸一套合理化現狀的意識形態的狀況下，戰後出生的世代的異議性政治意識，不是過去被壓抑的親身經驗在外在限制解除後的重新浮現，而是新近取得的態度。即使是親身經驗二二八事件的戰後第一代，現在所具有的異議性政治意識，也不是其過去個人親身經驗必然衍生的結果。因為，他們目前所擁有的異議性政治意識，可以說是一套反對運動支持者之間分享的「集體意識」

內涵；它們是反對運動的領導者與潛在的支持者之間，經過長時間的互動，才慢慢形塑出來的一套意識形態。因此，影響個人取得這些異議性政治意識的因素及其發生的過程，是對於台灣政治變遷的解釋中，必須處理的重要議題。

在這樣的想法下，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這些政治變遷的原動力，或者促成變遷的因素是什麼？這個問題，可以由反對運動「發展時機」去回答，也可以由社會中「那一個部門是此一變遷主要的承載者」去回答。前者主要涉及的，是一個跨時性(longitudinal)的解釋；而後者是跨部門性(cross-sectional)的解釋。目前既有的研究指出的一個答案，主要是關於「發展時機」的：國民黨過去固若金湯的威權控制，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後的逐漸鬆動，提供了反對運動快速發展的條件及環境(例如，王振寰 1989; 李筱峰 1987; 彭懷恩 1987)。但是這樣的說法在解釋上仍有不足。對於反對運動而言，「威權控制的鬆動」解除了一項不利於運動發展的消極限制因素：也就是降低了參與運動的成本(王甫昌 1996)。這樣的說法或許能夠部份地解釋運動發展時機，特別是為什麼反對運動的第一波的挑戰(一九七〇年代中期)最後在「美麗島事件」的鎮壓下受挫，而第二波的挑戰(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卻成功的觸動了近四十年來最大的政治變遷。但是，它並不是個完全的解釋，因為它不能告訴我們人們為何、或如何取得異議性的政治意識，進而支持反對運動，或者是那些人較可能取得。介於「外在限制因素的解除」及「支持基礎的增加」二者之間的，正是反對運動政治動員的過程。然而目前關於民眾政黨支持的研究，多半沒有探討反對運動政治動員的「過程」，而是直接用動員的「結果」，來探討它們和政黨支持的關係。

因此，本文主要的研究問題是：在台灣面臨重大社會變遷的一九七〇年代到一九八〇年代之間，對於政治變遷的影響因素，除了威權體制控制的鬆動之外，是不是有其他的社會結構變遷，也使得更多的

民眾較可能參與運動，進而讓反對運動有較大的發展空間？過去社會運動的研究文獻中，關於社會變遷與社會運動之間關係的探討，可以作為我們思考這個問題的起點。

## 二、社會變遷與社會運動二者關係的理論探討

在過去的研究中，作為政治或社會變遷主要發動者、與承載者的「社會運動」為什麼會興起，一直是一個備廣討論、但也引起相當多爭議的課題。一九七〇年代以後，隨著各種不同類型的社會運動在工業化社會中出現的頻率的升高，關於社會運動的研究，也由過去在社會學中居於邊緣的位置，逐漸成為核心的課題之一(Jenkins 1983)。<sup>2</sup>而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中，研究者對於社會運動興起的解釋，在基本假設及主要的論點上也經歷了相當的變化。一九六〇年代以前，在社會學功能論的典範之影響下，一般研究者（特別是美國的社會學者）多半採用「心理論」(McCarthy and Zald [1973] 及 McAdam [1982] 將它們稱為社會運動的「古典理論」)的觀點，來解釋社會運動(例如，Gurr 1970; Turner and Killian 1972; Smelser 1963)。心理論者認為，社會運動（甚至革命）是因為人們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感受到心理上的不滿，而起來參與集體行動的結果(請參見 Gurney and Tierney [1982] 對於此一理論傳統的評述)。當社會中這些累積的心理不滿(可能是「相對剝奪感」、也可能是迷亂或疏離)達到沸點，或是升高的期望與實際的滿足之間的落差達到最大時，社會運動便應運而生(Davies

2 在一九七〇年代以前，社會運動被認為是「集體行為」的一種，本質上是不理性、暫時性、或異常的社會現象。因此，在早期的社會學教科書中，它們通常是和「集體行為」、甚至「社會偏差」放在一起介紹。

1962)。這一類的理論認為心理不滿是個人社會運動參與的主要基礎，也是運動發生的主要原因。

心理論對於社會運動的解釋，在一九七〇年代以後，逐漸受到「資源動員論」(resource mobilization model)者的批評(例如, McCarthy and Zald 1977)。資源動員論者在權力分配的精英論典範的影響下，認為在任何社會或權力結構的安排下，居於結構位置弱勢者的相對剝奪感或不滿，是恆常存在的狀況。然而居於弱勢的團體，也往往是一個社會中最沒有資源或能力自己發起社會運動，以改變不利於他們的結構安排的一群人。因此，不滿或挫折通常並不足以解釋運動的產生；充其量它們只是運動產生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造成社會運動崛起的重要因素，因此是成功的資源動員，特別是「外在的資源」的注入 (Jenkins and Perrow 1977)。

以上這兩個以美國的經驗為主發展出來的理論，對於「社會變遷」及因而引發的「心理不滿」，在社會運動的崛起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著相當歧異的看法。「心理論」認為社會結構的變動，將造成舊有社會秩序或規範的破壞，進而導致人們的心理狀態受到擾亂；社會運動便是民眾對於此種心理狀況的直接反應(見 McAdam [1982] 對於此一論點的整理與評述)。在這樣的觀點下，心理不滿是社會變遷及社會運動之間的中介變數，社會變遷對於社會運動的影響，主要是在於它增加人們的不滿，特別是相對的剝削感。社會變遷似乎直接導致社會運動。如果將這個解釋的邏輯，運用到一九八〇年代台灣社會的各類社會運動大量興起的風潮中，則民眾因為經濟的快速發展，及生活情況的富裕，導致對於政治或社會參與的期望升高、及失望的增加，便成為重要的解釋因素了。高承恕(1989)對於一九八〇年代台灣新興社會運動，為何反而是在經濟情況改善時增加，所提供的一般性解釋，便是採用這樣的觀點。朱雲漢(1989:153)對於政治反對運動的發展，也有類似的觀察。

「資源動員論」對於社會變遷、心理不滿、及社會運動三者之間的關係，則有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心理不滿（或是其他心理的因素）本身並不足以解釋運動的出現。社會變遷對於運動的影響，主要是因為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財富增加，造成運動團體以外可以注入社會運動的資源（包括金錢、專業組織能力等）也跟著增加；對於這些新增資源的動員，使專業性運動組織能夠被建立並且維持下去，才是社會運動興起的主要因素 (McCarthy and Zald 1977)。McCarthy and Zald (1973) 最早對於一九六〇年代美國社會運動風潮的解釋，便是採用這樣的觀點，他們認為：金錢、可自由支配其工作時間的人力、及專業社會運動組織等等外在資源的增加，是促成六〇年代社會運動風潮的主因。不過，在稍後的研究中，多數的資源動員論者往往將注意焦點放在專業社會運動組織上；專業社會運動組織儼然成為最重要的「資源」。<sup>3</sup> 相對的來說，社會運動的大眾支持基礎，在這一類的研究中比較被忽略。（這也是 McAdam [1982] 對於資源動員論的批評之一）。有些資源動員論者更明白的宣稱，只要有足夠的資源及組織，大眾怨氣是可以被運動組織或精英創造、操縱、或界定出來的 (McCarthy and Zald 1977:1215)。因此，怨氣、不滿，甚至連同社會運動的大眾支持基礎，在這樣的觀點中都是比較不重要的。這樣的看法，充分的反應了政治社會學中「精英論」(elite model) 對於一般大眾在政治體系及過程中，相對於精英的無權狀態之假設 (Marger 1987)。

資源動員論對於物質資源（特別是金錢及專業運動組織）的重視，

3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這樣的分析焦點也許有其方法論上的考慮，而不全然是分析上的考慮。例如，張茂桂 (1989) 在《社會運動與政治轉化》一書中以資源動員的觀點分析台灣在八〇年代的運動風潮時，對於八個社會運動所做的經驗資料的分析，都是以運動組織的出現、結盟、分化、及其所發動的運動事件為焦點。對於這樣的做法，張茂桂指出這是因為物質資源（例如金錢或人力）不易直接觀察，而不得不採取的研究方法（張茂桂 1989:46）。



及對於大眾支持基礎的忽視，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後，引來了相當多的批評。McAdam (1982) 就指出，社會運動的大眾支持基礎，其實是運動可以依賴的最重要的資源之一。即使是最沒有物質資源的弱勢團體，仍可以透過拒絕服從或干擾正常秩序的運作的運動策略，來迫使其挑戰的對象進行協商。而弱勢團體之所以不採用這樣的策略，通常是因為他們並沒有對既有的不平等結構安排形成「不公義」的共識；或者，即使有這樣的共識，卻認為這樣的狀況是不可能被改變的。McAdam (1982) 因此認為，對於不平等的結構狀況形成「不公義」詮釋，或扭轉這些弱勢團體對於自己無力挑戰、或改變自己處境的想法，是社會運動能夠興起的重要社會心理條件之一；他稱之為「認知的解放」。對於潛在支持者數量相當龐大的社會運動來說，這種共識的建立或傳播，更是運動最重要的資源及權力的基礎。個人對於運動意識形態的接受，可以說是參與運動的先決條件 (Klandermans and Oegema 1987)。

不過，過去的研究也強調，這些不公義的詮釋，並不同於與運動的主題有關的個人不滿；個人的不滿如果不能被適當的引導，去和特定社會運動意識形態對於問題的界定、診斷、與處方形成共鳴，則不一定能夠成為參與運動的基礎。換言之，對於運動的參與有直接影響的，通常不是因為「個人」親身經驗而產生的不滿，而是個人透過和運動的意識形態的互動後所產生、或接受的「集體」意識。個人親身經歷的不滿，或許可以使個人較可能接受運動對於其所遭遇的怨恨所進行的結構性歸因，但是它並不能保證個人最終一定會發展出類似運動的意識形態、或接受運動的意識形態。Snow 等人將社會運動企圖在潛在支持者之間創造共識的互動過程稱為「認知架構調整的過程 (frame alignment process)」 (Snow, Rochford, Worden, and Benford 1986)。由於個人對於自身所遭受的不幸，所採取的詮釋性認知架構，和特定社會運動的意識形態中所建構的認知架構之間，常有

不一致的現象，而且這些不一致的程度往往也有相當大的個別差異，因此運動對於不同的潛在支持者，必須進行的認知架構調整過程，在種類上及程度上也有相當大的差異。對於原先想法與運動意識形態差異較小者，運動的工作者只需要做細節的澄清、增強、或延伸，便能完成調整的工作；對於差異較大者，則需要從最基本的信仰、價值、及世界觀，做全面性的轉化 (Snow et al. 1986)。這些過程都需要社會運動工作者長時期的努力、符合運動詮釋的外在突發事件的適時發生、以及支持者持續的參與才可能完成 (王甫昌 1996)。

上述對於「心理論」與「資源動員論」的檢討，使我們對於社會變遷與社會運動二者之間的關係，有一個新的分析視野。上述的檢討提醒我們，社會運動能夠成功的動員，其實是有效的共識動員的結果。由社會運動如何對於一般民眾進行共識動員的角度來看，則社會變遷對於社會運動大量興起的一個可能的影響，在於社會變遷促進了社會運動共識動員活動發生的可能性。這可能包括：社會變遷降低了運動的動員、或民眾參與運動活動的成本。過去的研究中，早已說明了現代傳播或溝通科技的發展，大幅的降低了運動動員的成本 (Nielsen 1985)。電話、影印技術、傳真機、電腦網路的發展，都大大的降低了動員所需的時間。另外，一般民眾也可能因為經濟結構的改變，造成工作時間的縮短，而較有時間參與各式的社會運動。後一類因素是本文探討此一社會結構變遷時，將分析的焦點。

### 三、對於台灣反對運動發展的既有解釋

上述的討論對於我們解釋台灣反對運動的發展，有相當的啟發性。首先，由於台灣反對運動在一九八〇年代中葉之後，以「台灣人對抗外來政權的壓迫」作為主要的訴求，造成反對運動的潛在支持者涵蓋的範圍相當大 (若林正文 1989)。就反對運動的發展策略來說，動員到

較多的物質「資源」只是手段；其真正的目標，是希望得到更多民衆支持其觀點，進而在選舉中贏得較多的選票，甚至贏得政權。因此，反對運動所面臨的一個最重要挑戰，在於如何贏得民意的支持；這包括是否能提出一套能夠和國民黨的主導意識形態相抗衡的異議性意識形態，並且透過持續的共識動員活動，將它們普遍的散播到目標支持者之間（王甫昌 1994, 1996）。

作者在另一篇論文（王甫昌 1996）中，說明了民進黨成立後三年內（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九年之間），透過有系統的舉辦「共識動員」性的群眾活動（例如，演講會、說明會、歡送大會等），的確是造成這一段時期中，民進黨在兩次立法委員選舉之間選票增加的重要因素。在該篇論文中，作者對於民進黨群眾活動訴求主題、及「民進報」（民進黨的機關報）的內容分析，也顯示和省籍族群政治議題有關「國會全面改選」、「解除動員戡亂體制」、及「台灣獨立」等等民主化或台灣民族主義性的理念，是民進黨有系統地在共識動員的活動中，對於群眾訴求的一套異議性的意識形態的主要內涵。另外，在前面引述的一些分析台灣民衆的政黨支持的研究，也發現上述這些民進黨所欲宣揚的理念，是影響民衆投票支持民進黨的主要政治意識因素。這些對於不同層次分析單位（運動組織及個人兩方面）個別的分析結果，大致上說明了民進黨爭取民衆支持的主要訴求及策略，及運動者和潛在支持者之間的透過群眾活動的互動過程，對於民進黨擴大其支持基礎的顯著影響。

然而，為什麼反對運動的政治動員過程，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後達到高峰？為何一九七〇年代末期國民黨第一次的統治危機（用王振寰的說法），只短暫的激起民衆參與風潮？對於這個問題，一個經常被提出的答案是：國民黨鎮壓異議者的能力及意願，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前後有退縮的跡象。比較常被研究者指出的一個事件是：一九八四年的「十信事件」由於牽涉到高階政府官員的涉案，使得國民黨對

於此一民怨不敢輕易鎮壓，以免造成更大的反彈（張茂桂、朱雲漢、黃德福、許宗力 1992；吳介民 1990）。另外，一九八〇年代上半葉台灣社會中頻仍的「自力救濟」事件，多半是由比較邊緣的部門、以小規模的方式發起挑戰；在反對運動構成更大的政治威脅的狀況下，國民黨沒有對這些非政治性的事件立即加以鎮壓的必要（吳介民 1990）。這多少造成一般民眾對於國民黨容忍政治挑戰意願的重新估計，進而感受到過去滴水不漏的國民黨威權統治，有開始鬆動的跡象。雖然不同的研究者對於造成鬆動的原因的看法不盡相同，但是對於威權統治鬆動的後果看法則相當一致。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威權控制的鬆動導致反對運動發展」的論點。

作者認為國民黨鎮壓異議的意願或能力降低，的確是促成反對運動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光靠這個變數來解釋此一時期的快速發展，可能仍然不充分。因為即使是類似「威權控制鬆動」這樣的政治情勢認知，通常也是透過集體詮釋才逐漸浮現的想法，而非個人的獨立判斷結果。換言之，「威權控制的鬆動」必須經過集體詮釋的社會溝通過程，才能成為激發進一步的集體行動的基礎。<sup>4</sup> 這種異議性的集體詮釋過程為何能發生，因此是解釋這個政治變遷的一個重要環節。然而，目前的研究在解釋上，往往忽略了這樣的社會溝通過程。另外，威權控制鬆動的因素，雖然可以說明此一時期反對運動整體而言，較前一時期得到更多的民眾支持，但是它並不能明確的告訴我們反對運動的支持者是誰、或具有何種社會特徵？而且，前面的討論也告訴我們，反對運動的支持基礎增加，主要是某些民眾因為參與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活動頻率及幅度提高，而逐漸被轉化，接受了異議性的政治

4 這種觀點是社會運動理論中，強調建構「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 是社會運動發展的核心過程的「社會建構論」的看法（參見 Cohen 1985; Melucci 1989; Klandermans 1992）。

意識的結果。當我們以這樣的觀點，重新審視及界定我們的研究問題時，對於反對運動的發展，在解釋上的一個重要環節將是：為何民眾對於反對運動共識動員性的活動之參與，較前一階段增加？

以「威權控制的鬆動」來作為反對運動發展的主要解釋因素的不充分性，在這個重新界定的研究問題的關照下，便格外明顯。以「威權控制鬆動」作為主要的解釋因素的做法，將解釋的重心完全放在政治精英的互動或權力消長上。這種解釋似乎假定了民眾「怨氣」在一九七〇與一九八〇年代之中的恆常存在性，而執政者隨時準備鎮壓政治異議行動的決心及威脅，則是導致一九七〇年代民眾參與較少的主因。反之，當威權控制者鎮壓的決心在一九八〇年代出現鬆動的跡象時，民眾參與異議性政治活動的頻率便大為增加。作為一個解釋個人是否參加運動活動的理論，上面這個說法最大的問題，是它幾乎完全依賴一般潛在參與者「敢不敢參加」的「動機」因素來解釋其參與行為。過去的威權控制（或鎮壓的威脅）讓民眾因為心有顧忌而不敢參與這些活動，也讓精英不敢舉辦這一類的活動。這都是關於「動機」的解釋。然而，當這樣的消極限制消失了，大多數民眾都敢（或都有「動機」）參與、反對運動的精英也敢舉辦這樣的活動時，真正參與活動的人卻仍然有限。究竟是誰比較可能參與？為什麼很多人有參與的動機，最後卻沒有參與？除了動機以外，還有什麼因素會影響他們是否參與？

#### 四、社會結構因素變遷對於台灣反對運動發展的影響

過去的研究對於民眾不參與這些活動的情況，往往用缺乏「動機」加以解釋。例如，一般人對於政治比較冷漠；或是國民黨成功的單向教化，使得他們較無法接受反對運動的異議性意識形態，也因此比較

不可能參與。特別是關於中國人、中國文化、中國歷史的教導，更使接受較長時間教育的人們，較難接受反對運動對於台灣人、台灣文化、及台灣歷史的重新詮釋（王甫昌 1993, 1994）。在過去的研究中，一個比較沒有被考慮的可能性是：也許有一些社會結構性的限制因素，使得某些有動機參加的人，就是較不可能參加。或者反過來說，有些人就是因為比較少受到這些限制的影響，而較可能將動機轉換為實際的行動。我們可以由異議性政治意識傳遞的場合及方式，來找尋可能影響個人參與這些活動的因素。前面提到，這些異議性的政治意識，往往都是在參與反對運動活動的過程中「逐漸」發展出來；因此產生這種異議性政治意識的先決條件之一，是必須能夠長時間的參與這些非例行社會秩序中的政治活動。那麼，除開動機不談，誰較可能「有時間」去參與這樣的活動？

有些人因為其工作的性質，或是其所扮演的角色身分種類較少、角色對於其日常行程的時間要求較低，因此比較可能調整自己的時間及行程，來參與一些他們感到有趣的、或認為有意義的非例行性活動。McCarthy and Zald (1973) 稱這樣的人擁有較多的「可自由支配時間 (discretionary time)」。有些研究者則稱這樣的人比較具有「結構上的自由性 (structural availability)」(Snow and Rochford 1983; Snow, Zurcher, and Ekland-Olson 1980; McAdam, McCarthy and Zald 1988)。反之，如果一個人有眾多的角色，或是這些角色的義務及要求較重，則不論是否有參與的動機，他（她）都比較不可能有時間參與這些既定角色以外的活動。比起一般人來說，大學生（特別是研究所學生）、從事自由業者、專業人士、大學教授、沒有年幼子女的家庭主婦等類屬的人，都具有這樣的社會結構位置的自由性。

「結構上的自由性」的概念，不但使我們能夠提出關於同一時間下「誰較可能參與反對運動活動」的假設，也使我們能夠為反對運動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後的快速發展，提出一個新的解釋視野。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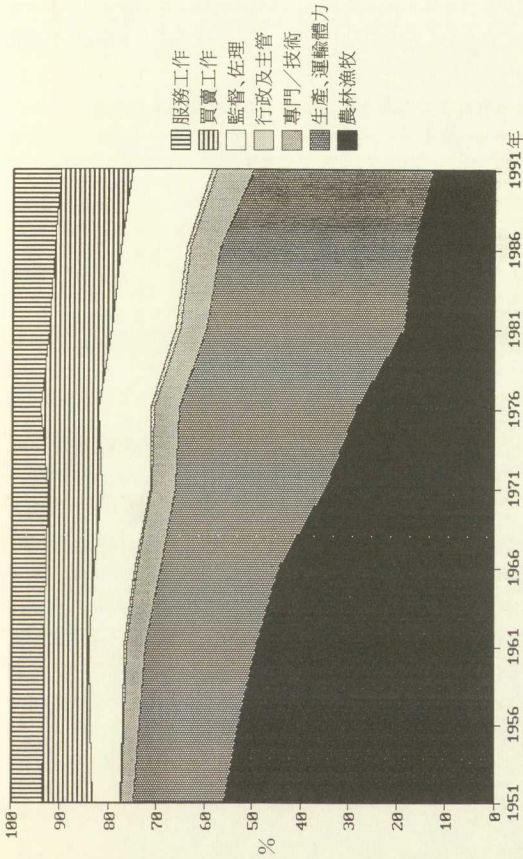
九七〇年代以後，台灣社會變遷的重要特色之一，是職業結構的變化，造成社會中有愈來愈多的人，有較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另外一項重要的結構變遷，是一般民眾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這項變化讓更高比例的人，處在過渡性角色的時間拉長。大專教育程度以上的學生，特別是研究所的學生，更是這一類處在過渡性角色人口的典型代表。根據教育部（1994）的資料，台灣大專以上（含專科、大學、研究所）學生人數佔全部人口的比例，由一九六〇年的 0.3%（三萬五千人）、一九七〇年的 1.4%（二十萬人）、一九八〇年的 1.9%（三十四萬人）、增加到一九九〇年的 2.8%（五十七萬人）。其中，研究所學生的人數，也由一九六〇年的 437 人，逐漸增加到一九七〇年 2,295 人、一九八〇年的 6,306 人、及一九九〇年的 22,372 人。在這兩項數字中，一九八〇年以後大專以上學生人數的成長最為驚人。而且，由於整個社會經濟狀況的富裕，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後的大專學生，需要擔任家教或透過其他打工的工作，以賺取生活費的情形，也明顯的較過去減少；學生因此有較多可自由支配的時間參與校內、校外各種課業以外的活動。這個趨勢，或許可以由各大專院校中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後，各類型的學生社團的大量浮現見其一斑。這當中有相當的比例的大學生，直接或間接參與了民進黨的反對運動活動，或與其意識形態相近的社會運動。例如，在民進黨出版機關刊物「民進報週刊」的時期（1987-1988 年之間），「校園民主運動」（學生運動）是民進黨以固定的週報專欄支持的社會運動之一。

同樣的，台灣經濟結構的變遷，也使得更多的民眾所從事的工作對於工作時間的要求，不像過去那麼嚴格或僵硬化。過去以農業為主的工作，因為有季節性、時間性及工作地點的要求，對於人們的生活規律有相當大的限制；在以工業及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中，這樣的限制因為工作時間較為規律化或可預測，及工作日數的降低（例如每週工作五天半的安排）而減少。根據勞工統計年報的資料，台灣工人

的每月的平均工時，由一九七〇年代 220-230 小時左右的水準，降低到一九八六年左右的 200-210 小時之間。另外，從事專業性工作者的比例也有增加的趨勢。根據統計，台灣就業人口中，從事「專門性及技術性」工作者的比例，由 1961 年的 3.9%，1971 年的 4.8%，1981 年的 5.6%，增加到 1991 年的 7.9%（參見圖一的資料）。一九八〇年以後的增加尤其快。這個變化使得更多的人可以根據其工作以外的需要，來安排或調整工作的行程。較傳統性的工作對於個人時間與精力投入的高度要求，將因為吸納人們去從事維持社會秩序、或複製社會結構的行動，而降低了民眾接觸不同政治意見的機會，因此減少了政治或社會變遷的可能性。上述的經濟結構變遷，使較多的人由過去工作的束縛中稍微解放出來，而較有可能去探索或參與維持既有社會秩序以外的活動，因而為社會變遷提供了重要的結構性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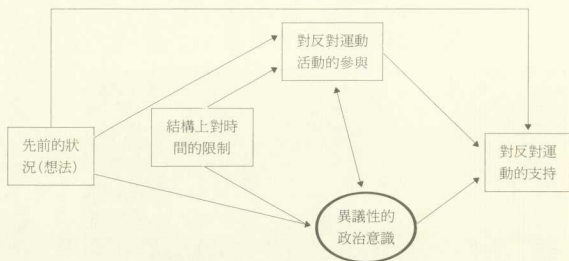
不過，這些社會結構的變遷，使得更多的人有機會去從事各種不同的例行社會秩序以外的活動，而不只是參加反對運動的活動而已。這些被釋放出來的社會力，的確也造成一九八〇年代上半葉各種社會活動的參與提高；例如，層出不窮的「自力救濟」事件。根據張茂桂等人登錄三家報紙所報導的自力救濟事件，由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八年之間，每年發生的各類的自力救濟事件，分別為 175、203、274、335、733、及 1172 件（張茂桂等人 1992:123）。雖然這些自力救濟的活動並不等於反對運動，早期的活動發起者甚至刻意和反對運動有所區隔，後來雙方也形成相互掩護的效果（吳介民 1990）；但是，這兩種活動的大量浮現，其實都是源於相類似的社會結構基礎。由於戒嚴時期執政的國民黨對於政治異議者的強力鎮壓，多數民眾在從事社會運動或自力救濟式的抗議活動時，盡力避免與反對運動扯上關係的做法，主要反映的可能是策略的考量，而非抗議的社會性質不同。無論如何，這些被蕭新煌稱為「由冒泡到沸騰」的一九八〇年代台灣社會的大量社會抗議事件，早在一九八七年解嚴之前，就已逐漸出現；它們顯然不





圖一 台灣就業人口行業分佈的比例趨勢變化, 1951-1991

是解除戒嚴、或預期解除戒嚴的心理因素所可以完全解釋的。作者認為，除了這些社會心理的因素轉變之外，社會結構的變遷也是不容被忽視的條件。



圖二 本文的分析概念架構

總括的來說，上述的討論可以歸納為圖二的分析架構。在圖二中，異議性的政治意識對於支持反對運動的影響，已經在過去的研究中，得到相當穩定的經驗性資料的支持。本文的重點將放在檢視：(1)個人的異議性政治意識形態的取得，是否受到參與反對運動的活動之影響；以及，(2)如果上述關係成立的話，對於異議性政治活動的參與，除了個人先前的想法外，是否也受到個人所處的結構位置之影響(或限制)。基於前面對於社會運動動員「過程」的討論，作者認為異議性政治意識形態與參與反對運動的活動二者之間，事實上存在著相互作用的關係。不過為了單純化本文的分析，下面的經驗資料分析中，將不考慮異議性政治意識對於參與反對運動活動的回饋性影響。

## 五、經驗資料的分析

在下面的經驗資料分析中，本文將採用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於一九九三年七月所執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的「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二期第四次調查，所得的全島性樣本資料(計畫編號：NSC 82-0301-H-001-050-B1)。關於該次調查的抽樣方式及樣本結構，請參見計畫執行報告書(瞿海源 1993)。該次調查問卷的主題是「政治文化」，其中包括了多項可以直接或間接用來操作化本文所指涉的概念之間項。<sup>5</sup>

對於本文中所分析的民眾「政黨支持」，是以受訪者表示在一九九二年第二屆立法委員的選舉時，是投給「國民黨」、「民進黨」、或「其他黨派」(包括不記得、未答、及拒答)的候選人加以測量。本文中是以支持民進黨的候選人，作為支持反對運動的測量。由於外省民眾對於民進黨的支持一向都十分低(通常都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外省民眾表示支持；在本次調查中，242位父親為外省人的受訪者中，僅有7位[2.9%]表示支持民進黨)，將他們納入分析中，將會對本文所指出

5 一位評審指出，本文用以建構某些分析概念所使用的問項，特別是關於異議性政治意識形態的測量，似乎並非最適當測量指標。由於本文只是採用既有問卷調查資料，選擇與本文使用的概念相近的問項進行分析，而非根據這些概念去設計問項蒐集原始資料，因此作者大致同意這些對於部份測量的「表面效度」(face validity)之質疑，有其一定的根據。不過，作者也認為，這些問項雖然不是某些概念最理想的操作化測量，但是它們仍然部份的掌握到這些概念所要指稱的特質，因此至少構成間接的指標。為了檢驗使用這些指標的適當性，作者也做了一些預備性的分析工作。例如，下面表一的分析結果就顯示，本文對於異議性意識形態的幾個測量，與民衆政黨支持之間的經驗關聯，和過去研究的發現，大致相符。這些似乎可以作為本文對於「異議性政治意識形態」的經驗測量，在建構上的具有「相關指標效度」(criteria-related validity)的證據。因此，即使這些資料在效度上不免有一些缺陷，針對這些資料所作的分析，對於本文的主題來說，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的變數之效果造成混淆。因此在本文的分析中，只包括了本省人（父親是「本省閩南人」及「本省客家人」者）的樣本。在分析的1,703位樣本中，投票給國民黨的有664位（佔38.99%），民進黨的有394位（23.14%），其他黨派（包括不記得、未投票及拒答等）的則有645位（佔37.87%）。必須注意的是，在「其他黨派」中，表示投給無黨籍、及其他黨派者僅有50人（2.9%），投廢票（14人，0.8%）、不知道（207人，12.2%）、拒答（161人，9.5%）、及未答者（絕大多數是未投票，有213人，12.5%）其實佔多數。即使扣除了未投票者，這樣的調查所顯示的政黨支持分佈，和該次選舉中，幾個主要政黨實際得票率的結果（國民黨53.02%，民進黨31.03%，其他政黨17.94%）相比，國民黨、民進黨、及無黨籍的支持率都仍然偏低。我們因此可以推知有些受訪者並沒有表明自己的立場。因此，這個測量可以說是支持國民黨與支持民進黨者的強測量。

另外，為了驗證異議性的政治意識對政黨支持的影響（參見註五），本文也運用相關的問題，設計了幾個異議性政治意識的測量，這些政治意識的測量包括下列三項：

(1)「民主理念」：有些讀者也許會認為「民主理念」也是國民黨政府一再宣稱及鼓吹的信念，稱不上是「異議性」的政治意識。不過，過去國民黨所推行的形式化、有限度「民主」令許多追求全面民主的反對運動人士深感不滿；台灣反對運動所推展的全面民主的理念，和過去國民黨一再以「動員戡亂時期」為由限制的「有限」民主是不相同的。它因此是一種異議性的政治意識。過去的研究也顯示，民主理念是影響民政支持反對黨的顯著因素。

這個概念主要是用五項民眾關於民主、政治制衡力量、政黨輪替執政等等態度的測量建構而成。（關於這五個問題的詳細內容，請參見「附錄」。根據因素分析的結果，顯示這五個問題構成一個理論因素（其固定值是2.028，解釋了22.5%的變異量）。在下面的分析中，將以這

五個問項去建構一個標準化的因素分數，作為分析的測量。必須注意的是，由於這五個原始問項中，以負面的語氣進行測量的問項較多，因素分析的結果形成一個「民主理念」的負面（標準化因素分數）測量。為了便於解讀分析的結果，作者將它做了正負方向的調整。

(2)「台獨意識」：這個概念的測量，主要是由社會變遷資料中，五個關於「中國統一」及「台灣獨立」的問項建構而得。這些問項包括對於促進統一或維持獨立的做法是否贊同、及對於本省籍與外省籍的官員是否真的贊成統一或獨立、以及歷史教育中應否強調台灣歷史等（詳見「附錄」）。這五個問項分別指向不同層次的現象，但是它們共同的內涵，則是都牽涉到目前台灣「國家認同」的爭議。因素分析的結果顯示它們構成一個理論的因素（固有价值為 1.629，解釋了 32.6% 的變異量<sup>6</sup>）。因此在下文的分析中，將以這五個問項，經過因素分析的

6 註五中提到的同一位評審特別指出，本文用以建構「台獨意識」的五項指標異質性太高，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它們的 communality 也偏低；因此建議本文使用更直接的「統獨態度」測量。本文在分析中未採用更直接詢問受訪者對於未來兩岸關係立場的問項，一方面是因為它的變異量很小，只有 9.1% 的受訪者表示支持台灣獨立，20.2% 的人贊成統一，而超過 70% 的受訪者都表示希望維持現狀、看情形或無意見，因此較難作有效的解釋；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這樣的問法混淆了「國家認同」及「國家選擇」兩個概念（對這兩個概念的區分，請參見吳乃德，1993）。作者也曾經根據該次社會變遷調查中，另一組關於統獨立場的問項，建構了另一個「台獨意識」的測量。其方式是區分受訪者贊成「台灣獨立」或「台灣與中國統一」的程度，並將有條件的國家選擇之現實因素考慮也納入測量中。其等級及給分則依序是（括弧內為樣本數及所佔百分比）：

- 3: 無條件非常贊成台獨 (72, 3.7%)
- 2: 無條件贊成台獨 (106, 5.4%)
- 1: 如果宣布獨立不至於導致中共武力犯台，則贊成台獨 (193, 9.9%)
- 0: 無意見或都有條件贊成 (922, 47.1%)
- 1: 如果大陸經濟發展程度和台灣相當，則贊成和中國統一 (270, 13.8%)
- 2: 無條件贊成和中國統一 (264, 13.5%)
- 3: 無條件非常贊成和中國統一 (131, 6.7%)

這項測量和本文所使用的「台獨意識」測量，達到中度的相關，（其相關係數為 .409,  $p < .01$ ）。而使用兩種不同的「台獨意識」測量，在下面表一到表三的

過程所產生的標準化因素分數，作為台獨意識的測量。

(3)「省籍意識」：就反對運動所宣揚的意識形態而言，「台獨意識」主要是指涉到『對外(國)』的態度與立場，「省籍意識」強調的則是『對內部不同(族群)團體』看法。省籍的「族群意識」可能包括三種不同層次的意識：對於族群差異的認知、對於族群不平等的認知、及對於族群集體行動可能性及可欲性的認知(吳乃德 1993)。由於可得的相關問項的限制，「省籍意識」的概念在本文的分析中，是用四個關於本省人及外省人對於「台灣前途」或「對中國大陸的情感」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去測量而得的。它們是屬於上述三類族群意識中，層次最低的一種(對於族群差異的認知)。同樣的，因素分析的結果也顯示它們構成一個理論因素(固有值為 2.592，解釋了 64.8%的變異量)。因此在下文的分析中，將以這四個問項經過因素分析的過程所產生的標準化因素分數，作為本省受訪者「省籍意識」的測量。

## 1. 不同政黨支持者的政治意識特徵

上述的三種異議性的政治意識形態，是否如過去研究的發現所顯示的，對於民眾的政黨支持有影響？這是本文在進行主要論點的檢證之前，必須確定的第一項經驗性事實。表一是以「民主理念」、「省籍意識」、「台獨意識」等三個異議性政治意識形態的因素分數測量，來

---

分析中，結果(影響方向及統計顯著性)並沒有明顯的差異，而且本文所使用的「台獨意識」測量在分析時，不論是作為依變數或自變數，都有較大的模式解釋量。是否無條件贊成台灣獨立，顯然是台獨意識的強測量(只測出了民衆是否有強烈的台獨意識)，在國民黨的強力打壓之下，它糾結了較多的其他因素在內；相對而言，本文所採用的五個問項經過因素分析標準化的過程，所建構的台獨意識測量，則可以掌握到較為溫和的台獨意識。本文分析的目的，是解釋異議性意識形態的來源及形成過程，而不是描述在一九九三年時台灣有多少民衆具有強烈的台獨意識。在這樣的研究目的下，測量出溫和的台獨意識顯然更重要，作者因此決定保留最初採用的測量。

預測本省民眾的政黨支持。表1中左邊第一個邏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式，是以支持國民黨相對於支持民進黨作為依變數(民進黨為1，國民黨為0)，而第二個邏輯迴歸式的依變數，則是以民進黨和其他黨派作為對比(民進黨為1，其他黨派為0)。表1的分析結果，對於上述的關係提供了明確的支持證據。異議性的政治意識，的確是區辨本省籍民眾政黨支持的重要心理特徵：其中民主理念及台獨意識，是國民黨及民進黨支持者在政治意識特徵上的主要差別；而民進黨支持者與無黨派支持者，在上述三項異議性政治意識上都有明顯的差別。這些結果，大致上和過去類似研究結果相吻合。由於這三項政治意識的特徵之間，彼此的相關程度並不高，<sup>7</sup>顯示這三項因素對於本省籍民眾的政黨支持，各自有其獨立的影響。必須指出的是，分析結果同時顯示：相對於兩大黨以外的支持者來說，民進黨及國民黨的本省支持者，都有較強的省籍意識。而且，民進黨及國民黨的支持者，在「省籍意識」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對於後面這項結果的充分解釋，可能需要對於一九八八年李登輝擔任總統及國民黨黨主席以來，在國民黨台灣化方面的努力，及其成果進行探討。這項工程遠超過本文預定的範疇，因此將暫時存而不論。

## 2. 異議性政治意識的來源

在確立了上述不同政黨支持者的政治意識特徵之後，我們必須進一步探討：個人這樣的異議性政治意識，是否和參與反對運動活動的經驗有關？由於「社會變遷」的調查資料中，沒有問到受訪者是否曾

7 省籍意識與民主理念的 Pearson 相關係數是 .2945，省籍意識與台獨意識的相關係數是 .0919，台獨意識與民主信念的相關是 .0959。雖然他們都達到 .001 的統計顯著水準，但是彼此的相關都在低度相關(.30)的水準以下，放入同一個迴歸方程式中做為自變數時，不會有共線性的問題；作為依變數時，也代表不同的概念層面。

表一 「異議性政治意識」對於本省籍民衆「政黨支持」的影響的  
Logistic Regression 分析結果 (括弧內是標準誤)

	民進黨／國民黨	民進黨／無黨籍
省籍意識	.050 (.080)	.375*** (.076)
民主態度	.873*** (.084)	.625*** (.082)
台獨意識	.444*** (.070)	.198*** (.074)
常 數	-.749 (.074)	.688 (.075)
Chi-square	210.009	167.656
自由度	3	3
N	1058	1039
pseudo R Square	.166	.139

註: \*\*  $p < .01$ , \*\*\*  $p < .001$ .

經參與反對運動活動的問題，因此較難直接加以測量。不過，有調查中間問到的若干行爲，是可以視爲此一變數的間接性、實驗性的測量。它們包括：

(1)「選舉參與」。選舉期間的競選活動，長期以來一直是反對運動發展的重要憑藉；尤其是在過去戒嚴時代，選舉期間更被稱爲「民主假期」，因爲這是當時唯一可以公開宣導政治異議的機會。不過，國民黨的候選人不是也能夠從事競選活動嗎？根據過去的觀察，國民黨的候選人大多靠組織戰(黨部的配票)，而非宣傳戰(特別是聽政見會)。因此參與競選活動，可以說是參與反對運動活動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將受訪者在一九九二年的立委選舉過程中，可能參與的各項活動(包括聽政見會、讀選舉公報、參與餐會、到擔任助選員等七項；詳細問法請見「附錄」)，每表示參加一種活動便得一分；而後加總起來，得



到一個「選舉參與」的連續性測量(0到7; 0表示一項都未參與, 7表示七類活動都參與過)。

(2)「參與抗議」。較上一個問項直接的測量, 是受訪者是否參與過社會抗議活動。受訪者在過去二、三年中如果參與過任何抗議活動(不論是爲了自身利益、地方事物、或整個社會的事物), 都將在「參與抗議」的兩元測量上得到「1」, 否則是「0」。

(3)「談論政治」。前面兩項都是對於反對運動有組織活動的參與, 另一項可以作爲間接參與的測量, 是比較非組織性的參與: 是否常和他人討論政治。這是用下列的問項測量的:『請問您平常和親戚朋友聊天時, 常不常談論政治方面的事情?』。回答「經常」及「有時」者重新登錄爲「是」; 而回答「很少」或「從不」者登錄爲「不是」。這個測量究竟是行爲的測量, 還是動機的測量, 或許會引發一些爭議(「社會變遷」的問卷中, 原先這個問題是被歸入「心理涉入感」的小類中)。但就本文的目的來說, 作者暫且將它當作是(參與)行爲的測量。

當這三個參與反對運動活動的指標, 被用來預測個人的異議性政治意識時, 可以發現它們有相當重要的影響。由表二的分析結果來看, 三種參與形式對於「省籍意識」及「民主理念」都有正面而且顯著的影響, 它們分別解釋了13%及14%的變異量。「台獨意識」雖然也受到參與抗議及談論政治的正面顯著影響, 但是不受「選舉參與」的影響; 三個運動參與的變數對於「台獨意識」的解釋力(1.6%), 遠低於對「省籍意識」及「民主理念」的解釋能力。

不過, 異議性政治意識的來源, 顯然不只是參與這些反對運動的活動而已。在這些反對運動的活動大量出現之前, 個人既有的「先前想法」應該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爲了控制原先就有的政治意識或態度, 對於受訪者目前異議性政治意識的影響, 以便評估「運動參與」的真正影響, 本文在分析中使用了一些可以用來指稱「先前情況」的變數。這些變數包括:

表二 「運動參與」對於「異議性政治意識」的影響的 OLS 迴歸分析  
(括弧內是標準誤)

自變數	依變數		
	民主理念	台獨意識	省籍意識
參與運動			
參與抗議	.248** (.077)	.271*** (.082)	.136+ (.079)
參與選舉	.106*** (.016)	.025 (.017)	.159*** (.017)
討論政治	.559*** (.052)	.149** (.056)	.504*** (.054)
常數	-.369*** (.038)	-.034 (.041)	-.541 (.039)
R Square	.131	.016	.142

註: + $p < .10$ ,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

(1)「教育」：一般而言，教育程度較高者有較強的政治意識，不論是支持現有體制的、或是異議性的，都是如此。不過，過去的研究指出，由於台灣的教育所具有的政治教化功能，本省人的教育程度和支持反對運動的可能性成反比（王甫昌 1993）。本文將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區分為四個等級：大專以上、高中、初中、及小學（含不識字）。

(2)「通婚」：配偶父親如果是外省人，對於本省人異議性政治意識，尤其是省籍意識及台獨意識，可能也有一些負面的影響。不論這個影響發生在本文的分析中，和外省人通婚者登錄為 1，內婚者為 0。

(3)「性別」：女性過去一向被認為對政治較沒有興趣，而且較不支持民進黨。在本文中，是以男性為 1，女性為 0 加以測量。另外，

(4)「父親的教育」：高教育程度的父親，比較可能因為過去的政治經驗及意識，而將這些異議性的政治意識傳遞給下一代。有鑒於受訪者的父親代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對於這個測量，本文只區分「中學以

上」(1)及「中學以下」(0)兩級。

由表三的分析結果可以知道，在控制了「參與運動」的三個測量後，「教育」及「省籍通婚」這兩項先前的狀況，對於本省人的異議性政治意識，仍有明顯而穩定的獨立影響。不過，它們影響的方式各有不同。其中「教育」對於民主理念及省籍意識有正向的影響，對於台獨意識則有負面的影響。這說明了：台灣教育的教化功能，似乎主要仍是在於「中國意識」的信念傳遞上。而「族群通婚」則對於本省籍民衆的民主理念及台獨意識有負向的影響，但是對於省籍意識卻有正向的影響。不過，父親的教育程度幾乎沒有影響，性別也只對民主理念及台獨意識有影響(男性有較強的民主信念，較弱的台獨意識)。和光是放入「運動參與」變數的分析結果一樣，這些「先前想法」的因素較能解釋「省籍意識」及「民主理念」(都解釋了20%以上的變異量)，但是較不能解釋「台獨意識」(只解釋了4%的變異量)。更重要的是，在控制了這些先前的情況後，運動參與對於異議性政治意識形態仍然有影響，這說明了「運動參與」及「先前的想法」兩個因素，對於異議性政治意識形態都有獨立的影響。

### 3. 結構性限制對於運動參與的影響

最後，我們來看看所謂的「結構性限制」對於運動參與的影響。由於本文所分析的資料，是一個時間下的調查資料，事實上不可能真正的測量結構限制在時間上的消滅，是否為促成參與增加的因素。在這樣的資料限制下，唯一可行的檢證方式，是由同一時間下，受到結構限制的多寡和參與活動的可能性二者之間的關係，間接去評估此一因果的關聯。本文所稱的結構性限制，按前面的討論，可以用下列的因素來加以測量：

(1)「工作時間」：這個變項是用受訪者在受訪前一週工作時數去測量。由結構限制的角度來看，工作時數太高是主要的限制來源。因此，

表三 「運動參與」與「先前狀況」對於「異議性政治意識」影響的 OLS 迴歸分析結果 (括弧內是標準誤)

自變數	依變數		
	民主理念	台獨意識	省籍意識
<b>參與運動</b>			
參與抗議	.276*** (.072)	.259*** (.081)	.175* (.076)
參與選舉	.069*** (.016)	.043** (.018)	.135*** (.017)
討論政治	.359*** (.052)	.262*** (.058)	.325*** (.054)
<b>先前情況</b>			
教育# 初中	.196** (.062)	-.135* (.070)	.238*** (.065)
高中	.429*** (.055)	-.265*** (.062)	.523*** (.058)
大學	.804*** (.063)	-.357*** (.071)	.653*** (.066)
父親教育程度 (高=1)	-.165+ (.094)	-.017 (.106)	-.095 (.099)
性別 (男=1)	.149*** (.043)	-.095* (.049)	-.027 (.046)
族群通婚(=1)	-.356*** (.096)	-.387*** (.108)	.190+ (.102)
常數	-.590*** (.045)	.129** (.051)	-.744*** (.047)
R Square	.231	.043	.205

註: 1. +p<.10, \*p<.05, \*\*p<.01, \*\*\*p<.001。

2. #教育程度中, 小學是比較組。

本文將前一週工作時數，重新歸類為四十小時以下、四十到五十小時、五十一小時以上三類。

(2)「工作自由」：根據本文前面的討論，這主要是指某些人因為工作的性質，使得他們較可能自主的安排工作行程，因此有較多的自由時間。由於這個概念在「社會變遷」的調查中，沒有直接測量的問項可資運用，在本文中將間接的以受訪者目前（或退休前）的職業，來加以測量。由於工作性質對於工作者必須付出的時間要求在量上及固定化的程度上不一樣，不同的職業之間在所容許的自由時間上，有相當大的變異性。本文根據不同的職業中，一般而言所容許的工作者對於工作過程及工作時間的自由控制程度，將受訪者依其職業，分為下列六個類屬：

職業類屬一：普通工人、技工；工商機構普通職員（營業員、科員、職員、店員等）。

職業類屬二：政府機關公務員；軍警；黨務、團務人員；公營黨營事業人員；高、初中、小學、幼稚園、補習班老師。

職業類屬三：農民；養殖業；漁民、鹽民。

職業類屬四：學生；家務；未就業；攤販；司機；家庭代工。

職業類屬五：民營工商機構經理人員；企業主（老闆）；自營商；民意代表。

職業類屬六：工程師、專業技師；自由業者（律師、醫師、會計師等）；文化工作者（新聞記者、作家、音樂家等）；演藝人員；大專教師及研究機構研究人員。

就設計的目的來說，這六個職業類屬，具有等級性（ordinal）測量的性質與特色；也就是說作者認為它們可以用來代表不同程度「工作自由」的等級。在作者的區分中，屬於第一類職業的受訪者，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最少，而第六類職業者則有最多自由時間、及最大的

自由。爲了避免缺失資料影響到分析的結果，本文在分析時刪除了職業類屬不明確、無法歸入上述六個類屬的 53 個樣本。

(3)「工作往返時間」：受訪者固定用在上下班通勤的時間，也是形成結構限制的因素之一。測量的方式是問受訪者：「請問從您住的地方到工作地點平均每次要花多少時間？」受訪者的回答被歸類爲六個等級：一小時以上(1)，45 分鐘(2)、半小時(3)、一刻鐘(4)、五分鐘(5)、就在住處(6)。這是一個結構限制的負向測量，其中 1 代表自由最少，限制最大；6 代表自由最大，限制最小。

(4)「婚姻狀況」：單身者應有較大的自由，可以調整自己的時間安排；相反的，已婚者則因爲有家人的時間行程必須配合，因此受到較多的限制。

表四用上述的「結構性限制因素」去預測「運動參與」，迴歸分析的結果發現，前者對於後者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其中影響最明顯的，是職業類屬的區分。不同工作類屬的受訪者，在參與不同類型的運動活動上，有相當大的差別。以「選舉參與」來說（表四第一行），比起第一類職業者（未放入迴歸方程式的比較組，是工作自由最低的一組）來說，二、六、五（依其重要性順序）類職業類屬都有較顯著的高程度的參與。另外，在「討論政治」（表四第三行）方面，職業類屬的區分也有很大的影響；不過，不同職業類屬影響「討論政治」的方式，並不完全如前面所預期的，呈現等級線性的關係。「討論政治」的可能性，依序是二、五、六、一、四、三類職業類屬。職業類屬的區分對於「參與抗議」的影響，則不若前兩者那麼明顯，除了第四、一類明顯的較不會參與抗議、第五類較可能參與抗議外，其他類屬的區分並不顯著。

另外，「工作時間」也對於選舉參與有顯著的影響，不過其影響的方式和本文前面的預期不完全一致。工作時間較一般（四十到五十小時）少或多的人，都比較沒有「選舉參與」的經驗。「工作往返時間」

表四 「結構限制」對「運動參與」的影響之迴歸分析  
(括弧內是標準誤)

	OLS 迴歸++		邏輯迴歸++	
	參與選舉 (1)	參與抗議 (2)	參與抗議 (2)	討論政治 (3)
工作自由 <sup>#</sup>				
職業類屬1		-.304+		-.336**
		(.182)		(.118)
職業類屬2	.802***	.230		.611***
	(.142)	(.248)		(.165)
職業類屬3	.004	.282		-.750***
	(.141)	(.230)		(.204)
職業類屬4	-.006	-.490*		-.580***
	(.113)	(.219)		(.142)
職業類屬5	.506***	.300+		.601***
	(.113)	(.181)		(.128)
職業類屬6	.530**			
	(.169)			
工作時間 <sup>#</sup>				
39小時以下	-.401***	-.192		.006
	(.101)	(.127)		(.082)
51小時以上	-.312***	-.082		-.076
	(.095)	(.110)		(.076)
工作往返時間	.033	.093*		-.096**
	(.024)	(.062)		(.037)
單身 (=1)	-.044	-.058		.250***
	(.093)	(.121)		(.072)
常  數	2.479***	-2.751***		-.314+
	(.186)	(.325)		(.187)
模式 Chi-square		24.020		114.007
自由度		9		9
N		1653		1653
pseudo R Square		.014		.065
R Square	.058			

註：1.+p<.10, \*p<.05, \*\*p<.01, \*\*\*p<.001。

2.#「工作時間」中，40-50小時是比較組；「工作自由」在(1)中職業類屬1是比較組，在(2)(3)中職業類屬6是比較組；「教育」的小學是比較組。

3.++對於類屬變數迴歸分析係數的詮釋，在 OLS (Ordinary Least Squares) 迴歸及邏輯(logistic)迴歸之間略有不同。OLS 的迴歸係數是將該類屬和分析中丟掉的比較組相比(即所謂的 dummy coding)；而邏輯迴歸分析的係數，則是將該類屬和該變數的平均狀況相比(即所謂的 effect coding)。對於這兩種處理方式的差異，可以參見 Alba (1988)。

4.pseudo R Squares 的計算是採用 Aldrich and Nelson(1984: 57)所建議的公式，pseudo R Squares=C/(C+N)。其中 C 是分析模式的 Chi-squares，而 N 是樣本數。

較少的人較可能參加抗議活動，但是較不會談論政治（後者與先前的預期不符合）；「單身」的人則較結婚的人可能談論政治。在三種運動參與的形式中，結構限制因素之解釋力，在選舉參與及討論政治兩類中稍高，抗議的參與由於變異量過小（只有9.5%的本省受訪者曾經參與過抗議活動），因此解釋力較低。

上面的分析顯示，在單獨將「結構限制」的變數放入分析模式時，它們對於「運動參與」有頗為顯著的影響。然而，本文所使用的一個重要的結構限制變數——「工作自由」——是以六種職業類屬的區分作為間接的測量。我們如何確定所觀察到的職業類屬之間在運動參與上差異，的確是工作自由的影響，而非其他的因素作用？職業類屬對於個人是否參加運動活動的影響，除了透過目前工作上的自由（這是本文想測量的特質）外，可能也包括和職業類屬有關聯、進入工作前的一些先前狀況，特別是教育程度。為了控制這些進入現有職業前的因素，本文在表五中，將前面討論過的「先前狀況」和「結構限制」的因素同時用來預測運動的參與。

表五的分析結果顯示，即使在相互控制的狀況下，「先前的狀況」、及「結構性的限制」都各自對於某些「運動參與」有獨立的影響，雖然「結構限制」的影響在控制了教育之後，有一些改變。在「先前狀況」中，教育對於運動參與有明顯的正面影響，特別是在選舉參與及討論政治上。性別的差異也十分明顯：男性顯著的較可能參加本文所分析的三種運動活動。父親的教育對於「運動參與」的影響則較不明顯。族群通婚者也只對於討論政治有正面的影響。在「結構限制」方面，工作時數對於運動參與有極為明顯的影響；工作時數較正常的人，明顯的比工作時間太長或過短的人可能參與選舉。另外，工作往返時間也對於選舉參與及抗議參與構成限制；對於比較不必運用特定時間來進行的運動活動——討論政治，則沒有構成明顯的限制。值得注意的是，在控制了先前的情況後，已婚者反而較未婚者更可能參與選舉



表五 「結構限制」與「先前狀況」對運動參與的迴歸係數  
(括弧內是標準誤)

	OLS 迴歸++		邏輯迴歸++	
	參與選舉 (1)	參與抗議 (2)	討論政治 (3)	
先前情況				
教育# 初中	.695*** (.100)	.189 (.123)	.435*** (.099)	
高中	.722*** (.092)	-.015 (.124)	.794*** (.089)	
大學	.861*** (.116)	.178 (.146)	.925*** (.104)	
父親教育程度 (高=1)	-.084 (.152)	-.044 (.205)	-.288+ (.169)	
性別 (男=1)	.498*** (.077)	.169+ (.101)	.277*** (.068)	
族群通婚 (=1)	.041 (.158)	.205 (.190)	.331 (.137)	
結構限制				
工作自由				
職業類屬 1		-.226 (.191)	-.060 (.129)	
職業類屬 2	.403** (.146)	.148 (.261)	.174 (.117)	
職業類屬 3	.006 (.140)	.361 (.250)	-.325 (.223)	
職業類屬 4	.072 (.111)	-.352 (.231)	-.362* (.155)	
職業類屬 5	.226* (.112)	.234 (.183)	.494*** (.136)	
職業類屬 6	.165 (.170)			
工作時間#				
39 小時以下	-.296** (.098)	-.185 (.128)	.113 (.087)	
51-70 小時	-.228* (.092)	-.060 (.111)	.010 (.080)	
工作往返時間	.064** (.023)	.119+ (.064)	-.036 (.040)	
單身 (=1)	-.372*** (.099)	.076 (.131)	-.043 (.080)	
常 數	1.325*** (.208)	-2.566*** (.440)	-.313 (.307)	
模式 Chi-square		32.756	255.365	
自由度		15	15	
N		1653	1653	
pseudo R Square		.019	.134	
R Square	.133			

註：同表四。

的活動。這和原先的預期不符。不過，前面所發現的職業類屬對於反對運動活動參與的影響，在控制了「先前的狀況」的變數後，雖然在重要性上減弱了一些，但是大致維持了原有的影響。由表 5 的第一行中的分析結果可知，除了原先和第一類職業類屬的人有顯著差異的第六類，在控制了教育後不再有差異外，二、五類仍然較可能參與選舉活動。同樣的，在第三行中，原先和一般有差異的一、二、三類職業類屬，在控制了教育後都不再顯著，但是四、五類仍然維持原先的差異。

上述的分析結果，顯示了職業類屬對於個人「參與選舉活動」及「討論政治」的影響，不全是因為進入某些職業類屬的人，有不同的教育程度所致；職業類屬的區分在控制了教育之後，仍然維持其獨立的影響。這說明了本文以職業類屬的區分所欲測量的「工作自由」，對於運動的參與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同樣的，「工作時間」及「工作往返所需時間」對於選舉參與的顯著影響，也為本文所謂的結構限制的影響，提供了有利的支持證據。另外，職業類屬對於「討論政治」的影響，則比較接近本文先前的預測；即使在控制了教育程度之後，工作自由較高者，仍然明顯的比工作自由較低者，更可能經常與朋友討論政治。和選舉參與不同的是，這和工作時間或工作往返所需時間無關。部份結構限制的變數對於不同參與運動方式的影響方向，與原先提出的假設不合有不符合的狀況，事實上也助於我們針對不同的假設提出了一些修正。它們也讓我們可以進一步闡述不同的結構限制（工作自由、上下班的交通時間、有無家累等）對於不同的參與活動方式（參與選舉或與別人談論政治）的影響，而不像本文最初假設的完全同質性的影響方式。

## 六、討論和結論

目前台灣民眾政黨支持的分歧(特別是本省人之間),可以說是過去十五年以來,因為台灣反對運動持續的挑戰,所造成的政治變遷的結果。然而,目前的研究往往由「精英—政治過程」的角度,來解釋此一政治上的鉅變。一般而言,在這樣的解釋中,對於此一變遷的核心議題:民眾政治態度轉變的「過程」,通常比較忽略。本文試圖由社會運動的觀點,對於台灣社會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所發生的政治與社會變遷,提供一個社會結構基礎的解釋。

本文認為,過去一般研究者所指出的影響台灣民眾支持反對運動的「異議性政治意識」,包括民主理念、(省籍)族群意識、及台獨意識等,其實是反對運動對於潛在支持者長期進行共識動員的「結果」。因此,除了「威權統治的鬆動」的因素以外,解釋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後台灣政治變遷的一個關鍵,是一般的民眾獲得這些異議性的政治意識的「過程」。本文指出,這些異議性的政治意識,不一定是早期親身經歷的不滿,在外在威脅解除後重新浮現的結果:它們主要是民眾因為參與反對運動的活動(特別是一九八六年以後的政治性群眾活動),而逐漸產生的集體政治意識轉化之結果。因此,影響個人取得異議性政治意識的因素,除了過去的經驗或已有的想法之外,還有對於反對運動活動的參與。就個人的層次來說,前者比較屬於心理性或意識性的因素,而後者則相當受到個人在社會結構中位置的影響。

這樣的觀點,促使本文重新檢討社會變遷和社會運動興起(鉅視層次)或運動參與(微視層次)之間的關係。本文指出,近代台灣社會變遷對於反對運動發展的影響,除了一般人比較注意到的社會與政治參與期望升高,導致相對剝奪感的增加之外,還有經濟結構的變遷,造成有較多的人具有「結構的自由性」。這些比較沒有被日常工作或社

會角色的義務及責任束縛住的人們，比較可能調整自己的時間，去參與任何他們覺得有興趣的活動；包括政治或社會運動的活動。反過來說，一個擁有較多的具有結構的自由性的成員的社會，是比較可能支持較多的社會運動，也因此是比較容易產生政治或社會變遷的結構環境。一九八〇年代以後台灣社會的轉變，相當合於這樣的描述；這正是本文所稱的，台灣民眾政黨支持的「社會結構基礎」。

本文運用「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資料，對於上述的論點做了初步的經驗性檢證。這些經驗資料分析的結果，可以歸納為下列幾點：(1)異議性的政治意識，是影響本省籍民眾政黨支持的重要因素；(2)台灣民眾的異議性政治意識，和他們對於反對運動的活動參與有密切的關聯；(3)個人的背景（包括教育程度、或族群通婚）及個人社會結構位置的限制（工作上的自由[以職業類屬來測量]、工作時間、往返工作時間等），對於個人的運動參與程度，都有顯著而獨立的影響。這些同一時間下，不同部門的經驗性發現，一方面說明了為何一九八〇年中期以後有更高的參與，一方面也相當清楚的指出了誰（具有何種社會特徵的人）較可能參與。

由於可得資料的限制，本文的若干核心概念（特別是關於「結構限制」），只有比較間接性、甚至是實驗性的測量。雖然經驗資料分析的結果，仍然大致上支持本文的主要論述，但是這些測量上可能存在的效度問題，對於本文分析的結果或多或少有一些影響或干擾。本文的結果，因此可以說是初步的發現，需要以後以更直接的測量加以驗證。

本文所提出的分析架構，主要是針對台灣反對運動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後，因為群眾活動策略的運用而造成的快速發展。相對於前一時期，黨外人士必須幾乎完全依靠「辦雜誌／選舉」的策略而言，此一時期群眾活動的採用，代表著反對運動一個成功的階段性發展。不過，這個架構的有效性不能被過度推論，因為，隨著民進黨群眾活

動策略在一九九〇年以後的衰退，以及新的、參與成本更低運動策略——地下電台及有線電視台的興起，未來民眾將有不同的管道，去得到不同的挑戰性政治意識。因此，雖然這些社會結構基礎對於社會運動參與的有利形勢仍然存在，但是所表現出來的參與強度與方式，卻可能不及於解嚴初期。更重要的是，新黨在一九九三年以後出現，將對台灣的政治生態產生重大的影響，也複雜了原本民眾政黨支持的模式。這些發展，當然都超出本文處理的範疇；但是，它們是未來台灣社會或政治運動研究的重要課題。無論如何，作者所指出的，以社會運動的觀點來理解政治變遷，在本文分析的主題中，已顯示了一些分析性的潛力。它對於未來的台灣政治變遷的研究的潛力，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去發展。

## 參考書目

王甫昌

- 1993 〈省籍融合的本質——一個理論與經驗的探討〉，收於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頁 53-100，台北：業強出版社。
- 1994 〈族群同化與動員——台灣民眾政黨支持之分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7:1-34。
- 1996 〈台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一九七九～一九八九年兩波挑戰層峰的比較〉《台灣政治學刊》第一期:129-209。

王振寰

- 1989 〈台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二卷一期，71-116。

朱雲漢

- 1989 〈寡佔經濟與威權政治體制〉，收於蕭新煌等人合著《壟斷與剝削：威權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頁 139-160，台北：台灣研究基金會。
- 1993 〈選民的政黨選擇〉，宣讀於「選舉行為、憲政秩序與政治變遷學術研討會」，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選舉行為研究小組主辦，十二月十七日。

高承恕

- 1989 〈台灣新興社會運動結構因素之探討〉，頁 9~19，收於徐正光、宋文里合編《台灣新興社會運動》，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吳乃德

- 1993 〈省籍意識、政治支持和國家認同——台灣族群政治理論的初探〉，收於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頁 27-51，台北：業強出版社。

吳介民

- 1990 〈政治轉型期的社會抗議：台灣 1980 年代〉，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筱峰

- 1987 《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出版社。

徐火炎

- 1992 〈民主轉型過程中的政黨重組：台灣地區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政黨偏好與黨派投票改變之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五卷一期，213-263 頁。
- 1993 〈選民的政黨政治價值取向、政黨認同與黨派投票抉擇：第二屆國大代表選舉選民的投票行為分析〉，《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

《社會科學》三卷二期，頁 144-166。

若林正文

1989 《轉型期的台灣——「脫內戰化」的政治》，台北：故鄉出版社。

張茂桂

1989 《社會運動與政治轉化》，台北：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

1994 〈民間社會、資源動員與新社會運動——論台灣社會運動研究的幾個理論志向〉，《香港社會科學學報》4:33-66。

張茂桂、朱雲漢、黃德福、許宗力

1992 《民國七十年代台灣地區「自力救濟」事件之研究》，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會委員會。

教育部

1994 《中華民國教育統計》，台北：教育部。

陳明通

1993 〈選民的選舉參與〉，宣讀於「選舉行爲、憲政秩序與政治變遷學術研討會」，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選舉行爲研究小組主辦，十二月十七日。

彭懷恩

1987 《台灣政治變遷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出版社。

游盈隆

1993 〈台灣選民的議題取向投票：二屆國大選民的分析〉，宣讀於「選舉行爲、憲政秩序與政治變遷學術研討會」，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選舉行爲研究小組主辦，十二月十七日。

蕭新煌

1989 〈台灣新興社會運動的分析架構〉，收於徐正光、宋文里合編《台灣新興社會運動》，頁 21-46，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瞿海源

1993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二期第四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委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出版。

Alba, Richard D.

1988 "Interpreting the Parameters of Log-linear Models," in J. Scott Long (ed.) *Common Problems/Prosper Solutions: Avoiding Error in Quantitative Research*, New York: Sage Publishers.

Aldrich, John H. and Forrest D. Nelson

1984 *Linear Probability, Logit, and Probit Models*, Sage University Papers series on Quantitative App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 series no. 07-045,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 Cheng, Tun-Jen  
1989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41(July):471-499.
- Chu, Yun-han  
1990 "Social Protests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政治科學論叢*, 第一期:65-88.
- Cohen, Jean L.  
1985 "Strategy or Identity: New Theoretical Paradigms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 *Social Research* 52(4):663-716.
- Davies, James, C.  
1962 "Toward a Theory of Rev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1):5-19.
- Gurney, Joan Neff, and Kathleen J. Tierney  
1982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Critical Look at Twenty Years of Theory and Research,"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3(Winter):33-47.
- Gurr, Ted, R.  
1970 *Why Man Rebe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enkins, J. Craig  
1983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9:527-563.
- Jenkins, J. Craig, and Charles Perrow  
1977 "Insurgency of the Powerless: Farm Worker Movement (1946-1972),"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2):249-268.
- Klandermans, Bert  
1992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rotest and Multiorganization Fields." Pp. 77-103 in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edited by Aldon D.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landermans, Bert, and Dirk Oegema  
1987 "Potential, Networks, Motivations, and Barriers: Steps Toward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4):519-531.
- Marger, Martin N.  
1987 *Elites and Masses: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ociology*.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 McAdam, Doug  
 1982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cAdam, Doug,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1988 "Social Movements," Pp. 695-737 in Neil J. Smelser (ed.) *Handbook of Sociology*,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 McCarthy, John D., and Mayer N. Zald  
 1973 *The Trend of Social Movement in America: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Morristown, N.J.: General Learning Press.
- McCarthy, John D. and Mayer N. Zald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6):1212-1241.
- Melucci, Alberto  
 1989 *Nomads of the Pres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Need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London: Hutchinson Radius.
- Nielsen, Francois  
 1985 "Toward A Theory of Ethnic Solidarity in Modern Socie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0(2):133-149.
- Smelser, Neil J.  
 1963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Snow, David A. and E. Burke Rochford Jr.  
 1983 "Structural Availability, the Alignment Process and Movement Recruit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 Snow, David A., and Robert Benford  
 1988 "Ideology, Frame Resonance, 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 Pp. 197-217 in Bert Klandermans, Hanspeter Kriesi, and Sidney Tarrow (eds.)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Greenwich, Connecticut: JAI Press Inc.
- Snow, David A., E. Burke Rochford, Jr., Steven K. Worden, and Robert D. Benford  
 1986 "Frame Alignment Proces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4):464-481.
- Snow, David A., Louis A. Zurcher, Jr. and Sheldon Ekland-Olson

- 1980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Movements: A Microstructural Approach to Differential Recruit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4):787-801.

Turner, Ralph H.

- 1969 "The Theme of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390-405.

Turner, Ralph H. and Lewis Killian

- 1972 *Collective Behavior*,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 附錄：本文建構的合成性測量的原始問項 及因素分析結果

### 一、民主理念

原始問項	Communality	因素分數 係數矩陣
請問您同不同意下面這些看法？		
(1)有強而有力反對黨，政治才會進步。	.4335	-.5685
(2)參加反對黨的人，他們的愛國情操（心）是值得懷疑的（台語：有問題的）。	.3892	.6120
(3)目前台灣的政治已經很民主了，我們不必再多做要求。	.4632	.6664
(4)如果國民黨領導的政府做的不好，就應該換別黨來做。	.3750	-.5232
(5)現在社會那麼亂，都是因為政府給人民太多自由的緣故。	.6827	.6658
Eigenvalue	2.0280	解釋百分比 22.5

### 二、臺獨意識

下面是一些常被人提到的看法，請問您同不同意這些看法？		
(1)台灣應該盡可能協助中國大陸發展經濟，拉近兩岸的生活水平差距。	.2701	-.5216
(2)在經濟發展上，台灣應該不斷保持領先，不能讓中國大陸追趕上來。	.2626	.5124
(3)多數外省籍的政府官員並不真正認同台灣。	.4602	.6784
(4)多數本省籍的政府官員並不真正贊成台灣與大陸統一。	.4135	.6430
(5)我們的歷史教育應該強調台灣歷史。	.2206	.4696
Eigenvalue	1.6289	解釋百分比 32.6

### 三、省籍意識

1. 您覺得從大陸來的（年長的）外省人與本省人對台灣前途的看法，有沒有不同？	.6359	.7975
2. 您覺得在台灣出生的（年輕的）外省人與本省人對台灣前途的看法，有沒有不同？	.6412	.8007
3. 您覺得從大陸來的（年長的）外省人與本省人對中國大陸的感情，有沒有不同？	.6867	.8177
4. 您覺得從台灣出生的（年輕的）外省人與本省人對中國大陸的感情，有沒有不同？	.6462	.8039

Eigenvalue 3.1654 解釋百分比 64.8

### 四、選舉參與

請問您去年年底（八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所舉行的立法委員選舉期間，有無參加下面的各項活動？

- (1) 前往聽取政見發表會
- (2) 邀請親友前往聽取某一位候選人的政見發表會
- (3) 閱讀選舉公報
- (4) 閱讀候選人的傳單、快報或宣傳小冊
- (5) 參加為選舉而舉辦的聚餐或餐會
- (6) 前往投開票所，觀看投、開票過程
- (7) 正式擔任某一候選人的助理工作人員

# 當代台灣社會的信任與不信任

張荳雲\*

## 摘 要

這篇論文是要回應文獻中由親而信的信任建構原則。作者認為親信哲學，以個別行動者為對象的信任，僅是當代社會人際信任的兩個機制之一：另有一類不以個別行為者為對象的信任，也就是非人際的制度性信任。第二種機制：非人際信任的建構，是當代社會變遷的主要發展面向。本文從社會變遷調查兩期五年的資料中，選出和信任與不信任有關的題目，探討 1984-1992 九年間台灣社會民眾的信任和信任，並討論到底這股不信任是普遍存在的，遍及個人和集體組織？還是選擇性的？這個研究的發現有 1.台灣社會民眾的不信任感有增加的趨勢，這股不信任的心態，不只表現在人際關係上，也表現在對包括政府、司法和執法機關、大眾傳播媒體的組織，以及對這些組織的在職者。對組織信任感的滑落幅度遠大於人際信任；2.以往以年齡和性別作為是否具有適當的能力和睿智，這種傳統的判斷標準已受到明顯挑戰，這是走向平權社會重要的一步；3.在眾多組織中，以對大眾傳播媒體的信任感滑落幅度最大；4.男性、教育程度高者、都市居民、年輕人和本省籍人士的不信任傾向比較強。由此，本篇論文提出由陌生到熟悉和信任之間不同媒介的性質，以解釋不同屬性的個人對不同類型行動者之信任的差異，由這個理論假設的方向，可以做為進一步研究的起點。

---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

# Trust and Distrust in the Taiwanese Society

Ly-Yun Chang

##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most studies of trust and distrust in the Taiwanese society,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both personal trust and impersonal trust.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trust in a natural person while the latter in an organization or institution. An analysi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waves of the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TSCS) produces four major findings: (1) There is a trend toward lower level of personal trust among relatives, neighbors, and strangers, but also impersonal trust toward governments, legal systems, mass media, and their respective incumbents. The decline of impersonal trust appears to be far more pronounced than that of personal trust. (2) The public's evaluation or expectation of a person's competence and privilege is no longer based on, or differentiated by, age and gender. (3) Among all the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studied, the greatest decline in public trust is with the mass media. (4) Young, urban, educated, male, native Taiwanese tend to be less trusting in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than do others (such as the old or female). This paper applies Luhmann's concept of familiarity and trust to interpr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ust and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I conclude that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impersonal trust is the key aspect of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Taiwan.

# 當代台灣社會的信任與不信任

這篇論文的主旨是要處理信任建構的課題。信任的課題在社會學文獻中討論的並不多，然而在有限的社會學文獻以及國內相關的經驗研究中，都指出信任是建構在社會網絡上，是由親而信的信任哲學，1964年 Peter Blau 的社會交換論即為典型的代表。1973年 Granovetter 所提出的「鑲嵌論點」(embeddedness thesis) 指出以人際網絡的脈絡，進行的經濟行為或是社會交換，是最有效的交互往來的方式，自此在社會學圈子裡引起了一波重新詮釋和定位初級人際網絡的研究。這篇論文是要回應前述觀點，認為親信哲學：以個人為對象的信任，僅是當代社會人際信任的兩個機制之一；另有一類機制是不以個人為對象的信任。以往社會學研究將信任這個概念侷限在微視層次的初級關係或初級關係的延續，以致當代社會信任的問題一直沒有受到適當的處理。從經驗資料的分析，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以個人為對象的信任和以群體、法人和制度為對象的信任，表現出不同的變化走向。我們認為這類不以個人為對象的信任是當代社會變遷的重要指標，兩者變化的走向以及相互交錯的運作是當代社會必須正視的課題。

## 一、親信哲學的反思

社會秩序 (social order) 的鋪陳與開展，而至於穩定，乃是一連串的信任建構過程。信任建構基礎的蛻變，是社會變遷的重要面向之一，我們可以觀察到現代社會人際關係的迅速次級化、距離化、和片斷化，陌生人成為生活中的多數，和陌生人的往來成為生活的主要活動，各類社會組織因應而生，以協助個人化陌生為熟悉、為信任，身

份證、信用卡、證照制度、保險制度等都是例證。

這個現象所帶給我們的啓示是，除了人際之間由親而信的信任基礎外，當代社會的秩序已鋪陳在非以特定個人為對象的信任基礎上，成為當代社會生活的主體文化。基於這樣的觀察，對於非人際信任基礎的孕育、擴展、以至居於主導地位，以及當代社會如何在「由親而信」的信任基礎上，迎接、面對、詮釋、及實踐非人際信任基礎和處理因不信任而衍生的難題，這些問題應該受到社會學者的注意。

過去的研究都指出今日的台灣社會，即使已邁入了開發國家之林，傳統的「親信」信任格局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無論是經濟活動，或是政治和社會生活領域，以血緣和地緣為立足點的信任基礎，逐漸過渡到建構於表現和經驗上的信任基礎（陳介玄與高承恕 1991）。「由親而信」的信任格局被視為左右中國人社會關係的基調，但是尋根究底的來看，這種建構在個人才智表現和互動經驗的信任基礎，由於是建立在附著於特定個人的直接人際互動上，它信任基礎的本質並沒有改變，仍然是以人為中心親信哲學的延長，變的是對「親」的定義。所謂親者，從原來的以血緣和地緣為界，過渡到以實際互動中的觀察和體會來定義。

血緣和地緣關係的重要性逐漸式微，由歷年來社會變遷調查和社會意向調查的簡單次數分析可以得到印證。越來越高比例的受訪者同意「人與人之間越來越不能互信」。認為親人是值得信賴的比例維持在百分之六十，而有超過百分之二十的受訪者認為即使是鄰居也不能相信，百分之十左右的人認為鄰居之間還是少來往為是（附表一）。其實，不能信任陌生人（自然人或法人）是很自然的。有趣的是此處的自然，可以是有家庭連帶的親人，可以是有地緣為主的鄰居，可以是熟人，也可以為陌生的「人」。傳統上常用的血緣和地緣，或是由初級關係發展而來的朋友關係，在是否能信任這個問題上，已不必然是主要的參考指標。



陌生人之所以轉變成熟人，而致值得投入信任，是需要經過熟悉這個階段。個人是藉由生活世界中的參考指標、符號或象徵，將不熟悉、陌生的世界，引介進入熟悉的世界 (Luhmann 1988)。過去的社會多以初級互動關係做為引介進入熟悉領域的媒介，因為做為媒介的初級關係可以信任，所以信任得以產生；而在當代社會中，除了傳統的信任媒介外，依賴的是自然人所建構的社會組織或制度，將陌生引入熟悉以致信任。之可以信任，是因為做為媒介的制度值得信任。

在這樣的思考之下，雖然人際之間的信任感有削弱的趨勢，認為人際之間愈來愈不能互信，但是在當代社會中，人對於另一股本質截然不同的集體實體或制度，以及佔據在這些職位上的個人，<sup>1</sup> 卻表現出相當程度的信任。這樣的觀察透露出來的是：這些以不同行動者為對象的信任，是性質完全不同但彼此相關的現象。同樣在這樣的思考下，不難瞭解，何以對這些集體實體，例如政府、大眾傳播媒體、學校、民意機構、或執法機構等，或在這些集體實體據有職位者，如政府官員、新聞從業人員、老師、民意代表、法官、律師的信任轉弱，往往會被視為社會的危機。這股信任或不信任，並不是附著於個人的，而是對集體實體的通盤認知，不信任的產生和如何面對和處理這個層面的不信任，也往往成為討論的焦點。

所以，就當代社會的運作機制而言，如果親信信任格局是當代台灣社會社會關係的基調，在社會現代化的蛻變過程中，社會秩序的維持與再製，將陷於紊亂難解，難以發展成為成熟的當代社會。藉著鋪陳在普同原則和特殊原則交錯的格局上運作的信任，藉著對不同社會領域的觀察，來檢驗社會秩序的建構與再製，可能有助於評估經過四、五十年現代化建設的台灣，是否已成功而穩當地邁向成熟的當代社會。

1 此處的個人，以 Coleman (1973) 的概念稱為自然人，以對應法人的概念。

## 二、人際信任與非人際信任

信任 (trust) 被視為穩定社會關係的根基，也是監控交易行為最有效的方法。最近社會學和經濟學文獻對信任感 (trust) 的討論，大都集中在《理性選擇學說》(rational choice model) (Coleman 1990) 和遊戲理論 (game theory) (Dasgupta 1988)。關於期貨、合約、或公司組織之間的合作關係，信任被視為是建構和維護合作不可或缺的基礎。這些類別的交易行為，由於存有風險，“可計算性”是建構信任的主要內容，也就是說，信任的產生必須是經過風險的計算和深思熟慮，然而觀察現實世界的日常生活，“可計算性”顯然並不是信任的唯一內容。中國社會中人情關係網所展現的差序格局，表現的是另一種形式的信任，是一種人際之間“不需要計算”、“不應分你我”、和“自家人”的交往關係和交換行為。中國人的社會以血緣、婚姻、和地緣等標準，界定信任的程度，界定是否能視為“自家人”，是否能“不分你我”，這些標準向來是區別中國社會和其他社會的指標。計算式的信任和不分彼此的信任，在當代社會的日常生活中並不罕見。

無論是以可計算性或不需要計算作為信任的核心內容，信任都是一種關係，是一種有時間落差的預期，於交往或交換行為中被突顯出來。信任的產生有些是和信任對象的個人特質有關，有些則是和集體或制度有關，不是附屬於個人的特質上。Zucker (1986) 在分析 1840 到 1920 年美國社會經濟結構的制度性根源時，為了在變遷的基調上論證信任建構的機制，她從三種不同的層面來剖析信任的根源：1) 從過程衍生的，指信任的產生是從過去往來的經驗或交換行為產生；2) 從特質衍生的，指因個人的背景特質而產生的信任感；和 3) 由制度衍生的，指信任的產生和維持，和社會制度的設計有關。第二種的信任是附屬在個人身上的，是為“人際信任”；第一種信任的兩方，包括自然

人或是組織的代理人，信任的產生，無論是來自於長期的交往，或是來自於利益的計算，本質上也是屬於人際之間的信任；至於第三種由制度衍生的信任，其中的制度可以指證照制度、會計制度、和契約等，也可以指社會組織的方式，例如當代社會的科層組織，這一類型的信任，很明顯的是屬於“非人際的信任”。

非人際信任的蘊育，並蛻變為社會秩序的運作基調，是當代社會的重要特質之一，這個立論的基礎在於觀察到當代社會科層組織之興起、普及、和主導社會活動的這種現象。由於組織具有非個人(impersonal)的本質，在「理性」、「客觀」、和「一視同仁」等特色的包裝下，所突顯的是“跑得了人，跑不了廟”的信念。對組織的這種非人際信任之具有“非人際”的特質，是因為信任組織的運作能符合原先所設定的目標、能合於常規範定、不致因私利而害公益等。

如果認為經驗研究上，信任的測量是對研究者很大的挑戰，那麼在日常生活中，無論是人際之間，或是公司組織之間，或是人與組織之間，要確定怎樣的情況之下才能謂之信任，怎樣的情況下才能使人撤防，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現代社會的許多制度即是針對在信任的前提下所衍生的行為，能不因信任的前提改變（即不能信任）而受到損害，或將損害降至最低而設計的，公證制度即為一例。兩人的正式契約，需要經過第三者的見證，才有多一層的保證，所以信任不只是建立在有效的正式契約的簽訂上，更建立在第三者之見證這個契約為真的基礎上。合約中的連帶責任和再保險制度等都是在這樣的認知下出現的。對於制度組織的信任，不止是對組織運作邏輯的信任，更是信任社會總有一套制度，能夠規範組織的行為，能夠在組織行動溢出常軌時，具有導正的力量(Shapiro 1988)。這樣的論述之下，信任在概念上應被視為一種社會組織，在這套社會組織的運作下，信任得以塑造。

以醫療服務為例，個人求醫過程中對醫療人員和醫療人員所建構

的醫療服務場所(醫院和診所)的授權和託付,所表現出來的即是“非人際信任”。這個信任固然因人而異,但本質上不是針對個人而發的,而是對附著於個人身上一系列活動的評估。具體而言,醫療專業所形塑出來的“專業常規和倫理”,具有的“公信力”和“品牌保證”,是在教育部(政府組織)、醫學院(教育組織)、醫療界(專業組織)共同運作的結果。任何人經過了這些組織的洗禮和考驗,即表示他有行醫的能力。沒有人可以自修而行醫(稱作密醫,以有別於經過社會組織認可的醫療人員)。非人際信任之蔚為社會活動的基調,是當代社會工具理性抬頭的典型例子。

### 三、信任概念的測量

談到信任的測量,當然首先需要問到的是對什麼的信任?信任與否是無法在真空狀態下判別的。回顧文獻中對信任的定義,尤其在人際之間的信任感,很容易即將之定位在動機的層次,因而蘊含較強的倫理道德意味。傅仰止曾經整理過人際間不信任感的文獻,將不信任定位於「不信任他人行為的動機,不採信別人善意的一種不誠摯的心態」(意向調查報告,1992:第44頁),這是用行為結果的出現與否來反推信任是否存在。

個人層次的人際間信任固然可以有較強型的道德意味,推演到非人際信任時,就顯得捉襟見肘。於集體實體的信任,無論是依人口特徵,或是依職業、專業、和財富,或是依職位和組織,動機取向的定義都有所不足。因為對集體實體層次的職業專業、組織和職位的信任,除了倫理道德層面的動機論外,能力、公平、正義、利他和穩定等層面都是信任產生的根源(Barber 1983),這是人際信任和非人際信任的重要區別之一。

就前所述,我們認定信任基礎的蛻變是社會變遷的重要面向之一,

人際間的互動僅為社會活動之一小部份，所以這篇論文將信任議題從人際間擴展到非人際的信任，依照這個論點，除了撤防、交託、信賴等個人心理層面考量外，信任還代表著授權和肯定，信任應該定位在對公義、正直、利他和能力等特質的肯定上。

由於變遷是本篇論文討論的主軸，研究問題據此設定在：過去的九年間（1984 到 1992 年），台灣社會的民眾對他人、組織和職位上的個人的信任程度為何？有何變化？並據此進一步追問：信任心態的不變，是普遍存在各種不同特質的個人，還是選擇性的。最後，則是比較民眾的信任感是遍及個人和不同組織和職位？還是偏於某些個人和某些組織和職位？到底這股不信任是普遍性的，遍及個人和集體組織？還是選擇性的？這些信任和不信任的立足點在那裡？這幾年的變化如何，是這篇論文所要處理的問題。本文藉著這樣的分析，以突顯人際信任和非人際信任這兩股不同機制的變遷走向。

## 四、資料與分析策略

本篇論文所使用的資料分別抽取自社會變遷第一期問卷二（1984-2）、社會變遷第二期第一年問卷一（1989-1）、社會變遷第二期第二年問卷二（1990-2）、社會變遷第二期第三年問卷二（1991-2）、社會變遷第二期第四年問卷一（1992-1）、和社會意向第二年（1991）等。

### （一）依變項：與信任有關的題目

這篇論文以人際關係之間的信任做為一個起點，進一步分析台灣社會對不同社會群體和法人組織的信任感。因此，分析模型的依變項分為三大類，第一類為對自然人，包括一般人、鄰居、親人；第二類則為以人口特徵、知識、和財富為基礎的社會群體。例如年長者和男性，或是對某些專業包括醫師、律師、教授、企業家等皆是；第三類

則為法人組織。對法人組織的信任可以直接表現在對這些組織的評價上，如對大眾傳播媒體對新聞的處理、政府的行事決策、和法院判決的公正性等，另外亦可以表現在對職位的集體形象評估。第三類法人組織中且包括在職者的做法是將職位上的個人視為組織的代理人，例如立法委員、法官、政府官員、警察等，分別可以代表民意機關如立法院、法院、政府組織、和警察單位。事實上，就意義而言，職位者和組織實都指涉同一社會實體，即法人(corporate actor) (Coleman 1974)。

這篇論文所使用的依變項的資料，根據前述的分類，將原問卷中的問題和出現的時間列於註二。至於變遷的討論則僅限於同時在第一期和第二期都有的資料。

2 一、第一類為對自然人，包括親人、鄰居、和一般人：

親人：「在現代社會裡，最值得信賴的還是親人」(91-1)

鄰居：「為了避免麻煩，鄰居之間還是少來往為妙」(84-1、90-1、91-2)

人際一：「人與人之間再也沒有可靠而值得信任的關係了」(84-2、90-1、91-2)

人際二：「在自己的生活環境中，一個人總可以找到一些可以信任的人」(84-2)

二、第二類為以人口特徵、知識、和財富為基礎的社會群體。例如年長者和男性，或是對某些專業包括醫師、律師、教授、企業家等皆是。

年長者：「政治方面的決定，應讓年長的人多負點責任比較妥當」(84-2、90-1、91-2)

男性：「政治是男人的事，女人最好少參加」(90-1、91-2)

三、第三類則為組織：

政府機關：「一種意見可不可以社會流傳，應該讓政府來決定」(84-1、90-1、91-2)

報紙：「對於報紙上的消息，一般來說您相信的程度如何？」(84-1、93-1)

電視一：「對於電視上的消息，一般來說您相信的程度如何？」(84-1、93-1)

電視二：「電視的報導是公平的」(92-2)

廣播：「對於廣播上的消息，一般來說您相信的程度如何？」(84-1)

這篇論文的信任感，因資料的性質，必需由行為面的特徵來反推信任之有無。當然從行為面來推論信任感之有無，這種做法是否得當，值得進一步推敲。一來有許多行為是發生在習慣性基礎上，可能與信任無關；其次有些則為主觀感受，如喜歡與否，偏好的問題能否和信任扯上關係，也值得思考。理想的做法是，討論信任的議題，最好能將上述之行為類別區分開來，但實證研究中卻往往有實際的困難存在。

在分析對各類組織或職位代理人的信任時，根本的困境在於，不信任的產生有兩個本質上衝突的來源：一為受訪者根據自己或他人的經驗，或根據某些事實而判斷，故而不信任某一類人或組織。這是「什

---

法律一：「國內的法律是主持正義，扶持弱小，您贊不贊成這樣的說法？」(91-2)

法律二：「國內的法律是為了促進社會安定、解決衝突，您贊不贊成這樣的說法？」(91-2)

法律三：「國內的法律是保障有權有勢的人，您贊不贊成這樣的說法？」(91-2)

法律四：「國內的法律是政府用來控制人民、壓制反對者的工具，您贊不贊成這樣的說法？」(91-2)

法院一：「如果您與人發生糾紛而打官司，您認為會不會得到法院公正的審判？」(90-1、91-2)，改為「像您這樣的人，如果去法院打官司，也會得到公平的審判」(92-2)

法院二：「反對人士都能得到公正的審判」(90-1、91-2)

警察機關：「您認為警察機關在審問嫌疑犯時有沒有刑求的情形？」(90-1、91-2)

四、公職者，即組織的代理人，例如立法委員、法官、政府官員、警察等：

政府官員一：「一切大小國事應該聽從政府首長的決定」(84-1、90-1、91-2)

政府官員二：「政府官員在電視與報紙等媒體所說的話，都是作秀的成份居多」(92-2)

政府官員三：「我們的政府首長在做決定的時候，通常都是公正無私的」(92-2)

立法委員：「我們的立法委員在決定各種法案時，都是為大眾的利益設想」(92-2)

警察：「我們的警察確實能做到保護好人打擊壞人」(92-2)

麼樣的人、社會群體、或組織不值得大家信任?」的問題；另一則為個人的性格特質：多慮、無安全感、和猜疑，是「什麼樣的人比較不容易信任他人、其他社會群體、或組織?」的問題，這是社會心理學文獻慣常處理的議題。行為面的資料的確不容易區辨這兩種可能的方向，定位於探討當前台灣社會發展的這篇論文，對於前者的探討有其特殊的意義，不想將問題與心理人格特質的思考方式混淆。也就是說，這篇論文企圖從社會變遷現有的資料中，有系統的分析是什麼樣的人，對他人、社會群體、或組織有比較強的不信任感。不信任是根源於某些人、社會群體、或組織的表現，比較讓人無法苟同，既無力更正，當然也無法從而產生信任。

## (二)自變項

個人基本變項是分析的自變項，包括年齡、出生年代、教育程度、工作場所、居住地點都市化的程度、性別和省籍等。因為考慮到成長和生活環境所帶來的影響，可能大於生命週期的人生閱歷下，同時，資料又是來自不同的期別和時間點，故而決定除了當時填答問卷時的年齡外，又另外建構了「出生年代」變項。<sup>3</sup> 這樣的決定，意味著在各種社會力和政治力鬆動的時代成長的一群，與那些帶動、目擊且經歷著這一連串變遷的一群，以及那些早年經歷過戰亂、貧窮、離家的一群，他們的人生經歷，可能對人、組織、社會的信任心態有所不同。

教育程度、工作場所和居住地點都市化程度等三個變項都指涉著生活訊息的豐富與否。歷年來各期各年教育程度的答項和編碼各有不

3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出生世代和年齡的建構是不一樣的。年齡是當時受訪時的實際年齡，而出生世代則將年齡換算成出生年代，再加上重組而成。二者之間相關在統計上並不顯著。其次，在檢查過 1984 年的資料檔後，發現有許多 1908 年以前出生者（即當時是六十六歲以上之受訪者，有的當時甚且超過八十歲），這些受訪者的資料將不包括到這次的分析裡。



同，故而依循一個簡單的假設：受教育的年數越多，教育程度越高，將這些類別學校所提供正式教育的年數，轉錄為受教育年數，而不考慮教育的性質，如普通中學、職業學校、或特殊軍警教育。這樣的做法一方面解決編碼不同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後幾年的資料與第一期的資料對應。

「工作場所」是由是否受僱於組織來判定。第二期的資料比較直接了當，除了有受訪者的「就業身份」（指是否就業和為誰工作）外，還有在那一類機構工作的資料；而第一期並沒有這些資料，只有「是否就業」和「工作酬金的方式」這兩方面的資料。為了建構「工作場所」我們做了一些必要的推演：利用「工作酬金的方式」資料中，“按月領薪水”的假設為在機構中工作，其他如“按工（日）計酬”、“按件計酬”、和“抽取佣金”者歸為其他，而“自僱”仍為自僱。這樣的建構是不得已之下的妥協，雖不理想但應可接受。

第三個和資訊、生活經驗有關的變項是居住地點：居住在都市地區？城鎮？或鄉村地區？由於第一期有都市化層級的資料：都市、城鎮和鄉村等三層，故而將第二期受訪者居住地點的資料，根據抽樣時的設計和台灣省經動會所編製的經濟發展指標，將台北市、高雄市和台灣省的五省轄市定為都市地區、經動會等級之第一和第二級定為城鎮地區，其餘則歸為鄉村地區。這三個變項的基本假設是教育程度越高、受僱於某些組織或是自僱者、居住在都市地區者，由於他們的知識程度、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的影響，他們的資訊來源比較可能多元化，生活的資訊也可能比較豐富，和相對的低教育程度、為自己或家裡工作、居住在鄉村地區者相比，對人和對組織的信任程度會有所不同。

最後，性別和省籍多少指涉著這些不同的社會群體的社會地位，以瞭解社會中的劣勢團體或是主導社會運作的優勢團體之間的差異。根據資料，省籍分為閩南、客家、外省及其他等四組。

台灣地區信任和不信任心態的“變遷”是這篇論文的主題，因此「時期」是個重要變項。由於相關資料分散在不同期別、年別、和問卷別的調查中，對於時期的設定是以年做基礎。也就是說，1984年的代碼為“0”、1990年為“6”，以此類推，1993年的即為“9”。

爲了閱讀分析結果的方便起見，各變項的編碼方式請參考註四。

### (三)資料分析前之技術處理

由於分析時所採的策略是將所有相關的資料合併成一個資料檔，以利於五年間隔的比較，其中遇到的一個困難是第一期和第二期過錄方式的改變。例如所有採用李克特量表型式的題目，第一期的都是六點量表，分別指涉「非常」、「相當」、「還算」、「有點不」、「相當不」、

#### 4 變項名稱 編碼

##### 自變項

年齡	受訪時年齡。
性別	1: 男性; 2: 女性。
省籍	1: 閩南; 2: 客家; 3: 外省; 4: 原住民。
教育	實際受教育年數，從 0 (不識字) 到 22。
工作場所	0: 未就業; 1: 爲自己或家裡工作; 2: 在機構工作。
出生年代	出生年別，分爲 1: 1935 年以前出生者; 2: 1936-1950 年; 3: 1951-1965 年; 4: 1966 年以後。
居住地點	1: 都市地區; 2: 城鎮地區; 3: 鄉村地區。
時期	0: 1984; 6: 1990; 7: 1991; 8: 1992; 9: 1993。

##### 依變項:

一、1: 非常贊成; 2: 贊成; 3: 不贊成; 4: 非常不贊成。

反向題: 分數越小表示越不信任，鄰居、人際一、政府官員二、警察機關、法律三、和法律四。

正向題: 分數越小表示越信任，包括親人、人際二、年長者、男性、政府官員一、政府官員三、立法委員、警察、政府、法院一、法院二、法律一、和法律二。

三、1: 非常相信; 2: 相信; 3: 不相信; 4: 非常不相信。

正向題: 報紙、電視、和廣播等。

和「非常不」，而第二期的則為四點量表，分別指涉「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爲了比較上的方便，參考了兩期相關項目的答案分配之後，決定將第一期的六點量表改錄爲四點量表。做法是將第一期的「相當」和「還算」合併、「相當不」和「還算不」合併。初步比較了它們的次數分配，看起來相當合理。

另外，大部份的態度量表均有「不明瞭題意」、「沒有意見」、和「無願意回答」等三個答項。不可否認，這些答項不僅有方法學上的意義，在實質內容上的意涵也值得思考，因爲選答這些項目的受訪者不是隨機的(蕭新煌和張苙雲 1988)。但是考慮到這篇論文所要處理的議題和這些資料在過去還沒有做過太多分析，因此初步決定將上述三個選項均視爲缺失值。

由於納入分析模型的資料有屬於次序類屬的變項，如信任程度(或贊成程度)和都市化程度；有類別變項，如性別、省籍、出生年代、和工作場所等；也有可以視爲連續變項的變數，如教育年數、年齡、和時間等。考慮到資料的測量性質，分析上採用次序類別的對數迴歸分析(Hosmer 和 Lemeshow 1989)依變項的次數分配列於附表一。

## 四、個人信任圈的建構

### (一) 自然人際之間的信任與不信任

從親人、鄰居，擴展到一般人所建構的個人信任圈，在過去幾年間到底有些什麼變化？能分析的資料分別來自四個題目：「在現代社會裡，最值得信賴的還是親人」、「爲了避免麻煩，鄰居之間還是少來往爲妙」、和「人與人之間再也沒有可靠而值得信任的關係了」與「在自己的生活環境中，一個人總可以找到一些可以信任的人」。

關於自然人際間的信任問題，傅仰止曾經將人際之間的不信任感做爲評估現階段台灣社會人際關係的一個面向。他所綜合的文獻指出：

年輕、男性、低社經地位者、都市居民、租屋居住者、曾經離婚者、以及藍領階級和治安人員等，不信任他人的傾向比較高。他所分析的1991年台灣社會意向調查的資料結果，印證了部份國外文獻的發現，社會變遷的資料分析也有類似的回應。社會變遷的資料中，人際間信任的資料只有一般人和鄰居兩項。如前所述，「時期」資料的建構，是以1984年為“0”，而1993年為“9”，因此「時期」迴歸係數意指年平均變化。表一看到的是越來越多的人贊成「人與人之間沒有信任關係」以及「鄰居之間少來往」，越來越多的人對他人和對鄰居有戒心和

表一：人際和對社會群體的信任

	人 際				社會群體					
	親人+	鄰居	人際一	人際二+	年長者+	男性+				
女性	.050	-.430 <sup>#</sup>	-.324*	-.263*	-.168 <sup>#</sup>	-.038	-.058	-.086	-.022	-.018
客家籍	.026	-.056	-.066	.062	.067	-.202	-.059	-.048	.148	.153
外省籍	-.279 <sup>#</sup>	-.017	-.013	.053	.051	-.294 <sup>#</sup>	-.073	-.040	.368 <sup>#</sup>	.364 <sup>#</sup>
原住民	-.079	-.091	-.226	-.089	-.234	-.200	-.682*	-.396	.230	.215
自雇者	.003	.004	.052	-.239*	-.203 <sup>#</sup>	-.260 <sup>#</sup>	.186 <sup>#</sup>	.072	-.087	-.083
機構工作	-.032	.026	.010	-.015	-.033	-.190 <sup>#</sup>	-.075	-.050	.020	.023
1936-50	.066	-.043	-.040	.142 <sup>#</sup>	.147	-.165	.044	.040	.037	.035
1951-65	.030	-.075	.079	.009	.009	-.145	-.031	-.041	.111	.108
1966+	-.011	-.139	-.141	-.032	-.035	.276	-.083	-.111	.237	.232
城鎮	.203 <sup>#</sup>	-.163 <sup>#</sup>	.032	-.166 <sup>#</sup>	.012	.034	.397*	-.011	-.112	-.118
鄉村	-.014	-.102	.127 <sup>#</sup>	-.121 <sup>#</sup>	.085	.040	.201 <sup>#</sup>	-.279*	-.310 <sup>#</sup>	-.339*
教育	-.013	.016 <sup>#</sup>	.038*	.047*	.067*	-.070*	.099*	.060*	.131*	.131*
年齡	-.008	-.014 <sup>#</sup>	-.012*	-.009*	-.007 <sup>#</sup>	.005	-.010*	-.017*	-.028*	-.028*
時期			-.093*		-.085*			.201*		.109
解釋量	.004	.013	.022	.016	.023	.016	.033	.072	.077	.077
樣本數	2314	7403	7403	7061	7061	4038	6251	6251	3352	3352

\* P<0.001 # P<0.01 @ P<0.05

+表示正向題，分數越小，表示越信任。

本表分別以男性、閩南籍、無工作者、1921年至1935年出生者、都市居民作對比。

疑慮。人際間不信任的心態隨著時間逐漸增強，不信任的心態不僅存在於陌生人間，也存在於對生活四週的鄰居以及自己的親人之間。

配合附表一的次數分配資料，至少有 25.0% 的人不認為親人是最值得信賴的。贊成鄰居之間少來往的比例，在兩期三年的資料中「非常贊成」和「贊成」的比例並沒有明顯變化，變的是由非常不贊成移轉到不贊成。這五年之間，雖然不至於認為鄰居之間少來往為妙，但已經不是絕對不贊成這種說法。

至於「人與人之間沒有值得信任的關係」的這種說法，雖然非常贊成這種說法的人僅為少數，且在兩期三年間沒有明顯的變化，但是「非常不贊成」的百分比則明顯下降，同時，「不贊成」和「贊成」的百分比相對增加，尤其是持贊成意見者。據此，我們還是可以說，越來越多人對於人與人之間是否存在有值得信任的關係，抱持著保留的態度。

總而言之，八〇年代的台灣，雖然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認為在他（她）的生活環境中，還是可以找到可以信任的人，然而還是有至少四分之一的人不認為親人是最值得信賴的，有十分之一左右的人認為鄰居還是少來往的好，有百分之二十四到三十的人認為人與人之間沒有什麼可以信任的關係。這個結果和五年前第一期的資料相比，整體看來，人際間的信任關係是減弱了。值得注意的是，強烈地贊成「鄰居之間少來往」和「人與人之間沒有信任關係」的比例，在這幾年間有稍微下降的趨勢。由這兩項資料來看，社區意識似乎不是完全沒有發展的契機。

到底這股不信任是普遍存在於各階層群體？還是某些群體特別突出？表一的對數迴歸分析所呈現出的係數是分別以男性、閩南籍、無工作者、1921 年至 1935 年出生者、和都市居民做為對比的結果。表一的結果指出，(1) 整體而言，人際間的關係，包括鄰居、民眾有比過去較強的戒心，比過去較深的疑慮；(2) 教育程度越低和年紀越大戒心越

強、疑慮也越深；(3)民眾因關係的遠近而出現了不同的信任圈，各群體階層的表现不太一樣。

具體地來說，從社會距離最近的親人開始，向外推至鄰居，再而至一般人的個人信任圈，男女、各省籍者、不同工作場所、以及居住不同地區的居民，其表現都有些許差別。以對親人的信賴為例，除了外省籍比閩南籍、都市居民比城鎮居民傾向於信賴他們的親人外，其餘各群體並沒有明顯的差別。至於鄰居、女性和城鎮居民對鄰居的戒心比男性和都市居民要來得強；都市居民又比鄉村居民有較強的戒心。

至於對一般人的信任感，同樣地，女性和城鎮居民比較有戒心，對人際間的關係有較多的疑慮。由於人際一和人際二的題目涉及人際關係的不同層面：人際一是“人與人之間沒有什麼值得信任的關係”，而人際二是“還是可以找到值得信任的人”，兩者並排討論時，倒有些出人意料的發現。例如外省籍的人比閩南籍的人信任他們的親人，也比較認為可以找到值得信任的人；又，自雇者雖然比無工作者不信任他人，可能因為接觸面的關係，卻同時也認為是可以找到值得信任的人；在機構中工作的人也比較認為可以找到值得信任的人。為什麼外省籍者和本省籍者表現不同？不同工作場所對人的社會心理影響是什麼，可能都是未來可以發展的研究議題。

## (二)對社會群體的信任

如前所言，當“信任”這個問題從非特定群體擴大到對具有特定屬性的社會群體的信任時，信任的內涵可能必須隨之調整。也就是說，對社會群體的信任，除了倫理道德的意涵之外，似乎另外帶有對社會群體能力評估和授權的味道，這是自然人際之間信任比較少具有的特質。在經驗研究的資料方面，目前能用的題目都和政治有關：「政治方面的決定，應讓年長的人多負點責任比較妥當」和「政治是男人的事，

女人最好少參加」。當然由年長者做決定和政治是男人的事，引申為對年長者和男性的信任，並不是不合理。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將之認定為對社會群體的信任，其實有其侷限性。

和1984年相比，贊成年長者應該在政治事務上多負些責任者，在六、七年中大幅滑落；在這同時，不贊成的比例則對應地大幅增加。至於對政治是男人的事的看法，短短的兩年間百分比升降的模式則有朝「不贊成」集結的趨勢：「贊成」和「非常不贊成」這個說法的，同時滑落兩個百分點左右，而「不贊成」的則增加約四個百分點。總體來說，對年長者和男性處理政治事務上的信任，呈現下滑的趨勢。持有“年長者不應在政治事務上多負責任”看法者，與年增加，相反的，對“政治是男人的事”這個問題，1990和1991這兩年間並沒有很大的變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年長者”的資料在1984、1990、和1991等三年均曾經搜集過，而只有1990和1991兩年有“男性”的資料，一年之間的變化或許仍不明顯，如果時間拉長一些，這個變化趨勢可能因為累積而更明顯（附表一）。

另外，教育程度越高和年紀越輕的人，越不認為年長者應在政治事務上多負些責任，也不認為政治是男人的事，女人最好不要參與。比較有趣的是外省籍者比閩南籍者更不贊成「政治是男人的事」的這種說法。城鎮居民和都市居民對年長者和男性的看法不分軒輊，倒是鄉村居民對年長者和男性有較高的信任。無論如何，這些年來，越來越多的人不認可年長者和男性在政治事務上的處理，而認為應該由社會中的其他群體共同參與。其中教育程度高的、住在都市地區的和年紀輕的人尤其有這樣的看法，不同性別在對這些事務的看法上倒沒有明顯的差異（表一）。

### （三）對法人組織的信任

#### （1）政府機構

社會變遷調查中可以視之為對各類法人組織之信任感的題目並不多(見註一)，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政府組織、大眾傳播媒體、司法和執法機關等。有關政府組織的題目在兩期共三年的問卷中出現，問到「意見之流傳與否，是否應由政府來決定」，在1984年時，有61%的受訪者贊成，有的甚至非常贊成由政府決定、主導公共事務的進行，只有5%的人非常不贊成。事隔六年，到了1990年，贊成由政府主導的百分比大幅下跌至43%，在1991年進一步跌至38%左右，其中非常贊成的人維持在不到3%的水準，不贊成的百分比由1984年的33%上升至1990年的51%和1991年的55%，而非常不贊成的百分比則維持在5-7%間(附表一)。

整體而言，民眾對政府在公共事務的主導性越來越有戒心，越來越持著質疑的態度。這種不信任的心態，近年來轉而趨於強烈，時期的迴歸係數值為.097，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教育程度越高和年紀越輕的，對政府的不信任傾向越強，越不贊成由政府來決定那些意見可以流傳(表二)。當時間變項沒有納入分析時，還可以看到都市地區以外的居民還是比較認同政府對公共事務的主導，閩南籍的人也比原住民更認同政府的主導性，但是一旦考慮了時間的變化，這些差異即行消失，顯示同區域和同族群在不同的時間點變化較大，以至區域間和族群間有趨同的發展。也就是說，在1984年時都市地區以外的居民和原住民是比較認同政府的主導性，及至六年之後的1990年，對政府是否應該主導公共事務的問題上，非都市居民和原住民顯得比都市居民和其他族群的變化要大，而漸漸趨近於都市居民和其他族群的看法。

## (2) 大眾傳播媒體

「對電視消息的信任」(84-1、93-1)、「電視報導公平」(92-2)「對報紙消息的信任」(84-1、93-1)、和「對廣播消息的信任」(84-1)是三類與大眾傳播媒體信任感有關的題目。整體來看，大眾傳播媒體在過去九年之間越來越不能得到大眾的信任，越來越多的人不信任報



紙和電視上的消息。其中「非常相信」和「相信」報紙上的消息者合起來在 1984 年和 1993 年的九年間滑落了三十八個百分點，同時答「不相信」和「非常不相信」的人數則對應地增加。對電視上消息的相信程度也有同樣的不信賴傾向，並且相信程度滑落的幅度更大。在 1992 年時，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受訪者認為電視上的報導是公平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受訪者不認為電視報導是公平的，其中有近十分之一的受訪者甚至非常強烈地認為電視是不公平的（附表一）。

對大眾傳播媒體的不信任，尤其是報紙和電視上的訊息，與日漸增，滑落的幅度遠大於民眾對政府機構的信任。顯示出這些年來民眾

表二：對組織的信任

	政府機關+		報紙+		電視一+		電視二+	廣播+
女性	-.073	-.092	.104	.192 <sup>#</sup>	-.037	-.044	-.348 <sup>@</sup>	.199
客家籍	-.124	-.124	.051	.073	-.013	-.018	-.301	.215
外省籍	-.078	-.062	-.244 <sup>#</sup>	-.210 <sup>@</sup>	-.213 <sup>@</sup>	-.160	-.886*	-.126
原住民	-.572 <sup>#</sup>	-.379	-.781 <sup>#</sup>	-.303	-1.009*	-.480	-2.971 <sup>#</sup>	-.302
自雇者	.032	-.048 <sup>#</sup>	.301*	.229 <sup>@</sup>	.196 <sup>@</sup>	.120	.261	.178
機構工作	-.080	-.075	.139 <sup>@</sup>	.035	.166 <sup>@</sup>	.010	.186	-.073
1936-50	-.009	-.004 <sup>@</sup>	-.137	-.122	-.112	-.079	-.345	-.050
1951-65	-.035	-.029	-.259*	-.295*	-.110	-.134	-.221	-.026
1966+	-.017	-.019	-.103	-.096	.177	.263	-.421	.316
城鎮	.259*	.029	.215 <sup>#</sup>	.002	.215 <sup>#</sup>	-.035	.039	.054
鄉村	.191 <sup>#</sup>	-.072	.716*	-.067	.746*	-.190 <sup>@</sup>	-.135	-.356 <sup>#</sup>
教育	.105*	.081*	.087*	.019	.108*	.020 <sup>@</sup>	.058*	-.023
年齡	-.012*	.016*	.000	-.016*	.008 <sup>#</sup>	-.012*	-.023*	-.016*
時期		.097*		.234*		.318*		
解釋量	.036	.048	.033	.137	.038	.192	.047	.009
樣本數	5877	5877	4776	4776	5558	5558	1072	2952

\* P<0.001 # P<0.01 @ P<0.05

+表示正向題，分數越小，表示越信任。

本表分別以男性、閩南籍、無工作者、1921年至1935年出生者、都市居民作對比。

對報紙和電視台消息的處理相當有意見，因而直接表現在對這些媒體所報導的消息的不信任上。教育程度越高和年紀越輕者，越不相信報紙和電視上的消息；但是外省籍者和戰後出生者（1951至1965年）分別比閩南籍和1935年以前出生者要相信報紙多些，女性比男性更不相信報紙的新聞，卻與外省籍者和原住民一樣，比較相信電視的報導是中立的。鄉村居民又比都市居民相信電視和廣播的報導（表二）。

### (3) 司法制度和執法機關

社會變遷調查中有關對組織信任的題目中，第三類的法人組織是和執法機構有關，包括對法律和對法院、警察機關等司法和執法機關的信任。法律作為社會控制的正式機制，而法院和警察機關分別授權承擔攸關人民權益的最終裁決和維護人民權益之不受侵犯，對這類組織和制度之能發揮既有的功能和得到社會成員的信任，是社會秩序的基石。在差不多同一時期進行的社會意向調查報告即曾由對法官和政府官員的信任度中推論到，一般民眾對司法與執法體系的不信任，這個推論在社會變遷資料分析裡得到證實。

九〇年代台灣社會民眾對法律的認知是什麼？社會變遷調查在1991年各有兩個正面與兩個反面的題目。正面的題目是：國內的法律是「主持正義，扶持弱小」和「促進社會安定、解決衝突」；而反面的題目則是國內的法律是「保障有權有勢的人」「政府用來控制人民、壓制反對者的工具」。簡單的次數分配結果相當讓人沮喪。80%的受訪者認為國內法律的主要作用是促進社會安定，但只有57%的認為法律能主持正義和扶助弱小；在此同時，不少的受訪者非常質疑而且批判法律的控制本質和工具性格：有40%同意或非常同意國內的法律是保障有權有勢者的工具，20%認為法律是政府控制人民的工具。大部份的人對國內法律的信任感是相信負面的。

長久以來，台灣社會司法體系的獨立自主性備受質疑，法律尊嚴不受到重視，常常被踐踏，民眾不能信任司法機關審案的公正性，這

無寧是聲稱台灣社會“已”邁入開發國家之林、是成熟的現代社會，這種說法最有力的反證。台灣民眾是否相信法院會公正地審判？法院的判決裁定，是否會受到個人的背景關係、政治信仰、和其他原因的影響？社會變遷調查中分別有「像您這樣的人」和「反對人士」，如果去法院打官司，是否會得到公平的審判的問題。在1990年，大約有66%到68%的受訪者相信或是非常相信「像您（受訪者）這樣的人」，以及相信或是非常相信「反對人士」，可以得到公平的審判。有大約三分之一的人不相信、或非常不相信法院的判決是公正的。值得警惕的是，到了1992年的調查，非常相信「像您一樣的人」可以得到公平審判的比例驟然下降了十四個百分點，由1991年的17%降到1992年的3%，而且相信的比例也降了四個百分點，兩年之間，降幅之大，非可等閒視之（附表一）。

各群體對法律的認知沒有太大的差異，只有鄉村居民要比都市居民更相信法律能夠主持正義、扶助弱小，也比較相信法律能促進社會安定（表三）；而有工作的人，無論是自雇或是在機關做事，比較懷疑法律能主持正義和扶助弱小。值得注意的是對法院判決的公正性，省籍的差異相當明顯：比起閩南籍者，客家人和外省人更相信法院能公正的審判，也比較相信反對人士能得到公正的審判。對應於男性，女性也比較信任法院能公平的審判；無工作者也比自雇者和在機關做事者，非都市居民比都市居民更加信任法院主持正義的能力。總而言之，在九〇年代的頭幾年，對法院的信任感有日益降低的趨勢。

認為警察機關在審問嫌疑犯時有刑求的百分比，在1990和1991兩年中維持在百分之七十以上，在1991年認為有刑求的百分比低了一些，比較多的人不認為警方會用刑審案。女性、外省人、和鄉村居民，要比男性、閩南人、和都市居民，較不相信警察機關刑求問案，也就是說，他們比較信任警方的說詞。

綜合看來，男性、教育程度高的、年紀輕和居住在都市地區的人，

表三：對司法和執法組織的信任

	法律一 <sup>+</sup>	法律一 <sup>+</sup>	法律三	法律四	法院一 <sup>+</sup>	法院二 <sup>+</sup>	法院二 <sup>+</sup>	警察機關		
女性	.108	.099	.035	-.029	-.169 <sup>#</sup>	-.155 <sup>#</sup>	-.156	-.145	.525*	.519*
客家籍	-.029	.408	.268	-.053	-.280 <sup>#</sup>	-.278 <sup>#</sup>	-.462*	-.445*	.116	.113
外省籍	-.053	.361	-.002	.579 <sup>#</sup>	-.492*	-.551*	-.786*	-.787*	.433 <sup>#</sup>	.441 <sup>#</sup>
原住民	-.566	-.234	-.438	.180	-.326	-.210	-.048	-.085	.975	1.000
自雇者	.630*	.058	-.445	-.248	.319*	.338*	.154	.160	-.099	-.102
機構工作	.357 <sup>#</sup>	.051	-.231	.022	.184 <sup>#</sup>	.104	.098	.101	.102	.098
1936-50	-.300	-.493 <sup>#</sup>	-.033	.101	.062	.065	.198	.199	.099	.097
1951-65	.036	-.112	-.075	.253	.038	.033	.012	.015	.102	.099
1966+	.080	-.244	-.226	.123	.062	.049	.071	.066	-.112	-.110
城鎮	-.261	-.233	.079	-.108	-.169 <sup>#</sup>	-.089	-.109	-.115	-.031	-.025
鄉村	-.495 <sup>#</sup>	-.843*	.262	.219	-.049	-.190 <sup>#</sup>	-.116	-.160	.449*	.477*
教育	.030	.001	-.007	.035	-.004	.009	-.005	-.005	.018	.018
年齡	-.012 <sup>#</sup>	-.012	.002	.001	.002	.000	.001	.001	.025*	.025*
時期						.460*		.167		-.107
解釋量	.022	.029	.008	.012	.008	.026	.013	.014	.023	.024
樣本數	906	958	922	894	3288	3288	1940	1940	1788	1788

\* P<0.001 # P<0.01 @ P<0.05

+表示正向題，分數越小，表示越信任。

本表分別以男性、閩南籍、無工作者、1921年至1935年出生者、都市居民作對比。

對社會上包括政府、司法和執法組織、和大眾傳播媒體不信任的傾向比較強。他們比較不信任這些組織有能力處理相關的事務，比較不信任這些組織能公正無私地做獨立判斷，也比較不信任這些組織在職責上沒有預設立場。民眾對問卷題目所涵蓋的這些組織的信任感，都呈現下跌的勢態，而以報紙和電視下滑的幅度之大，最為引人注目。民眾對社會組織的判批和質疑態度轉強，戒心增加，似乎顯示出民間社會力的鬆動與茁壯。

#### (四)對組織在職者的信任

1991年社會意向調查中，八月的定期調查曾經有兩個題目問到受訪者對不同職業和專業人士整體的信任程度。題目是這樣問的：「就下列八種不同行業的人中，您最信任那一種人？（就下述八項中選出一項）」和「就下列八種不同行業的人中，您最不信任那一種人？（就下述八項中選出一項）」。

這八種不同行業中有五種是職業專業人員，他們是醫師、教授、宗教人士、律師、和企業家。除了選其他項者外，醫師和教授是最被信任的職業，這兩個職業在1,623位受訪者中得到最高百分比的「最信任的行業」和最低百分比的「最不信任的行業」（表四）。宗教人士有類似的模式，但最信任的百分點低些，且最不信任的百分點高些。根據這一年所做的意向調查，律師和企業家都沒有被列入最信任，也不是最不信任的行業。

表四：個人信任圈的建構：對職業和職位的信任

	專業職業人員					公職			
	醫師	教授	宗教人士	律師	企業家	法官	政府官員	民意代表	其他
最信任那種人和最不信任那種人？									
信任	295	250	225	43	28	157	71	61	493
	18.2	15.4	13.9	2.6	1.7	9.7	4.4	3.8	30.4
不信任	17	9	70	60	104	72	197	479	615
	1.0	0.6	4.3	3.7	6.4	4.4	12.1	29.5	37.9
執法人員中最信任誰？									
	都不信任	法官	調查局人員	檢察官	警察	不知道			
	499	230	123	112	70	585			
	30.7	14.2	7.6	6.9	4.3	36.0			

樣本數：1623

資料來源：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八十年八月定期調查報告。

1991年社會意向調查曾經問到最信任和最不信任的行業，有另一組題目是問到對各類公職人員和執法人員的信任程度。和其他類別的專業職業人員相比，民意代表在民眾心目中，被信任的程度是敬陪末座，不僅“最信任”項下的百分比最低（3.8%），而且在“最不信任”項下的百分比高居榜首，而公職人員中，相對於政府官員，民眾對法官的信任感也高些，雖然，「從制度設計的角度，法官被賦予就攸關人民權益的事項作最終裁決的權限，理應最受民眾信任」（社會意向調查報告，頁186），但事實上，法官所得到的信任程度，不僅低於醫師（18.2%）、教授（15.4%），也低於宗教人士（13.9%）。醫師和教授這兩種職業在我們的社會中得到較多的信任，與這兩個職業的專業地位有關，而宗教人士則在本質上有強烈的道德色彩。對法官之信任程度低，已經令人十分關切，相對於其他執法人員：調查局人員、檢察官和警察，法官還是最被信任的（表四），在近三分之一的受訪者眼中，所有的執法人員，誰也不值得信任。

我們從授權（聽從政府首長的決定）、發揮預定功能（保護好人打擊壞人）和動機等角度，在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中選擇三組五個題目，推斷民眾對組織的代理人：政府官員、立法委員、和警察等的信任程度，有一半以上（三年的百分比介於48%和66%之間）的民眾不認為國家的事應該聽從政府官員的決定。雖然有一半以上的民眾非常相信或相信政府官員是“公正無私”的（59%）和在媒體上的發言不是在作秀（55%），是發自內心的真誠，然而，民眾對政府官員在國家大事的授權，卻逐年降低，有相當比例的人不相信政府官員的決策是公正無私的（41%）、認為發言僅是在作秀而已（44%）。這個不信任的心態看起來相當強烈（附表一）。

民眾對政府官員的信任感不僅在近年來明顯地滑落，教育程度高的以及年紀輕的，不贊成國家大事聽命於政府官員的決定的傾向還更強（表五）；戰後出生的和年輕人還比一般人更不相信政府官員的決定

表五：對公職者的信任

	政府官員一 <sup>+</sup>	官員二	官員三 <sup>+</sup>	立委 <sup>+</sup>	警察 <sup>+</sup>	
女性	-.089	-.102 <sup>@</sup>	.066	-.183	-.190	.140
客家籍	-.157 <sup>@</sup>	-.155 <sup>@</sup>	-.107	-.072	-.036	-.051
外省籍	-.109	-.094	.351	-.327	-.187	.090
原住民	-.732 <sup>*</sup>	-.632 <sup>#</sup>	-.219	-.604	.205	-.117
自雇者	.077	.034	.160	.205	.063	.451 <sup>#</sup>
機構工作	-.059	-.054	.172	.002	.172	.107
1936-50	.004	.001	.125	.129	.032	-.402 <sup>@</sup>
1951-65	.002	.000	.034	.366 <sup>@</sup>	.116	-.056
1966+	.083	.081	.466	-.128	-.130	.070
城鎮	.139 <sup>@</sup>	.012	.321	-.319	-.413 <sup>@</sup>	-.250
鄉村	.054	-.087	.119	-.172	-.538 <sup>*</sup>	.142
教育	.108 <sup>*</sup>	.095 <sup>*</sup>	.029	.025	.117 <sup>*</sup>	.051 <sup>*</sup>
年齡	-.012 <sup>*</sup>	-.014 <sup>*</sup>	.012	-.034 <sup>*</sup>	-.010	-.031 <sup>*</sup>
時期		.046 <sup>*</sup>				
解釋量	.038	.041	.010	.035	.065	.042
樣本數	6361	6361	1008	1060	1140	1195

\* P<0.001    # P<0.01    @ P<0.05

+表示正向題，即分數越小，表示越信任。

本表分別以男性、閩南籍、無工作者、1921年至1935年出生者、都市居民作對比。

是公正無私的。在與閩南人和男性相比之下，客家人、原住民和女性比較信任政府官員。

如果民眾對政府官員的信任程度值得憂慮，那對民選的立法委員的信任感更是值得擔心。在問到「我們的立法委員在決定各種法案時，都是為大眾的利益設想」時，只有 33% 的受訪者贊成這種說法，其中包括不到 2% 的非常贊成者，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根本不相信立法委員能為大眾的利益設想。而對警察的看法則介乎其中，還有 45% 的人相信「我們的警察確實能做到保護好人打擊壞人」，雖然超過一半以上的人並不相信警察真能做到保護好人、打擊壞人的預定職責，和立法委員相比，還是比較多的人相信警察能盡責(附表一)。教育程度高的和居住在都市地區的，比較不信任立法委員，比較不認為他們能為大眾利益著想(表五)，戰亂時出生的那一群要比戰前出生者相信警察能保護好人打擊壞人，年紀輕的對警察的信任傾向要高些。

## 五、結論：普遍性抑或選擇性的不信任？

這篇論文旨在處理信任建構的課題。我們認為以往社會學研究將信任這個概念侷限在微視層次的初級關係，以致當代社會信任的問題一直沒有受到適當的處理。從經驗資料的分析，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以個人為對象的信任和以群體，以法人和制度為對象的信任，表現出來不同的變化走向，兩者變化的走向以及相互交錯運作是當代社會必須正視的課題。就前節的分析結果，我們可以從人際信任和非人際信任等層面的異同以及不同社會屬性和信任程度之間的交叉變化等兩方面來討論。

如果我們以贊成（或同意）的程度做為信任與不信任心態的參考指標，綜合本文個人信任圈建構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這幾次社會變遷調查有關“信任”的資料，總合起來所傳遞的訊息是：現代台灣



社會的民眾對自然人際之間的信任心態還是比較強些（正面表達信任的比例介於 72% 和 95% 之間），對社會中的新興行動者的法人組織的各種活動，則是保有相當的戒心（正面表達信任的比例介於 31% 和 93% 之間，且高比例的信任指標多出現在 1984 年），而且這種戒心和批判質疑的心態，逐年增強。

對自然人的信任，並不是對所有人都是等距離的。雖然越來越高比例的人認為人與人之間已經沒有什麼信任關係了，然而，在絕大多數認為自己生活圈內，仍然可以找到值得信任的人的前提下，四分之一以上的人不認為親人是最值得信賴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認為「鄰居是很麻煩的，還是少來往為妙」，雖然鄰居間的來往，並不代表鄰居是最值得信賴的，可以拆除防衛，但是這樣的發現，多少都意謂著現代台灣社會的「親信哲學」已經發生了質變。因親而信的原則固然維持著，但親的定義已然不同了。不再以血緣、地緣、和婚姻為親的絕對標準，而加入了往來經驗和其他可驗證的標準。

親信哲學發生質變的同時，我們也看到以年齡和性別為是否具有適當的能力和睿智的這種傳統判斷標準，在過去的九年間也明顯的受到挑戰。“痴長幾歲”和身為男性也不被認為是壟斷政治事務的合理化藉口。這種以年齡和性別為基礎的信任觀之受到強烈的挑戰，毋寧是台灣社會結構令人稱道的發展之一，是走向平權社會重要的一步。

尤其是對於政府主導、和政府首長決定國家大事等題項，大多數人都應該會同意不贊成百分比的增加是件美事，是威權政體鬆綁的動力，然而另有一些題項不信任所反映的不是對扭曲的制度的不滿，就是對公器私用的不耐，這類的結果則是需要深思反省。前者如質疑做為法治社會標竿的法律、司法機關、和執法機關，審判的公正性和捍衛人權的能力；後者如認為政府官員、立法委員、和大眾傳播媒體，公然地將私利的成本建構在公益之上。這些題項上信任度的下滑，應視之為社會發展的警鐘，這個研究固然發現若干群體階層間呈現出明

顯差異，但是，相對於時間的變化，這些群體階層間的差異顯得微不足道。我們的分析指出，1984年以來，民眾對現代社會主體之一的組織，尤其那些和庶民生活習習相關的政府機構、司法和執法機構、和大眾傳播媒體，信任程度大幅下滑，對組織信任下滑幅度之大，使得人際間的不信任相對看來，不是那麼嚴重了。

台灣社會在邁向現代化的蛻變過程中，社會秩序的維持與再製，相當程度建構在非人際基礎的信任上。對於這一股本質截然不同的集體實體或制度，以及佔據在這些位置上的個人，所表現出的信任程度，其實不必然需要被視為社會安定或危機的指標。表現在授權上的信任與安定並不一定能與開放、平權、和民主劃等號；對於以處理公共事務為職責的組織，它們處理事務的判斷決策的能力和執法能力等這些根本要求有了懷疑和不信任，也不盡然是嚴重的社會危機，因為對能力的判斷很難有客觀的標準，而且常常與期望的高低有關。以美國歷年來對政府機構信任之民意調查結果來看，也是呈現下滑的走向 (Coleman 1990)。因而理論上以能力為基礎所建構的信任，通常是互動過程中所達到的交集點，大有為的政府往往發生在民間社會力被壓抑的社會中。

然而能力只是信任的原因之一，行動者在角色或職務上的注意義務，如公平和正義的原則，以及自己權益和他人權益之間的平衡等倫理原則的維護，亦是產生信任的根源。這次分析所選用的題目，如法律是主持正義、法律保障有權有勢者、法院審判的公正性、政府官員公正無私地做決策、或是立法委員的私利與公益之間的選擇等，都是與行動者（個人或是制度）維護倫理原則的能力有關。對於以處理公共事務為職責的組織或個人，它們的公正無私受到質疑，這一點無法不視為嚴重的社會危機，尤其是這股不信任的心態，已經有逐漸漫延的趨勢。

由目前社會變遷調查資料的結果看來，台灣的民眾對和日常生活

習習相關的政府機構、司法和執法機關、和大眾傳播媒體普遍存在著相當程度的不信任，不信任他們能公正無私，不信任他們能有效的執法，也不信任他們能將眾人之利益置於私利之前。而教育程度高、都市地區居民、年紀輕、和男性，不信任的傾向更強。這股信任或不信任，並不是附著於個人的，而是對集體實體的通盤認知。這股不信任的心態也連帶地表現在這些組織佔有職位的人身上。不信任是如何產生的，固然是個值得我們思索的問題，我們的社會是否有能力面對和處理這個層面的不信任，是否有制度性的設計，能有系統、有效率地將這股負面的心態，轉化成爲開放、成熟，和健康社會進步的原動力，更值得我們思考。

其次，各類群體屬性中，以教育程度和年齡的解釋方向最爲一致：教育程度越高和年紀越輕的人，除了對一般人和自己的鄰居有較多的信任之外，其餘無論是對年長者和男性，或是對各類組織及組織的在職者都是採取比較質疑和批判的態度。值得注意的是，對法院的信任倒不因教育程度的高低或年齡高低，而有不同，有三分之一的受訪者不認爲在法院能得到公正的審判。

都市居民和非都市居民對不同的對象的信任程度，表現得也不一樣，尤其是都市居民和鄉村居民之間。如果差異達到顯著水準的話，通常指的是鄉村居民比都市居民更傾向於相信他人、相信組織、和相信在職者。出生年代之間的差異並不明顯，而工作場所卻顯出不同程度的差異，對應於無工作者，自雇者對自然人、大眾傳播媒體和法院、以及警察的信任程度都顯得低些；在機構工作者對某些組織也有類似的情形。

兩性對於許多不同層次對象的信任，有非常明顯的差異。女性對比較遠距離的法人組織之行爲，如電視報導的中立性、法院、警察機關、和政府官員都比男性來得信任，但對近距離的鄰居或不特定的個人則有較強的戒心，這是一個值得玩味的發現。

省籍的差異相當明顯，這次分析是以閩南人做為基準，以其他族群有系統的和閩南人相比，分析的結果顯示外省人不僅對親人有較高的信賴，而且對社會制度的信任感也較強，外省人對報紙、電視、法院、和警察機關都有較高的信賴感。客家人在某些項上和外省人類似，如對法院的信任即為一例。原住民比較突出的是對年長者的信任，和對大眾傳播媒體的信任，這和閩南人很不一樣，原住民對其他的社會制度，如政府機關、法院、警察機關、或在職者的信任感都和閩南人並無不同。

回到 Luhmann 有關熟悉和信任之間關係的討論，可能有助於思考何以不同群體屬性對各類信任表現出不同的風貌。其中的關鍵似乎在將陌生帶入熟悉以致信任這個媒介的性質上。媒介愈多元、愈具有公信力，則愈可能投入信任。多種媒介中，當以親身經歷和親身掌握最為自己所信任，由此，社會距離近的，愈有機會接近、體驗，或是愈有機會交叉檢驗的，愈可能採取批判的態度，也比較不容易產生信任。另一種媒介則與行動者之社會網絡的特質有關，社會網絡做為重要的參考架構，它的重要性在於權力差距，由此我們可以假設劣勢群體比較容易對主流社會的活動產生較強不信任的心態。二者的交互作用，或者可以解釋不同群體屬性對各種基礎的信任所表現出來的差異。女性對身邊人的戒心和對法人組織的放心、外省人對親人和既有體制的信任、以及都市人的批判心態，由上面的理論假設的方向，可能可以做為進一步研究的起點。

附表一：個人信任圈的建構

	非常贊成	贊成	不贊成	非常 不贊成	小計	
自然人際的信任						
親人：最值得信賴						
91-1	364	1368	568	25	2325	
	15.66	58.84	24.43	1.08	100.00	
鄰居：少來往						
84-2	56	359	2112	1362	3889	
	1.44	9.23	54.31	35.02	100.00	
90-1	20	240	1713	450	2423	Chi2=247.3
	0.83	9.91	70.70	18.57	100.00	Pr=0.000
91-2	13	79	766	246	1104	
	1.18	7.16	69.38	22.28	100.00	
一般人：沒有信任關係						
84-2	95	801	2251	594	3741	
	2.54	21.41	60.17	15.88	100.00	
90-1	62	567	1497	163	2289	Chi2=146.7
	2.71	24.77	65.40	7.12	100.00	Pr=0.000
91-2	38	274	656	76	1046	
	3.63	26.20	62.72	7.27	100.00	
一般人：能找到可以信任的人						
84-2	622	3217	141	32	4012	
	15.50	80.18	3.51	0.80	100.00	
對社會群體的信任						
年長者：多負些責任						
84-1	200	1405	1401	191	3197	
	6.26	43.95	43.82	5.97	100.00	
90-1	24	377	1407	268	2076	Chi2=678.8
	1.16	18.16	67.77	12.91	100.00	Pr=0.000
91-2	18	171	684	113	986	
	1.83	17.34	69.37	11.46	100.00	

## 男人：政治是男人的事

90-1	37	279	1559	420	2295	Chi2=8.2 Pr=0.041
	1.61	12.16	67.93	18.30	100.00	
91-2	23	102	765	177	1067	
	2.16	9.56	71.70	16.59	100.00	

## 對組織的信任

## 政府：由政府決定公共事務

84-1	356	1529	1006	168	3059	Chi2=333.1 Pr=0.000
	11.64	49.98	32.89	5.49	100.00	
90-1	54	774	971	114	1913	
	2.82	40.46	50.76	5.96	100.00	
91-2	27	321	505	62	915	
	2.95	35.08	55.19	6.78	100.00	

## 大眾傳播：相信報紙的程度

84-1	125	2427	696	10	3258	Chi2=1034.8 Pr=0.000
	3.84	74.49	21.36	0.31	100.00	
93-1	13	458	975	74	1520	
	0.86	30.13	64.14	4.87	100.00	

## 大眾傳播：相信電視的程度

84-1	336	3278	289	4	3907	Chi2=1828.7 Pr=0.000
	8.60	83.90	7.40	0.10	100.00	
93-1	31	630	902	90	1653	
	1.88	38.11	54.57	5.44	100.00	

## 大眾傳播：電視報導公平

92-2	17	358	595	104	1074
	1.58	33.33	55.40	9.68	100.00

## 大眾傳播：相信廣播的程度

84-1	142	2371	429	10	2952
	4.81	80.32	14.53	0.34	100.00

警察機關：仍有刑求						
90-1	186	702	223	60	1166	
	15.52	60.21	19.13	5.15	100.00	Chi2=6.4 Pr=0.093
91-2	109	355	141	22	627	
	17.38	56.62	22.49	3.51	100.00	
法院：公正的審判						
90-1	259	717	368	98	1442	
	17.96	49.72	25.52	6.80	100.00	
91-2	133	381	224	47	785	Chi2=198.9 Pr=0.000
	16.94	48.54	28.54	5.99	100.00	
92-2	33	477	479	82	1071	
	3.08	44.54	44.72	7.66	100.00	
法院：反對人士得到公正的審判						
90-1	246	615	336	83	1280	
	19.22	48.05	26.25	6.48	100.00	Chi2=5.4 Pr=0.144
91-2	101	330	192	46	669	
	15.10	49.33	28.70	6.88	100.00	
法律：91-2						
主持正義、扶助弱小	33	481	355	41	910	
	3.63	52.86	39.01	4.51	100.00	
促進社會安定	43	728	173	18	962	
	4.47	75.68	17.98	1.87	100.00	
保障有權有勢	45	325	504	52	926	
	4.86	35.10	54.43	5.62	100.00	
控制人民的工具	19	163	636	79	897	
	2.12	18.17	70.90	8.81	100.00	
對職位的信任						
政府首長：國家的事應聽從政府首長的決定						
84-1	335	1388	1275	302	3300	
	10.15	42.06	38.64	9.15	100.00	

90-1	73	760	1068	161	2062	Chi2=221.3 Pr=0.000
	3.54	36.86	51.79	7.81	100.00	
91-2	23	329	573	83	1008	
	2.28	32.64	56.85	8.23	100.00	
政府官員：作秀						
92-2	26	455	517	64	1062	
	2.45	42.84	48.68	6.03	100.00	
政府首長：公正無私的						
92-2	89	509	392	20	1010	
	8.81	50.40	38.81	1.98	100.00	
立法委員：大眾著想的						
92-2	21	361	642	118	1142	
	1.84	31.61	56.22	10.33	100.00	
警察：保護好人打擊壞人						
92-2	37	499	570	91	1197	
	3.09	41.69	47.62	7.60	100.00	

\* 資料來源為各期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



## 參考書目

蕭新煌和張苙雲

- 1988 社會問題的事實建構：民眾對社會問題認知的分析。見楊國樞和瞿海源編：變遷中的台灣社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第二十號，頁 133-158。

陳介玄和高承恕

- 1991 台灣企業運作的社會秩序：人情關係與法律。東海學報 32:219-232。

Barber, Bernard

- 1983 *The Logic and Limits of Trust*.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Blau, Peter

- 1964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NY: Wiley.

Coleman, James S.

- 1974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ety*. NY: W. W. Norton.

- 1990 *Foundation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asgupta, Partha

- 1988 "Trust as a commodity" Pp. 49-72 in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edited by Diego Gambetta. MA: Basil Blackwell.

Granovetter, Mark

-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360-1380.

Hosmer, D. W. and S. Lemeshow

- 1989 *Applied Logistic Regress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Luhmann, Niklas

- 1988 "Familiarity, confidence, trust: Problems and alternatives" Chapter 6 in Diego Gambetta (ed.)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MA: Basil Blackwell.

Shapiro, Susan P.

- 1988 "The social control of impersonal trus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3):623-658.

Zucker, Lynne G.

- 1986 "Production of trust: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economic structure, 1840-1920."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8:53-111.



#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劃

## 一、計劃簡介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劃」以提供社會變遷研究資料檔案為主要目的。由已故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處處長華嚴教授及時兼任國科會研究員之葉啓政教授推動。第一期計劃在一九八四—八五年進行，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楊國樞教授主持。後來在前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處處長劉克智教授及時兼國科會研究員的陳寬政教授積極支持繼續進行此項調查研究，乃規劃為期五年之第二期計劃，自一九八九至一九九四年共進行十項調查。第三期亦為期五年，已完成兩個年度的四個調查，正在進行第三年調查。第二、三期計劃均由中央研究院原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現為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的瞿海源教授主持。

本計劃是一長期性學術調查計劃，自一九八四年進行第一期計劃以來所蒐集之資料全面公開，提供學界研究分析。多年來已有許多學術工作者運用此一資料撰寫學術論著，對有關研究有實質的貢獻。

第一期調查屬於綜合性調查，包含了七個主要領域：心理、社會、文化、教育、大眾傳播、政治及精神醫學，涵蓋的範圍相當廣泛。

第二期調查分五年進行，除第一次調查屬於綜合調查之外，每年有二個主題，用兩份問卷進行調查。每年的調查主題如下：

第二次調查，1991年，問卷一為家庭、教育；問卷二為社會、政治及傳播。

第三次調查，1992年，問卷一為社會階層化；問卷二為政治文化。

第四次調查，1993年，問卷一為大眾傳播；問卷二為選舉行為與

### 政治參與。

第五次調查，1994年，問卷一為文化價值；問卷二為宗教。

每年問卷的設計均請與該年調查主題有相關的教授設計題目，因此，每年參與的學者除中央研究院研究員以外也涵蓋了台大、政大、師大、中興、東海、東吳、東華、清華、輔仁、暨南、高醫、台東師院等學院的教授，參與的學者每年大約有十至二十位。

為瞭解台灣社會的變遷現象，自第三期調查開始，問卷設計原則上以二期調查的問卷為藍本，盡可能保留原有題目，但也開發因社會變遷而需要探討的新的研究主題。

第三期調查的調查主題做了一些修改。各次調查主題如下：

第一次調查仍為綜合性調查。

第二次調查則為家庭及東亞社會。

第三次調查（目前正在進行）則為社會階層及社會網絡。

第四次調查預定主題是傳播行為、政治行為，政治文化與職業組織。

第五次調查預定主題是文化價值及宗教。

## 二、資料申請辦法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劃」在一九九五年改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執行，而調查資料的釋出也委託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工作室釋出。申請者可以逕向調查研究工作室洽詢。

調查研究工作室的電話：(02) 788-1625 轉 12 或 40，

傳真：(02) 788-1740，

E-mail: srda @gate.sinica.edu.tw

(URL) <http://www.sinica.edu.tw/as/survey>

申請者因該調查資料撰成之一切論著（如會議論文、期刊論文、

書本或其他等),在出版或發表一個月之內須送交兩份給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計劃」小組。資料申請辦法如下:

### (一)資料使用者申請資格

1. 國內外公私立研究機構之研究人員。
2. 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之老師。
3. 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博、碩士班研究生,及在老師的指導下的大學部學生。
4. 政府機構之相關研究人員。
5. 曾捐贈資料予「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之個人或機構。

### (二)申請資料手續

申請者可先以電話、傳真、或利用電子郵件與資料組聯絡,詢問有關事項。同時可以透過調查研究工作室在 WWW Homepage (<http://www.sinica.edu.tw/as/survey>),獲得「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所有相關的資訊。目前已可直接利用 WWW,填妥申請表寄回調查研究工作室。

#### (一)申請單筆調查資料者

須詳細填寫資料申請表,註明所需資料名稱及項目,將申請表與研究大綱或摘要寄回(或傳真)本室。待本室檢閱申請表並計費後,會通知申請者將所需金額利用郵政劃撥至「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工作室」,帳號為 17740166。工作室收到工本費劃撥款項後,即將所需資料郵寄出去。

#### (二)申請大型調查研究計劃整套資料者

除須詳細填寫資料申請表外,並且須撰寫研究計畫書,針對申請者所提出之計畫書,經該調查計畫主持人同意後,方可提供此全套調查資料。有關研究計畫書的撰寫規定如下:

## 1. 撰寫格式

### (1) 目的

請簡潔務實地寫明貴計畫想達成的目的及任何想驗證的假設。

### (2) 背景及重要性

簡短描寫貴計畫的研究背景，試著評論現有的知識，指出欲探索的問題，並陳述貴計畫對知識的累積將會有那些貢獻。

### (3) 研究設計及方法

爲了達成研究目的，貴計畫將採何種研究設計及程序。包括選用那些變數、資料將如何分析及解釋、欲採用何種統計方法、並比較任何新方法與現存方法之優缺點。

### (4) 預期結果

預估將達到何種結果，這些結果對於日後下一步研究的重要性，並討論潛在的研究困難及限制，或其他可達成研究目的之方法。

### (5) 參考書目

寫出貴計畫中所引用的文獻。每一引用文獻應註明：作者的全名、文獻的題名、文獻的出處、出版卷數、頁數及出版年等。

## 2. 頁數及字數限制

### (1) 申請單筆資料者

研究大綱或摘要，不含參考書目，頁數建議應爲一頁，字數約六百字。

### (2) 申請整套資料者

整個研究計畫書，不含參考書目，頁數建議應爲三至五頁，字數不得少於一千五百字。

## (三) 申請資料手續工本費及調閱費

調查研究工作室會根據申請者的合理需求，提供拷貝電腦資料檔、資料庫收藏目錄等服務，並酌收工本費，以支應資料庫在行政、維護

發展、資料處理所花費之人力、物力的開銷。費用包括：

- (一)磁片工本費：每一片 1.44MB 磁片五十元。
- (二)影印費：每頁一元，申請者須親自前來工作室自行影印執行報告等書面資料。
- (三)郵電費：如果申請者不克前來領取申請的資料，則應另行支付郵電費用（每次申請一百二十元）。
- (四)其他：前述三項費用未列入之必要費用。

### 三、本計劃將在網際網路上發行通訊(Newsletter)

多年來不僅台灣社會有許多變遷，本計劃十年來也歷經些許變遷，為讓資料使用者能更瞭解本計劃的內容，增加本計劃與學術圈內各位先進的雙向溝通，本計劃準備在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的網路網址上增加一個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劃的首頁，內容有：

- 一、本調查計劃的最新動態及調查進度，
- 二、歷年調查主題一覽表及歷次調查有效問卷份數表，
- 三、使用本計劃調查資料完成的論著目錄，
- 四、網上 call-in，資料使用者可以藉由網路將對本計劃的意見傳送進來，
- 五、其他與本計劃有關的研討會、論著出版及執行報告內容更正等訊息。

資料使用者及欲申請本計劃資料者均可利用此一網際網路服務，取得最新、最正確的資訊。同時本計劃希望大家能利用網上 call-in 的方式將意見傳送給本計劃，以便參與計劃的學者能集思廣益，將調查研究工作做得更好。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計劃小組

1997年5月

## 作者簡介

(下冊)

呂玉瑕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副研究員。主要研究興趣在家庭社會學及婦女研究，研究範圍包括性別角色、婦女就業、家庭組織及其變遷。主要著作有社會變遷中台灣婦女之事業觀、傳統工作態度及其變遷之研究、婦女就業與家庭角色、權力結構之關係、城鄉經濟發展與已婚婦女就業、台灣家庭企業的婦女角色初探等。

陸先恆 美國威斯康新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目前研究以社會人口學、女性就業、女性福祉、家庭社會學與社會統計為重點；並著重長期變遷、比較研究，以及與社會政策相關的理論與經驗議題。

胡美珍 美國威斯康新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候選人。目前研究以兒童福利、家庭福利與社會福利政策的制定與評估為重點。

孔祥明 世界新聞傳播學院社會心理學副教授。專長於婚姻、家庭與心理健康的研究。

蔡勇美 美國德州理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亞太邊緣地區研究主任，論文散見國內與國際期刊，近期主要著作有台灣都市世界（合編）、人力資本與二十一世紀（合著）。

伊慶春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研究領域主要在家庭社會學方面的夫妻權力與婚姻調適、子女照顧、婦女角色、家庭問題等議題；都市社會學方面則偏重都市鄰里關係、住宅滿足、以及個人資源等。主要論文包括台北地區夫妻權力的分析、夫妻衝突處理模式的影響因素、都市意象、家庭問題、Child Care Arrange-



ments of Employed Mothers in Taiwan 等。

葉光輝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主要研究興趣在中國人的孝道觀念、家庭教化或社會化歷程、親子互動困境消解，及老人居住安排等主題上。近年來致力於心理學本土化的研究工作。著有多篇與中國人的孝道觀念相關的研究論文。

吳齊殷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研究專長為家庭社會學、青少年行為研究、社會網絡分析及社會學方法研究。主要著作為與 Ronald L. Simons 等人合著之：*A Test of Various Perspectives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Domestic Violence*, 1995, *Criminology* 33(1):141-172.

高美英 國立藝術學院、淡江大學及文化大學等校兼任副教授。研究專長為家庭社會學及社會學方法研究。主要著作為與 Les B. Whitbeck 等人合著之：*The Effects of Divorced Mothers' Dating Behaviors and Sexual Attitudes on the Sexu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of Their Adolescent Childr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6 (August 1994):615-621.

王甫昌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副研究員。主要研究課題為族群關係、民族主義、社會運動及政治社會學。主要著作包括省籍融合的本質、族群同化與動員、光復後台灣漢人族群通婚的原因與形式初探、族群通婚的後果、台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等論文，散見各學術期刊。

張苙雲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在組織社會學和醫療社會學，近年來致力於組織和產業的研究，包括百年來醫院產業的結構變遷、醫療照顧的迷思、西醫在台定基過程、

金融產業的發展，以及人情關係運作等。目前進行的研究計畫為，組織主導的當代社會：組織與社會結構的研究，位置資本與制度信任是兩個核心概念。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九〇年代的台灣社會：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系列二 / 張苙雲, 呂玉瑕, 王甫昌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中研院社研所籌備處, 民86  
冊；公分.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專書；第1號)

ISBN 957-671-496-6 (上冊：精裝). --

ISBN 957-671-497-4 (上冊：平裝). --

ISBN 957-671-498-2 (下冊：精裝). --

ISBN 957-671-499-0 (下冊：平裝)

1. 社會變遷 — 台灣 — 論文, 講詞等 2. 社會  
— 台灣 — 論文, 講詞等

540.9232

86004723

專書第一號

## 九〇年代的台灣社會 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系列二(下)

主 編：張苙雲、呂玉瑕、王甫昌

出 版 者：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

發 行 者：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2段128號

印刷排版：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敦化南路1段294號11樓之5

初 版：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五月

定 價：精裝300元·平裝250元(單冊)

ISBN 957-671-498-2 (下冊：精裝)

ISBN 957-671-499-0 (下冊：平裝)

The Preparatory Office of th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 Series No.1

# Taiwanese Society in 1990s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Symposium Series II  
(part II)

Edited by  
Ly-Yun Chang, Yu-Hsia Lu, Fu-Chang Wang

---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 May 1997



15087186f

中華民國捌拾陸年陸月貳伍日錄



三

The Preparatory Office of th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 Series No.1

# Taiwanese Society in 1990s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Symposium Series II  
(part II)

Edited by

Ly-Yun Chang, Yu-Hsia Lu, Fu-Chang Wang